

剧场和戏 丛书

Michael Frayn

迈克·弗雷恩戏剧集

[英] 迈克·弗雷恩 著
胡开奇 译



哥本哈根
民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作家和史学家同样面对的巨大挑战就是要进入人们的脑中，要站在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并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要对他们的动机和意向做出合理的估量——而这恰恰是已有记载和将有记载的历史所不能企及的。即使当所有外在的实据已被掌握，进入角色们头脑之中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想象。这确实属于戏剧的本质。

—— 迈克·弗雷恩



ISBN 978-7-80225-323-0



9 787802 253230 >

定价：35.00元

剧场和戏 丛书

Michael Frayn

迈克·弗雷恩戏剧集

[英] 迈克·弗雷恩 著
胡开奇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克·弗雷恩戏剧集/(英)弗雷恩著;胡开奇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225-323-0

I.迈... II.①弗... ②胡... III.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英国—现代②戏剧文学—文学评论—英国—现代
IV.I561.35 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7625号

迈克·弗雷恩戏剧集

(英)迈克·弗雷恩/著 胡开奇/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装帧设计 林 涛 阿 提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11千字
版 次 2007年12月第一版 200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23-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译者前言

2002年暑期，我在上海译完了迈克·弗雷恩的《哥本哈根》的最后一句台词，舒了口气。译得很沉重，译得很难，可我很快乐。2004年又是暑期，我在上海译完了他的新作《民主》的最后一句台词，译得很投入，译得很累，可我依然很快乐。从《哥本哈根》的不确定性和科学家的困境到《民主》的政治社会与人的复杂性，弗雷恩提出的哲理命题总是那么沉重，那么苍凉，可我们从他作品的深处读到了人类的良知、人类的追求和人类的希望；这是最令人快乐的。更不必说他的戏剧作品所体现的质朴的形式、新颖的结构和富于诗意的语言。

今年4月30日，国家话剧院《哥本哈根》在北大纪念堂举行了它的百场演出；明年，《民主》一剧又将出现于北京的舞台。《哥本哈根》与《民主》曾先后发表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

艺术》，其中《哥本哈根》还曾由中国剧协的《剧本》月刊重发。今天由这两部剧作结集的《迈克·弗雷恩戏剧集》出版了，可见，严肃戏剧还未被我们的社会遗忘。在此，谨向严搏非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英国剧作家、作家及翻译家迈克·弗雷恩 1933 年 9 月 8 日出生在伦敦郊区。他母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在他 12 岁那年去世。做建材公司销售的父亲不得不让儿子离开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而就读于公立学校。在伦敦南部埃韦尔长大的小迈克顽强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在童年时便显露了音乐与诗歌的天赋，早在少年时代他便立志做一名作家。

在陆军服役期间他担任俄语翻译。随后他入读剑桥大学伦理学专业。1957 年剑桥毕业后，他开始了写作生涯，成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959 年后改称《卫报》) 和《观察家》(The Observer) 的专栏作家。其间，他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完成了《锡匠》(The Tin Men, 1965) (获萨默塞特·毛姆奖)、《俄文翻译》(The Russian Interpreter, 1966) (获霍桑奖)、《直到早晨过去》(Towards the End of the Morning, 1967) 和《隐秘至极的私生活》(A Very Private Life, 1968) 等小说。近年来他写了《登日》(Landing on the Sun, 1991) (获星期日快报年度图书奖)、《勇往直前》(Headlong, 1999) (获布莱克小说纪念奖)、《间谍》(Spies, 2002) (获惠特布莱德小说奖和英联邦作家奖)。弗雷恩本人还获得 2002 年的海伍德·希尔文学奖。

作为剧作家，弗雷恩早年的戏剧创作生涯却颇为坎坷。当他的小说接二连三获奖时他的剧作却屡遭退稿。一怒之下，他连续写了几部短剧，举行了个人短剧晚会。但由雷德格瑞夫 (Lynn Redgrave) 和布赖尔斯 (Richard Briers) 主演的《我

俩》(*The Two of Us*, 1970)相当失败,遭到了评论界无情的抨击。该剧首场公演后,弗雷恩在大街上被观众吐口水,唾骂。但他并未退缩,笔耕不辍。1975年,他的一部关于报界人士生活状态的剧作《字母顺序》(*Alphabetical Order*, 1975)获得了评论界的齐声喝彩,赢得了当年英国旗帜晚报最佳喜剧奖。接着他又写了《云》(*Clouds*, 1977)、《驴的岁月》(*Donkey's Years*, 1976)(获劳伦斯·奥利弗最佳喜剧奖)、《立与破》(*Make and Break*, 1980)(获旗帜晚报最佳喜剧奖)、《幕后的喧闹》(*Noises Off*, 1982)(获旗帜晚报最佳喜剧奖和劳伦斯·奥利弗最佳喜剧奖)、《施主》(*Benefactors*, 1984)(获劳伦斯·奥利弗最佳新剧奖),以及《哥本哈根》(*Copenhagen*, 1998)和《民主》(*Democracy*, 2003)。

弗雷恩还翻译了契诃夫的一系列剧作,如《樱桃园》(1978)、《三姐妹》(1983)、《万尼亚舅舅》(1988),以及四部独幕剧《烟草之恶》、《天鹅曲》、《熊》、《求婚》,等等。他还将契诃夫冗长松散的早年未命名剧作(国话版译为《普拉东诺夫》)翻译改编为《野蜜》(*Wild Honey*, 1984)。他的第一部电影《顺时针》(*Clockwise*, 1986)由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主演。第二部电影《第一个和最后一个》(*First and Last*, 1989)赢得了国际艾美奖。由迪士尼公司改编的电影《幕后的喧闹》拥有明星荟萃的演员阵容。他的剧作《字母顺序》、《驴的岁月》、《立与破》及《施主》均被UK电视拍成电影。2006年,他出版了《人类之手:宇宙造物中我们的角色》(*The Human Touch: Our Par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弗雷恩是成功的剧作家,也是成功的小说家和翻译家。早年他还是屡屡获奖的新闻记者。发人深省的是在他的各种体裁

与题材的众多作品中，贯穿着始终如一的主题——弗雷恩自己这样陈述：“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些作品表述的总是我们如何将我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所处的世界。”客观世界和人们试图驾驭它的徒劳，这两者间的冲突几乎是他永恒的主题。

弗雷恩在担任《卫报》专栏作家多年后开始他的戏剧创作。起初，他的成就在于以喜剧与闹剧来承载他的哲理探索。他的第一部重要剧作《字母顺序》的背景是外省的一家报社的剪报部门，主人翁不顾一切地试图规范源源不断涌入的信息。另一部闹剧式的《驴的岁月》则是一群中年男人闹哄哄地举行大学校友聚会的故事。他们彼此对青春时代印象的回忆和如今他们重塑的自我间的矛盾成为戏剧的焦点。而在《云》中，弗雷恩通过一个访问古巴的记者来揭示：对于陌生地域的印象，人们大都依据他们的所思所感。而在他看来，“这理性观念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思想被他们的见闻所左右”。

他的这些喜剧作品在伦敦西区演出都颇为成功，从而使弗雷恩成为人们公认的哲理喜剧作家。在《哥本哈根》与《民主》之前，他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喜剧《幕后的喧闹》。该剧展示了一家英国剧团正在上演一出典型英国闹剧的狂热的幕后场景。《幕后的喧闹》一举成功，在伦敦西区连续热演了四年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而该剧在世界各地火热地上演，更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此剧体现了他高超的编剧技巧。第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部英国闹剧在进行最后的混乱不堪的彩排，场上充斥着门的撞击、裤子的滑落和暧昧性爱的众生相。精彩的第二幕呈现的是幕后的场景，当演员与导演成为彼此背叛的牺牲品时，观众看到了幕后生活与艺术的撞击。而到第三幕时，原先的闹剧已成了彻底的狂乱。毫无疑问，此剧是对闹剧自身的脆弱性一个极为有趣的评判。演员上场的一丝疏忽或一个表演者的违规将

毁掉计划周密的整个彩排。如同弗雷恩的所有其他作品，此剧是对错乱生活的一个隐喻，秩序与无序之间的分隔是如此细微。弗雷恩的喜剧恰恰来自于人们试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客观世界的徒劳之中。在电影剧本《顺时针》中，他对这一主题又作了新的探索。剧中一个严格守时的校长整日欢乐而又绝望地与时间竞争以达到他的预期目标。当然他的哲理喜剧并非部部成功，比如他的《瞧看戏》（*Look Look*, 1990），他试图尝试另一新的角度——由观众席观看另一群观众看戏。但此剧的效果未能完全如愿，最终只上演了27场。

随后，他的《哥本哈根》与《民主》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许多人惊讶，何以一位天才的喜剧与闹剧作家突然将目光转向如此严肃沉重的主题。但这两部剧作并未背离他一贯的主题，而是对他过去所有作品的一种逻辑延伸。《哥本哈根》不仅仅是一部核物理学的智力剧，或是一部科学伦理的道德剧。它还是一部令人深思人类动机与宇宙无限的不确定性的哲理剧。《民主》则关注了政治社会与人的复杂性。

弗雷恩的剧作在围绕哲理主题的同时也有着多角度的开阔的视野。他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早期小说中的最佳作品《直到早晨过去》既是对弗里街怪异、滑稽的描述，也是一位绅士记者投入一场种族关系电视讨论的故事。《登日》说的是1970年代早期威尔逊（James H. Wilson）政府一个公务员的神秘死亡，而该公务员牵涉到政府的一项最高国防机密的研究项目。《勇往直前》中一位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在偶然发现一幅失踪的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名作后不顾一切探寻其秘密。故事融艺术史及学术探索为一体。而主人翁试图以他的主观意念来揣度这幅无限神秘的画作。

弗雷恩的译作也牵涉到他的哲理观念：“我们试图以我们的

直觉与语言，将我们的意念强加于我们知之甚少的世界。”弗雷恩为何唯独喜爱并翻译了契诃夫的剧作呢？显然，在所有剧作家中，契诃夫最为明了芸芸众生与茫茫宇宙间的戏剧性的深沟，所以他的人物总是无法忍受他们的生活现实，总是沉浸在对未来的向往之中。这两个作家之间有着真正的精神认同。同契诃夫一样，弗雷恩深知浩瀚的宇宙与悲欢而徒劳地试图改变它的众生之间的鸿沟，而戏剧是探索这条鸿沟的完美载体。

《哥本哈根》是弗雷恩在阅读了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的传记作品《海森伯的战争》（*Heisenberg's War*）后动笔的。这是他的首部历史剧作。它以后现代拼贴式结构和灵魂对话方式展开追忆。在伦敦和纽约公演后，好评如潮，除千禧年的托尼奖外，它还获得了英国的旗帜晚报奖、评论圈奖，法国的莫里哀奖，美国的外围评论圈奖、戏剧评论奖（Drama Desk Award）。

在剧中，作者运用正、反、合的结构来揭示“哥本哈根之谜”，在非线性叙事中蕴藏着严密的线性逻辑，呈现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剧本分两幕，两幕的内容同为三个鬼魂追溯1941年海森伯的哥本哈根之行，但审视角度迥异。相对于第一幕着重于展示科学家的道德观、科学观和历史事实，第二幕的“复述”则深入剧中人的心理层面，探求他们的灵魂，以不同的角度展示当时剧中人的动机，而非寻求事件的真相。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人类自身对历史、人性、真理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同政治、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悖论。

1941年，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突然来到丹麦访问他当年的导师和挚友、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他们曾合作多年，创立了量子理论。而如今，彼此成了战争中敌

对的双方。玻尔是德国的占领国丹麦的公民，海森伯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教授、纳粹德国原子能研究的领头人。此刻他们二人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问题在于，海森伯为什么来哥本哈根？他是为了了解、掌握同盟国的原子弹研究进展呢，还是为了将德国核研究情报告知玻尔以免德国得逞？他究竟是纳粹的帮凶，还是抵抗运动的英雄？正如海森伯一出场便宣称的：

“关于我，世人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测不准原理，另一事便是我在1941年去哥本哈根与尼耳斯·玻尔的神秘会面。大家都知道测不准原理，或自以为知道，但无人理解我的哥本哈根之行。”弗雷恩在剧中对若干问题作了探索，如会面动机的可能性，是否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如果出现的话，会对当时的战争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由于人们认为海森伯从事的原子能研究的目标是制造原子弹，这就触及到从事原子能研究的科学家们的道德与良知，毕竟原子能可被用来制造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核武器。

弗雷恩在探索这些可能性时运用了新颖、感人、有别于传统的戏剧手法。《哥本哈根》展示了一次关于悖论的试验，在众多不确定性之中，寻求人物灵魂的撞击，让观众透过剧作现在、过去、未来的时空转换，看到了人物不同的心理动机与他们复杂的性格。

弗雷恩曾说：“我所有的剧作都源自我对哲学的阅读。”《哥本哈根》一剧所表现的世无绝对真理的哲学观点就融入了剧中物理学家们对宏观物理与微观物理的讨论，于是，观众在此剧中看到人物关系也像物理学中粒子运动的测不准原理——“裂变的时刻刚开始便结束了”；“他们又一次各自分开，向黑暗中飞去”；“他的一切又像过去一样无法确定”。甚至滑雪也与这项原理不谋而合：“若你知道你的落点，你便不知道你的落速。而

即便你知道你的落速，你又不知道你的落点。”

该剧后现代性的主题不确定性还体现在剧中人物始终以虚无缥缈、时隐时现的魂魄形式出现这个细节上。剧中人追忆哥本哈根会谈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模糊不清：一个说9月，一个说10月；一个说在费莱德公园，一个说在书房。谈话时有没有落叶，有没有街灯？玻尔用玩具手枪射杀的是卡西米尔，还是伽莫夫？海森伯的到来，是想和玻尔一起阻止原子弹的研制，还是想在恩师面前以战胜国的姿态炫耀？他是否有能力帮德国人造出原子弹？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就像海森伯自己所说：“我是你的敌人又是你的朋友。我是人类的危险又是你的客人。我是粒子又是波……”

此剧也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佳作，充满了意识流色彩。人物在剧中承担了灵魂、叙述者、当事人的三重角色，切出切入，既真切，又模糊；流动的意识成为整出剧唯一真实的存在。

剧中科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思索，也正是作者的思索。海森伯在1941年之所以来到丹麦会见玻尔，内心是极为困惑的，爱国心与科学家的良知错综交杂。其动机之一就是与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科学家们达成一种默契，即各自向当局夸大制造原子弹的难度从而停止这项研究。如果这的确是海森伯的意图，他失败了。当他问道：“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玻尔勃然大怒，中断了与他的会面，因为他认为海森伯所领导的这项研究正在为纳粹德国提供原子弹。而谜点在于：玻尔是如何理解海森伯这一问题，又是如何误解的？

作者通过科学家的艺术形象来探寻人类的良知。玻尔后来加入了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研究计划。在剧中，科学家的良知令他为广岛、长崎的毁灭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当广岛原子弹

爆炸的消息传来时，海森伯则感到这一行动的野蛮与残忍不逊于纳粹的大屠杀。他说：“奥托·哈恩想要自杀，因为他发现了裂变，他能看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剧中的海森伯与玻尔形成了鲜明的性格对照，前者敏捷、锐利、自负，后者迂慢、谨慎，并不时地为一次海上事故失去儿子而自责不已。时时担任父亲角色的玻尔也未能阻止海森伯在研究中犯了一个严重的计算错误，延缓了德国原子弹的研制。弗雷恩在此又一次表明不确定的偶然因素如何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剧末，《哥本哈根》充满了生命的超脱感、宿命感。“我们尚在寻觅之中，我们的生命便结束了。”“我们还未能看清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便去了，躺入了尘土。”而结尾的“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这一句台词使全剧上升到哲理的境界。《哥本哈根》以充满张力的艺术手段成功地揭示了世间万物的不确定性的特征，为人们思考及审视人类自身及客观世界提供了新的视野。

2003年8月，弗雷恩的新剧《民主》由英国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制作，迈克·布莱克莫尔(Michael Blackmore)执导，公演于国家剧院的科特斯洛(Cottesloe)剧场。《民主》在伦敦公演后，佳评如潮，连获当年的旗帜晚报最佳戏剧奖、评论圈最佳戏剧奖和南岸最佳戏剧奖。《泰晤士报》(Times)的著名戏剧评论家班尼迪克特·南丁格尔(Benedict Nightingale)给了《民主》五星的最高评级。他说：“迈克·弗雷恩的《民主》是科特斯洛剧场有史以来最具感召力的作品。我为布莱克莫尔的舞台呈现而惊叹。”《卫报》的林·加德纳(Lyn Gardner)说：“迈克·弗雷恩的《民主》不仅仅是伦敦最深刻锐利，也是最感人

的作品。”尼古拉斯·德·戎(Nicholas de Jongh)在《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上撰文写道：“迈克·弗雷恩这部优雅的获奖作品带给了我们一种何等罕见的戏剧激情。”而约翰·皮特(John Pet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称赞《民主》“将是这十年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2004年5月,德文版《民主》在柏林上演。2004年11月,纽约版《民主》在百老汇首演。

该剧讲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和他的私人助理——东德间谍京特·纪尧姆的故事。尽管弗雷恩称之为故事,但其历史事实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剧情以1970年代初德国政坛的一起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为蓝本。时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在大选获胜后得以连任。但此后不到两年,因其助手纪尧姆被揭露为东德间谍,勃兰特被迫辞职。“我想写一部表现政治复杂性的剧。德国政治尤为佳例。因为它相当复杂。因为它是联邦制度,并且二次大战后德国的历届政府均为联合执政,尤为复杂的是,德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分割为两个国家。”弗雷恩说,“同时,我还特别想写勃兰特和纪尧姆,因为我认为此剧并不仅仅与政治的复杂有关,也关乎人类个体的复杂性。”

全剧以维利·勃兰特于1969年在西德联邦议会当选为第一位中左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场面开始,以柏林墙最终的倒塌崩落结束。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勃兰特投身抵抗纳粹运动,从1933年起流亡挪威。战后他回到德国投入了祖国的重建,并出任西柏林市市长。在他当选为西德总理后,以他特有的政治家的人性情怀,提出了极具远见卓识的谋求和解的东方政策,先后与莫斯科、波兰和东德签订了和约,使得东德与西德在1974年双双加入联合国,并最终实现了祖国的统一。

在剧中,我们可看到勃兰特政府内部的运作、德国人民对

勃兰特的崇敬与热爱、勃兰特跪在华沙犹太死亡纪念碑前的感人形象，以及他的宽容、人道、亲和的政治理念的深得人心。同时，当代民主政治及政治人物的复杂性、起伏的政治形势中勃兰特的个人生涯以及他同身边助手同僚们特别是同纪尧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贯穿全剧。潜伏在勃兰特身边的纪尧姆恍如隐形人般活跃在总理行政班子中，逐步赢得了勃兰特对他的信任。作为东德间谍的他对勃兰特极为崇敬爱戴，为勃兰特及他的东方政策不遗余力地工作与奉献。剧中勃兰特与纪尧姆、与其他政界人物之间都呈现了栩栩如生的、人性化的关系。

同《哥本哈根》一样，作者在戏剧场景、剧情及人物情感发展上运用了同样松散自如的手法。结构意义上的不同之处是《哥本哈根》的三个人物是来自坟墓的鬼魂，试图澄清一件争论不休、无法定论的史实，而《民主》则把历史事件活生生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皮特·戴维逊（Peter J. Davison）的舞台设计所展现的勃兰特在波恩的总理办公室是那样朴实无华，近乎赤裸。一架白色的金属螺旋梯连接着舞台的双层空间。上层为勃兰特的办公室，下层舞台空间环绕三张办公桌的墙面全部被书架覆盖，书架上摆满了卷宗、档案和书籍。当全剧高潮到来——柏林墙隆隆然崩坍时，舞台上的一座座书架也随之倾覆。

同《哥本哈根》一样，弗雷恩对他的历史剧《民主》题材的选择似乎有着同样的担心。他在伦敦里士满区的家中告诉来访的记者：“当人们问起此剧的主题时，我说，‘70年代的德国政治’，他们就立刻目瞪口呆了。”

但他何以对德国题材情有独钟呢？弗雷恩为德国所吸引由来已久，他一直十分喜爱德国，始终关注着它的历史与现状。现代德国历史对于欧洲至关重要，德国位于欧洲的中间地带，

欧洲的历史，无论何种结局，都围绕着它发生。一般说来，德国历史最令英国人感兴趣的是它的纳粹时期，但最能引起弗雷恩兴趣的却是在它的战后时期。德国如何从战后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双重废墟中得以重生，弗雷恩每次去德国都不得不为之震动。在一片废墟瓦砾中，德国人民重建起一个欧洲最为繁荣富强而又高度稳定文明的社会。因此，现代德国一直为弗雷恩所瞩目，特别是维利·勃兰特这位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特别具有人格魅力而为公众所喜爱的政治领袖。他是一个具有复杂的人格结构的政治人物。他是极具亲和力和感召力的领袖，可又有着致命的人性弱点：不仅好酒好女色，还被政治同僚们诟言为优柔寡断，同时他还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虽然他在多数公众场合表现出惊人的领袖魅力，但他时有因抑郁而无法言表的情状，这时他只能卧床而在外交辞令上称之为“发烧感冒”。

这种具有分裂性格的人物总是易于引起人们的兴趣，而故事尤为不寻常之处在于，勃兰特的下台是由另一位具分裂性格的人物——纪尧姆造成的。纪尧姆既是勃兰特忠实的私人助理又深深地热爱、崇拜着他。他在工作上对勃兰特忠心耿耿，勤勉高效。社会民主党内也对他信赖器重至极。然而，他同时又是东德国家安全的间谍。他运作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一只手坚定不移地支持勃兰特，另一只手则要颠覆他。而这似乎并未造成他良心上任何大的不安。就某种意义而言，人们都在同一时间追求着不同的可能性，人们都由极为矛盾的个性组合而成。但纪尧姆这个个体的矛盾组合最为极致也最具戏剧性。刻画和表现德国民主政治及政治人物个体的复杂性是弗雷恩创作《民主》一剧的原始动力。

西德！联邦共和国！并非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政体——十一个独立的民主实体合并为一个联邦，就像一窝雪貂装入一个口袋里！十一个独立的议会同时在发言，而在波恩的联邦议会试图让它的声音压到它们！三个政党，彼此上床下床就像喝醉了的读书人，光是波恩就有十五个冲突不断的内阁部长，就别说还有六千万个独立的自我。都在相互达成协议又背弃协议。都每时每刻四处张望着窥探别人的脸色。都试图猜想别人下一步怎么走。都在为自己谋求，都得靠着别人。不是一个德国。六千万个独立的德国。巴别通天塔！

弗雷恩用剧中人物克雷施曼的这席话来表述政治社会以及民主政治的复杂性，“巴别通天塔”取自基督教《圣经》，诺亚的后代拟在古城巴别建造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人突操不同语言，塔因此终未建成。此处隐喻民主政治之复杂性，但这还只是该剧浅层的哲理意义。何以该剧起名为“民主”？《哥本哈根》以事件发生地而命名，《民主》是否是针对作品中的政治制度而言呢？弗雷恩说：“如果当时德国政府所在地是柏林的话，我的剧名会用《柏林》。但是波恩似乎缺了力度，而“民主”正是该剧的真正的含义。它要说的是，每一个人作出任何决定的时候都会是何等的复杂困难，并非仅仅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你如何布置你的客厅或决定去哪儿度假。任何事物，只要牵涉到一个人以上，就会有政治争论、妥协、试图揣测别人的真实感觉，以求圆滑得体。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免不掉妥协与差错。因而该剧一方面谈了所有政治社会的民主，但在更深层次上，我认为所有人的自身内在存在着一种民主过程。”*

* 出自《弗雷恩谈〈民主〉》，见本书第328页，译文略有不同。——编注

的确，人们通常很少意识到自身的特性，就是人存在着一个盲点：无法了解自身。我们自信满满向外部世界公告的这个“我”实际上是一个想像——一个七拼八凑的容器承载着分裂和困惑着我们的变幻不定的无意识的组成。弗雷恩的《民主》一剧就是围绕着这个复杂的命题展开的。“我们每一个人自身都潜存着所有不同的可能性，”弗雷恩说，“把这些可能性凝聚起来，将每个人内在的所有可能的自我聚合成某种可实施的行动同外部世界的民主政治一样的艰难。”如果说《哥本哈根》强调了历史事件中人物动机是何等的难以确定，《民主》则揭示了人类的社会行为特别是人的个体内在的复杂性。就像剧中的纪尧姆，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实施着他东德间谍的使命，另一方面则忠心耿耿为勃兰特和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奋斗。而特别不同凡响的是，这些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并未使他内心失衡。事实上，纵观中外历史乃至现实生活，纪尧姆式的这类人物并不少见，关键是今天人们如何来面对他们。因而“民主”在弗雷恩的笔下是对人的外在世界——政治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的内在世界——性格心理的复杂性的一种隐喻。《民主》一剧中现代德国政治场景及政治人物的舞台呈现都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哲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巴别通天塔既在人们的身外又在人们的心中。

胡开奇

2007年7月于纽约

目录

译者前言 I

哥本哈根 I

后记 86

后记补遗 121

科学与历史背景简图 137

附文 《哥本哈根》剧中人物传记 142

量子力学与哥本哈根阐释 175

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哥本哈根》 184

民主 195

后记 281

附文 我和我的影子 315

弗雷恩谈《民主》 321

附录

弗雷恩访谈录 339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两幕剧

人物

玛格丽特	MARGERETHE
玻尔	BOHR
海森伯	HEISENBERG

本版本（包括剧本、后记、后记补遗、科学与历史背景简图）由作者改定于2003年1月。

第一幕

玛格丽特 可为什么呢？

玻尔 你还在想这事？

玛格丽特 他为什么来哥本哈根？

玻尔 如今我们三人都已死去，不在人世，亲爱的，还有什么要紧吗？

玛格丽特 人死去了，疑问还一直在，鬼魂般徘徊着，寻找着他们生前未能觅得的答案。

玻尔 有些疑问是无答案可寻的。

玛格丽特 他为什么来？他想告诉你什么？

玻尔 他后来解释了嘛。

玛格丽特 他解释了又解释，可一次比一次令人费解。

玻尔 说白了也很简单，他就想交谈一下。

玛格丽特 交谈？同敌人？在一场战争中？

玻尔 玛格丽特，亲爱的，我们算不上敌人。

玛格丽特 那是 1941 年！

玻尔 海森伯是我们最好的老朋友。

玛格丽特 海森伯是德国人，我们是丹麦人。我们在德国占领之下。

玻尔 当然，这的确令我们为难。

玛格丽特 那天夜里你对他那么生气，我从未见过你对别人这样。

玻尔 是那样吧，但我相信自己当时还是十分冷静的。

玛格丽特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气。

玻尔 他同我们一样的为难。

玛格丽特 现在已不再会有人被伤害，也不再会有人被出卖了。但当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玻尔 我怀疑他自己也从未弄清楚。

玛格丽特 自打那次来访后，他就不再是朋友了。那是尼耳斯·玻尔与沃纳·海森伯举世闻名的友情的终结。

海森伯 现在，我们都已过世，永远地离去了，是的，关于我，世人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测不准原理，另一事便是 1941 年我去哥本哈根与尼耳斯·玻尔的神秘会面。大家都知道测不准原理，或自以为知道。但无人理解我的哥本哈根之行。一次又一次，我向玻尔和玛格丽特，向讯问者们及情报局的官员们，向记者们与历史学家们，再三地解释。解释得越多，疑问就越深。不管如何，我还是乐意再试一下。如今我们都已离开人世，不再会有人被伤害，不再会有人被出卖。

玛格丽特 我从未真正喜欢过他，你知道的。或许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

玻尔 不，你喜欢他的。当他二十多岁刚来这儿的时候呢？你当然喜欢他的。当他同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在齐斯维

勒海滩的时候呢？他是家庭的一员。

玛格丽特 即便那时，他也有令人陌生的地方。

玻尔 那么敏捷，那么热切。

玛格丽特 太敏捷，太热切了。

玻尔 那双明亮专注的眼睛。

玛格丽特 太明亮，太专注了。

玻尔 但他是一位很伟大的物理学家，对此，我深信不疑。

玛格丽特 他们都很出色，所有来哥本哈根同你一起做研究的学者。你几乎把原子理论界的精英们都请来过。

玻尔 我越往回想，就越觉得海森伯是他们中最出类拔萃的。

海森伯 那玻尔呢？他是我们大家的引路人，我们大家的父亲。现代原子物理学就从他定量子理论既应用于物质也应用于能量开始的。那是 1913 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源自于他这一伟大的思想。

玻尔 当你想起 1924 年他第一次来我这儿工作时……

海森伯 我还刚完成博士学位，而玻尔已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了。

玻尔 ……仅仅一年多时间，他创立了量子力学。

玛格丽特 那是在他和你一起工作时产生的。

玻尔 主要部分是在哥廷根时同马克斯·玻恩和帕斯夸尔·约尔丹工作时完成的。而又过了一年左右，他便创立了测不准原理。

玛格丽特 是你作了补充。

玻尔 对这两个原理，我们都进行了争辩、探讨。

海森伯 大多数重要的研究我们都是合作的。

玻尔 海森伯通常是主导。

海森伯 玻尔则使它臻于完美。

玻尔 我们像企业般运作。

海森伯 总裁与总经理。

玛格丽特 父亲与儿子。

海森伯 一个家族企业。

玛格丽特 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儿子。

玻尔 在他不再担任我的助手后，我们又合作了很久。

海森伯 直到1927年，我离开哥本哈根回到德国。直到我做了教授，成了家。

玛格丽特 后来，纳粹上了台……

玻尔 合作就越来越难了。战争爆发后，就不可能了。直到1941年的那天。

玛格丽特 合作就永远结束了。

玻尔 是的，他为什么这样做？

海森伯 1941年的九月，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记作是十月。

玛格丽特 是九月，九月底。

玻尔 记忆是一种奇妙的日记。

海森伯 你翻开它，简洁的标题，工整的记述，在你的四周融化了。

玻尔 你踏上一页页的步阶，走入日日月月。

玛格丽特 过去在你的脑中成为现在。

海森伯 1941年9月，哥本哈根……顷刻间，我与我的同事卡尔·冯·魏茨泽克跳下来自柏林的夜车，身着便服雨衣，我俩走在满是土灰色的党卫军制服的人群中，到处是金色镶边海军呢，到处是精制的黑色秘密警察服。手提包中装着我的讲稿，脑中装着的则是另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我的讲题是天体物理学，而脑中的话题却难得多。

玻尔 我们显然无法去听他演讲。

玛格丽特 那自然了，如果他是在德国文化中心演讲。那是纳粹的宣传机构。

玻尔 他一定知道我们的感受。

海森伯 魏茨泽克是我的门生，他曾写信告知玻尔我的来访。

玛格丽特 他要见你？

玻尔 我想这就是他来的原因。

海森伯 但如何才能安排与玻尔本人的会面呢？

玛格丽特 他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情要谈。

海森伯 谈话必须显得很自然，必须是私下的。

玛格丽特 你真的没想过请他来我们家吗？

玻尔 那自然是他希望的。

玛格丽特 尼耳斯，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国家！

玻尔 他不是他们。

玛格丽特 他们是他们中的一个。

海森伯 首先是对玻尔工作的场所——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次正式拜访，在旧日熟悉的餐厅里一顿面面相觑的午餐，当然没机会与玻尔交谈。甚至他出席了么？当时。有罗森塔尔……我想，还有佩特森……几乎肯定，还有克里斯蒂安·默勒……真像在梦中。你永远无法看清当时身临其境的种种细节。那是玻尔吗——坐在餐桌的上首。我仔细地看，是玻尔，还有罗森塔尔，还有默勒，我该见的人都在……然而，多么尴尬的场合——我至今记忆犹新。

玻尔 场面糟透了，他给我们留下极坏的印象，什么占领丹麦是不幸的，但占领波兰是无可非议的，德国赢得这场战争是无疑的。

海森伯 我们的坦克已经在莫斯科城下。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

不，或许还有一件东西。是的，是有一件东西。

玻尔 当然他知道他被监视着，谁都必须切记。说话小心。

玛格丽特 不然，他将会被禁止出国。

玻尔 亲爱的，盖世太保在他的家里装了窃听器，在美国时他告诉过古兹密特。秘密警察曾传唤他去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地下室讯问。

玛格丽特 然后他们又放了他。

海森伯 我猜想他们是绝对想不到申请这次出访是何等的令人痛苦。卑躬屈膝地向党部申请，低声下气地请外交部的朋友疏通。

玛格丽特 他看上去怎样？变化大吗？

玻尔 老了点。

玛格丽特 在我的脑海中他还是个小伙子。

玻尔 他都快四十了。中年教授，快赶上我们这帮人了。

玛格丽特 你还要请他来家里？

玻尔 让我们理性地、科学地解决这一分歧。首先海森伯是一位朋友……

玛格丽特 首先，海森伯是一个德国人。

玻尔 一个犹太白人。纳粹是这样称呼他的。他教相对论，而他们说那是犹太物理学。他不能提爱因斯坦的名字，但他坚持教相对论，尽管备受攻击。

玛格丽特 所有真正的犹太人都失去了工作。他还在教。

玻尔 他还在教相对论。

玛格丽特 还是莱比锡的一位教授。

玻尔 在莱比锡，是的。但不是慕尼黑，他们不给他慕尼黑的教职。

玛格丽特 他本来可以去哥伦比亚的。

- 玻尔 或芝加哥。他有这两个学校的聘书。
- 玛格丽特 他不愿离开德国。
- 玻尔 他想留在那儿等希特勒下台后重振德国科学。他告诉过古兹密特。
- 玛格丽特 如果他被监视的话，他的一切都会被汇报的。他见了谁，他对别人说了什么，别人对他说了什么。
- 海森伯 对我的监视伴随着我犹如感染的疾病。但当时我偶然得知玻尔也被监控着。
- 玛格丽特 而你自己知道你被监视着。
- 玻尔 被盖世太保吗？
- 海森伯 他意识到吗？
- 玻尔 我没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 玛格丽特 被我们丹麦人监视着。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同海森伯勾结，那将是对他们对你的信赖的可怕背叛。
- 海森伯 请一位老朋友来家里吃晚餐算不上勾结吧。
- 玛格丽特 会给人以勾结的印象。
- 玻尔 是的，他置我们于这种困难的境地。
- 玛格丽特 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 玻尔 他一定有原因，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
- 海森伯 这将是一个极尴尬的处境。
- 玛格丽特 你不会谈政治吧？
- 玻尔 我们只谈物理。我想他要同我谈的也是物理。
- 玛格丽特 我想你一定清楚你们与我并非这房子里唯一的听众。如果你们有什么私下话，最好走出去谈。
- 玻尔 我不想谈什么私下话。
- 玛格丽特 你们可以再一起去散步。
- 海森伯 我可以提议出去散步吗？

玻尔 我认为我们不该再去散步了。不管他必须说什么，他可以诉之于众。

玛格丽特 或许有些新的想法，他想同你先谈谈。

玻尔 但会是什么想法呢？接着我们又谈什么呢？

玛格丽特 现在，不管怎样，你的好奇心被激发了。

海森伯 踏着秋日的暮色，我现在来到了卡尔斯贝格的玻尔家的门前，自然是被看不见的影子尾随着。我感觉怎样？畏惧？当然，那种对教师、雇主、父亲的畏惧感。我更畏惧的是我必须说什么，怎么说，如何开头。更恐惧的是一旦我失败了会发生什么。

玛格丽特 不会是与战争有关吧？

玻尔 海森伯是理论物理学家。迄今为止尚无人发现能用理论物理杀人。

玛格丽特 不会是关于裂变吧？

玻尔 裂变？他为什么要跟我谈裂变？

玛格丽特 因为这是你正在研究的课题。

玻尔 但不是他的课题。

玛格丽特 不是他的课题？似乎所有人都在搞。而你是公认的权威。

玻尔 他还没发表过裂变的论文。

玛格丽特 海森伯是原子物理学的创立者。当时他曾请教于你，每一步都与你商讨。

玻尔 那还是在 1932 年。裂变的研究仅仅是这三年的事。

玛格丽特 但如果德国人正利用核裂变研制某种武器……

玻尔 亲爱的，没人在用核裂变研制武器。

玛格丽特 但如果德国人正在做，海森伯一定会置身其中的。

玻尔 优秀的德国科学家有的是。

玛格丽特 优秀的德国科学家在美国或英国也有的是。

- 玻尔 显然，犹太裔的走了。
- 海森伯 爱因斯坦、沃尔夫冈·泡利、马克斯·玻恩……奥托·弗里施、莉泽·迈特纳……在理论物理上，我们曾领导过世界。
- 玛格丽特 那谁还继续在德国工作呢？
- 玻尔 索末菲，当然喽，还有冯·劳厄。
- 玛格丽特 都是老人了。
- 玻尔 沃兹。哈特克。
- 玛格丽特 海森伯远在他们之上。
- 玻尔 奥托·哈恩——他还在。不管如何，裂变是他发现的。
- 玛格丽特 哈恩是化学家，我觉得哈恩的发现……
- 玻尔 你是说恩里科·费米在罗马发现这一现象比哈恩早了四年？是的——不过他没有意识到那是裂变。没人想到铀原子会分裂，而转变为钡原子与氙原子。直到哈恩和斯特拉斯曼作了分析，并发现了钡。
- 玛格丽特 费米在芝加哥。
- 玻尔 他妻子是犹太人。
- 玛格丽特 这么说，是海森伯在负责这项研究吧？
- 玻尔 玛格丽特，没有这个项目！约翰·惠勒和我在1939年做过。在我们的论文中有这样一条表述，即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还无法利用裂变来制造武器。
- 玛格丽特 那为什么大家都还在研究它？
- 玻尔 因为其中有一个神奇的特征。你将一个中子撞击铀原子的核，它会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元素。这正是炼金术士所从事的。将一个元素变成另一个。
- 玛格丽特 那他为什么来这儿呢？
- 玻尔 现在，你的好奇心上来了。

玛格丽特 我有预感。

海森伯 窸窸窣窣地踩着熟悉的砾石路，我来到玻尔家的门前，拉了下熟悉的门铃。畏惧，是的。还有另一种这些年来我痛切地备感熟悉的情愫。一种自豪与完全无助的荒谬感的混合，在这个存活着二十亿人口的世界里，我是背负着无法承载的重任的那个人……沉重的门缓缓地开启了。

玻尔 亲爱的海森伯！

海森伯 亲爱的玻尔！

玻尔 进来，进来……

玛格丽特 从他们两人眼神相遇的刹那起，一切疑虑便消失了。旧日的火苗从灰烬中燃起。如果我们能省去这些小小的见面虚礼……

海森伯 我很感激你还能请我来。

玻尔 我们行事总得讲人情吧。

海森伯 我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

玻尔 那天午饭时，我们除了握手外，别无接触的机会。

海森伯 玛格丽特，我上次见到你还是……

玻尔 四年前，你来这儿时。

玛格丽特 尼耳斯没说错，你是老了些。

海森伯 我本来希望 1938 年在华沙的会议上能见到你俩……

玻尔 我记得你好像有什么个人的麻烦。

海森伯 柏林的一桩小事。

玛格丽特 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吗？

海森伯 一点误会吧。

玻尔 是的，我们听说了。很遗憾。

海森伯 这种事时有发生。现在解决了。幸而解决了。我们本

该在苏黎世见面的……

玻尔 1939年9月。

海森伯 当然，可是……

玛格丽特 战争爆发后的一个不幸的冲突。

海森伯 真是不幸。

玻尔 当然也是我们的不幸。

玛格丽特 多少人面临着更大的不幸。

海森伯 是啊，确实如此。

玻尔 然而，这就是现实。

海森伯 我能说什么呢？

玛格丽特 事已至此，我们谁还能说什么呢？

海森伯 无法说了。你们的儿子呢？

玛格丽特 挺好的，谢谢你。伊丽莎白呢？孩子们呢？

海森伯 他们很好。他们要我向你们问好。

玛格丽特 情况如此恶劣，他们还渴望着相见。而现在真的见面了，又竭力避免眼神的交流，几乎无法正视对方。

海森伯 我想你们是知道的，重返哥本哈根，重回这屋子，对我意味着什么。这几年来，我被隔绝了。

玻尔 我能想像。

玛格丽特 他几乎未注意我。在他费劲地谈话时，我似乎在洗耳恭听，实则是在察言观色。

海森伯 这儿情况很困难了吗？

玻尔 困难？

玛格丽特 自然，他不得不问，他总得说下去。

玻尔 困难……我该怎么说呢？迄今，我们还未受到别处已发生的肉体虐待。种族法还未实施。

玛格丽特 还没有。

玻尔 几个月前，他们开始驱逐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德分子。

海森伯 那你个人……

玻尔 被严密地隔离了。

海森伯 我一直为你担忧。

玻尔 多谢你了。不过，你在莱比锡还无需夜不成眠。

玛格丽特 又是沉默。他该说的都说了。现在该谈些轻松话题了。

海森伯 你还出海吗？

玻尔 出海？

玛格丽特 不该问这个。

玻尔 不，不出海了。

海森伯 松德海峡……

玻尔 布了水雷。

海森伯 哦，当然。

玛格丽特 我想他不至于再问尼耳斯是否还滑雪。

海森伯 你还去滑雪吗？

玻尔 滑雪？在丹麦？

海森伯 挪威，你过去总是去挪威的。

玻尔 那时候我是去的。

海森伯 不过，自从挪威也被……是的……

玻尔 也被占领后？是的，那就更容易了。事实上，我想我们现在几乎可以到欧洲任何地方度假了。

海森伯 真抱歉，我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玻尔 或许，是我太敏感了。

海森伯 当然没有，我应该想到的。

玛格丽特 现在，他想必开始希望自己已回到了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

海森伯 我不知道你是否想过来德国……

- 玛格丽特 这孩子真是傻。
- 玻尔 亲爱的海森伯，以为一个被强大邻邦蹂躏，被肆虐地、残忍地蹂躏的小国之民不具有像他们的征服者那般强烈的自豪感和爱国心，是一个易犯的错误。
- 玛格丽特 尼耳斯，我们有约在先的。
- 玻尔 只谈物理，对。
- 玛格丽特 不谈政治。
- 玻尔 真对不起。
- 海森伯 不必，我只是想说我在拜里施采尔的滑雪屋还在，所以不管有任何机会……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
- 玻尔 或许玛格丽特愿意在我的滑雪服上缝上一颗黄星。
- 海森伯 是了，是了，我太蠢了。
- 玛格丽特 又是沉默。开头燃起的火星熄灭了，现在火灰已变冷了。我几乎开始可怜他了。独自坐着，周围都是恨他的人。一个人面对着我们俩。他看上去又年轻了，就像1924年刚来的时候。比克里斯汀现在要年轻。羞怯、自负而又渴望被人喜爱；恋家而最后又渴望离去。可是，是啊，令人伤心，因为尼耳斯爱他，他曾是他的父亲。
- 海森伯 那……你现在搞什么课题？
- 玛格丽特 他现在只能这样谈下去。
- 玻尔 裂变，主要是这个题目。
- 海森伯 我在《物理评论》上看到了几篇文章。是不是裂变物的速率分布关系？
- 玻尔 是关于重氢核与核子的相互作用。你呢？
- 海森伯 好几个题目。
- 玛格丽特 裂变？
- 海森伯 我有时很羡慕你们的回旋加速器。

玛格丽特 为什么？你也在研究裂变？

海森伯 美国有三十多台，而在整个德国……反正……你们多多少少还去乡间别墅吧？

玻尔 是的，我们还去齐斯维勒。

玛格丽特 你是说，在整个德国……

玻尔 ……一台回旋加速器也没有。

海森伯 这个季节的齐斯维勒是很美的。

玻尔 你不是来借回旋加速器吧，是吗？你是为这来哥本哈根吗？

海森伯 我不是为这来哥本哈根。

玻尔 对不起，我们不能乱下结论。

海森伯 对，我们谁也不能乱下任何结论。

玛格丽特 我们得耐心地听下去。

海森伯 向整个世界解释问题并非总是容易的。

玻尔 我明白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我们的谈话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德国没有回旋加速器肯定不是军事秘密。

海森伯 我不清楚什么是秘密什么不是。

玻尔 至于他们为什么没有这种设备，也不是秘密。你不能说我可以。这是因为纳粹政府系统地削弱了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为何呢？因为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大都是犹太人。而为什么大都是犹太人呢？因为在德国，理论物理学，就是爱因斯坦、薛定谔和泡利、玻恩和索末菲、你和我所从事的物理学，被认为比应用物理学低一等。因而，犹太人只能拿到理论物理学教授与讲师的职位。

玛格丽特 物理，对吗？物理。

玻尔 这是物理啊。

- 玛格丽特 也是政治。
- 海森伯 痛苦的是，这两者有时很难分开。
- 玻尔 那你读过我那两篇文章了。我最近一直没有看到你的东西。
- 海森伯 没东西。
- 玻尔 这不像你。教学太忙？
- 海森伯 我没在教书，最近没教。
- 玻尔 亲爱的海森伯，他们没有拿掉你莱比锡的教席吧，你不会是为这来的吧？
- 海森伯 没有，我还在莱比锡。每星期都去一下。
- 玻尔 其余的时间呢？
- 海森伯 别的地方。问题是工作多了，不是少了。
- 玻尔 我明白。我明白了吗？
- 海森伯 你和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们还联系吗？玻恩？查德威克？
- 玻尔 海森伯，我们在德国占领之下，德国在和英国交战。
- 海森伯 我想你或许还和他们保持某种联系。那美国的同人们呢？我们和美国没有战争。
- 玛格丽特 还没有。
- 海森伯 你有没有泡利的消息？他在普林斯顿。古兹密特？费米？
- 玻尔 你想知道什么？
- 海森伯 一点好奇心而已。前天我还想起罗伯特·奥本海默。1939年，我和他在芝加哥有过一次很大的争论。
- 玻尔 是关于介子。
- 海森伯 他还在研究介子吗？
- 玻尔 很久没和他联系了。
- 玛格丽特 我们唯一的国外客人来自德国，就是三月份来过的你的朋友魏茨泽克。

海森伯 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朋友。我希望。你们知道他这次和我一起来哥本哈根的。他非常想再见你。

玛格丽特 三月份他来时，还带来了德国文化中心的主任。

海森伯 对此，我很抱歉。不过他真的是出于好意。他可能没告诉你文化中心是外交部文化处办的。我们有好朋友在外交部。特别是这儿的大使馆。

玻尔 当然，二十年代他父亲任驻哥本哈根大使时我便认识他了。

海森伯 情况变化不大，你知道的，德国外交部。

玻尔 它是纳粹政府的一个部门。

海森伯 德国实际上比它的外部形象复杂得多。政府不同的机构部门有着相当不同的传统，尽管都在改革。特别是外交部。我们这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行事上是非常传统的。他们一定会设法让当地重要的公民们能不受干扰地工作。

玻尔 你是在说，我正受着你们大使馆的朋友们的保护吗？

海森伯 我说的是，除非魏茨泽克没说清楚，那儿有自己人。如果你有时能接受一次偶然的邀请，他们会感到很荣幸的。

玻尔 出席德国大使馆的鸡尾酒会，同纳粹的大使一起喝咖啡、吃点心？

海森伯 出席演讲会、讨论会之类。任何社交活动都会有所助益的。

玻尔 我肯定它们会的。

海森伯 或许，在某些场合是必要的。

玻尔 在哪种场合？

海森伯 我想你我都清楚的。

- 玻尔 因为我是半个犹太人？
- 海森伯 我们都有需要朋友们帮助的时候。
- 玻尔 你就为这来哥本哈根？邀请我去德国大使馆，坐在他们的窗前欣赏我的丹麦同胞如何被驱逐出境。
- 海森伯 玻尔，你说，那你说，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怎么帮忙？
- 这对你太难，我理解。可对我也一样。
- 玻尔 是的，对不起。我毫不怀疑，你也是一片好意。
- 海森伯 就算我没说，除非……
- 玻尔 除非我必须牢牢记住。
- 海森伯 不管怎样，这不是我来的原因。
- 玛格丽特 也许，你该直截了当地说。
- 海森伯 你我过去总在傍晚时出去散步。
- 玻尔 常常去的。是的，在那个时候。
- 海森伯 为了过去的岁月，你今晚不想出去走走？
- 玻尔 今晚散步或许冷了点。
- 海森伯 这真是难。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哪儿见的面？
- 玻尔 当然记得。1922年在哥廷根。
- 海森伯 在一次欢迎你的演讲庆典上。
- 玻尔 那是很高的荣誉。我是感激不尽的。
- 海森伯 欢迎你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你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 玻尔 是的，是的。
- 海森伯 ……其二是因为当时你是欧洲极少数愿意与德国交往的人之一。战争结束已四年了，我们依然是弃儿。你向我们伸出了你的手。无论你去过哪儿，在哪儿工作，你总是用爱激励着人们。在丹麦，在英国，在美国。而在德国，我们崇拜你。因为你曾向我们伸出过你的手。

玻尔 德国变了。

海森伯 是的。那时候德国战败了，而你能宽容大度。

玛格丽特 但现在你们战胜了。

海森伯 于是宽容大度就更难了。但当年你向我们伸出手时，我们握住了。

玻尔 是的……不！你没有。事实上，你咬了它。

海森伯 咬了它？

玻尔 你咬了我的手。你咬了！我伸出手来，以一种政治家的风度，和解的姿态，而你却狠狠地咬了我一口。

海森伯 我咬了吗？

玻尔 我第一次注意到你，是在我哥廷根系列讲座的一次讲演中。

海森伯 你在说什么？

玻尔 你站起来，迎头痛斥我。

海森伯 哦……我提了一些看法。

玻尔 美丽的夏日，花园里飘来阵阵玫瑰的清香。大厅中座无虚席，一排排地坐满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人们都点头赞许着我的学养和智慧。突然，跳出一个毛头小伙子，指出我的数学计算是错误的。

海森伯 计算是错误的。

玻尔 那时你多大？

海森伯 二十。

玻尔 比世纪还小两岁。

海森伯 不到两岁。

玻尔 十二月五日出生，对吗？

海森伯 比世纪小 1.93 岁。

玻尔 精确数。

海森伯 不，这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精确数为 $1.928\cdots 7\cdots 6\cdots 7\cdots 1\cdots$

玻尔 我始终能跟上你，不管怎样。世纪也是。

玛格丽特 事已至此，尼耳斯突然又喜欢他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是因为哥廷根的那个夏日的回忆吗？还是为这一切？或是什么也不为？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坐下来用晚餐时，熄灭的灰烬又燃起了火焰。

玻尔 你总是那么好胜。在齐斯维勒打乒乓球时也是这样。当时你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

海森伯 我要赢，我当然想赢球，你也想赢。

玻尔 我想打一场轻松的球赛。

海森伯 你没看到你脸上的表情。

玻尔 我看到了你脸上的表情。

海森伯 那次在拜里施采尔的滑雪屋打扑克呢？你把我们全蒙住了！你还记得吗？用一副根本不存在的顺子！我们都是数学家，我们都在算牌，我们都 90% 地确信他手中没好牌。他却神神道道地不断加赌注，不断加赌注。真是疯狂的自信。直到我们对数学概率的信念动摇了，一个接一个全被蒙住了。

玻尔 我以为我有个顺子。我看错牌了，我把自己给唬了。

玛格丽特 可怜的尼耳斯。

海森伯 他可怜？他赢了！他把大家全掏空了。你真是疯狂地好胜。他有次还用想像出来的牌同大家打扑克。

玻尔 你同魏茨泽克在想像的棋盘上下棋。

玛格丽特 谁赢了？

玻尔 还用问吗？在拜里施采尔，我们从滑雪屋滑下山去买食品，他居然把这也当作一次比赛。你还记得吗？那

次有魏茨泽克，还有谁来着？你拿出一只秒表。

海森伯 可怜的魏茨泽克用了十八分钟。

玻尔 你下山只用了十分钟。

海森伯 八分钟。

玻尔 我忘了我用了多少时间。

海森伯 四十五分钟。

玻尔 谢谢你。

玛格丽特 我觉得，这儿也正进行着某种快速滑雪。

海森伯 你滑雪就像你的科学研究。你在等什么呀？等我和魏茨泽克滑回来，再建议我们在着重点上做细微调整？

玻尔 应该是吧。

海森伯 每一次你的障碍滑都要设计十七个方案？

玛格丽特 还没有我在一旁替他打出来。

玻尔 至少我知道自己的落点。按照你的滑速，你上升时违反了测不准原理的关系。若你知道你的落点，你便不知道你的落速。而即便你知道你的落速，你又不知道你的落点。

海森伯 我自然不会停下来思考它。

玻尔 不是说这个。或许是对你的某些研究的一个忠告。

海森伯 尽管如此，我通常总能到达目标。

玻尔 但你从不在乎沿路毁掉了什么。只要在数学上成立你就满意了。

海森伯 只要它能奏效就行了。

玻尔 而问题在于——用一般语言来说——数学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哲学内涵是什么？

海森伯 我知道你总是沿着我滑过的斜坡，一步步地选着你的路，从雪中刨根究底地挖出已被推翻的意义和推论。

- 玛格丽特 你滑速越高，越过断层和裂口就越快。
- 海森伯 滑速越高，思维越敏捷。
- 玻尔 不反对。那倒是最为……最为有趣的。
- 海森伯 你是说这是无稽之谈，然而它不是。当你以七十五公里的时速下滑时，决定不是人为的。突然，你面前万丈深渊，转左？转右？或思考一下然后死亡。在你的意识中你是双向转……
- 玛格丽特 就像那颗粒子。
- 海森伯 哪颗粒子？
- 玛格丽特 就是你所说的那颗沿着两条不同的切口同时行进的粒子。
- 海森伯 哦，在我们过去的推理试验中。是的，是的！
- 玛格丽特 或者就是薛定谔的那只可怜的猫。
- 海森伯 生死同在的状态。
- 玛格丽特 可怜的小家伙。
- 玻尔 亲爱的，它是只想像的猫。
- 玛格丽特 我知道。
- 玻尔 它同一小瓶氯化物一起被封闭在密室中。
- 玛格丽特 我知道，我知道。
- 海森伯 于是粒子在这儿，粒子也在那儿……
- 玻尔 猫是活的，猫也是死的……
- 玛格丽特 你既左转了，你也右转了……
- 海森伯 直到试验结束。要点在于，直到封闭的密室被打开，深渊被绕过；于是粒子又与自己相逢，猫死了……
- 玛格丽特 而你活着。
- 玻尔 没那么快。海森伯……
- 海森伯 转向自身就是决定。
- 玻尔 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海森伯 你是否就是这样射杀了卡西米尔？

玻尔 亨德里克·卡西米尔？

海森伯 他在学院作研究时。

玻尔 我从未开枪打过亨德里克·卡西米尔。

海森伯 你告诉我你干过的。

玻尔 是乔治·伽莫夫。我枪击了乔治·伽莫夫。你不知道——你走后很久发生的。

海森伯 玻尔，你枪击的是亨德里克·卡西米尔。

玻尔 是伽莫夫，伽莫夫。因为他坚持先发制人总比后发制人快，因而宁可先发制人而不可后发制人。

海森伯 于是你枪杀了他？

玻尔 是他！他去买来两支手枪，他口袋里放一支，我口袋里一支，然后我们继续那天的工作。过了几个小时，我们争论得厉害——我记不起为何了——应该是氮核子的问题——突然伽莫夫把手伸向口袋……

海森伯 玩具手枪。

玻尔 玩具手枪，是的。当然。

海森伯 玛格丽特显得有些担心。

玛格丽特 不，是有些吃惊，意料之外。

玻尔 你现在该想起他有多快。

海森伯 卡西米尔？

玻尔 伽莫夫。

海森伯 没有我快。

玻尔 当然没你快，可比我快多了。

海森伯 一粒高速中子。不过你是在说……

玻尔 但是，甚至在他还未拔出枪时……

海森伯 你完成了你的反制计划。

玛格丽特 我把它打出来了。

海森伯 你与克莱因核实了一遍。

玛格丽特 我重新打了一稿。

海森伯 你把它发给汉堡的泡利。

玛格丽特 我又重新打了一稿。

玻尔 在他还未拔出枪时，我的枪已在手中。

海森伯 可怜的卡西米尔就这样被轰掉了。

玻尔 是伽莫夫。

海森伯 是卡西米尔！他告诉过我！

玻尔 是吧，反正是他们俩中的一个。

海森伯 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俩同时既活着又死去。

玻尔 像一对薛定谔的猫。我们说到哪了？

海森伯 滑雪。或音乐。音乐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我弹钢琴时，乐章似乎从我心中流出——我只需让手随着它。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我觅得佳人的成功经历。在莱比锡比金斯的一次音乐晚会上，我们演奏了钢琴三重奏。那是1937年，正好是我麻烦连连……精神上危机重重时。我们演奏的是贝多芬的G大调交响曲。弹完了诙谐曲后，我抬头看一下伙伴们以便开始结尾的急板曲。恰在那时，我瞥见了坐在角落的一位年轻女性。只是短短的一瞥，我却立刻想到带她去了拜里施采尔，订婚，结婚，等等——自然是昙花一现的浪漫幻想。随后我们开始演奏急板曲，它的节奏快得可怕——快得你无暇恐慌。突然间，世间一切都可随心所欲。演奏完后，我还是去滑雪。我向那位姑娘介绍了自己——送她回家——然后，是的，一星期后我带她去了拜里施采尔——再一个星期我们订婚——三个月后我们结婚。一切完

全伴随着那急板曲的跳荡腾跃的快旋律。

玻尔 你说你被隔绝了，但你总还有个伴侣。

海森伯 音乐？

玻尔 伊丽莎白！

海森伯 哦，是的，自然喽，还有孩子们，……我一直羡慕你与玛格丽特之间的无话不谈。你的工作。你的难处。当然，还有我。

玻尔 我生来就是一个数学的奇异体，不是一，而是二的一半。

海森伯 数学应用于人时会变得很怪，一加一会得出这么多不同的和……

玛格丽特 沉默。他在想什么？他的生活？或我们的？

玻尔 在这同一时刻，我们想起了那么多事情。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物理学。

玛格丽特 所有的往事不知不觉全涌上了心头。

玻尔 我们自己的慰藉，我们自己的痛苦。

海森伯 沉默。毫无疑问，他们又想起了他们的孩子。

玛格丽特 那明亮的往事，那黯淡的往事，一桩一桩又重现了。

海森伯 他们的六个孩子，两个已不在人世。

玛格丽特 哈罗德，独自躺在那病房里。

玻尔 她想起了克里斯汀和哈罗德。

海森伯 两个死去的男孩。哈罗德……

玻尔 那么多年，独自躺在那可怕的病房里。

海森伯 还有克里斯汀，第一个孩子，他们的长子。

玻尔 每日在我眼前闪现的那片刻又出现了。

海森伯 船上的那短短片刻，海浪汹涌，当舵柄“砰”地猛然回撞，克里斯汀落入水中。

玻尔 如果我没让他把舵……

- 海森伯 水中的那长长的片刻。
- 玻尔 水中的那永久的片刻。
- 海森伯 当他挣扎着扑向救生圈时。
- 玻尔 就差一点就抓住了。
- 玛格丽特 我在齐斯维勒。我放下活计，抬头看去。尼耳斯站在门口，沉默地注视着我，当他把头扭过去，我已明白发生了什么。
- 玻尔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呀！那么一点点啊！
- 海森伯 一次又一次，舵柄“砰”地猛然回撞，一次又一次……
- 玛格丽特 尼耳斯扭过头去……
- 玻尔 克里斯汀扑向救生圈……
- 海森伯 然而，有些事他们甚至从未说过。
- 玻尔 有些事我们永远埋在心底。
- 玛格丽特 因为那是没法说的。
- 玻尔 现在……似乎我们应该暖和多了。你说过去散步的。
- 海森伯 实际上，天够暖和的。
- 玻尔 不会很久的。
- 海森伯 最多一个星期。
- 玻尔 去哪儿走走呢？还是那伟大的西兰之行？
- 海森伯 还是去埃尔西诺吧。我总想着你在那儿说过的话。
- 玻尔 亲爱的，你不在意吧？半小时？
- 海森伯 也许一小时。不，你说过，自从我们知道哈姆雷特曾住过那儿，整个埃尔西诺变了个样。那儿每一个暗角都提醒我们人类灵魂的阴影……
- 玛格丽特 于是，他们又去散步了。他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散步，那就是交谈。毫无疑问，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在我一生中，已打出太多稿关于不同粒子在未被观测时

如何运作……我知道尼耳斯，只要开头几分钟谈得投机，他绝对煞不住。即便只是出于好奇……现在他们说谈一小时，就意味着两小时，当然，也许三小时……他俩一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散步。在哥廷根，演讲之后，尼耳斯立刻去寻找那位与他辩论数学的自负的小伙子。拖着他在乡间漫步。走啊——走啊——成了朋友。海森伯来这儿为他工作后，他们又去散步了，进行那伟大的西兰之行。本世纪物理学的许多新思想就在他们的野外交谈中形成。在齐斯维勒的林间小径中漫步；同孩子们一起去海边，海森伯牵着克里斯汀的手。是的，在哥本哈根的每个黄昏，晚餐之后，他们就环绕着学院后面的费莱德公园散步，或沿着兰格利涅一直走到港口，边走边谈。那是在隔墙有耳之前很久很久了……但这次，1941年，他俩散步走着一条不同的路。离开十分钟后……他们回来了！尼耳斯站在门口时我几乎还未收拾好餐桌，我立刻发现他是何等的气愤——他无法看着我的眼睛。

玻尔 海森伯来告别的，他要走了。

玛格丽特 他也无法看着我。

海森伯 谢谢你，一个快乐的晚上，就像当年一样。辛苦你了。

玛格丽特 喝点咖啡吗？来一杯什么？

海森伯 我得回去准备明天的讲座了。

玛格丽特 你走之前还会来看我们吗？

玻尔 他有好多事呢。

玛格丽特 就像1927年那最糟的场面又重新出现，那是尼耳斯从挪威回来，第一次读了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论文。今晚起初时，他们似乎都忘了这事，虽然我没忘。或许

是他俩又突然记了起来。从两人的面部表情来看，发生了更糟的事情。

海森伯 请原谅我，如果我做了或说了什么……

玻尔 没什么，没什么。

海森伯 能来这儿与你俩重聚，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或许远超过你们的想像。

玛格丽特 你能来真使我们快乐。问伊丽莎白好。

玻尔 那是一定的。

玛格丽特 还有孩子们。

海森伯 或许，战争结束后……如果我们都能幸免……再见。

玛格丽特 政治？

玻尔 物理。无论如何，他不对的。他怎么能对呢？约翰·惠勒和我……

玛格丽特 换换空气说话，不好吗？

玻尔 换空气？

玛格丽特 也许去花园里转一转，比待在屋里对身体更好些。

玻尔 哦，是的。

玛格丽特 这对大家都好。

玻尔 是的，谢谢你……他怎么可能对呢？惠勒和我在1939年从头到尾核实过。

玛格丽特 他说了什么？

玻尔 没什么，我不知道。我气得没记住。

玛格丽特 是关于裂变吗？

玻尔 裂变怎么形成？你向一颗铀核子发射一颗中子，它分裂，从而释放能量。

玛格丽特 极大的能量，对吗？

玻尔 大约能够拂动一小片灰尘吧？但它同时又释放出二到

三个中子，而每个中子又可能分裂为另外的核子。

玛格丽特 这样那二到三个分裂的核子又释放出它们的能量？

玻尔 每个又产生二到三个中子。

海森伯 就像你在滑雪时，滚动一小片雪，雪片变成雪球……

玻尔 一个无休止扩大的连锁核分裂从铀元素发生，以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速，二倍，四倍，一级级地扩展。先一分为二，简单表述吧，然后二的平方，二的立方，二的四次方，二的五次方，二的六次方……

海森伯 其排山倒海的雷霆万钧之声在群山中回荡……

玻尔 直到最后，让我们这样说，在裂变的八十级之后， 2^{80} 片尘土被掀起。 2^{80} 是一个数字加上 24 个零。其尘土足以掩埋一座城市，城市中所有的人。

海森伯 但这里有一个暗结。

玻尔 谢天谢地，幸亏有一个暗结。天然铀有两种核素。绝大部分是只能与快中子产生裂变的 U-238。而绝大多数的中子只能与另一种核素 U-235 产生裂变，而这种 U-235 在天然铀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 1%。

海森伯 这就是玻尔的重大发现，是他又一个神奇的顿悟。那是 1939 年，在普林斯顿，他同惠勒一起在校园散步。一个典型的玻尔时刻，我真希望能身临其境。两人走着，走着，静默了足足五分钟后，他突然说：“听着，我现在完全明白了。”

玻尔 事实上，这是双重暗结。因为 U-238 迟滞了中子并吸收它们。于是，天然铀永远无法产生爆炸的连锁反应。你必须分离出纯 235，才能产生爆炸，并持续连锁反应直至更大的爆炸……

海森伯 八十级裂变，那就是说……

- 玻尔 ……你将需要多吨 U-235，而它是极难分离出来的。
- 海森伯 令人窒息的难。
- 玻尔 冷酷无情的难。最好的估算，1939年，我在美国做过，仅分离一克 U-235，就需 26,000 年。到那时，无疑，这次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他是错的，你明白，他是错的！或者我错了吗？我可能计算错吗？让我想想……238 吸收快中子的速率为多少？慢中子在 235 中的自由轨的平均值是多少……
- 玛格丽特 但海森伯究竟说了什么？这是当时以及后来所有人想知道的。
- 玻尔 这正是英国人想知道的，查德威克一联络上我就问，海森伯究竟说了什么？
- 海森伯 玻尔究竟回答了什么？这当然是我回国后，同事们问我的第一件事。
- 玛格丽特 海森伯对尼耳斯说了什么——尼耳斯回答了什么，最想知道这一切的是海森伯自己。
- 玻尔 你是说，战后，1947年，他重返哥本哈根时。
- 玛格丽特 这次不是由看不见的盖世太保警察护送，而是由非常显眼的英国情报部的看守人员陪同。
- 玻尔 我记得，他要几样东西。
- 玛格丽特 两样东西。大包的食品……
- 玻尔 给他在德国的家人的，他们已濒于饥饿线了。
- 玛格丽特 还有就是要你确认 1941 年你俩间的谈话。
- 玻尔 交谈和前次一样，一开口就话不投机。
- 玛格丽特 甚至连那晚上谈话的地点你们都说法不一。
- 海森伯 我们去了哪儿？当然是费莱德公园，过去我们常去散步的地方。

玛格丽特 但是费莱德公园在学院后面，离我们家足有四公里呢。

海森伯 我能看到飘落的秋叶在室外乐池旁边的街灯下掠过。

玻尔 是的，因为你把它记作是十月！

玛格丽特 而那是九月。

玻尔 没有落叶！

玛格丽特 况且那是 1941 年，没有街灯！

玻尔 我记得我们就没走出我的书房。我能看到书桌台灯下纸页的飘动。

海森伯 我们绝对是在外面，因为我的谈话是叛国的，如果被窃听到，我是要被处决的。

玛格丽特 那你说的秘密是什么呢？

海森伯 它不是什么秘密，从来也没什么秘密。我记得绝对清楚，因为事关我的安危，我言语极为小心。我简单地问你，一个有道义良知的物理学家能否从事原子能实际应用的研究，对吗？

玻尔 我记不起了。

海森伯 你记不起了，不，因为你立刻变得非常警觉，你当场就哑了。

玻尔 我惊呆了。

海森伯 惊呆了。好，你想起来了。你站在那儿，惊恐地盯着我。

玻尔 因为，含义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你正在研究它。

海森伯 然后，你贸然断定，我正为希特勒研制核武器。

玻尔 你就是！

海森伯 没有！只是一个反应堆！那是我们正在研制的东西！一个制造动力的机器！用来发电，驱动船只！

玻尔 你根本没说什么反应堆。

海森伯 我什么都没说！没法多说。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话会被

窃听，多少话你会告诉别人。

玻尔 但我问过你，你真的认为铀裂变能够应用于制造武器吗？

海森伯 呵！现在想起来了！

玻尔 而我清楚地记得你的回答。

海森伯 我说，我现在知道它是能够的。

玻尔 这真令我万分惊恐。

海森伯 因为你一直深信不疑研制武器必须有 235，而我们绝对分离不到足够的量。

玻尔 反应堆——是的，或许是的。你可用天然铀保持一种慢速的连锁反应。

海森伯 尽管我们当时意识到，就是一旦我们启动了反应堆……

玻尔 天然铀中的 238，便会吸收快中子……

海森伯 完全符合你 1939 年的预测，试验的一切都循着你的基本论述发展。238 吸收快中子，然后一起转化为另一新的元素……

玻尔 铀，而它在逐步衰减的过程中会转化为另一种新的元素……

海森伯 至少它可以像我们无法分离的 235 那样裂变……

玛格丽特 钚。

海森伯 钚。

玻尔 我本该自己得出这个结论的。

海森伯 如果我们能建成反应堆，我们就能造炸弹。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哥本哈根。但是我什么都不能说。而谈到这点你不愿再听。炸弹已在你脑中迸裂。我意识到我们在走回去，我们的散步结束了。我们这次谈话的机会永远失去了。

玻尔 因为我已经抓住了核心要点，那就是不管用何种方法，

你已经发现了为希特勒提供核武器的可能性。

海森伯 你至少抓住了四个不同的核心要点，而它们都不是事实。你告诉罗森塔尔我了解你的裂变研究。你告诉维斯可夫我向你打听同盟国的核研究项目。查德威克以为我想向你证实德国没有核项目。而后你似乎又对别人说我要聘你进行这项研究。

玻尔 很好，让我们从头开始。这次没有盖世太保躲在暗处，没有英国情报官员。没有任何人监视我们。

玛格丽特 只有我。

玻尔 只有玛格丽特。我们把整个事情向玛格丽特说清楚。我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们不是为自己搞科研，我们搞科研是为了向人们解释……

海森伯 用简单的语言吧。

玻尔 用简单的语言。不是你的方式，我知道，你最乐于用尽可能纯粹的微分方程式来表述——但为了玛格丽特……

海森伯 简单地说吧。

玻尔 简单地说。好，我们现在在路上散步。我绝对冷静，专注地听，你要说什么？

海森伯 这不仅仅是我要说什么！是在柏林的德国全体核科学家们！当然不是迪布纳，不是纳粹——而是魏茨泽克、哈恩、沃兹、延森、豪特曼斯。他们都要我来向你求救。我们都把你视作我们的精神父亲。

玛格丽特 教皇，那时你们在背后这么叫他的。现在你们要他给你们赦免。

海森伯 赦免？不！

玛格丽特 这是你的同事延森的话。

- 海森伯 我绝不需要什么赦免！
- 玛格丽特 你曾对一位历史学家说过廷森的表述是确切的。
- 海森伯 我说过吗？赦免……我是为赦免来的吗？就像是拼命回忆在学院你请我的那次午餐上还有谁作陪。那天的座上客们对我的所作所为解释不一。我环顾着……佩特森、罗森塔尔，还有……是的……现在赦免成了他们的一致用语……
- 玛格丽特 但是，我觉着赦免用于过去的已犯下的罪行，不能用于正在策划并行将进行的犯罪。
- 海森伯 正是如此。这就是为何我如此震惊！
- 玻尔 你感到震惊？
- 海森伯 因为你的确给了我赦免！千真万确你给了我！当我们匆匆往回赶时你喃喃自语地说，在战争时期，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的祖国竭尽全力，对吗？
- 玻尔 天知道我说了什么。但现在，我极度冷静、理智，斟酌词句。你不是要赦免。我理解。你要我告诉你不要做。好，我按着你的手臂，像教皇般地注视着你。回德国吧，海森伯，把你的人召集到实验室，告诉他们：“尼耳斯·玻尔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将新型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提供给战争狂人是……”我该怎么说？“……一个有趣的想法。”不，甚至不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一个真正的相当严肃枯燥的想法。”然后怎么样？你们全都扔掉盖革计数器？
- 海森伯 显然不会。
- 玻尔 因为他们会逮捕你们。
- 海森伯 会不会逮捕我们并无关系。客观上后果会更糟。我是为威廉皇家研究所搞的项目，但有一个竞争项目在陆

军兵器部，由库尔特·迪布纳负责，他是纳粹党员。如果我离开，他们只要让迪布纳接手我的项目，无论如何，他会搞下去。沃兹和其他同人就是用我来阻止迪布纳及纳粹的插手。我的愿望就是继续保持控制。

玻尔 所以你要我既不说做也不说别做。

海森伯 我要你细心地听我说下去，而不是像个疯子般地满街跑。

玻尔 很好。现在我像教皇似的慢慢踱步，全神贯注地洗耳恭听……

海森伯 研制核武器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

玻尔 是的。

海森伯 而且会耗去巨额的资源。

玻尔 巨额的资源，那是无疑的。

海森伯 那么，迟早政府都得征询科学家们的意见，值不值得投入这些资源——有无希望及时生产出核武器用于战争。

玻尔 当然是，但……

海森伯 等等。这样他们将不得不来找你和我。继续或停止，你我是向他们建言的人。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最终决定将在我们手中。

玻尔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海森伯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

玻尔 这就是你冒着危险，风尘仆仆赶来的原因？这就是你抛却我们二十年友情的原因？就为了告诉我这一点？

海森伯 就这一点。

玻尔 可是，海森伯，现在，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你告诉我的目的何在？我该做什么？被占领的丹麦政府是不会来问我是否该生产核武器的！

海森伯 是不会，但只要我掌控着这个项目，德国政府迟早会

来找我！他们会问我是继续还是停止！我将必须作出如何回答的决定！

玻尔 那你就可轻易脱离困境了，就把对我说的简单的真情告诉他们，强调其难度之大。或许他们就会知难而退。或许他们会失去兴趣。

海森伯 但是，玻尔，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如果我们设法使计划失败，后果又会怎样呢？

玻尔 你都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海森伯 斯德哥尔摩一家报纸报道说，美国正在研制原子弹。

玻尔 啊，现在你说了，你说出来了。现在我全都明白了。你以为我跟美国有联系。

海森伯 你有可能。这是可以想像的。在被占领的欧洲，如果说有人和美国有联系的话，那就是你。

玻尔 所以你的确想知道同盟国的核计划。

海森伯 我想知道它是否存在，一个暗示，一条线索就行。我背叛自己的祖国，冒着生命危险来告诉你德国的核计划……

玻尔 那我现在该回报了？

海森伯 玻尔，我必须知道！我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同盟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我该为我们国家作什么选择呢？你说过，人们容易错误地以为弱小国家的国民们的爱国心会少些。是的，然而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出生在德国，德国养育了我。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我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

的妻子；德国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该为他们选择什么！再战败一次吗？再让伴随我长大的噩梦重现吗？玻尔，我的童年是在慕尼黑兵荒马乱的内战中度过的。还要更多的孩子像我们那样挨饿吗？还要他们再过我学生时代那样的夜晚吗？在那寒冷的冬夜，我手膝并用匍匐着爬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大雪与夜幕的掩护下去乡间为全家找吃的。还要他们再过我十七岁时那样的夜晚吗？在那备受煎熬的夜晚，我守着那天明就要被处决的、吓坏了的犯人，跟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凌晨。

玻尔 但是，亲爱的海森伯，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我不知道同盟国是否有核计划。

海森伯 它在进行，甚至就在你我谈话之时。或许我那时选择了比战败更糟的事情。因为他们制造的原子弹将用来对付我们。广岛的那个夜晚，奥本海默说他的一大遗憾便是未能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轰炸德国。

玻尔 事后，他痛苦不堪。

海森伯 事后，是的。我们至少在事前就多少感到痛苦。而他们中有没有人，哪怕是一个人，停下来想过，哪怕是短短一刻，他们在做什么？奥本海默想过吗？费米想过吗？特勒？齐拉特？当爱因斯坦在1939年写信敦促罗斯福拨款研究原子弹时，他想过吗？两年后当你逃出哥本哈根，去了洛斯阿拉莫斯时，你想过吗？

玻尔 亲爱的，善良的海森伯，我们没有给希特勒提供原子弹呀！

海森伯 你们也没有把它投向希特勒。你们把它投向了能投到的任何人。街上的老人与妇女，母亲与孩子。如果你

们来得及的话，受难的会是我的同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那是目标，对吗？

玻尔 那是目标。

海森伯 炸弹扔在城市后所发生的一切，你从未有过一丁点概念，哪怕是常规炸弹。你们中谁也没经历过，一个也没有。一天晚上，在一场疯狂的空袭之后，我从柏林市中心走到郊外，当然没有交通工具。整个城市在燃烧。连街道上的水坑都在燃烧，水坑里是熔化了了的磷。它粘在鞋上，像闪闪发光的狗屎——我不得不停地把它擦掉——所有的街道都好像刚被一群地狱里来的恶狗糟践过。没准让你发笑——我的鞋还不断烧起来，我的四周，是陷在火中的人们，烧成各种各样，狼藉扭曲的尸体。而我想的却是，在这种时候我怎样才能再弄到一双鞋？

玻尔 你是知道同盟国的科学家们为何研究原子弹的。

海森伯 当然。是恐惧。

玻尔 同折磨你的恐惧一样。因为他们害怕你也在研究。

海森伯 但是，玻尔，你本该告诉他们的！

玻尔 告诉他们什么？

海森伯 我在1941年告诉过你的！选择在我们手中！在我——在奥本海默的手中！那就是，既然我能在他们询问时回以简单的实情，简单的、令其失望的实情，他也能够！

玻尔 这就是你要我做的？不是告诉你美国人在做什么，而是让他们停下来？

海森伯 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一起停下来。

玻尔 我同美国人没有联系！

海森伯 你同英国人有联系。

玻尔 那是后来。

海森伯 盖世太保截获了你发给他们的关于你我会面的电文。

玛格丽特 电文转给了你？

海森伯 为什么不呢？他们开始信任我。这就给了我继续控制局面的可能。

玻尔 不是指责，海森伯，但如果这是你来哥本哈根的计划，这是……我能说些什么呢？这是最有趣的。

海森伯 这不是计划，这是个希望。甚至还算不上希望，只是细如发丝般的一线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的可能性。但值得一试，玻尔！绝对值得一试！可你已经怒气冲冲无法理解我在说什么了。

玛格丽特 不，他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他开始理解了！德国人逼走了大多数优秀的物理学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美国和英国给了他们庇护。而这也可能为同盟国提供拯救的希望。这时你立刻赶来了，吼着缠着尼耳斯，要他劝说他们放弃。

玻尔 玛格丽特，亲爱的，也许我们该尽量和颜悦色地表达自己吧。

玛格丽特 但这太气人了！真让人气得喘不过气来！

玻尔 这是大胆的滑雪，我只好这样说。

海森伯 但是，玻尔，我们不是在滑雪！我们不是在打乒乓！我们不是在摆弄玩具手枪和虚拟的牌！第一次听到广岛的消息时，我拒绝相信它。我以为那只是当时我们亲身经历的奇异梦境中的一个。天知道，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德国成了一片废墟时，那些梦就变得越来越离奇。突然间，废墟消失了——梦中常有的事——我们转眼间来到了英国中部乡间的一座豪宅里。我们

被英国人集中起来——整个班子，所有从事核研究的人们——我们被软禁了。在亨廷顿郡的农庄馆，四周是乌斯河的水草地。我们的家人在德国挨饿，而我们每晚与优雅的主人，看管我们的英国官员们，一起享受着丰盛的正餐。就像战前的家庭晚会——一个那种戏剧舞台上的家庭晚会，与世隔绝，你知道，所有的客人都因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受邀。没人知道我们在那儿——英国没人知道，德国没人知道，甚至我们的家人也不知道。但是战争已经结束。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们会像剧中人物一样，一个接一个，被悄无声息地杀掉。同时，一切都是那么温文尔雅。我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为晚会助兴，瑞特纳少校，我们好客的监狱官，为我们朗读狄更斯，提高我们的英文……这些事情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吗……？我们等待着真相大白的一天。那个晚上终于到来了。它甚至比我们所恐惧的更荒唐怪诞。消息由无线电广播了，我们一直困惑痛苦着的事情，你们实实在在地做了。所以，我们在那儿，与殷勤的主人共进晚餐，欣赏着狄更斯。我们被关了起来，免得同任何人讨论这事，直到你们大功告成。当瑞特纳少校告诉大家时，我拒绝相信，直到亲耳听到九点钟的新闻。我们不知道你们干到了什么程度。我无法描绘当时大家的反应。你潇洒地玩着你的玩具手枪，然后别人拣起它，扣动扳机……霎时，血流遍地，人们在号叫，因为它根本不是玩具……我们坐了整整半夜，谈论着，试着面对它。我们确实感到震惊。

玛格丽特

是因为它确实被做成了？还是因为你们没有做到？

海森伯 两者。两者。奥托·哈恩想要自杀,因为是他发现了裂变,他能看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格拉赫,我们年迈的行政主管,也要寻死,因为他的手是如此可耻的干净。然而你们成功了。你们造出了原子弹。

玻尔 是的。

海森伯 你们把它用于一个活的目标。

玻尔 一个活的目标。

玛格丽特 你不是在指责尼耳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做错了什么事吧?

海森伯 当然不是,玻尔从未做过错事。

玛格丽特 在尼耳斯去之前,事情早就决定。不管他去否,原子弹总是会被造出来的。

玻尔 无论从哪方面讲,我的作用都是很小的。

海森伯 奥本海默说你是研究小组的忏悔神父。

玻尔 这似乎是我的终身角色。

海森伯 他说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玻尔 可能是精神上的,不是技术上。

海森伯 费米说长崎那颗炸弹的引信是你研制的。

玻尔 我提出过一个想法。

玛格丽特 你不是在暗示尼耳斯该为什么作解释或辩护吧?

海森伯 没人要求过他解释或辩护。他是个十足的好人。

玻尔 这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我与决策无关。

海森伯 是的,而我却不行。我在不断的解释和自辩中度过了我生命的后三十年。1949年我去美国时,许多物理学家居然都不屑与我握手。那些造过原子弹的手不愿碰我的手。

玛格丽特 如果你以为你已向我解释得够清楚的话,让我告诉你,你并没有。

- 玻尔 玛格丽特，我理解他的感情……
- 玛格丽特 我不理解。我像你当时一样气愤！你太容易使自己良心受责备。他为何把自己的负担转嫁于你？就为他那次同你至关重要的商讨之后的所作所为吗？他回到柏林告诉纳粹他能造出原子弹！
- 海森伯 但我强调的是分离 235 的困难。
- 玛格丽特 你对他们说了坏。
- 海森伯 是对几位低层官员。我必须让他们抱有希望。
- 玛格丽特 不然，他们会派别人来。
- 海森伯 迪布纳，非常可能。
- 玛格丽特 我们手头总有一个迪布纳来承担我们的罪责。
- 海森伯 迪布纳或许能走得比我远。
- 玻尔 迪布纳？
- 海森伯 可能，很有可能。
- 玻尔 他的能力还不及你的四分之一。
- 海森伯 还不到十分之一，但他有着十倍的愿望。如果是他而不是我同阿尔伯特·斯佩尔会面的话，情况可能就截然不同了。
- 玛格丽特 著名的斯佩尔会谈。
- 海森伯 那是举足轻重的、作决策的关键时刻。在 1942 年 6 月，哥本哈根之行的九个月后。一切研究都被希特勒取消，除非它能立刻产生效果——斯佩尔是决定项目去留的唯一裁决人。这时我们第一次发现反应堆启动的迹象，第一次发现中子量增加。不多——13%——但它是个开端。
- 玻尔 1942 年 6 月，你比芝加哥的费米还稍早一点。
- 海森伯 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而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开始了恐怖轰炸，他们摧毁了半个吕贝克和整个罗斯托克与科隆

的中心地带。我们极需反击的新式武器。我们的项目就遇上了这样一个难逢的时刻。

玛格丽特 你没要求他继续提供经费？

海森伯 继续反应堆的研究？我当然要求了。但我要的不多，以免他把它太当回事。

玛格丽特 你是否告诉他反应堆会产生钚？

海森伯 我没告诉他这一点。不能告诉斯佩尔，不，我没告诉他反应堆会产生钚。

玻尔 惊人的疏忽，我得承认。

海森伯 结果如何呢？奏效了！他给了我们一笔经费，仅仅能维持反应堆项目的运转。这就是德国原子弹的结束。这就是它的终结。

玛格丽特 但你们继续反应堆的研究。

海森伯 我们继续着反应堆的研究。当然，现在，不再存在运转它来生产制核弹的钚这一危险了。没有了，我们的研究很顺利。为改进它，我们疯狂地工作。我们拖着反应堆横跨德国，从东到西，从柏林到施瓦本，四处躲避轰炸，躲避俄国人追捕。迪布纳企图在路上劫持它，我们没让他得手，在施瓦本侏罗山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把它建了起来。

玻尔 是海格洛赫吗？

海森伯 那儿有个天然隐蔽处——村里酒店有一个酒窖挖在峭壁之下。我们在酒窖地下挖了个坑洞，装上反应堆，继续研究。我置它于我的控制之下，直到那痛苦的结尾。

玻尔 但是，海森伯，现在我要冒昧地说，我要冒昧至极地说：你甚至无法置反应堆于你的控制之下，因为它会置你于死地。

- 海森伯 它未曾被测试，从未达到临界状态。
- 玻尔 感谢上帝。汉布罗和佩林在盟军接手后，测试过它。他们说它没有镉控制杆。而当反应堆过热时，没有任何能吸收过量中子的物质来降慢反应。
- 海森伯 没有控制杆，没有。
- 玻尔 你相信反应将会自限。
- 海森伯 那是我当初的想法。
- 玻尔 海森伯，反应是无法自限的。
- 海森伯 直到 1945 年，我才明白。
- 玻尔 所以你一旦让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它就会熔化，在地心的尽头消失。
- 海森伯 绝对不会。我们有一块镉。
- 玻尔 一块镉，你们准备用一块镉来做什么？
- 海森伯 把镉投入水中。
- 玻尔 什么水？
- 海森伯 重水。就是把铀浸在里边的减速剂。
- 玻尔 我亲爱的好海森伯，并非指责，不过你们都发疯了。
- 海森伯 我们几乎成功了！我们的中子量神速增长！达到了 670% 的增长率。
- 玻尔 你们在那个山洞里与世隔绝！
- 海森伯 再有一个星期。再有两个星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切！
- 玻尔 盟军的到来才救了你们！
- 海森伯 我们几乎到达了临界质量。再稍大一点点，连锁反应就能无限地自我保持了。我们只需再增加一点铀。我和魏茨泽克出发去找迪布纳：又一次恐怖的横跨德国之行。一波接一波的空袭——没有火车——用自行车——我们最终失败了！在中部某地的一家小酒店里

歇脚时，我们听着四周炸弹落地的呼啸声，而收音机里有人在演奏贝多芬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

玻尔 但一切仍然在你的控制下？

海森伯 在我的控制下——是的！这就是关键！在我的控制之下！

玻尔 到那时，谁都无法控制了！

海森伯 是的，到最后，我们已无任何约束！越接近终点，我们的工作效率就越高！

玻尔 你已不再驾驭着这个项目，海森伯，这个项目驾驭着你。

海森伯 再有两个星期，再加两块铀，德国物理界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核自动连锁反应堆。

玻尔 只是费米两年前就在芝加哥完成了。

海森伯 我们不知道。

玻尔 在那个洞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像洞中的鼯鼠一样完全瞎了。佩林说洞里没有任何防辐射装置。

海森伯 我们没时间去考虑那个。

玻尔 当时如果它真的达到临界……

玛格丽特 你们已全都死于辐射病。

玻尔 我亲爱的海森伯！我亲爱的孩子！

海森伯 是的，但那样的话，反应堆就真的运行了。

玻尔 我应该在那儿提醒你的。

海森伯 启动反应堆，启动反应堆，那是我们当时唯一的愿望。

玻尔 你总是需要我在旁边替你减速。我是你的一块镅。

海森伯 如果我在当时死去，我会错过什么？三十年的竭力解释，三十年的非难与敌视。连你们都背弃了我。

玛格丽特 你又来到了哥本哈根，又来到了蒂斯菲尔德。

海森伯 它再也不一样了。

玻尔 是的，再也不一样了。

海森伯 我有时感到在海格洛赫的最后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那段时间出奇地宁静，远离了柏林的政治，远离了空袭轰炸。战争快结束了。反应堆成了我们唯一的寄托。我们并未疯狂，我们也有闲暇的时候。在我们石洞上方的崖顶，有一座寺院，我常常独自躲到教堂的风琴台上弹奏巴赫的赋格曲。

玛格丽特 你看他，他迷失了。像个迷路的孩子。整天在树林里，这边跑，那边跑，不时地表现自己，时而勇敢，时而怯懦，做过错事，做过好事。现在天黑了，他只想回家，可他迷路了。

海森伯 沉默。

玻尔 沉默。

玛格丽特 沉默。

海森伯 舵柄又一次“砰”地猛然回撞，克里斯汀落入水中。

玻尔 他又一次挣扎着扑向救生圈。

玛格丽特 我又一次放下活计抬头看去，尼耳斯站在门口，沉默地注视着我……

玻尔 那么，海森伯，你为什么在 1941 年来哥本哈根？不错，你要告诉我们你心中的恐惧。但关于美国人是否在研制原子弹，你并不认为我会告诉你实情。

海森伯 是的。

玻尔 你也并不真的期待我制止他们。

海森伯 是的。

玻尔 不管我说什么，你将回德国继续你的反应堆研究。

海森伯 是的。

玻尔 那么，海森伯，你为什么还要来？

海森伯 我为什么还要来？

玻尔 再给我们说一次，再写一稿。这次要把事情弄清楚，使我们能理解。

玛格丽特 或许，也使你自已更理解。

玻尔 毕竟，原子的运动是难以解释的。我们解释了多次，一次比一次更令人费解。但最终我们成功了。所以——再写一稿，再写一稿。

海森伯 我为什么来？再次重温 1941 年的那个傍晚，我踏着熟悉的砾石路，拉响了熟悉的门铃。满脑子是什么？恐惧，还有传递噩耗的人的那种荒诞而可怕的自豪感。但……是的……还有别的感觉。哦，它又来了，我几乎能看到它的脸。它那么美好，那么明亮、热切、充满希望。

玻尔 我打开门……

海森伯 他出来了，一看到我，眼睛发亮。

玻尔 他微笑着，那副小心翼翼的学生气的笑容。

海森伯 那是我充满安慰的一刻。

玻尔 那无限喜悦的瞬间。

海森伯 就像长久离家后的归来。

玻尔 就像走失了很久的孩子出现在门前。

海森伯 突然，我脱离了水中那漆黑窒息的漩流。

玻尔 克里斯汀活着，哈罗德还未出生。

海森伯 世界又安宁了。

玛格丽特 你看他们，在这一时刻，还是父亲和儿子，尽管我们如今都已死去。

玻尔 这一时刻，是的，又到了二十年代。

海森伯 我们又像过去那样倾心交谈，相互理解。

玛格丽特 在这两个头脑中，未来在显现。哪些城市将毁灭，哪些城市将留存。谁将死去，谁将活着。哪个世界将绝迹，

哪个世界将凯旋。

玻尔 我亲爱的海森伯！

海森伯 我亲爱的玻尔！

玻尔 进来，进来……

第二幕

海森伯 那是 1924 年的早春三月，我第一次来到哥本哈根，北欧天气，寒风凛冽，但太阳不时地照耀着，阳光晒在皮肤上，带给人们早春美妙的暖意，最初的万物复苏的气息。

玻尔 你那时二十二岁，那我该是……

海森伯 三十八岁。

玻尔 差不多就是你 1941 年来哥本哈根的年纪。

海森伯 那我们做什么呢？

玻尔 套上靴子背上登山包……

海森伯 搭上电车直到终点……

玻尔 然后开始步行！

海森伯 向北到埃尔西诺。

玻尔 一边走一边谈。

- 海森伯 向西到齐斯维勒。
- 玻尔 从希勒勒返回。
- 海森伯 谈笑间走完了一百英里。
- 玻尔 从那时起，不管谈多谈少，我们风雨无阻地持续了三年。
- 海森伯 在学院你的公寓里，我们共用晚餐，分享一瓶葡萄酒。
- 玻尔 然后我来到你的房间……
- 海森伯 那可怜的小房间在勤务部的阁楼上。
- 玻尔 我们继续交谈，直到凌晨。
- 海森伯 可怎么交谈呢？
- 玻尔 怎么交谈？
- 海森伯 我们如何交谈？用丹麦语？
- 玻尔 当然是德语。
- 海森伯 我用丹麦语讲课。在我来丹麦十个星期后，我就作了首次学术报告。
- 玻尔 我想起来了，你的丹麦语已经很漂亮了。
- 海森伯 不，你将了我一军，报告开始前半小时，你漫不经心地说：“哦，我想，今天，我们用英语讲。”
- 玻尔 但当你解释……
- 海森伯 向教皇解释？我哪敢呢。你所听到的漂亮的丹麦语是我对英语的最初尝试。
- 玻尔 我亲爱的海森伯！不过，还有我们自己的语言，对吗？亲爱的，你记得吗？
- 玛格丽特 我不在场，我怎么知道你们用什么语言？你以为我有窃听器吗？
- 玻尔 不，不——耐心，亲爱的，耐心！
- 玛格丽特 耐心？
- 玻尔 你口气冲了些。

玛格丽特 一点也没有哇。

玻尔 我们得顺着思绪回溯到迷津的起点。

玛格丽特 我留神着脚下的每一步。

玻尔 我想，你不介意吧？

玛格丽特 介意？

玻尔 把你留在家里？

玛格丽特 而你们去徒步旅行？当然不。我干吗要介意呢？你应该出去走走。两个儿子接连降临，对男人来说都是够呛的。

玻尔 两个新生儿子？

玛格丽特 海森伯。

玻尔 是的，是的。

玛格丽特 还有我们自己的儿子。

玻尔 阿埃基？

玛格丽特 恩斯特！

玻尔 1924年——没错——恩斯特。

玛格丽特 第五个孩子，对吗？

玻尔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三月份，你说得对——他还不到……

玛格丽特 一星期。

玻尔 一星期？是一星期，是的。你真的不介意？

玛格丽特 真的。我挺高兴你有机会出去走走。你一直带你的新助手徒步旅行的。克拉末1916年来时，你也带他出去过。

玻尔 是的。那时克里斯汀出生才……

玛格丽特 一星期。

玻尔 是的……是的……你知道，我几乎杀了克拉末。

海森伯 不是用玩具手枪？

- 玻尔 用水雷。在我们散步时。
- 海森伯 哦，水雷。对，我们散步时你说过。不仅是克拉末——你几乎杀了你自己！
- 玻尔 一个被波浪冲到浅滩的水雷……
- 海森伯 于是他们立刻比赛向它扔石头。你当时在想什么？
- 玻尔 我不知道。
- 海森伯 也许那是一种埃尔西诺举动。
- 玻尔 埃尔西诺？
- 海森伯 人们灵魂深处的暗角。
- 玻尔 你也有过类似愚蠢的举动。
- 海森伯 我有过吗？
- 玻尔 你和狄拉克在日本，你们登上一座塔。
- 海森伯 哦，那座塔。
- 玻尔 据狄拉克说，你在塔的尖顶上，在大风中做单腿独立平衡动作，我庆幸自己不在现场。
- 海森伯 也是埃尔西诺，我承认。
- 玻尔 当然是埃尔西诺。
- 海森伯 我一直嫉妒克拉末，你知道的。
- 玻尔 嫉妒他的显赫。你不是这样说他的吗？
- 海森伯 因为这就是他。你的红衣主教，你的爱子。直到我的出现。
- 玛格丽特 他是个出色的大提琴手。
- 玻尔 他是个出色的全才。
- 海森伯 岂止出色。
- 玛格丽特 我喜欢他。
- 海森伯 我被他吓倒了。我刚来学院时，你请来的这帮神童们，个个灵气逼人，才华横溢，全把我震住了。但克拉末

显然是你的继承人。我们都只能使用综合厅，而克拉末在你的隔壁有他的专用工作室，就像在中心轨道上紧绕着核子运转的电子。他对我的物理观念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你能用传统力学解释原子的一切。

玻尔 但他错了。

玛格丽特 而且，不久那间专用工作室便空出了。

玻尔 而另一颗电子进入了中心轨道。

海森伯 是啊，整整三年我们生活在原子之中。

玻尔 同时，在整个欧洲，其余的电子也在外围轨道环绕着我们运转。

海森伯 马克斯·玻恩和帕斯夸尔·约尔丹在哥廷根。

玻尔 是的，而薛定谔在苏黎世，费米在罗马。

海森伯 查德威克和狄拉克在英国。

玻尔 约里奥和德布罗意在巴黎。

海森伯 伽莫夫和兰道在俄国。

玻尔 大家都进进出出于相互的机构，彼此来往。

海森伯 每一列国际邮车上都装载着我们的论文和论文原稿。

玻尔 你还记得古兹密特和乌伦贝克的旋转说吗？

海森伯 这是无人能解释的原子的量子状态的最后一个变项。最后一道障碍……

玻尔 这两个疯狂的荷兰人退回到一个荒唐的观点，电子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旋转。

海森伯 当然，大家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哥本哈根的看法是什么？

玻尔 我正巧在去莱顿的路上。

海森伯 于是就成了教皇出巡！专列在途中停靠汉堡……

玻尔 泡利和斯特恩等在站台上问我对旋转说的看法。

- 海森伯 你告诉他们它是错的。
- 玻尔 不，我说它非常……
- 海森伯 有趣。
- 玻尔 我想我正是用了这个词。
- 海森伯 然后车子又到了莱顿。
- 玻尔 在出口处见到了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我改变了主意，因为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你明白吗？——我是教皇——他是上帝——因为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分析，解决了我所有的疑点。
- 海森伯 那时，我正在哥廷根顶替马克斯·玻恩，所以你在返回的途中绕道哥廷根。
- 玻尔 你和约尔丹在车站接我。
- 海森伯 还是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旋转说？
- 玻尔 当车子到达柏林，泡利站在月台上。
- 海森伯 沃尔夫冈·泡利，只要有一丝可能，他绝不会离开他那张床……
- 玻尔 我在来的途中已和他在汉堡见过一次了……
- 海森伯 他专程从汉堡赶到柏林就是为见你第二次面……
- 玻尔 想知道在途中我对旋转说有了什么新的想法。
- 海森伯 啊，那几个年头！那令人惊讶的几年！那短短的三年！
- 玻尔 从1924年到1927年。
- 海森伯 从我到哥本哈根跟你工作开始……
- 玻尔 直到你接受莱比锡的教席，离开哥本哈根为止。
- 海森伯 那有着寒峭、激越的北方春天的三年。
- 玻尔 最后，我们有了量子力学，有了测不准原理……
- 海森伯 我们有了互补性……
- 玻尔 我们有了完整的哥本哈根阐释。

海森伯 欧洲恢复了它的光荣。在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中，德国回到了它的中心主导地位。谁是领路人呢？

玛格丽特 你和尼耳斯。

海森伯 是的，是我们。

玻尔 是我们。

玛格丽特 这就是你为何在 1941 年又回来？

海森伯 为了那三年中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所想的一切……就在我们谈话的此刻一切好像又在我眼前！我们那时的工作方式，我们完成一切研究的方式……

玻尔 我们一起。

海森伯 我们一起。是的，我们一起。

玛格丽特 不。

玻尔 不？你说不，什么意思？

玛格丽特 你们不是一起做的。这一切中，你们没有一件是一起做的。

玻尔 不对，我们一起做的，我们当然是一起做的。

玛格丽特 不，你们没有。每一项研究都是在你们分开时完成的。你首先在黑尔戈兰岛搞出了量子力学。

海森伯 是的，完成时已是夏天，我得了花粉热。

玛格丽特 在黑尔戈兰岛，你独自一人，住在北海中部一个满地礁石的荒岛上，你说那儿没有任何纷扰……

海森伯 我的思路开始清晰，我对原子物理的本质产生了轮廓鲜明的图像。我突然醒悟到我们必须把它限制在我们能实施的计量与观测中。我们无法看到原子中的电子……

玛格丽特 比之更甚，尼耳斯无法看到你的想法，你也无法看到他的想法。

海森伯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电子产生的效果，它们反射的

光……

玻尔 但你要解决的难题，是我们在公寓的晚餐时，在齐斯维勒的海滩边一起探讨的。

海森伯 当然是的。但我记得，那个夜晚数学计算才开始与原理一致起来。

玛格丽特 在黑尔戈兰岛。

海森伯 在黑尔戈兰岛。

玛格丽特 你自己。

海森伯 艰难极了——当时我不懂矩阵微积分……兴奋至极，老出计算错误。但凌晨三点时，我算了出来。我似乎通过原子表象看到了一个奇异美妙的内在世界。一个纯数学结构的世界。我激动得无法入睡，一个人跑到岛的南端。那儿有一块我一直想攀登的突入大海的巨大礁石。在黎明的曦光中我登上崖顶，躺下来，俯瞰着大海。

玛格丽特 你自己。

海森伯 我自己。是的——快乐极了。

玛格丽特 比你冬天回到哥本哈根和我们大家一起时要快乐些。

海森伯 什么，就是听薛定谔的那套胡说八道？

玻尔 胡说八道？慢着，慢着，薛定谔的波方程式？

玛格丽特 是的。忽然间所有人都不理睬你那新奇的矩阵力学。

海森伯 无人能理解它。

玛格丽特 但他们能理解薛定谔的波力学。

海森伯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过！我们又倒退回传统物理学！而当我对接受它表示些许谨慎时……

玻尔 些许谨慎？不是指责，但是……

玛格丽特 ……你说它是令人厌恶的！

海森伯 我说过它的物理含义令人厌恶，薛定谔也说我的数学令人厌恶。

玻尔 我似乎记得你用的词是……好了，我不必在别人面前再说这些了。

海森伯 私下地说。但那时人们都发狂了。

玛格丽特 他们认为你纯粹是嫉妒。

海森伯 有人甚至称其为怪里怪气的知识势利。你极度愤慨。

玻尔 我站在你这边。

海森伯 你把薛定谔请来……

玻尔 平心静气地讨论分歧。

海森伯 你同他疯狂地争吵。你到车站接他——那是自然——他还没把旅行包拿下车，你就开始向他猛烈进攻。然后你同他从清晨争吵到深夜。

玻尔 我争吵？他争吵！

海森伯 因为你不愿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玻尔 他也不愿！

海森伯 你把他吵到生病！他只好躲在床上不见你。

玻尔 他有点感冒发烧。

海森伯 玛格丽特只好照看他！

玛格丽特 我用茶和蛋糕来增强他的体力。

海森伯 是的。而你甚至追到病房里，坐在床边，继续向他不停出击！

玻尔 绝对温文尔雅地。

海森伯 你集教皇、教廷和宗教裁判所于一身！而后，接着，在薛定谔逃回苏黎世后——这是我永世难忘的，玻尔，我也永远不会让你忘掉——你开始站到他那边！你向我出手了！

- 玻尔 因为那时你已怒火中烧！你变得如此偏激！拒绝让波动说在量子力学里占一席之地。
- 海森伯 你完全倒戈了！
- 玻尔 我提出波动力学与矩阵力学仅仅是不同的方法。
- 海森伯 就像你一直指责我的，“只要它奏效就行”，不管它的意义如何。
- 玻尔 我当然在乎它的意义。
- 海森伯 语言上的意义。
- 玻尔 纯语言上的，是的。
- 海森伯 在这儿的意义是指它的数学意义。
- 玻尔 你以为只要数学上成立，意义无所谓。
- 海森伯 数学就是意义，那是意义的本质！
- 玻尔 但最终，最终，我们必须能够向玛格丽特完全解释清楚。
- 玛格丽特 向我解释？你们甚至无法相互解释！你们每晚争到凌晨！两人争得青筋暴跳！
- 玻尔 我们争得精疲力竭。
- 玛格丽特 是云室结束了你们的争论。
- 玻尔 是的，因为你将一颗电子从原子中分离，把它放入云室，你能看到它的轨迹。
- 海森伯 那是胡扯。根本不可能有轨迹！
- 玛格丽特 根据你的量子力学。
- 海森伯 没有轨迹！没有轨道！没有轨迹或轨线！只有外在的效应！
- 玛格丽特 确有轨迹，我亲眼见到，清清楚楚就像行船的尾波。
- 玻尔 一个神奇的悖论。
- 海森伯 你实际上就爱悖论，那是你有问题。你陶醉在这种自相矛盾中。

玻尔 是的，而你却永远无法理解悖论及自相矛盾的启示。那是你的问题。你生活与呼吸在悖论与自相矛盾之中，但你就是看不到它们的美，就像鱼看不到水的美一样。

海森伯 我时常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封闭的地狱中，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多拼命，在漆黑的空间里爬上爬下，如同想吞食什么人——而且我能猜出会是谁。

玻尔 然而，这就是我们研究物理的方式。

玛格丽特 不，不！最后还是你自己完成的！你也一样，你去了挪威滑雪。

玻尔 我不得不彻底摆脱一下！

玛格丽特 你独自在挪威完成了互补性。

海森伯 以他的滑雪速度，他必须做点什么来保持血液循环。不做研究就会被冻坏。

玻尔 是啊，而你在哥本哈根……

海森伯 终于开始思考。

玛格丽特 你们两个分开后，好多了。

海森伯 他的离去给我的自由解放感就像我在黑尔戈兰岛摆脱了花粉热。

玛格丽特 如果我是你们的老师，我绝不让你俩坐一起。

海森伯 就在那段时间，我完成了测不准原理。在二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我独自在费莱德公园漫步。夜深了，当我转进公园时，浓浓的夜色里我孑然一人。我开始设想，如果此时你在挪威的山巅架起一座射电望远镜来观测我，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我走在布莱格丹姆斯维基的街灯下，然后我消失在黑暗中，而当我走到室外乐池前的街灯下时，你又瞥见了。这就是我们在云室中看到的。不是连贯的轨迹，而是一串闪现——

穿行的电子与各种水蒸气分子的一连串碰撞……就像你，在你伟大的1925年莱顿出巡中，玛格丽特在哥本哈根的家中看到了什么？来自汉堡的一张明信片，或许还有一张来自莱顿，一张来自哥廷根，一张来自柏林。因为我们在云室中看到的甚至还不是碰撞自身，只是环绕着它们凝聚的水滴，其范围之大，如同环绕着旅行者的城市——不，甚至还要大得多，相对而言——整个国家——德国……荷兰……再德国。没有行程路线，没有确切地址，只是笼统的一列走访的国家。我不清楚我们为什么原先没想到，只是太忙于争吵而无暇去想罢了。

玻尔 你似乎已放弃了所有形式的讨论。当我回到挪威时，你已完成了测不准原理的文稿，而且已付诸发表。

玛格丽特 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玻尔 我亲爱的好海森伯，在我们未曾一起讨论之前，就匆匆地发表初稿，可不是坦荡的举动！不符合我们合作的惯例！

海森伯 不，我们合作的惯例就是你从清早到深夜不停地烦扰我！我们合作的方式就是你逼得我发狂！

玻尔 是的。因为论文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错误。

玛格丽特 又争起来了。

海森伯 不，我只是显示给他关于宇宙的最奇怪的真实，这是自相对论以来，人们一直困惑不解的——即你永远无法知道关于粒子的确切方位，或其他一切，也包括正以他那令人发狂的方式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的玻尔。因为我们无法观察它，除非在现场引入某一新元素，比如，一粒与其相撞的水蒸气分子，或一束光——那种

有自身能量的物质，这样，在相撞时，才会产生效果。毫无疑问，是微小的，就玻尔这个例子来说……

玻尔 是的，当我们讨论粒子时，如果你能以我们所说的精准来确认我的方位，你依然能测出我的速度……

海森伯 相当于每秒钟十亿分之一的十亿分之一公里。然而，理论焦点依然存在，即在宇宙中你并无绝对准确的方位，此一说法同其余某些观点一样，撼动着科学体系的整个基础——因果关系。因为你如果不了解事物的今天，你必定无法知晓它们的明天。我将你置身的客观世界打得粉碎——而你只能说表述中有一差错！

玻尔 是有差错！

玛格丽特 你们谁要茶？蛋糕？

海森伯 听着，在我的论文中，我们要测定的不是一颗在云室中沿轨道运行的自由电子，而是一颗在原子中以自然状态运行的电子……

玻尔 而测不准原理依然不能成立，正如你的陈述，当它被侵入的光子相撞而进入不规定反弹时……

海森伯 简单语言，简单语言！

玻尔 这是简单语言。

海森伯 听着……

玻尔 标准的数学语言。

海森伯 听着！哥本哈根是一个原子，玛格丽特是它的核。差不多吧，比例呢？一万比一？

玻尔 是的，是的。

海森伯 现在。玻尔是一颗电子，他环绕着城市漫步。由于他在暗中，无人知晓他在何处。他在这儿，他在那儿，他哪儿都在，又哪儿都不在。北到费莱德公园，南至卡

尔斯贝格，走过市政厅，向外到港口。我是光子，一束光子，被发射入黑暗中以寻找玻尔。我成功了，因为我设法与他相撞……但是，结果呢？看——他被迟滞了，转向了！他不再像我撞上他前那般玩命地转悠了！

玻尔 但是，海森伯，海森伯！你也偏向了！如果人们能够从他们的光束中观察到你的变化，他们就能解决我的变化！困难就在发现你的变化！因为要理解人们如何观测你，我们就必须把你不仅看作是一颗粒子，而且也看作是一个波。我不仅得用你的粒子力学，还得用薛定谔的波动力学。

海森伯 我知道——我把它写在我的论文附言中了。

玻尔 大家只记住论文——没人记住附言。但问题却十分重要。粒子是物质，在本体完成。波是来自于异体的干扰。

海森伯 我知道。互补性。在附言中论述了。

玻尔 它们非此即彼，无法共存。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或另一种观测方式。而一旦这样做，我们就无法了解它们的整体。

海森伯 于是他又转入轨道，巧合地再一次例证了互补性概念的应用。在你的漫步中，你的确切方位当然完全取决于你的基因以及各种自然力对你的作用。但也同样完全取决于那时时刻刻在发生、你自己也无法知晓的念头。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你的行为，除非同时以两种方式观测你，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的不寻常的旅程并非是宇宙客观的整体呈现。它们只是在我或玛格丽特的努力下，在我们的思绪无休止地在两种方式间来回中才得以局部呈现。

玻尔 你从未绝对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互补性，对吗？

海森伯 不，我是绝对地、毫无保留地接受它！我在1927年的科莫会议上捍卫过它，从那时起，我以宗教式的热情追随着它！你令我信服，我恭敬地接受了你的批评。

玻尔 在那之前，你说过一些伤透人心的话。

海森伯 上帝啊，那时候，你真的逼得我流泪！

玻尔 饶恕我吧，但我把它们视作是失望与愤怒的泪水。

海森伯 我在发脾气吗？

玻尔 我带大过孩子。

海森伯 那玛格丽特呢？她在发脾气吗？克莱因告诉过我，在我走后，你让玛格丽特一稿又一稿没完没了地打你那篇互补性论文，逼得她流泪。

玻尔 我不记得了。

玛格丽特 我记得。

海森伯 我们只好再去汉堡把泡利从床上拖起，拖到哥本哈根，进行和谈。

玻尔 他成功了。我们签了条约。不确定性和互补性成为哥本哈根量子力学阐释的中心内容。

海森伯 当然是一个政治妥协，条约大都如此。

玻尔 你看到吗？在内心深处，你仍然暗暗抵触它。

海森伯 完全没有——它奏效了。那是紧要的。它奏效了，它奏效了，它奏效了！

玻尔 它奏效了，是的。但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了我们这三年的成果，对吗，海森伯？不夸张地说，我们把世界翻了个个儿！是的，你听着，这就是说，这就是说……我们又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有史以来，我们不断地发现自身被放逐。我们将自己流放至万物的边缘。首先我们将自己变为上帝不可知旨意的附属，渺小的众

生跪倒在创世纪的大教堂前。而当我们刚从文艺复兴中找回自我，当人刚刚成为倡导者们所宣称的万物之衡，我们又一次被自己竖起的理性产物推至一旁！又侏儒般地仰望着物理学家们筑起的巍峨高耸的新大教堂——传统力学法则，它不管我们存在与否，先我们之先，开永恒之起始，后我们之后，至永恒之终结。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初叶，我们突然被迫又一次站立起来。

海森伯 从爱因斯坦开始。

玻尔 从爱因斯坦开始。他指出，测量——整个科学存在所依赖的测量——并非是不偏不倚的、非人格化的举动。它是一项人类行为，受特定的时空观念，及观测者个人视角的影响。因而，在二十年代中期的这三年中，我们在哥本哈根发现了宇宙中并无绝对准确的客观世界。世间万物只是一系列的近似存在。仅仅由我们同它相对关系的限度来决定，仅仅由人类的思维与理解来决定。

玛格丽特 那你说的将人又置于宇宙的中心——是你？还是海森伯？

玻尔 别急，别急，亲爱的。

玛格丽特 不急，但它至关重要。

玻尔 我或他。我们两人。你自己。我们大家。

玛格丽特 如果是海森伯在宇宙中心，那他在宇宙中的盲点就是海森伯。

海森伯 那就……

玛格丽特 那就不该问他为何在 1941 年来哥本哈根。他不知道！

海森伯 我想了片刻，忽然瞥到它一眼。

玛格丽特 于是你回头去看。

海森伯 它不见了。

玛格丽特 又是互补性。对吗？

玻尔 是的，是的。

玛格丽特 我都打了多少遍了。如果你在做某事就必须专注于它，别再思考它，如果你思考了，实际上，你就没能做它。是吗？

海森伯 转左，转右，或思考它并死去。

玻尔 但在你做了之后……

玛格丽特 你回顾并做一猜测，就像其他人一样。只是猜得差一些，因为你看不到你做那事，而我们看到了。请原谅，但你甚至不知道你最初为何研究测不准原理。

玻尔 当然如果你是那位于宇宙中心的人……

玛格丽特 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要向薛定谔投一颗炸弹。

海森伯 我当然要指出他错了。

玛格丽特 是薛定谔赢了战争。那年秋天，当莱比锡的教授席位第一次有空缺时，他立刻成为候选人而你却不是。你需要一件神奇的新武器。

玻尔 玛格丽特，并非指责，但你对事总喜欢涉及到个人。

玛格丽特 因为事情总涉及到个人！你只会给我们说教！你知道海森伯多需要一个教授席位，你知道他有多大的家庭压力。真对不住，但你总把事情历史地抽象化与逻辑化。当你叙述往事时，是啊，一切都到位，一切都有开始、中间和结尾。但当时我在场，回忆起来，还像在眼前一样，环顾四周，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故事！它是失落、愤怒、嫉恨和泪水，没人知道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或他们该怎么做。

海森伯 还是一样，它奏效了，它奏效了。

玛格丽特 是的，它神奇地奏效了。你的测不准原理的论文发表不到三个月，你就被聘为莱比锡的教授。

- 海森伯 我不是指这个。
- 玛格丽特 就不提还有这儿的大学，那儿的大学了。
- 海森伯 哈雷、慕尼黑和苏黎世。
- 玻尔 还有美国各大名校。
- 海森伯 但我不是指这个。
- 玛格丽特 当你担任莱比锡教授时，你多大年纪？
- 海森伯 二十六岁。
- 玻尔 德国最年轻的正教授。
- 海森伯 我是指哥本哈根阐释。哥本哈根阐释奏效了。不管怎样我们终究抵达了，不管它是否综合了高理论低运算，最困苦艰难的和最痛切幼稚的泪水，它奏效了，它奏效着。
- 玛格丽特 是的，为什么最终你俩都接受了阐释？真是因为你们要重建人文主义吗？
- 玻尔 当然不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解释实验者的观测结果的方式。
- 玛格丽特 或是因为现在你是一位教授，教学上你需要一个扎实、严谨的体系？因为你需要你的新观念能获得哥本哈根教主的公开支持？还是尼耳斯答应以支持你的观念来换取你接受他的学说，从而确认他的教主地位？如果你想知道你为何在 1941 年来哥本哈根，我可以告诉你，你是对的——并无秘密可言。你来向我们炫耀的。
- 玻尔 玛格丽特！
- 玛格丽特 没错！1924 年他刚来时，一位来自战败国的卑微的小助教，感激不尽地获得了一份差事。现在你来了，凯旋而归——一个征服了欧洲大部的泱泱大国的科学界领袖。你来向我们炫耀你是如何功成名就的。

玻尔 这完全不像你！

玛格丽特 冒昧了，但难道他不是为这而来吗？他渴望着让我们知道他正负责某项生死攸关的秘密研究。尽管那样，他依然保持着高傲的道德独立，这种执着是如此著名以致盖世太保时刻监视着他。这种执着是如此成功以致今日还拥有个重大至极的道德困境来面对。

玻尔 是的，你现在不过把自己激怒而已。

玛格丽特 一个连锁反应。你述说了个痛苦的真实，它引出了另外两个。而正如你坦承的，不管尼耳斯如何回应，你将回到德国不折不扣地继续你的研究。

海森伯 是的。

玛格丽特 因为你不可能放弃这么好的研究机会。

海森伯 我也阻止不了它。

玛格丽特 你也希望向纳粹显示理论物理是何等重要。你要捍卫德国科学的荣誉。你留在德国是想等战争一结束便重建它的科学的光荣。

海森伯 都一样，我没告诉斯佩尔关于反应堆……

玛格丽特 ……能够生产钚，不是的，因为你害怕如果纳粹动用了大量资源，而你无法造出核弹的后果。请别告诉我们你是抵抗运动的英雄。

海森伯 我从未声称自己是个英雄。

玛格丽特 你的才华就在于滑雪之飞速以致别人看不到你的方位。每次总有不止一个的位置，就像你的粒子。

海森伯 我只能说它奏效了。虽不像抵抗英雄们所作的大部分壮举，它奏效了！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觉得我应该参与策划推翻希特勒，然后同其他人一样被绞死。

玻尔 当然不是。

- 海森伯 你没说罢了。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你这样想。
- 玻尔 不。
- 海森伯 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在克里斯汀落水后，如果你也跳下去，除了淹死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但这事又是不能说的。
- 玻尔 只能想。
- 海森伯 是的，我很抱歉。
- 玻尔 想了又想，日复一日。
- 海森伯 当时，你不得被拉住，我知道。
- 玛格丽特 而你也拉住你自己。
- 海森伯 还是待在船上，绕着走。还是保存自己，扔出救生圈。只能如此！
- 玻尔 或许是。或许不是。
- 海森伯 至少好些，好些。
- 玛格丽特 真是荒唐。你俩都以这般惊人的细密与精确解析了这微小的原子世界。现在是一切都由我们肩上的这些大的物件来决定。而这都是由于……
- 海森伯 埃尔西诺。
- 玛格丽特 埃尔西诺，是的。
- 海森伯 而且你可能是对的。我的确害怕失败的后果，我的确意识到要占上风……对我做过的一切有那么多解释！餐桌上围坐着那么多人！坐在席首的才是我来哥本哈根真正要见的人。我又探身看……这一刻，我几乎看到了它的脸。而当我再看时，席首的座位完全是空的。毫无理由。我没告诉施佩尔，仅仅是我就没想过这么做。我来哥本哈根仅仅是我想过这么做。每天，有成百万件事我们做了或没做。成百万个决定是它们自生

的。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玻尔 我为什么不……

海森伯 杀了我。谋杀我。那个 1941 年的夜晚。现在我们正往回走，你已得出结论，我将为希特勒提供核武器。你绝对应该采取任何可行的手段来制止它的发生。

玻尔 杀了你？

海森伯 我们在战争中，我是敌人。消灭敌人既不奇怪也毫无不道德之嫌。

玻尔 我应该拔出我的玩具手枪？

海森伯 你不需要玩具手枪，你甚至不需要水雷。你可以干得悄无声息，没有血迹，没有惨状。就像轰炸机的瞄准手在距地面三千米的高空按钮释弹般的干净利落。你只要等我离去后，悄悄地坐在你喜爱的这张沙发里，当着那隐形的听众，对玛格丽特重复我说过话。我会死得像卡西米尔那么快，要比伽莫夫快得多。

玻尔 亲爱的海森伯，这建议当然是……

海森伯 最有趣的。有趣到你从未想到过。互补性，又来了。我是你的敌人又是你的朋友。我是人类的危险又是你的客人。我是粒子又是波。对普世众生，我们有应尽的道义，而永远无法调和的是，对同胞、邻居、朋友、家庭、孩子，我们还有应尽的责任。我们不得不同时运行于不止两条，而是二十二条切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事后看，看其结果。

玛格丽特 我要说的是你创立测不准原理的另一原因是，你天生就认同它。

海森伯 那么，当我 1947 年再来时，我该以感恩戴德的被惩戒者的姿态又一次匍匐在地。我的祖国又在废墟之中。

- 玛格丽特 并非如此，你又一次展示了你个人的春风得意。
- 海森伯 乞讨一包包的食品？
- 玛格丽特 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你在哥廷根东山再起，领导着战后的德国科学。
- 海森伯 在哥廷根的第一年，我是睡在干草上的。
- 玛格丽特 伊丽莎白说不久你就有了一栋最气派的房子。
- 海森伯 是英国人给我的。
- 玛格丽特 你新的养父母，他们从别人那儿没收来的。
- 玻尔 够了，亲爱的，够了。
- 玛格丽特 不，这些年来我一直忍着。但看着这个聪敏的儿子在我们眼前不停地舞来舞去，令我发狂。不停地争求着我们的认可，不停地奋斗着让我们震惊，不停地乞求着给他自由的底线，好让他去逾越！我很抱歉，但真的是……匍匐在地？是我亲爱的、善良的、仁慈的丈夫匍匐在地上。真的，为了免遭杀害，1943年，他像个贼一样在夜里爬过海滩逃离了自己的祖国。你所吹嘘的德国大使馆的保护没能维持几天。我们将被押往帝国。
- 海森伯 我在1941年警告过你们，你们不听。好在玻尔逃到了瑞典。
- 玛格丽特 就在渔船载着他越过松德海峡，两艘准备将丹麦的所有犹太人运往东部的货轮驶入了港口。人类灵魂中的黑暗大潮泛滥喷涌将吞噬我们所有的人。
- 海森伯 我曾经警告过你们。
- 玛格丽特 是的，可你在哪儿？像个野人般栖居在山洞里，在地下洞穴里为制造这邪恶的武器卖命。二十年代的那些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到头来竟产生了更高效率的杀害人民

的机器。

玻尔 每每想起这我就心碎。

海森伯 它令所有的人心碎。

玛格丽特 而这种神奇的机器可能会杀尽世上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如果我们真是宇宙的中心，如果真的是我们全体要维持这种武器的存在，留给世界的将会是什么？

玻尔 黑暗，绝对的和终极的黑暗。

玛格丽特 困扰着我们的这些问题将最终不复存在，连鬼魂也将死去。

海森伯 我只能说我没有做，我没有制造原子弹。

玛格丽特 你是没有，为什么呢？我也要告诉你。原因极简单，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不懂物理。

海森伯 那是古兹密特的话。

玛格丽特 因为古兹密特知道。他是你们核研究圈的同人之一。他和乌伦贝克创立了旋转说。

海森伯 都一样，他全然不知我对原子弹构造知晓或不知晓之处。

玛格丽特 他为同盟国情报部门在全欧洲追踪你。你被俘后，他讯问过你。

海森伯 他自然怪罪我。他父母死在奥斯威辛，他认为我该设法营救他们，我没有办法。黑暗中，那么多只手伸向救生索，但没有救生索能——够到他们……

玛格丽特 他说你不懂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关键区别。

海森伯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有告诉别人。

玛格丽特 噢。

海森伯 不过我是知道的。

玛格丽特 只是不公开。

海森伯 你可以核实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 玛格丽特 有据可查吗？
- 海森伯 当时的谈话全有最精心的录音。
- 玛格丽特 还有证人吗？
- 海森伯 绝对可靠的证人。
- 玛格丽特 谁笔录下来的？
- 海森伯 是录音者笔录下来的。
- 玛格丽特 尽管如此，你没告诉任何人？
- 海森伯 我告诉过一个人，我告诉过奥托·哈恩。在农庄馆听到消息后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大约凌晨时候，最后大家都去睡了，只留下我们俩，我比较详尽地向他解说了炸弹制作原理。
- 玛格丽特 在事件发生后。
- 海森伯 在事件发生后。是的，当它已不再紧要时。我说了所有古兹密特说我不懂的东西。235 中的快中子，铀的选用，减少中心泄漏的反射外壳。甚至引爆的方式。
- 玻尔 临界质量，这是最重要的。引起连锁反应所需元素的量。你有没有告诉他临界质量？
- 海森伯 我给了他一个数字，是的，你可以查到！因为这是家庭晚会的另一个秘密。在我们刚到时，迪布纳问我是否会有窃听器，我笑了，我告诉他英国人还过于守旧，不会用盖世太保的手段。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在所有地方都安装了窃听器——全部录音。查一下！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所有谈话，我在凌晨告诉哈恩的所有一切。
- 玻尔 临界质量，你给了他一个数，是个什么数？
- 海森伯 我忘了。
- 玻尔 海森伯……

海森伯 全部记录在案，你自己去看。

玻尔 广岛炸弹的数量为……

海森伯 五十公斤。

玻尔 这就是你给哈恩的数量？五十公斤？

海森伯 我说大约是一吨。

玻尔 大约一吨？一千公斤？海森伯，我相信我最终开始明白了。

海森伯 这是我唯一的差错。

玻尔 你高估了二十倍。

海森伯 唯一的错处。

玻尔 但是，海森伯，你的数学，你的数学！它们怎么会差那么多？

海森伯 差得不多，在我计算了扩散率后，我得出的答案就差不多了。

玻尔 在你计算后？

海森伯 一星期后，我给大家作了个学术报告。记录中有！查一下！

玻尔 你是说……你以前没计算过？你没做过扩散率公式？

海森伯 没必要。

玻尔 没必要？

海森伯 计算已经作过了。

玻尔 谁做的？

海森伯 1939年佩林和弗吕格做的。

玻尔 佩林和弗吕格？但是，亲爱的海森伯，那个计算是天然的铀。惠勒和我发现只有235才产生裂变。

海森伯 你们的伟大的论文，我们一切研究的基础。

玻尔 你需要计算纯235的量。

- 海森伯 显然是的。
- 玻尔 你没有做。
- 海森伯 我没有。
- 玻尔 这就是你为何如此确信，没有怀你便无法成功。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你一直以为临界量不是几公斤 235，而是一吨，或更多。而生产一吨 235 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内……
- 海森伯 大概需要二亿个分离器，那是无法想像的。
- 玻尔 如果你意识到你只需要生产几公斤……
- 海森伯 就是生产一公斤也需要二十万个分离器。
- 玻尔 但二亿是一回事，二十万是另一回事。二十万的话，你或许就会考虑去做。
- 海森伯 完全可能。
- 玻尔 美国人想到了。
- 海森伯 因为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佩尔斯作了实际的计算。他们解出了扩散率方程式。
- 玻尔 弗里施是我以前的助手。
- 海森伯 佩尔斯是我过去的学生。
- 玻尔 一个奥地利人，一个德国人。
- 海森伯 他们本该在柏林的威廉皇家研究所为我们作计算，相反，他们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作了这个计算。
- 玛格丽特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 海森伯 就数学角度而言，它是一流的。
- 玻尔 他们也是从佩林和弗吕格的计算开始的。
- 海森伯 他们也认为需要几吨，也觉得是无法想像的。
- 玻尔 直到有一天……
- 海森伯 他们作了计算。

玻尔 他们发现了连锁反应所能达到的高速度。

海森伯 那样的话，只需多么少的量啊。

玻尔 他们说稍高于半公斤。

海森伯 差不多一个网球的大小。

玻尔 当然，他们是错的。

海森伯 他们估低了一百倍。

玻尔 这样就把它实际可行性扩大了一百倍。

海森伯 而我则把它的可行性缩小了二十倍。

玻尔 这么一来，你在哥本哈根为钚的苦痛辛劳都是不必要的，你本无需研制反应器，直接用 235 就行。

海森伯 可以说肯定不会。

玻尔 但完全可能。

海森伯 完全可能。

玻尔 在你来哥本哈根之前，本该早就解决了那个问题，仅仅是忽略了扩散率方程式。

海森伯 这样一个细小的疏忽。

玻尔 但其后果蔓延了许多年，成倍成倍扩大。

海森伯 直到它们大到足以能拯救一个城市。哪个城市？任何我们未曾投放原子弹的城市。

玻尔 伦敦，应该是的，假如你及时研制的话。如果美国已加入了战争，同盟国开始解放欧洲，那么……

海森伯 谁知道呢？也许是巴黎。阿姆斯特丹。或许是哥本哈根。

玻尔 那么，海森伯，告诉我们这个简单的答案，你为什么没作这个计算？

海森伯 问题是为什么弗里施和佩尔斯已经做了它。纯属浪费时间，毫无疑问，不管计算出 235 的量是多少，要生

产它都是无法想像的。

玻尔 除非结果不是！

海森伯 除非结果不是。

玻尔 那为什么……？

海森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因为我从未想过它！它从未在我脑中出现过！我一直认定它不值得做！

玻尔 认定？认定？你从不认定事情！你之所以创立测不准原理，是因为你拒绝我们的认定！你计算，海森伯！你计算所有的一切！你解决问题的第一件事就是数学！

海森伯 你当时该在场劝阻我的。

玻尔 是的，当时有我监督，你不可能滑过去。

海森伯 而事实上，你和我的认定完全一致！正是由于完全相同的原因，你觉得没有任何危险！你为什么没计算它？

玻尔 我为什么没计算它？

海森伯 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没做，这样我们将知道我没做的原因。

玻尔 我没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海森伯 说下去。

玛格丽特 因为他没想要造原子弹！

海森伯 对啊，谢谢你。因为他没想要造原子弹。我想我也一样，因为我没想要造原子弹。谢谢你。

玻尔 那你就像我打扑克时，用一个不存在的顺子唬住你自己。如果那样……

海森伯 我为什么来哥本哈根？是啊，我为什么来……？

玻尔 再来一次，是吗？最后一次！

海森伯 我又一次踏着熟悉的砾石路来到玻尔家的门前，拉了熟悉的门铃。我为什么要来？我非常清楚，太清楚了而不必问自己。直到那沉重的大门又一次打开。

玻尔 他站在门阶上，屋内的灯光照得他直眨眼。直到此刻他的思绪还是哪儿都在又哪儿都不在，就像观测不到的粒子在衍射光栅中同时穿过所有的切口。现在，它们不得不被观测与规范了。

海森伯 但在我脑中清晰的目标突然间遁形了。在灯光下，它们消逝了。

玻尔 亲爱的海森伯！

海森伯 亲爱的玻尔！

玻尔 进来，进来……

海森伯 多难看清啊，甚至就是眼前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就是现在，而现在正无尽地融入过去。在我转向玛格丽特时，玻尔已不见了。

玛格丽特 尼耳斯没说错，你老了点。

玻尔 我知道你有些个人的麻烦。

海森伯 当我转回玻尔时，玛格丽特隐入了历史。而要瞥一眼人们眼睛背后的东西那就更难了。现在我站在宇宙的中心，而能看到的只是两个不属于我的微笑。

玛格丽特 伊丽莎白好吗？孩子们呢？

海森伯 很好。他们也问你们好，当然……我能感觉到房间里的第三个微笑，靠我很近。会是那个我突然在镜子里发现的微笑吗？那个微笑着的尴尬的陌生人与我感觉到有人在场有关系吗？这个完全隐秘的、无法观察的在场者？

玛格丽特 我注视着屋内的两张笑脸，一张笑脸尴尬、讨好，另一张则由热情洋溢变得客套。还有第三张笑脸，我知道，始终彬彬有礼，我希望如此，而始终心怀戒意。

海森伯 你还抽空去滑雪吗？

玻尔 我扫了玛格丽特一眼，此刻我看到了她能看到而我却看不到的——我自己，当可怜的海森伯犯蠢时，笑容从我脸上消失了。

海森伯 我看到他俩注视着我，这时，我还清楚地看到了室内的第三个人，先愚蠢发问后故作体贴的纠缠不清的客人。

玻尔 我看见他急切地、恳求地注视着我，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时光，我也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是的——现在清楚了，现在清楚了——房间里还漏了一个人。他看到了我，他看到了玛格丽特，他看不到他自己。

海森伯 在世上的二十亿人中，那个不得不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却是那唯一永远躲避着我的人。

玻尔 你提议去散步。

海森伯 你记得埃尔西诺吗？人类灵魂深处的暗角……？

玻尔 我们走了出去，走在秋天的林荫下，走在没有灯火的街道上。

海森伯 现在，整个世界，只有玻尔和另一位隐形者了。那个躲在暗处完全隐秘的在场者是谁？

玛格丽特 飞悬的粒子，在黑暗中漫游，无人知道它在何处。它在这儿，它在那儿，它哪儿都在又哪儿都不在。

玻尔 似乎随意，实则小心翼翼，他开始提出那斟酌已久的问题。

海森伯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

玛格丽特 大裂变。

玻尔 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

玛格丽特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

海森伯 他盯着我，惊呆了。

玛格丽特 现在他终于明白他身在何处并做着何事。

海森伯 他转过身去。

玛格丽特 裂变的时刻刚开始便结束了。

玻尔 我们已匆匆地往回走了。

玛格丽特 他们又一次各自分开，向黑暗中飞去。

海森伯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

玻尔 我们伟大的合作。

海森伯 我们的深情厚谊。

玛格丽特 他的一切又像过去一样无法确定。

玻尔 除非……是的……作一个想像试验……让我们假设，那晚我未曾离开，相反我记起了我应该担任的父亲角色，会是什么结果。如果我停下来，压住怒火，转过身去问他为什么。

海森伯 为什么？

玻尔 你为什么肯定用 235 造原子弹会如此之难呢？是因为你作过计算？

海森伯 计算？

玻尔 235 的扩散率。不，因为你还没计算过，你还没考虑过计算它。你还没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必作的计算。

海森伯 当然，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了。实际上，它并非那么难。让我们看看……扩散横切面为 6×10^{-24} ，这样自由轨的平均值为……等一下……

玻尔 突然间，一个绝然不同的、极为可怖的新的世界开始成形……

玛格丽特 在海森伯与你的友情中，那是最后也是最至关紧要的一次请求，在他无法理解自己时，希望得到你的理解。这也是你俩友情中，你对海森伯的最后也是最至关紧

要的回答。置他于误解之中。

海森伯 是的，或许我应该感谢你。

玻尔 或许，你应该。

玛格丽特 不管怎样，这是故事的尾声。

玻尔 可是，有些事情或许我也该感谢你。1943年的那个夏夜，当我躲在漂游松德海峡的渔船上出逃时，几艘来自德国的货船驶入了……

玛格丽特 同海森伯有什么关系呢？

玻尔 货船是星期三到的，而丹麦的八千个犹太人将被逮捕监禁。到了第二天，犹太新年的前夕，当党卫队开始搜捕时，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不见了。

玛格丽特 他们全躲进了教堂、医院、人们的家中和乡间村舍里。

玻尔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德国领事馆官员处得到了情报。

海森伯 格奥尔格·杜克维茨，海运专员。

玻尔 你们的人？

海森伯 其中一个。

玻尔 他是个杰出的情报员。他在货船到达的前一天通知我们——就在希特勒下命令的当天。他还告诉了我们秘密警察行动的确切时间。

玛格丽特 是抵抗组织把他们从藏身处转移到那几艘货船上，然后从松德海峡偷渡出去。

玻尔 我们在渔船上的一小拨人想躲过德国巡逻艇已经够呛，而载着八千多人的一个船队要躲过他们，那比红海分流还难。

玛格丽特 我想那天晚上并没有德国巡逻艇吧？

玻尔 没有——整个巡逻艇队突然接到不宜出海的命令。

海森伯 我无法想像他们是如何运作的。

玻尔 又是杜克维茨？

海森伯 他还去了斯德哥尔摩，请求瑞典政府收留所有的人。

玻尔 所以，或许我应该感谢你。

海森伯 为什么？

玻尔 我的生命。我们大家的生命。

海森伯 在那时，已与我毫无关系了。很遗憾，但这是实话。

玻尔 不过，在我走后，你又回到了哥本哈根。

海森伯 我要确信我们的人没有趁你不在时接管学院。

玻尔 我还从未为这事谢你呢。

海森伯 他们要把你的分离器给我，你知道吗？

玻尔 你能够用它分离出微量的 235。

海森伯 当时，你正从瑞典去洛斯阿拉莫斯。

玻尔 去担任酿成十万人死亡的惨剧中那不起眼但也缺不了的角色。

玛格丽特 尼耳斯，你没有错！

玻尔 没做错吗？

海森伯 当然没有，你是个好人，自始至终，无人能说什么。而我……

玻尔 而你，亲爱的海森伯，你一生中从未沾手哪怕一个人的死。

玛格丽特 哦，有的。

海森伯 我有吗？

玛格丽特 有一个，就是你告诉我们的，在慕尼黑，你还是个孩子时，整夜看守着那个可怜的人，他清早就要被处决。

玻尔 那就是，一个。与别人相比，你只有一个令你良心不安的灵魂。

玛格丽特 但那一个灵魂也是宇宙之灵，和我们每个人一样，直

到天亮后。

海森伯 没有，天亮后，在我的劝说下，他们释放了他。

玻尔 海森伯，我只好说——如果人们按严格的可辨量来测衡自身……

海森伯 那我们则需一种新奇的量子伦理。天堂里应有我一席之地，也有当年我返家途中在海格洛赫遇到的那位秘密警察一份。那是战争结束时，同盟军正在合围，我们已无能为力。伊丽莎白和孩子们逃到了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子里，我趁被捕之前去看他们。那时交通已全部中断，我只好骑自行车——只能夜里走，白天睡在树丛中。因为密密麻麻的盟军飞机从早到晚在空中呼啸着，他们向路上任何移动目标俯冲攻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会成为他们在德国境内的最大目标。我走了三天三夜，出符腾堡，穿过施瓦本侏罗山和阿尔卑斯山口的丘陵地，横贯了已被摧毁的祖国，这就是我的选择吗？那满目的废墟瓦砾？那蔽天的滚滚浓烟？那数不清的饥饿的脸？这就是我的事业？所有绝望的人们都在逃命。最绝望的是秘密警察，他们像一群红了眼的恶狗，垂死挣扎地四处追杀着溃散的逃兵，把他们吊死在路边的树上。第二天夜里，突然间——那可怕而又熟悉的黑制服，在夜色里猛地出现在我面前。从他的嘴型，我读到了那恐怖而又熟悉的词，“逃兵”，他说，和我一样的精疲力竭。我递给他我自己签发的通行证，可夜色太暗，他又极累。他径直打开枪套，准备枪决我，那更省事。在那瞬间，我的思路转得极快极清晰——就像在滑雪，或像在黑尔戈兰岛的那个夜晚，或是费莱德公园的那个夜里。这次出现在我脑

中的是口袋里的那包美国香烟，它已在我手中，我递过去，最绝望的一招了。我等着，他看着香烟，犹豫着，思量着，左手拿着我那张无用的通行证，右手按着枪套。烟盒上印着两个大字：好运。他扣上枪套，接过香烟……它奏效了……它奏效了！像所有其他问题的答案。为了这二十支烟，他放了我。我继续上路。三天三夜，途中有哭泣的孩子们，有迷了路、饥饿不堪的孩子们，他们被征入伍又被指挥官抛下。还有徒步返乡的奴工队伍，饥肠辘辘地赶往法国、波兰、爱沙尼亚。经过加默廷根、比伯拉赫和梅明根，明德尔海姆、考夫博伊伦和雄高。横越我那亲爱的祖国，我那已毁灭的、耻辱的而又亲爱的祖国。

- 玻尔 亲爱的海森伯！亲爱的朋友！
- 玛格丽特 沉默，我们总是回归于最终的沉默。
- 海森伯 当然，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 玛格丽特 所有迷失在路上的孩子们。
- 玻尔 海森伯在世间游荡，犹如一个失落的孩子。
- 玛格丽特 我们自己失落的孩子们。
- 海森伯 舵柄又一次回撞。
- 玻尔 那么近，那么近！差那么一点儿！
- 玛格丽特 他站在门口，注视着我，然后转过头去……
- 海森伯 他又一次离去，消逝在黑暗的波涛中。
- 玻尔 我们尚在寻觅之中，我们的生命便结束了。
- 海森伯 我们还未能看清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便去了，躺入了尘土。
- 玻尔 湮没在我们扬起的尘土之中。
- 玛格丽特 那时会迟早到来，当我们所有的孩子化为尘土，我们

所有孩子的孩子。

玻尔 那时，不再需要抉择，无论大小。也不再有什么原理，因为那时已不再有知识。

玛格丽特 当所有的眼睛都合上，甚至所有的鬼魂都离去，我们亲爱的世界还会剩下什么？我们那已毁灭的、耻辱的而又亲爱的世界？

海森伯 但就在那时，就在最为珍贵的那时，它还在。费莱德公园的树林、加默廷根、比伯拉赫和明德尔海姆。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

后记

对于一部涉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人们想了解作品中的内容多少为虚构，多少为史实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将尽可能清晰地对此剧作一交代。

剧中的中心事件是一件历史事实。1941年海森伯的确去了哥本哈根，也确实与玻尔见了面，当时，我笔下的人物们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海森伯几乎肯定是去玻尔家用了晚餐，为了避免被监听的可能，两人几乎肯定是外出散步过，尽管连这些基本的细节人们也不无争议。至于两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则有着更多的争议，而剧中事件的含混之处也是由于当事人回忆的含混所致。对于海森伯对此次会面所抱的希望，人们有着更多的推测。本剧所提供的所有非此即彼或可以共存的解释，也许除最后一种外，都曾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多次地表述过。

最渴望确定此次会面的某种公认说法的，就是海森伯自己。他确实于1947年在他的英国监管人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陪同下重返哥本哈根，并试图与玻尔找到解释这一事件的某种共同的立场。结果表明，由于事情过于微妙复杂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于是（不管怎样，根据海森伯在他回忆录中所述）“我们终于感到最好不再去搅扰昔日的魂灵”。这就是我的剧作的历史记录出发处，设想在若干年后，当所有的当事人都成了昔日的魂灵，让他们继续争辩昔日的疑问，以求得对当年的事件更多的理解，就像他们在世时，曾经就原子内核运动的错综复杂达成了那么多的理解和一致。

正如许多传记和自传的资料所显示，无论如何，对于1920年代那一个或二个重大课题的早期讨论以及讨论中的那种激情，我深知我的文本过于简约。马克斯·玻恩把当年真实的故事描绘成“不像一架笔直向上的楼梯，而更像扭结成一团的小径”。我发现我无法从任何细节中追寻那些小径（尽管我开始理解它们）。特别是，我曾经极大地忽视了哥廷根的玻恩本人和他的学生帕斯夸尔·约尔丹（Pascual Jordan）在量子力学表述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玻恩提供了海森伯所缺少的矩阵理解以及薛定谔波函数的统计阐释）以及汉堡的沃尔夫冈·泡利的重要作用——他的不相容原理填补了难题中的一个关键空白。

但是，关于德国和美国原子弹研究计划和这两位科学家的参与情况均来自史料的记载，包括丹麦犹太人的命运、海森伯战前和战时在德国的经历、他在战后的被拘留以及随后几年困扰他生活的萧条。我补充了一些细节，但总体上出自他对个人经历的叙述。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尾、在黑尔戈兰岛和费莱德公园的夜间漫步、柏林的空袭、他的被拘留、他的单车横越德国之行，以及路上险些被处决的遭遇，这些几乎完全依据他生前的叙述。

我的剧中人所说的实际话语当然也完全属于他们自己，如果这需要证实那我只能诉诸海森伯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话占着重要部分，他说这是因为他希望“表明科学植根于对话之中”。然而，正如他所解释的，交谈，即使是真实的交谈，也无法在几十年后逐词逐句地重现。因而他未受约束地再现了它们，并引用了修昔底德的观点。（海森伯父亲是古典学教授，而他自己除了其他众多才华之外还精通古典学。）修昔底德在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序言中解释道，尽管他回避所有的“杜撰”（storytelling），但碰到对话时，“我发现记住他们确切的词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让每位发言者说出我认为在当时他该说的话，但我尽可能贴近他当时说话时的思路。”修昔底德试图追述当时的原话，许多话他也曾亲耳所闻。我剧中的某些对话代表了某些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过的话，也代表了某些肯定从未说过的话。然而我希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修昔底德原则的尊重，而且剧中的对话（实际的动作）都尽可能地符合人物原型的意念过程。

但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他们的思想过程呢？这正是我将已经确认的历史记录（任何可能的历史记录）作为我的起点之处的原因。作家和史学家同样面对的巨大挑战就是要进入人们的脑中，要站在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并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要对他们的动机和意向做出合理的估量——而这恰恰是已有记载和将有记载的历史所不能企及的。即使当所有外在的实据已被掌握，进入角色们头脑之中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想像。这确实属于戏剧的本质。

对于海森伯的科学与生活间的平行相似处，我不能声称自己是发现此现象的第一人。这些平行相似处为戴维·卡西迪

(David Cassidy) 提供了他那本优秀传记的标题(《不确定性》)。卡西迪在序言中说：“尤为困难并争议不休的就是对海森伯在第三帝国期间的经历作历史评价，特别是他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出现了许多极为不同的评介与观点，观点来自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热情、有的激越。对某些人而言，那次战争和纳粹体制难言的恐怖所激起的强烈情感似乎与海森伯的生活和行为中许多模糊性、二重性和妥协性合为了一体，这使得海森伯自身也受到了一种不确定性原则的制约……”托马斯·鲍尔斯的那本非凡而广博的著作《海森伯的战争》最早引起了我对哥本哈根之行的兴趣，他在书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海森伯后来对他在德国原子弹研究失败中的作用保持缄默“引入了一个无法消减的不确定性的因素”。

卡西迪没有进一步追溯这种平行相似性。鲍尔斯甚至在他的评论上加了一个脚注：“请原谅我。”在我看来他无需道歉。无疑，不确定性概念如今已成为普通的科学新名词之一，已被广义化到失落了它多半的原意。海森伯在量子力学中所引入的这个概念则是清晰而专业的。它并不意味关于粒子运行的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或模糊的。它所限制的是“正则共轭变量”的同时量测，就如方位与动量或能量与时间。就是说，你一个变量测得越准确，你测的相关变量就越不准确；而这一比例，即测不准关系，自身可以准确表述。

显然，这一切都不能直接应用于我们对思考和意向的观察。思想是不能用一对共轭变量来定位的，因而不存在精确度的比例问题。鲍尔斯似乎暗示，不确定性出现在海森伯的案例中纯粹是因为“动机和意向无法确定得比他愿意陈述的更清晰”。海森伯在战后确实处于矛盾的压力之下，这使得他特别难以解释他当时的意图。他要与纳粹划清界线，但他不想表示自己是叛国者。

他不愿向他的德国同胞们声称是他蓄意使他们输掉了战争，但他同样不愿意表示他未能帮助他们获胜只是由于他的无能。

但早在海森伯可能做出解释的很久之前，不确定性便毫无疑问地开始了。在他计划他后来无法解释的行动时，他处于至少是同样的矛盾压力之下，不确定性也依然存在，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即便他极为人道地做到了开放、诚实和乐于相助。人们在谈到他们自己的动机和意向时，即便他们不曾落入海森伯所遭遇的困境，也总是取决于问题——也同样取决于别人如何说他们。意识与意向，甚至你自身的——尤其是你自身的——永远在变化与流动。没有任何类别的单独意识和意向可以被确切地界定。

意念上的不确定性与粒子的不确定性的相同之处在于，其困难不仅是实际的，而且是一种系统理论上也无法绕过的限制。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显然对它无能为力，神经学家也解决不了这一难题，即便人们已经知道脑的结构与功能的一切，这恰如语义学的问题是无法靠查看一部电脑的机械码来解决的。既然根据所谓的“哥本哈根阐释”量子力学——由海森伯、玻尔等人在 1920 年代发展起来的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讨论和思考世间万物的整体可能性，甚至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世界都依赖于人的观察，并且也受到加之于它的人类思想的制约，因而，我们思维中的不确定性也是自然世界的基本属性。

说到此处，“不确定性”便是一个令人不满的词。即便是在它的原始语境中也显得笨拙。你会对某些事物感到不确定，而它们自身是完全确定的，而仅仅当你有了更深的了解后你才会完全确定。确实，不确定性的原意似乎就隐含了确定的可能性。海森伯和玻尔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了不同的德语名词。玻尔（他多少能说地道的德语）有时用 *Unsicherheit*，其语义

简言之即是“不肯定性”。在海森伯的论文原稿中，他谈到 *Un-genauigkeit* (不确切性)，而现在德语中用作常见的术语似乎是 *Unschärfe* (不清晰，模糊性)。但在他的总纲结论中，以及后来在回忆录中回顾往事时，他所采用的词是 *Unbestimmtheit*，这在英文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虽然它在模糊性的意义下意为“不确定”，但从词源上说，它却是 *bestimmen* (动词“测定”或“确定”) 的派生词。有时使用的另一比较确切的英译为 *indeterminacy*，但似乎更不常用。*Undeterminedness* 应该更接近些，但显笨拙。与德语相去稍远，但更接近情境本意的，应该是 *indeterminability*。

除了词义的翻译之外，海森伯的用词选择表明，他在撰写他的论文时尚未充分把握他的论点的理论上的涵义。他的确得出结论，相关的实验“纯经验地”受到了 *Unbestimmtheit* 的影响。在当时，正如玻尔所抱怨的，他对来自物理学和数学的哲理沉淀并无太多兴趣 (尽管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对此很感兴趣)，而又像玻尔所抱怨的，他未及与玻尔或他人商讨便匆忙地发表了她的论文。他的论文似乎暗示电子具有确切的轨道，尽管它们是不可知的；他谈到一个光量子把电子从它的“轨道”上完全抛出，然而他还是在轨道一词上加了引号，说它在此并无理性意义。论文标题的自身也加强了这种印象：*Über den anschaulichen Inhalt der quantentheoretischen Kinematik und Mechanik*。这里又存在一些翻译的问题。*Anschaulich* 意为“图解的”、“具象的”、“可视的”；这一标题在翻译中通常被认为涉及到相关学说的“感性”内容，而这似乎又意味着与那些非感性范畴形成一种对照——好像海森伯只关心我们在抽象的直观化上的困难，而不考虑它的物理涵义。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阐释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年代是科学的正统，也是核力量在本世纪的戏剧性物理演示的理论基础（无论其功过）。但它并非从未受到挑战。爱因斯坦就从未接受过它，虽然他无法找到一条避开它的途径。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称量子理论的目前状态为“预备性的”，并引用了薛定谔、德布罗意和狄拉克作为先驱者们的观点。

与哥本哈根阐释不同的另一种阐述是用平行世界的多重性来解释出现在量子层次上的不同态表现叠加。这一理论是由休·埃弗雷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他曾经是约翰·惠勒的研究生，而惠勒则是与玻尔合写了开辟理解铀裂变之路的那篇著名论文的合作者。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在他的《现实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埃弗雷特观念的一种极端论点，声称如今“几乎无人”还相信哥本哈根阐释。我就此观点求教于几位物理学家，他们似乎对此大为惊异；但也许我恰好遇上那被认为一小伙至今仍然相信哥本哈根阐释的人们。

埃弗雷特的另一位追随者是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虽然他似乎与多伊奇大相径庭），他和尤瓦尔·奈曼（Yuval Ne'eman）一起在 1960 年代革新了基础粒子理论，引进了三种不同“色”与六种不同“味”的夸克作为物质世界的基本单位。盖尔-曼相信量子力学是理解宇宙的基本工具，但他认为哥本哈根阐释是“人类中心观”的，因为它依赖于观测者以及人类的测量行为，仅仅表征为一个他称为“已测体系的近似量子力学”（the approximate quantum mechanics of measured systems）的特殊范例。对于我知之甚少的领域我不便妄言，尤其是出自一位权威人士的观点，但我似乎觉得盖尔-曼所赞同的观点，以及相关的另类“历史”与“叙事”恰恰与

玻尔的观念同样的“人类中心观”，因为历史与叙事并不是独立于宇宙的成分，只是人类的构建，其观点与观测行为具有同样的主观与局限。

不确定性与量子力学的关联也曾受到挑战。那著名的涉及双缝的假想试验的操作已在实验室（康斯坦茨大学）中实施了。它证实了玻尔所假设的一个未被观察的粒子似乎同时穿过双缝，从而在双缝之外的屏上形成了一种特征性的干扰图像，而任何企图确定粒子所走的是双缝中的哪一条缝的观察行为都必然会破坏这一现象而使干扰图像消失。但实验似乎也表明，尽管测不准原理是成立的，但它说明的误差太小而不足以解释干扰现象的消失。此外，实验室中的这一观测并非像过去的假想试验中那样用一个光子来打击所涉及的粒子从而把光子的能量转给粒子以改变粒子的行径，而是采用了一种微波标志的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不会影响粒子的动量。

有些物理学家现在认同干扰现象的消失是由量子世界一种更奇特更非“准经典化”的状态——“纠缠”（entanglement）所引起。这一观点是薛定谔在1935年提出的。它意味着当量子力学的实体相互作用时（就像粒子与光子），它们就形成继续持有一种集体性质与行为的事态，即使它们的成分在物理上已经再次分离。这一观点的难度是显然的，但量子力学现象的任何阐释都给我们日常生活的逻辑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挑战。

所有这些过程的参考资料见本后记末尾的文献目录。

那么我的剧中人呢？他们与他们的生活原型相像吗？

对于从未知晓的人，只凭文字记载是不可能抓住他们的确切语调的，更何况他们绝大多数同代人回忆他们的原话用的并非英语。同时，剧中的三个角色都有着一些特殊的问题。

从玻尔说起。他是出名的口拙加轻声，正如他以善良和友好闻名于世。他能流畅地说多种语言，但我听说要明白他在流畅地说哪种语言却是个问题。薛定谔同玻尔经过了1926年那次史诗般的对决之后，描绘玻尔常常一谈“多少分钟，像在梦寐、幻觉和含糊不清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总是在思考并不断地犹豫不决——生怕别人会把他（玻尔）的观点当成对他人见解的不敬……”。我的玻尔自然比这种状况要善谈些——而且许多了解他的人写信告诉我，私下里，如果不在大庭广众间，他远比薛定谔所发现的要善辩、犀利得多。

玛格丽特的问题是有关她的传记材料相对较少。她和尼耳斯显然是相濡以沫，而一切记录都表明，她像他一样地为人们所敬重。她未受过科学的专业教育，但玻尔一直与她讨论自己的研究，自然是尽力避免专业词汇——尽管她已经相当熟悉这类词汇，因为玻尔的每一份文稿都由她打出。我推测她比舞台上的人物要更优雅和内敛，但她显然有着十分坚强的个性——她在晚年被人们称为“玛格丽特女王”（Dronning Margrethe）。对海森伯，她一直不像玻尔那般热情。她对海森伯1941年的来访公开地表示了愤怒。据玻尔说，她强烈反对请海森伯到家里来，直到玻尔允诺只谈物理不谈政治时，她才让步。玻尔自己一直拒绝提及海森伯1941年的来访，但玛格丽特，无论在战后还是在海森伯作了试图解释的所有努力之后，始终坚称：“不管人们怎么说，那是一次敌意的来访。”

海森伯的问题是他的捉摸不定和模棱两可，这当然就是本剧试图阐释的所在。对于他，人们一致认同的就是他在哥廷根的导师马克斯·玻恩的评价：“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与清晰的理解力。”他同玻尔构成了几乎是喜剧式的对比。用乔治·伽莫夫的话来说：“应该说（玻尔）最突出的个性就是他在思考和

领悟上的迟缓。”

海森伯在年轻时就似乎有着感人的热情和率真。玻恩描绘他像一个纯朴的农家少年，两眼清澈，容光焕发。还有人觉得他“像一个刚刚从技校出来的聪敏的木工学徒”。维克托·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说他平易近人，所以大家都喜欢他。玻尔在他们1922年的首次相遇后，十分喜欢海森伯“友好羞怯的气质、他温和的性格、他的真切与热情”。他身上有一种得奖学生的气息，各方面都很优秀。喜欢他的父亲般的人物并非玻尔一人，他同他在慕尼黑的第一位导师索末菲也保持着多少类似的关系。当他与纳粹发生冲突时，他曾请教于德国物理学界的两位长辈马克斯·普朗克和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他最亲密的朋友与同事应该是比他年轻一些的魏茨泽克，但令人惊异的是，在他被拘期间他信任地选择了六十六岁的奥托·哈恩来解释广岛的原子弹，而不是同时被拘留的魏茨泽克（但也许他早已同魏讨论过）。

美国物理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说：“他具有最早的真正量子力学的头脑——能够跨越传统的直观化图像而跳入抽象的完全非直观化的亚原子世界的的能力……”

卡西迪认为他的天才的主要之处在于“能够采纳适用的解法而不为传统法则所束缚”。鲁道夫·佩尔斯则强调他的直觉。他“几乎总是直觉地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再为自己寻找一个数学解式来证明它”。佩尔斯之所以这样评说，是因为“他对数字总是漫不经心”。这一弱点似乎造成了他在原子弹研究中的挫败，抑或是他的得救。

玛格丽特总是觉得他难处、封闭、过分敏感，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理应消退或改变的性格倾向反而加深了——首先是由于1930年代他的政治问题，然后又是战争时期他竭力调和他的道

德良知与他的工作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他的自传体的作品是相当生硬板正的。他写给玻尔的信件，即使在二三十年代，也是得体但并不亲切。在他们友情的最亲密时期，他们仍相互尊称 Sie(先生)，只是在海森伯有了教授席位后，他们才改成 du(你)。

海森伯在他回忆录中声称不受束缚地重现的那些对话是冠冕庄重的。似乎更加可信的对话可见于戴维·欧文(David Irving)为他的《病毒之屋》(德国原子弹研究史)一书而采访海森伯的那次长谈的记录，尽管海森伯依然(自然是)十分谨慎。在德国原子科学家们被拘留期间，海森伯无论在道义和实践中都显示了他主导人物的形象。在他们一些比较随意的谈话记录中，可以觉察到他有一种精明的世俗头脑。他非常关注专业的前景，关注如何可能利用他们战时的原子研究来挣钱。当另外一人提出如果他们接受在同盟国控制下从事原子研究他们将会在“众人眼中”被视为叛国者，海森伯回答说：“不会。你必须做得巧妙。在人们眼中，我们像是不幸地在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控制下继续我们的科研，而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将显得愤怒而切齿地接受这种控制。”

关于他，一直有些稍稍锐利和刺耳的议论，只能算是尊重而不是热爱，而到了战后则真的变成了令人十分吃惊的敌意和蔑视。甚至塞缪尔·古兹密特都转而反对他。古兹密特曾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同事。他服务于盟军收集德国原子研究情报的组织阿尔索斯(Alsos)特遣队。1945年当该队队员最后冲进海森伯的办公室时，他们首先看到的物件之一就是这两个人的合影，海森伯在那儿存放着这张照片以纪念昔日的快乐。但当古兹密特在随后审讯海森伯时却发现他自负而自私。当时古兹密特刚刚发现了他的父母死于奥斯威辛——他的愤怒之情可以理解。而海森伯自己也陷入一种错误的情境中。坚信自己的研究小组

远远地领先于美国人，他向古兹密特提出愿意将铀裂变的秘密提供给美国人。（古兹密特不动声色，并未纠正海森伯的错觉，这使得海森伯在最终真相大白后对古兹密特颇为愤怒。）在古兹密特的关于阿尔索斯的那本浅薄且乏味得出奇的书中，古兹密特带着蔑视的口气描写了海森伯和他的研究人员。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报刊上持续一年之久的通信专栏中，古兹密特又指责了海森伯的自负和虚伪。

在海森伯 1949 年的美国之行中，魏斯科普夫为他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大约有半数客人——其中包括许多洛斯阿拉莫斯团队的成员——未到场，他们告诉魏斯科普夫他们不愿握那个曾试图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的手。就是海森伯传中对他作为物理学家予以高度评价的卡西迪在评价海森伯在德国原子弹研究中的角色时，也极为冷静与审慎。罗纳德·弗雷泽，1947 年陪海森伯重回哥本哈根的英国情报官员（英国人当时似乎怕他投奔俄国人或被俄国人绑架），以一种似乎稍显失态的主人式的轻蔑口气回答了欧文对此行的询问，在给欧文的信中，他写道，“关于 1941 年他与玻尔在梯沃里（Tivoli）公园（误记）中的闲谈时的‘一场对决’的整个故事是典型的海森伯式的编造——也许稍稍高明于其他千百种编造，但同它们一样是那种‘血与葡萄酒’的犯罪情节的产物。他如此之快地将它合理化以至故事变成了他的真实，整体的真实，没有别的只有真实。发生在他这种心智的人身上，可怜。”

专门研究海森伯的历史学家保罗·罗斯（Paul Lawrence Rose），以一种惊人的道德高调，把海森伯视为他所称之为德国文化普遍失败的一个象征。在他 1984 年写的题为“海森伯、德国道德和原子弹”（Heisenberg, German Morality and the Atomic Bomb）一文中，他谈到了海森伯的“瞎扯”、他“自私

自欺的宣称”和他“低级的道德愚昧”。经过十四年的研究之后，1998年，罗斯教授又在本剧上演后出版的一整本书中回到了这一主题。这本题为《海森伯和纳粹原子弹计划》的书颇为引人注目。他对海森伯的蔑视依旧强烈。他认为，由于海森伯的自负和错误的思考，由于他接受了通常的德国文化的各种恶处，特别是他吸纳了纳粹体制的罪恶价值观念，因此，尽管他甘心情愿为纳粹体制效劳，他依然失败。

这是一本难读的书——罗斯在引用海森伯的原话时几乎都要加上他自己毁谤式的评语。此处从中随机选取一些他的感叹语：“……自陷于罪……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这种自相矛盾……这些低劣托辞的虚假……一个典型的海森伯谎言……海森伯常见的拿手辩才……海森伯接着就继续振振有词地回忆……海森伯记忆的虚妄本质……”

你有时会纳闷，如果这些文字不分段落，用绿墨水手写而成，会不会好看些。罗斯自己似乎也知道自己制造的效果。他意识到了，他说，有些读者可能会对他“反复地对海森伯做道德评判感到厌恶”。他觉得，他们也可能对这种似乎“缺少对德国文化的同情”的评判失去兴趣——他承认，他的“不列颠背景”使他不能说 he 完全同情德国文化。他尽力使自己免于这种态度可能引起的任何不幸的反响：他希望读者们不会责备他“不加思考的散播一种德国‘民族性’的粗俗观念，无论这词是何含义”。他解释说，他所关切的完全不是那一点，而是“人们称之为德国‘深层文化’的那坚韧的本质……在此书中我试图深究德国人如何思考——或者是，曾经如何思考——以展示德国人在心态与感情上与‘西方’是如何的截然不同。”这正是他虽无明显讽刺，却暗有所指的所谓“海森伯问题”。

他列举的某些例证令人困惑。在某一章的引言中，他不

加评论地引用了纳粹军械部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 (Albert Speer) 的话：“我确实希望海森伯现在不会声称他们是出于原则的理由，试图通过要求如此之低的经费来抵制这个计划！”的确，任何抵制计划，特别是为了原则的理由，这种声称，都惊人地背离了海森伯在这一问题上一贯的审慎立场。但问题不在于斯佩尔的希望，而在于海森伯是否真的做过这种宣称。

那么，他做过还是没做过？罗斯没有告诉我们，他所给出的唯一参考是吉塔·塞里尼 (Gitta Sereny) 的新书《斯佩尔：他与真理的战斗》(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此处所指的就是本剧中提及的1942年在哈尔纳克府 (Harnack House) 中举行的那次关键会议。斯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海森伯要求这么少的钱来进行核研究计划，使他“相当灰心”。在更早一份的手稿中 (“斯潘道稿” [Spandau draft])，塞里尼说，斯佩尔在括号中加了罗斯所引用的那句话——而海森伯，塞里尼说，“确实在战后试图那样声称”。

那么他的确这样声称过！但在何时何地，塞里尼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他要求的款项数额之小，我在记录中能找到的仅仅是引用斯佩尔的那份，另一份引自代表戈林空军方面出席会议的陆军元帅米尔希 (Milch)。在海森伯的回忆录中，或在罗伯特·容克 (Robert Jungk) 的《亮过一千个太阳》(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一书中，肯定未提及此事，在海森伯接受欧文采访的长篇访谈录中也没有。在另外明显的两处，1967年当欧文的书出版时海森伯接受《镜报》(Der Spiegel) 的访谈录或者他在《法兰克福大众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上发表的书评中也都未提到。我无意自告奋勇来填补这项空白，但据我所知，他有此声称的唯一参考便是在他死后，在我剧本的虚构中。

总之，塞里尼同罗斯一样，对海森伯明显地缺乏热心。她随后对海森伯1941年与玻尔见面的动机进行了争辩，认为“现在斯佩尔的‘斯潘道陈述’证实了它的虚假”，然而她并没有解释何以如此。对于她所说的哥本哈根见面的“实情”，她断然地一笔带过。在交谈中“……玻尔事后向尼耳斯·玻尔研究所的同事们回顾了他们的谈话，海森伯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告诉玻尔，他的研究团队正在研究开发制造原子弹的途径。德国将赢得战争，也许很快，所以玻尔现在应该加入他们的研究”。

海森伯邀请玻尔参加德国原子弹的研制的这一想法从其表面来看也是所有解释中可能性最低的一种。这一说法与魏斯科普夫回忆玻尔在1948年的谈话完全矛盾，也和记录中玻尔当时告诉查德威克的情况相抵触。无论如何，认为海森伯会觉得他能把一个半犹太血统的人弄进纳粹德国最机密的研究计划之中绝对是荒谬的。

那么塞里尼对这次会面的看法的依据何在呢？此刻，眩晕感又回来了，你开始感到你在一幅埃舍尔（Escher）的画中，沿着楼梯走到楼上却又回到了原地，因为她给出的唯一参考依据出自……海森伯的勇敢卫士鲍尔斯的《海森伯的战争》。

而这是真的——鲍尔斯的确引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据我所知，这是此观点的唯一出处）。他说，魏茨泽克曾告诉他，事件发生四十四年之后，哥本哈根有人或几个没有具名者告诉他，玻尔说过他自信那就是海森伯的意图。你可能认为这是相当微弱的依据。无论何种情况，即便这真是玻尔所相信的，它也当然不是魏茨泽克所相信的，更不是鲍尔斯所相信的。他们是在阐明这据称为玻尔的信念有可能只是他个人的误解，或许这也说明他了当时的气愤。实际上，塞里尼声称已被斯佩尔所推翻

的那个意图倒正是鲍尔斯本人的读解。

古兹密特逐渐修正了他的观点，当1976年海森伯去世时，他对海森伯最后的评价颇为大度，多少去除了他那本书中的贬斥的口气。他写道：“海森伯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富有人性的人，也是一位勇敢的人。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但他在狂热同行们的无端攻击下深受痛苦。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应该被看作是纳粹体制的牺牲品。”

罗伯特·容克，曾经坚持捍卫海森伯的少数作家之一，却反向地修改了他的意见。在1956年最初出版的《亮过一千个太阳》中，他认为德国物理学家们出于良知而设法避免制造核武器，并引用了海森伯的话：“在独裁制度下，积极的反抗只能由那些假装与体制合作的人们来实施。任何公开表明反对制度的人将毫无疑问地剥夺了自己实施积极反抗的任何机会。”但容克后来改变了他的想法，将德国物理学家们消极反抗的看法称之为一种“神话”。他说，他曾经致力于传播它，那是出于“尊重那些令人敬仰的人格，而我后来意识到事情并非那样”。

海森伯不得不等待那真正富于勇气和毅力的对他的捍卫，1993年，鲍尔斯出版了他那本书。这是一部惊人的著作，新闻体的文笔，大气磅礴，视野广阔。也许是太广阔了一些，因为鲍尔斯无法舍去从主体叙述上岔出去的那些引人入胜的分支。我特别向剧作家和电影编剧们推荐此书，因为书中的素材还可以写更多的剧本和电影。

他的核心论点是，同盟国原子弹研究的成功是因为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的惊人的热忱，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了纳粹迫害，为了抢先于希特勒而不顾一切的流亡科学家；而德国原子计划的失败是因为德国科学家们暗中抵制以原子弹来武装希特勒，

无论他们的爱国心何等强烈，也无论他们是何等希望得益于这项研究的可能性。他指出：“热情是必要的，热情的缺乏是致命的，恰如一剂不留痕迹的毒药。”

但他更进一步论证海森伯“不仅是消极旁观，任凭研究计划死去。他亲手杀死了它”。他试图表明海森伯在每一点上都小心翼翼，既让当局持有足够的希望以确保原子研究计划掌握在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手中，又绝不给当局足够的希望以免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巨大的资金而真正实现他们成功的愿望。“海森伯的谨慎救了他。他得以自如地将德国原子研究的努力引入了一个扫帚间，让科学家们在那儿磨磨蹭蹭，直到战争结束。”

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评论此书的卡西迪认为它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坚持“作为历史，它是不可信的”。罗斯贬斥它为“纯属编造”及“一个学术灾难”。鲍尔斯在近期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的一封信中伤心地承认他未能改变任何历史学家对此事的原有看法。

本剧并无意图对海森伯人格的这些不同观点或对他行为的不同论述作出裁决。但不采用鲍尔斯对若干事件的某些观点，此剧则无法写成，所以我在此，对此事本身以及我自己的疑虑之处作一简要的综述。既然证据是混乱和矛盾的，从中寻找概率与可能的平衡几乎就像海森伯发现原子内在世界那样地无法确定。

海森伯人为地抵制了德国原子计划，鲍尔斯这一论点毫无疑问地得到了某些证据的有力支持。

首先有两份书面的直接证据。一份是由一位名叫弗里茨·瑞希(*Fritz Reiche*) 的离德犹太学者在 1941 年带到美国的信件。信来自德国物理学家弗里茨·豪特曼斯，他刚发现，如果他们能够启动一个反应堆，它就会产生钚，而钚则是他们无法分离

的 U-235 之外的另一裂变物。瑞希后来作证说他把信转给了在普林斯顿工作的一组科学家们，其中包括泡利、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汉斯·贝特（Hans Bethe）。正如安排会面的物理学家鲁道夫·拉登堡（Rudolf Ladenburg）后来的记录，豪特曼斯要告知的是“一大批德国物理学家正在海森伯的领导下紧张地从事铀弹问题的研究”，而“海森伯自己却试图延缓研究进程，因为害怕它的成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罗斯指斥豪特曼斯是一个被证实的说谎者，并以记录表明瑞希似乎收回了他对海森伯反对核计划的信赖。但这两项反驳似乎与瑞希和拉登堡的作证的一致性并无直接的相关。

第二份书面证据甚至更为直接，但也更加可疑。海森伯的美国编辑鲁思·安申（Ruth N. Anshen）的记录说在 1970 年收到过海森伯的一封信，信中声称，“哈恩博士、冯·劳厄博士和我编造了数学计算以避免由德国科学家来研制原子弹。”

信件本身显然从记录中消失了，但罗斯却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并将其视作一种公然自我辩护的企图。但鲍尔斯并未引用这封支持他的论点的信作为证据，而只是在他的注解中极为保留地提到了它。我认为所有海森伯的评论者中，杰里米·伯恩斯坦是最权威最公正的一位，他的《希特勒的铀俱乐部》一书将作为科学的考虑与理解的依据。该书斥此信为“不可信”和“一个幻想”。这事与海森伯一贯的谨慎稳重的处事截然不同，而且与哈恩和劳厄合谋也是荒谬的。哈恩不是物理学家，是化学家，而且，后面将谈到，他对相关的数学毫无了解，而劳厄则以一位纳粹的公开反对者而闻名，他从未参与过德国核计划研究。

不管真假，直接的证据就是如此。其余的所有证据都是间接的，所涉及的就是究竟海森伯实际上掌握了相关的物理学而只是隐瞒了它，还是他因为无知而失败。问题的核心在于临界

质量，以维持爆炸的连锁反应的裂变物质（U-235 或钷）的足够量。这个量的计算对于一项核武器计划进程的生死决定至关重要，因为从构成天然铀主体的 U-238 中分离出 U-235 困难极大，耗资极巨，而研制一个能够将铀转化为钷的反应堆也耗时极长。在战争初期，双方科学家都相信临界质量为数吨，于是生产它的可能性便几乎不存在。只是在英国从事研究的两位科学家——鲁道夫·佩尔斯和奥托·弗里施通过计算，意识到快中子在纯 U-235 中的反应之速，以致所需裂变物的最少量不是几吨而是几公斤之后，这才成为一个可以想像的概念（与此相关的各种嘲讽已在剧中呈现，此处不再重述）。

鲍尔斯提出，由于海森伯“编造了一种似乎可信的临界质量的估算而得出几吨的结论”，因而在德国它从未成为一个可以想像的概念。他相信海森伯“十分清楚如何用少量的材料制造原子弹，只是他秘而不宣”。

某些证据表明德国研究团队确实一度发现了临界质量的一个低得多的数值——确实以公斤计算。这和弗里施和佩尔斯的估算有某种关联，也与广岛原子弹的实际临界质量（五十六公斤）有关。后来，主持德国邮电部的另一核计划的曼弗雷德·冯·阿登（Manfred von Ardenne）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在 1941 年的晚秋，他曾从海森伯和哈恩处私下得知他们已经求出了 U-235 弹的临界质量，发现它大约在十公斤。这一消息随后由魏茨泽克收回，他告诉阿登他与海森伯已断定制造 U-235 弹是不可能的（因为反应的热量使铀超速膨胀而无法继续）。但海森伯，据我所知，从未评论此事，而魏茨泽克，据伯恩斯坦说，“根本否认”有过这一交谈。

就像伯恩斯坦所说，很难知道如何理解这一切——它是“任何研究这一专题的人都会撞上这几堵砖墙中的一堵”。我想很难

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冯·阿登的回忆。哈恩，如我前文所说，对数学毫无所知，对其他相关之事也不了解，而且我们会看到，他得由海森伯给他解释这些问题。而另一方面（这故事有印度佛像般的多面多手），在魏茨泽克1941年9月所写的美国原子弹计划可行性的报告中他谈到了一个五公斤重的原子弹的破坏力。随后又在1942年2月写给军械部的一篇未署名的进展简报中未加进一步解释地提出了一个介于十公斤和一百公斤之间的临界质量。而且1942年6月在哈尔纳克府中与斯佩尔的那次决定性会面中，当陆军元帅米尔希问他摧毁一个城市的原子弹该有多大时，海森伯回答说，或是在答复欧文访谈时说，它，或者无论如何它的“核心作用部分”，必须“像一个菠萝那么大”。

但说到底，我相信最关键的那份证据一直封存某处，直到最近，这份资料从未向任何撰写海森伯的作者们开放——农庄馆（Farm Hall）记录的文本。伯恩斯坦、鲍尔斯和罗斯是最早获准目睹这份资料的评论者。

但是他们仍然未能从这份记录中得出相同的结论。

农庄馆的故事本身就是另外一部完整的戏剧。为英国出版的记录文本作序的英国原子物理学家查尔斯·弗兰克（Charles Frank）爵士，在他令人叹服的公正清晰的序言中，为此书未能及时问世以供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所用而遗憾。

战争末期，为了最终确信德国不会在最后时刻发起恐怖的核袭击，古兹密特所属的阿尔索斯特遣队突破了德军前线的残余部队，并在海格洛赫找到了德国反应堆的遗留处。他们对巴伐利亚的乌尔费尔德实施了一次突袭，在海森伯家中逮捕了他，也抓住了研究团队中的其他科学家。科学家们驻地附近的黑兴根和海格洛赫都位于法国占领区。德国科学家们在法国人的鼻子底下被

秘密逮捕，押回伦敦。在那里，根据战时法令他们被秘密囚禁在前情报系统的安全场所——剑桥附近的农庄馆。目的似乎是：其一，防止他们将任何原子机密泄露给我们的两个盟国——俄国与法国；其二，在我们完成以及使用我们原子武器之前防止任何核武器可行性的讨论；其三，也许是为了挽救海森伯及其他人的生命，因为一位美国将军为了避免上述麻烦，提出了干脆枪毙他们的解决方法。

在农庄馆内他们被囚禁了六个月，其间他们并未作为犯人而是被当作客人接待。但到处都安装了监听器，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被秘密录音。录音记录文本的存在和被囚禁者的存在同样讳莫如深。同盟国原子弹计划的主管格罗夫斯（Groves）将军在他的回忆录（1962年）中引用过这些记录。而古兹密特显然有权看到它们，他在他关于阿尔索斯的一本书中引用过。但英国政府一直禁止这些文件的公开，也许是出于保护被拘留者的情感，而今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战后德国的科学名人，也许只是出于一种寻常的病态保密心理。甚至玛格丽特·高因（Margaret Gowing）在1964年撰写她的英国原子政策的官方史时也未能看到它们，而希望一睹记录的戴维·欧文在1967年撰写《病毒之屋》时，几经努力，也未能如愿。直到1992年，政府才终于在科学界与历史学界的领袖们的协力争取下，解除了这一禁令。

该记录的德文原本已经遗失了，而英文译本显然是仓促而成，毫不顾及口语的风格，但这些记录却直接证明了海森伯及其他人在他们相信无人监视而交谈时的想法。十位被拘留者代表了差距很大的不同态度。从核研究计划的纳粹政府行政管理人瓦尔特·格拉赫（Walther Gerlach）以及曾经是纳粹党徒的库尔特·迪布纳（Kurt Diebner），到公开反对纳粹体制的冯·劳厄。劳厄从未参与过原子计划，他被归入这一团队颇显神秘。

这六个月中的交谈也同样反映了差异颇大的态度与情绪。当一群学者被不予解释地剥夺了自由而囚在一处时，那种状况是可以想像的。其间充满了人们料想中的许多抱怨、策划和彼此的摩擦。

然而有一事在我看来却十分清楚：作为所有的实用目标，德国人的思考停留在一个反应堆上，完全没有任何以此来制造武器的热情。在广岛爆炸宣布后，他们在毫不掩饰的恐惧中说出的那些惊悸的话语具有特别的说服力。这一消息是由殷勤备至、彬彬有礼的主人瑞特纳（Rittner）少校，在晚餐时告诉被拘留者们的。但海森伯并不相信，直到他亲耳听到 BBC 九点钟的新闻。瑞特纳在报告中说：“当他们意识到消息的真实，他们完全惊呆了。我们知趣地离开，以便让他们不受干扰地讨论他们的处境……”

在随后的交谈中，海森伯说：“我对我们制造一个轴发动机 [反应堆] 的可能性是绝对确信的，但我从未想过我们会造一个炸弹，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实在庆幸那是个发动机而不是个炸弹。这是我必须承认的。”魏茨泽克则说他认为他们不必为失败而辩解，“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希望成功”。格拉赫说：“我们不能在英国人面前说我们没有尽力而为。尽管我们抵制了战争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有些事情我们知道甚至可以一起讨论，但不能当着英国人的面。”

冯·劳厄在十四年之后的一封信中这样诉说，在随后几周中的用餐谈话时，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德国原子物理学家们确实没想制造原子弹，也许是因为不可能在预期的战争期间完成，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要它”。冯·劳厄的这一净化“说辞”（德文 Lesart）的细节陈述被一些反感的评论家们抓住，将它与某些物理学家们在战争初期无疑曾经多次向纳粹当

局鼓吹原子武器的前景进行对照。

是啊，随着时光的流去，我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梳理我们的记忆，而毫无疑问，海森伯和他的难友们也是这样。但是伯恩斯坦将这一 Lesart 归源于那九点钟新闻广播的即时反应。如果是那样，我只能说这个研究团队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他们自发的共通的自圆其说。如果他们都思考得如此之迅速，合作得如此之密切，那么他们在原子弹研究上未能再上层楼就更令人惊异了。

我必须说，在我看来那些当场的无准备的反应十分明确地印证了鲍尔斯论点的第一部分，无论如何，这一观点是对的，他所断定的“热情的致命缺乏”确实一直存在。格拉赫所作的他们实际上“抵制了战争”的声明，并未受到他人反对，这至少表明了他对许多未揭开之事的心照不宣。

但这些记录有助于证实鲍尔斯说的海森伯“编造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计算临界质量的方式以及吨计的答案，而他非常清楚如何用少得多的材料制成原子弹，但他秘而不宣”的论点吗？

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首先需要去除：海森伯是否理解甚至更基本的一个问题，一个反应堆（通过天然铀或 U-238 和 U-235 的某种混合物中的慢中子起作用）和一个原子弹（通过纯的 U-235 或钚的快中子起作用）的区别。直接目睹过记录的古兹密特在他撰写的关于阿尔索斯的一书中，似乎认为那些记录支持他所持的海森伯不理解这一区别的观点。在这些记录出版前，罗斯也同意古兹密特的否定观点。

但是根据记录，当天夜里，在格拉赫回他的房中去哭泣，终于只剩下他俩时，海森伯对哈恩说：“我一直知道可以用 U-235 和快中子来做炸弹。这就是为何 235 只能（应作“只有 235 能”）

用做一种爆炸物。慢中子是永远不能用做爆炸物的，即使用重水器（德国的反应堆）也做不到，因为慢中子只以热速率运动，结果是反应太慢以至反应尚未完成东西就爆炸了。”

伯恩斯坦（与古兹密特不同）认为这句话和随后的话表明海森伯的确理解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区别，“但他对哪一个都理解得不深——尤其是原子弹”。罗斯现在似乎承认海森伯的话确实表明了他清楚原子弹必须用快中子来引起裂变（虽然他过去坚称海森伯在玩弄某种大爆炸反应堆的概念）*。

海森伯和哈恩两人在那个可怕的夜晚间的谈话，于我而言，毫无疑问地解答了海森伯对临界质量的理解。他透露给哈恩他相信的合理计算并告诉他答案是“大约一吨”。在德国研究团队已退出竞赛被拘留之时，在别人已经造出原子弹之后，在那种局面下，我不觉得他还有任何现实的理由来重演一个编造的计算或一个编造的答案。如果他一直以来掩盖着他正确的计算和答案，那么此刻无疑是说出它们的时候了。我认为，在此之前他对哈恩说的“坦白地说，我从未算出过它因为我从未相信过人们能够得到纯 235”是一句可信得多的实话。

的确，那晚的早些时候，当新闻刚结束，当在场的所有人正在讨论时，哈恩对海森伯说：“但请告诉我你为何总是对我说要做成这事必须要有五十公斤的 235 呢？”（当时海森伯回答说他不想在那一刻表态。）这似乎表明他在那时之前的确已做过某种计算，就像冯·阿登所宣称的——尽管这无疑是一劳永逸地击破了那不太可能的说法，即哈恩也牵涉在内，或者他自己也曾

* 伯恩斯坦在他的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了其他评论者很少会解释的问题——慢中子与快中子的区别：“按照定义，慢中子的运行速度为每秒几公里，大约是室温中气体的一个分子速度。因此慢中子也被称为热中子。而快中子，它们在许多核反应中被发射出来，其运行速度为每秒几万公里。”

作过某种估算。也许海森伯并未做过计算而只是一种推算。即便那是一种认真的计算，也似乎绝不可能是正确的计算，或者是他一直坚信的计算。

让我（最后）明白这一点的是杰里米·伯恩斯坦。我应当说明在编写此剧之前，当我第一次阅读农庄馆记录时，我读的是英国版的未加评论的文本，不知道还有一个美国出的完全不同的版本，其中收录了伯恩斯坦的详细评注。在此剧上演和出版后，承蒙他的厚意寄来了这书，而这书澄清了我原先弄不清楚的大量的史实。这些终究是科学家对科学家的谈话，又存在对话语言转为报道语言以及翻译中进一步出现的模糊。伯恩斯坦既是一位出色的记者又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从事于原子研究历史已多年。（他回忆起1957年在内华达试验基地时，曾手捧过一颗裸露的原子弹的钚核：“它摸上去稍暖，因为钚有低限的放射性。”）他对相关的物理学问题有着透彻的理解，因而在物理学上是一个理想的引导者——尽管我觉得，对物理学家们的心理分析他稍欠敏锐感。

我欣喜地发现，在海森伯向哈恩承认从未求出临界质量这个前提性的问题上，他与我看法一致。他认为，此事只能从它的表层涵义来理解，而且他自问道，这又如何与哈恩所回忆起的五十公斤一数相一致。他解释说，当海森伯试图给哈恩做此计算时他“在每一层面上都错了”——他演算错了，不管怎样他做了错误的演算。“我了解科学家们的工作方式，”伯恩斯坦说，“我发现他先前计算正确的说法不可信。你尽管可以想像忘了一个数字的海森伯——不管怎样，他在数字上是不很高明——但很难想像他会忘记一种常规的计算方法，一种曾经将他引向一个更合理答案的方法。”

临界质量的计算并不是海森伯那天夜里所犯的唯一错处。甚

至当他向哈恩透露他知道临界质量如何通过一个反射外壳来减小，他提出了能够产生所需的反作用的外壳材料——碳。碳是一个反应堆很好的减速剂，而海森伯建议用它来作为原子弹中的“屏”。对此，伯恩斯坦说，这“表明了他的思考像一位反应堆物理学家，而在这最后两年中，他也正是一位反应堆物理学家”。

当然这只是海森伯从广岛事件中醒来后脑中最初的想法。一周以后，借助于报上披露的两颗原子弹的少量细节，海森伯给所有被拘留的同伴们作了一次演讲，就盟方的原子弹制造提出了一个详尽而深思熟虑的报告。鲍尔斯提出，演讲中所包括的极为基本的概念以及听讲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十分清楚地表明，这对出席的众人完全是新闻，只有他最亲密的副手除外。鲍尔斯说：“农庄馆的记录丝毫不差地证实了，直到战争结束，海森伯也未向德国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格拉赫]解释过原子弹物理的基本原理。”这些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海森伯从未向格拉赫解释过快中子裂变”。鲍尔斯说，在演讲的末尾，“德国科学家们，如有第二次机会，就能够着手制造原子弹了”。

伯恩斯坦对此演讲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表明海森伯的解说仍然有一些基本的误解。海森伯现在似乎有了如何计算临界质量的“初始概念”（尽管他还是演算错了），但对于原子弹的实际制造，他的了解并不比他的听众们多多少。令伯恩斯坦感到十分新奇的仅仅是这份材料表明了德国研究计划的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非常糟糕。

我不是一位科学家，所以无法提供物理学上的意见。但在在我看来，我只能说，海森伯在一周内似乎确实走了一段长得惊人的路——也就是，如果他多少是从头开始的话。而且他肯定是那样。那么此刻他回忆不起他实际上已做过的研究确实是不合情理的。对我而言，结论是必然的：他不曾做过计算。如果他

将临界质量多小的致命答案对众人保密的话，那就像鲍尔斯所论证的，那么就是他对自己保密。

总之，我认为，对海森伯的判断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他那一基本计算的错误。是像他的贬抑者们所声称的，它意味着无能和傲慢吗？这是可能的。即使伟大的科学家——伯恩斯坦承认海森伯是其中之一——也会犯错误，也会错过比他不如的人们所看到的可能性；海森伯承认他在测不准原理本身的表述中犯过一个错误。同时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伯恩斯坦的判断，虽然海森伯是掌握量子力学的反直觉抽象的第一人，他在常规估算和实际演算上并不那么强。

或者这一失误意味着某种十分不同的东西？以一种无意识的避免来挑战心安理得地假设一事并无实践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他试图从事的不是造一个炸弹，那就会心安理得。这完全是一种普遍的退避心理的成分？就像鲍尔斯命题第一部分的那更可信的部分所提示的？如果是那样，你会纳闷这种退避是否是一种足以肯定到可以用来做解释的状态。海森伯陷入一个怪圈：他没有试图计算是因为他觉得不值得做——他觉得不值得计算是因为他没有试图计算。奇异之处在于，需要解释的现象并非这种未发生而是它的反面——弗里施和佩尔斯逃出了同样的怪圈。这几乎就像一种随机的量子事件：期间，它的发生并不比它的不发生更可解释。

当然，在战后，海森伯对核能的任何军事应用就不再仅仅是消极地避免，而是积极地反对。在1950年代，当西德政府出现了一个以核武器来武装德国的提案时，他与魏茨泽克等人联合起来一致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全面永久地击败了这一提案。

还有一件涉及海森伯战争期间态度的小小的证据，非常奇怪的是鲍尔斯却未曾提及：回旋加速器的问题。

1942年海森伯与斯佩尔的那次关键会面似乎最终摒除了德国原子弹的一切可能性，据报道，海森伯强调了建造一台回旋加速器的必要。回旋器可用于同位素分离，正如美国对回旋器的应用，而这是德国原子计划中的棘手的症结。斯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次会面这样陈述，“考虑了一些困难，海森伯解释说实际上欧洲只有一台回旋加速器，而其能量是最低的。再者，这台加速器在巴黎，由于保密的需要就不能充分使用。”鲍尔斯提到了这点，但未继续进行明显的推论：那就是如果斯佩尔的记忆准确，那么海森伯显然在说谎，因为他完全清楚手边的另外一台回旋器——在哥本哈根的玻尔实验室里。这就表明他并非像他表面上那样焦虑地想弄到能够分离U-235的机器。或者，至少他将保护玻尔实验室的愿望置于德国的战争目标之上。

也许，就是斯佩尔记错了。这种冒险的公然说谎似乎不合乎海森伯的行事风格，在他自己对这次会议的陈述中他没有提到它。不管怎样，在玻尔出逃后，当海森伯在1944年回到哥本哈根去评估德国的一项运走研究所所有设备（应该包括那台回旋器）的提案时，他似乎竭尽全力，设法在那时还将它留在丹麦人手里。

剧中所触及的不确定性的形式之一便是人类记忆的不确定性，或可以说是历史记录的不确定性。为了避免剧中更多的纠缠，我略去了许多这类例子。有些例子，像冯·阿登所回忆的海森伯与哈恩在1941年提出的关于实现临界质量所需惊人的数量的难度，我已经在后记中提及。另外还有一些。有一件较小的事例涉及到派往哥本哈根遣送犹太人出境的船只，是像目击者回忆的两艘呢，还是一艘（名为Wartheland）。一个更主要的争议点是在1941年的会面中海森伯是否给玻尔画了一张图。

根据洛斯阿拉莫斯团队成员之一的汉斯·贝特的说法，海森伯画了一张草图来向玻尔说明他们当时在德国的研究工作。玻尔显然把图也带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因为贝特（以及另外一些人）记得那张图在一次会上被传阅。贝特告诉鲍尔斯，玻尔相信那表示的是一个原子弹；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那是一个反应堆。但是，奥格·玻尔（Aage Bohr）——尼耳斯·玻尔的儿子，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以及诺贝尔奖得主），在海森伯来访时他同他父亲一起在哥本哈根，后来又同他父亲一起在洛斯阿拉莫斯——绝对地坚持认为没有那样一张图。

如果这是真实的，它也许有助于解释古兹密特所以不顾农庄馆的记录，坚称海森伯无法说出一个反应堆同一个原子弹之间的区别。它也必然置海森伯的回忆于疑问的阴影中，即海森伯关于1941年同玻尔在一次散步的谈话过程时，玻尔突然中断刚刚开始谈话的回忆。在我看来，海森伯似乎绝不可能冒险把任何东西留在纸上，而即便他那样做了，我也不明白他为何不在战后抓住此事来证明他曾经向玻尔暗示了德国的原子弹研究。我设想，可能是玻尔自己画了这张草图，以便向洛斯阿拉莫斯的同僚们说明海森伯的进展，但事情的真相似乎无法追溯。

本剧在伦敦首演之前和之后，我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爵士好意地为我阅读剧本，还有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巴拉茨·吉奥非（Balázs L Gyorffy）也为我阅读了剧本，并提出了一些修改的建议。我还感激尼耳斯·玻尔文献馆馆长芬·阿瑟路德（Finn Aaserud）和他馆内的同事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许多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在看了该剧的演出后给我写了信。他们中大多数人非常地理解与支持，也有人在科学专业细节上给我以指正，对此我特别感谢。

他们还指出有两处数学错误荒唐得使几行台词从头到尾都没有意义——当我重读它们时也是同样感觉。现在，所有这些都已被改正，但我肯定还存在别的错误。那么多新的资料以不同方式出现，因此我做了全面的修订，并补充了这篇后记以便与纽约版的演出相符。

我未能完全解决的一件争议之事是关于马克斯·玻恩在引入量子力学中的作用。此事是由他的儿子古斯塔夫·玻恩(Gustav Born)(十分含蓄地)提出的。他觉得我在写及他父亲时有欠公正。我不情愿使剧本变得更复杂，但我还是对剧本和本后记作了调整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玻恩教授的愿望。但是，有一句台词我们还有分歧，句中说海森伯“创立了量子力学”。我在此引用了另外一些物理学家的评论(其中包括一位并不特别同情海森伯的人)，但我深知这是一种非常过分的简单化，是对原先不公正性的一种加剧。1932年海森伯因“创立量子力学”而获得诺贝尔奖，而玻恩却只能等到二十二年后才因他的作用而得到同样的承认。困难在于我想不出一个别的法子 in 对话中简单地表述此事。

美国物理学家斯宾塞·沃特(Spencer Weart)在写给芬·阿瑟路德的一封信中极有说服力地指出，临界质量的计算似乎比我让玻尔向海森伯所建议的要难得多。“佩林未能算出临界质量，而他发布的以吨计的临界质量却潜移默化地误导了所有的人，于是玻尔和惠勒失败了，库尔恰托夫(Kurchatov)失败了，查德威克失败了，所有其他的德国人、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错过了它，甚至在这类问题上比所有人都出色的费米也在尝试中失败了，每一个人，除了佩尔斯……物理学是艰深的。”

有些来信者也反对海森伯针对同盟国造出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几句台词，“他们中，哪怕是一个人，停下来想过，哪怕是

短短的一刻，他们在做什么？”其理由是这对莱奥·齐拉特（Leo Szilard）是不公平的。确实，齐拉特在1945年3月发起了一个旨在劝说美国政府不使用原子弹的运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社会和政治影响委员会——让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们表达他们的感受；齐拉特还在科学家们中间传发了一个请愿书，六十七位科学家签了名；请愿书中提到了“道德层面的考虑”，虽然并未特别指出其确切内容。

但齐拉特的反思所陈述的主要原因却与原子弹将带给日本人的后果不相干——他担忧的是对同盟国的后果。他认为（颇有远见）原子弹对日本的实施将触发美苏两国的原子军备竞赛。委员会的报告（似由齐拉特亲自起草）和请愿书强调了同样的观点。而此时，不管怎样，原子弹的研制几乎已经完成。当初敦促核计划的正是齐拉特，而据我所知，在这一计划的实施中无论是从事原子弹的研究还是实际制造，他从未表示过丝毫的迟疑。

所以我认为尽管齐拉特存在着反思，这些台词仍然成立。科学家们已经把原子弹奉送给政府，句中所涉及的只是德国科学家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意图。如果海森伯的研究集体已经制成了原子弹，我不认为请求希特勒发善心不对任何人扔炸弹会对他们的道德声誉有多大的恢复——特别是如果他们反对是因为怕造成战后轴心国之间可能的紧张关系。

一个若隐若现的难解之点依然存在。如果海森伯当时做了计算，如果这缩减的答案结果多少激起了纳粹当局和科学家们的真正的热情，德国人是否已经造出了原子弹？弗兰克认为在欧洲战事结束之前他们做不到——“即使是有着坚实的工业与科学优势的美国在英国及英国的前德国流亡人士的有力协助下，也未能办到（VE日是1945年5月8日，而阿拉莫戈多

[Alamogordo] 的三一试验 [Trinity Test] 是在 1945 年 7 月 6 日)。”斯佩尔(作为纳粹的军械部部长大概会将此计划坚持到底)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如果德国停止所有其他的武器研制项目,该计划在 1945 年内也许可以完成,而在后两段中,他又谨慎地将他的估计改为 1947 年;当然他需要这种可能性来为他的失败辩解。鲍尔斯指出,不管何种时间表,它的起始日期应该远早于此。他坚称,在德国,原子能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当局的兴趣。“美国,从 1942 年 6 月开始,用了三年多时间完成了这个项目,而苏联则用了四年。如果在 1940 年年中即开始认真努力地研制原子弹,那它可能在 1943 年就完成了测试,要比盟军轰炸机摧毁德国的工业早得多。”

正如剧中所说,如果与玻尔的交谈是另一种情形,如果这“认真的努力”是在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后才开始,那么即使按这一时间表,原子弹也只能在 1944 年末产生——而到那时,德国工业生产它的可能性当然就少了许多。无论怎样,面对的挑战与困难是可怕的。尽管使用克劳修斯-狄克尔管(Clusius-Dickel tubes)的试验方法起源于德国,德国的研究集体仍为无法找到一种成功的技术来分离数量可观的 U-235 而大为沮丧。他们本可试用同盟国使用过的成功程序的一种——气体扩散法。这是另一项德国发明,是古斯塔夫·赫茨(Gustav Hertz)在柏林创始的,但赫茨因为他的叔叔是犹太人而失去了他的工作。(无独有偶,正是美国各种同位素分离工厂运转启动的延缓,使得盟国的原子弹未能及时制成以攻击德国。)

分离 U-235 的失败造成了反应堆研制的停顿,这样也就延缓了生产钚的前景,因为他们甚至无法分离出足够的量以用于富化(增加天然铀中的 U-235 成分),这样就更难使反应堆达到临界状态。由于在海德堡的瓦尔特·博特(Walther Bothe)研

究小组对石墨的中子吸收率的错误估算，使得反应堆的设计者们不得不用重水来作为减速剂，从而更加延缓了反应堆的建造。重水的唯一来源是挪威的一家工厂。在属于特别行动部队的挪威伞兵、美国轰炸机和挪威抵抗运动人员的一系列袭击下，那工厂被迫关闭。但也许，如果一个失败的计划在战争的第一天起已经建立，那么在袭击开始之前便会储存了足够的重水。

如果，如果，如果……这将是长长的一串。但，这仍然是可能的。真正的热诚与真正的坚定是无可衡量的。在可能的世界中，它们有时起着决定作用。

读者若对这些问题有足够的兴趣而愿意查找与剧作相关的历史记录，可从下列资料入手：

托马斯·鲍尔斯：《海森伯的战争》（*Heisenberg's War*, Knopf, 1993; Cape, 1993）。

戴维·卡西迪：《不确定性：沃纳·海森伯的生活与科学》（*Uncertainty: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Werner Heisenberg*, W.H. Freeman, 1992）。

亚伯拉罕·派斯（Abraham Pais）：《尼耳斯·玻尔的时代》（*Niels Bohr's Times*, OUP, 1991）。派斯是一位与玻尔同辈的核物理学家，他认识玻尔。此书是一本质朴的传记，有着异乎寻常的形式，由于派斯的描述感不会多于我的物理感，此书的结构更像一本科学报告而非一本人物传记。但是玻尔也是出名地缺乏描述感，他的助手们的任务之一就是陪他去看电影并在事后为他解释剧情。

沃纳·海森伯：《物理与物理之外》（*Physics and Beyond*, Harper & Row, 1971）——另见德文原版 *Der Teil und das Ganze*。他的回忆录。

杰里米·伯恩斯坦：《希特勒的铀俱乐部：农庄馆的监听记录》

(*Hitler's Uranium Club, the Secret Recordings at Farm Hall,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Woodbury, New York, 1996*)。
戴维·卡西迪作序。

——或者该记录的英文版：《E行动：农庄馆记录》(*Operation Epsilon, the Farm Hall Transcripts, 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 1993*)。查尔斯·弗兰克爵士作序。

相关资料还有：

海森伯：《物理与哲学》(*Physics and Philosophy, Penguin, 1958*)。
尼耳斯·玻尔：《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Niels Bohr, Oxbow Press, Connecticut, 1987*)。

伊丽莎白·海森伯：《心灵的流放》(*Inner Exile, Birkhauser, 1984*)——另见德文版 *Das politische Leben eines Unpolitischen*。其中有辩解的语气，另外也展示了她丈夫对世人所隐瞒的那种内心的痛苦以及他在1945年骑自行车返家的过程。

戴维·欧文：《德国的原子弹》(*The German Atomic Bomb, Simon & Schuster, 1968*)——英国版名为《病毒之屋》(*The Virus House, Collins, 1967*)。德国原子弹计划的故事。

保罗·劳伦斯·罗斯：《海森伯和纳粹原子弹计划》(*Heisenberg and the Nazi Atomic Bomb Proje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关于第三帝国的记录与文件II：德国原子研究》(*Record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Third Reich, II German Atomic Research, Microfilms DJ29-32., EP Microform Ltd, Wakefield*)。欧文那本著作所用的研究资料，包括对海森伯与其他人的长篇口头访谈记录。我能找到的唯一可参考的一份藏于伦敦英国国防部图书馆。

《量子物理学史档案》(*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Quantum Physics, microfilm*)。包括海森伯与玻尔的全部信件。可供参考的一份藏于伦敦科学博物院图书馆。玻尔的信件几乎完全在丹麦，而海森伯的信件，除了一封信之外，都在德国。

莱尼·亚希尔 (Leni Yahil)：《营救丹麦犹太人》(*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1969*)。

还有许多关于玻尔研究所全盛时期的生活趣闻，见：

弗伦奇 (French) 与肯尼迪 (Kennedy) 编撰：《尼耳斯·玻尔百年诞辰纪念集》(Niels Bohr, A Centenary Volume, Harvard, 1985)。

亨德里克·卡西米尔、乔治·伽莫夫、奥托·弗里施、奥托·哈恩、鲁道夫·佩尔斯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的回忆录。

后人对哥本哈根阐释的挑战，见：

戴维·多伊奇：《现实的结构》(The Fabric of Reality, Allen Lane, 1997)。

默里·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The Quark and the Jaguar, W H Freeman, 1994; Little Brown, 1994)。

罗杰·彭罗斯：《皇帝的新想法》(The Emperor's New Mind, OUP, 1989)

实际的“双缝”(two-slits)实验是由迪尔(Dürr)、诺恩(Nonn)和雷姆珀(Rempe)在康斯坦茨大学所做，报告见于《自然》(1998年9月3日)。同期载有彼得·奈特(Peter Knight)的一篇通俗易懂的介绍，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的另一篇(大胆题为“不确定性的终结”[An end to uncertainty])介绍刊载于《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 1999年3月6日)。

后记补遗

正如我前文所解释的，根据该剧在伦敦上演期间人们的批评和建议，以及我所获得的新的史料，我对剧本做了若干改动。然而，该剧在纽约的上演引起了更广更深的争议。一部分评论者对整部戏提出了他们的疑虑。保罗·罗斯是此剧最为坦率的批评者，他甚至在剧中寻找到一种“巧妙的修正主义……比之欧文那种直言不讳的荒谬论点，对艺术、科学和历史的整体而言更具破坏性”。

在美国，人们对该剧的最常见的批评是我应当更重视纳粹体制的罪恶，尤其是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有人指出，海森伯 1941 年的哥本哈根之行与“万西会议”(Wannsee Conference)是一致的。有人强调应该把海森伯的这次访问置于他在战争期间走访其他被占领国的背景之中来考虑。有人觉得我应更加重视海森伯对战争所持之

观点，其观点是：德国的征服，至少对东欧的征服，是正义的，而德国战胜苏联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回顾全剧，我觉得某些批评我能够接受。我也许应该让海森伯直接为德国的战争企图辩护，而不是让玻尔在发怒时转述他的观点。我也许应该以某种方式来显示哥本哈根之行与海森伯所有其他对占领国出访的对等性，而那些出访似乎并不带有哥本哈根之行所存附的神秘动机。

我不甚认同关于应该对纳粹体制的罪恶予以更大重视的观点。我想这已经是人尽皆知而无需指出的。毕竟，这是本剧已知的事实。这也恰恰是为何存在（或为何应该存在）一个面对海森伯以及我们如何理解他的问题。不管怎样，本剧再三地追述了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从对所谓的“犹太物理学”（相对论）的压制到所有犹太物理学家们的被迫出逃，从古兹密特的双亲死在奥斯威辛到党卫队企图将丹麦所有的犹太居民押送到死亡集中营，正如玛格丽特所描绘的“人类灵魂中的黑暗大潮……泛滥喷涌将吞噬我们所有的人”。

有些评论甚至更为激进。本剧强调的是确定海森伯的动机何其之难，而对某些评论者而言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他们有着肯定无误的解答，尽管那些解答各不相同。在有些人看来那不过是海森伯赶来向玻尔宣说德国战争目标的正义性以及胜利的必然性的愿望而已。在罗斯和另外一些人看来，他负有间谍使命，他要通过玻尔来了解同盟国是否也正在研制原子弹。

我同意海森伯可能希望向玻尔陈述德国的立场，但他远道而来绝非仅仅为此。我也同意间谍一说。而我的海森伯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告诉玻尔他需要关于同盟国核计划的“某种暗示、某种线索”。在我看来这是常理，他若不想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弄清同盟国是否会向他的祖国扔原子弹，那真是糊涂到失常了。

这与他宣称的此行的目的——讨论德国的核研究团队为德国研制一种武器是否存有道义依据是毫不矛盾的。他能获得的任何对方意图的情报都将成为他们后续行动的先决条件。

有些批评我无法接受。但我愿意澄清事实。关于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海森伯冒着生命危险与玻尔交谈，罗斯教授认为我“幻想”了海森伯这一恐惧。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引申了海森伯的原话。玻尔在剧中曾提出，在1942年的6月间，海森伯曾稍稍超过了芝加哥的费米。物理学家乔纳森·洛根(Jonathan Logan)在《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上撰文指斥这一观点有误导之嫌。从上下文中我们明了这所涉及的是中子倍增问题，而这一观点来自戴维·卡西迪在他的海森伯传记中的陈述。在我的一再询问下，费米《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的编者之一——阿尔·沃滕伯格(Al Wattenberg)向我证实了卡西迪的这一评论的正确性。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是可以争议的论点。而另外一些批评，我觉得极难理解——有的甚至令人难以置信。觉察出本剧的巧妙修正主义的罗斯教授，发现剧中的某一情节尤为居心叵测——剧中的海森伯谈到了历史的无情冷嘲——令同盟国确信制造核武器可行性的临界计算(临界质量计算)是由被迫逃亡到英国的一位德国犹太人和一位奥地利犹太人所作出。罗斯教授将此视为企图将原子弹的发明归罪于“犹太人”。

哈佛的物理学和科学史荣誉退休教授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提出的观点更不寻常。鲍尔斯认为海森伯曾正确地计算了临界质量，只是编造了一个假的结果来隐瞒它，而霍尔顿则视本剧以“最佳结构”体现了鲍尔斯所持的观点。他相信，当本剧在纽约上演时，我已被迫(由于伯恩斯坦)将此观点置于一旁。因而在此剧的动机上我现在有了一个无法解

决的问题。

我只能认为，霍尔顿之所以被误导是由于我在《后记》中以赞美与感激之情谈到了鲍尔斯的著作。此书一直以来备受抨击，但我赞美它行文笔调之大气和作者研究之广博。我也同意他命题的第一部分（热情的欠缺）。而霍尔顿自己也一样，他还认为凡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认同此一观点。但是在《后记》中，我已再三申明我并不接受鲍尔斯的关于“编造”的观点，而且从未接受过。

对此你甚至无需阅读《后记》，因为它贯穿了全剧。这中心论点就出现在海森伯与奥托·哈恩的交谈之中，他说他从未试图计算它。根据我的计数，剧中有三十五处对话牵涉到这一点，关于他为何不曾计算以及如果他计算了会有何种后果。任何只要稍稍浏览过此剧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难于理解。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某些人对剧中海森伯提出的“新奇的量子伦理”的反应。我想我应该在其前方竖一发光的“冷嘲”之标志。这是对他洞察力的影射，即他在量子物理学上的创见，物理学应被限于我们能实际观察事物的测量——原子内在事物的外部效应。他在剧中提议，如果我们判断人的动机仅凭他们行为的外部效果而不考虑他们的意图，我们应当需要一种同样的伦理。根据霍尔顿教授的说法，在这新的伦理之下，海森伯“欣喜”自己在天堂将有一席之地。霍尔顿教授忘了提到海森伯还“欣喜”在新奇的量子伦理之下那党卫队军官在天堂也有一席之地。那人在1945年似乎想处决他的，而最终只是因为一包美国香烟而放了他。乔纳森·洛根居然相信我甚至当真提议那党卫队军官也应进入天堂。

让我把这事弄得毫不含糊：我的海森伯是说，我们在判断人们的行动时必须考虑其意向。（意向的认识论正是此剧的关怀

所在!)他是说玻尔将仍然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尽管他卷入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制造。而他自己将继续被人们怀疑和责难,尽管他未能杀害任何人。或许霍尔顿、罗斯和其余人对此剧的反应正是这种判断的真实性的一种间接的证明吧。

对本剧最惊人的评论之一来自约亨·海森伯(Jochen Heisenberg)——沃纳·海森伯的儿子。我在纽约的《哥本哈根》首演式后见到了他,他令我颇为吃惊。“当然,你的海森伯同我父亲毫不相像”,他说,“除音乐之外,我从未见我父亲情感流露。但我理解,作为剧中的人物他不得不那样地坦率外露。”

这对我似乎是一个警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一个真实人物是何其艰难。对于试图尝试清晰无疑地呈现纷乱匆忙的人生中难以言传的意念和感受,呈现事件中潜在的结构作家,这无疑是个深刻明智的指点。19世纪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曾有过同样的观点,他的伟大的名言(所有的剧作家都应当把它烙在他们的书桌上):“在一部好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对的。”我猜测他的意思并非是邀请观众来赞同每个人的行动,而是每一个人物都有自由和口才来为自己作出最令人信服的辩解。不管它是否是剧作家的一条普遍规则,它肯定适用于这部特定的戏,这部讨论我们的无奈的戏。也就是,在我们对物质与精神双重世界的观察中,人们甚至无法避免特定的观点。

我想,令某些人如鲠在喉的是——我的海森伯竟被允许自我辩护——甚至批评他人。他对自己意图的声明遭到了剧中另一人物玛格丽特的强烈反驳。依我所见,剧中的海森伯与玛格丽特都未能赢得这场辩论。真实的玛格丽特是一直彬彬有礼的,而我不觉得为何我的玛格丽特就不能更尖锐更伤人地表达她对海

森伯的怀疑；真实的海森伯一直是沉默不语的，而我不觉得为何我的海森伯就不能自由地表达他心底的感受。为何他就不能有我们所有的同样矛盾的忠诚和同样交错的动机与情感呢？为何他就不能像我们那样审时度势、权宜行事呢？为何他就不能害怕他的祖国被打败、被核武器毁灭呢？为何他就不能为他的祖国沦为废墟残垣、为他的同胞惨遭杀戮而痛心呢？

我能想像人们对此剧会有这样的疑问：在这一原则上我能走多远？我是否相信一个虚构的希特勒也享有同样的特权？我能看到在舞台上展示希特勒的所有问题，但如果仅仅作为仪式性羞辱的图像，我看不到作此尝试的任何理由。如果他未曾提供我们他自己的某些观点而使我们理解他脑中的想法，又为何要求我们忍受他自以一种形象出现呢？我完全相信观众们会得出他们自己的道德结论。

然而，本剧上演所引发争议的最意外的结果是玻尔文件的公开。

1999年秋天，尼耳斯·玻尔文献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被私下告知了这份文件的确实存在。海森伯曾公开了他在1941年与玻尔会面的相关文本，主要发表于两处：1957年写给正为《亮过一千个太阳》收集素材的罗伯特·容克的备忘录，还有就是他出版于1969年的回忆录。而玻尔从未公开过他那一方的陈述。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只能依靠他人（主要是他的儿子奥格，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家，后来也成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他的同事施特凡·罗森塔尔 [Stefan Rozental]）对他的回忆的转述。

1957年，当玻尔在容克的书中读到了海森伯的文本时，他显然十分气愤。于是他写信给海森伯表示异议并陈述自己的观

点。但他从未寄出此信，直到1962年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将此信存放在文献馆并决定五十年后再予以公开。这是我的消息来源者所提供给我的内容。

对此事我保持缄默，因为我相信我是被私下告知。据我所知，这封信的存在被首次公开提及，是在2000年3月《哥本哈根》纽约上演期间，在随后一次的座谈会上由霍尔顿教授提出。他说他确实见到了此信——玻尔家人给他看过。他觉得他有责任不公开此信的内容，但我记得他曾说过当此信在2012年最终公诸于世时，它将完全会改变世人对这次会面的看法。

现在谜底终于浮出，2000年9月间在尼耳斯·玻尔文献馆中召开的又一次座谈会上，当场宣布了玻尔家族决定提前公开此信。事实上并非只有一封信，还有和此信相关的文稿与笔记。2002年2月，当它们最终在网络上发表时，围绕这次会面的问题在报刊上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我觉得这些文件似乎与鲍尔斯根据其他资料来源而详尽重构的玻尔当时的态度惊人地相符。令人吃惊的是他在信的第一稿中的极为尖锐的语气——尤其是考虑到这出自一位以平和著称的人：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极为震惊地看到你的记忆是何等地欺骗了你……

就我个人而言，我记得我们那次谈话的每一个词；谈话是在丹麦、在我们极其悲苦极其危急的背景下进行的。你们两人的谈话留给玛格丽特和我，还有研究所的全体同仁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你和魏茨泽克表示了你们认为德国必胜的坚定信念，因而我们再对其他结果抱有希望并对德国所有的建议不予合作将是十分愚蠢的。我也非常清楚地记得你我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的谈话；你当时用的含混的语言以及那种谈话方式，给我唯一牢

固的印象就是，在你的领导下，德国正全力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有必要讨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它们，而且已经在过去两年中多多少少进行了这种专项的准备。我默默地听着，因为这是涉及到人类的一件大事，在这一问题上，尽管我们间的个人友情，我们毕竟代表着正进行着殊死战争的双方。

看到信中玻尔自己的原话是一种启示，我真希望在我动笔写剧时能看到它。我意识到真实的玻尔心怀的怒气比之我剧中的他要强烈长久得多，他对海森伯说法的关注之深，记忆之牢也是远远超出我剧中的角色的。

然而，对于海森伯的表述以及他的意图，我们真的改变了看法吗？

我想，稍有改变但没有根本改变。因为从未存在任何矛盾之处。首先，海森伯向玻尔研究所的众人声称德国将赢得战争，德国的战争目标，至少在东线是正当的。再则奥格和罗森塔尔都在他们的文章中回忆了玻尔当时说过海森伯提到了原子能的军事应用。奥格说：“我父亲极为审慎地表达了他的怀疑，因为存在着极其艰巨、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但他印象中海森伯认为，如果战争拖延下去的话，这新的因素有可能决定战争的结局。”而罗森塔尔说：“我只记得玻尔在谈话后是那么的激动还转述了海森伯的话，好像是：‘你必须明白，如果我参加的话，这一项目肯定能做成。’”

无论如何，此信第一次直接证实了玻尔相信自己被敦促接受德国的“合作提议”，也正是魏茨泽克所猜测的他当时可能误解了海森伯的建言。此信也未表明玻尔认为是何种“合作”，而且这一回忆同魏茨泽克忆及的海森伯劝说玻尔的话也并不那么矛盾——也就是劝说玻尔应与德国大使馆的人员建立联系以确保他自身的安全。

玻尔和海森伯关于会面的各自陈述的某些差异并非像愤怒中的玻尔所表露的那般分明。在海森伯给索克斯的备忘录中，他告诉玻尔铀裂变应用于武器制造“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需要逾越可怕的技术难关，因而人们只能希望在这次战争中它无法实现”。而玻尔大为震惊。海森伯说：“显然他以为我试图告知他德国在制造原子武器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我看来，这与玻尔的回忆似乎并无本质的不同。

当玻尔接着辩驳海森伯对他的反应的误解时，情况还是相同。

你在信中写道，当你告诉我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时，我的沉默和严肃被你视为极其震惊；这是你一种非常奇特的误解，想必是你自己的巨大的压力所致。自从三年前我发现慢中子只能在U-235而不能在U-238中引起裂变那天起，我自然非常清楚，通过铀的分离……某种效能的炸弹是能够制造的。如果我当时的表情举止有任何可以解释为震惊的话，那不是由于这一情况，而是我不得不那样理解的另一消息，即德国正积极加入一种竞赛，以便成为拥有原子武器的第一个国家。

海森伯所认定的“震惊”同玻尔本人所回忆的更具尊严的“无言与沉重”之间的差别在信的最后一稿中稍有化解。在这一稿中，玻尔称他的反应为“吃惊”。他一语带过地声称他已理解用裂变制造武器的可能性，但他的后续行为并未证明他的理解。实际上，他直到那时还相信它绝无实践的可能，因为分离裂变物U-235的困难，而海森伯无法告诉他概率的平衡已经变化——德国团队已发现了反应堆，如能让它启动，会产生钚来作为替代物。在海森伯来访之后，根据罗森塔尔所称，海森伯的自信撼动了玻尔的信念，他回到黑板前重复了一遍他的全部计算。即便如此，

他仍在怀疑中。当他把关于这次会面的审慎的报告送交他在英国情报机关的联络人查德威克时，他说：“综上所述，我的最佳判断仍使我确信，无论将来的前景如何，任何对原子物理学的奇妙的新发现的即刻应用都是不现实的。”

在信的后来几稿中，那次会面的截然分歧的焦点才得以显示。玻尔说：“在你那方，并无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努力抵制原子科学的这种应用。”这显然是对海森伯的某种声明的一次反驳。据传海森伯曾有此声明之说似乎广为流传。霍尔顿教授称我的剧作“很大程度上依据了海森伯已公布于众的声明，即对他而言，在原子能的研究中，存在过一种出于道德顾忌的迟滞”。

但就我所知，海森伯从未有过玻尔加之于他的那一声称。没有出现在写给容克的备忘录中，甚至在他回忆录关于那次会面的补述中他还是极其审慎：“我暗示……物理学家们或许应该自问，他们究竟是否应该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一项极其艰巨的技术难关有待攻破。对我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恰恰因为它给了物理学家们决定是否应该试制原子弹的可能性。他们既可以向政府建议，原子弹来不及用于当前的战争，因而研制它们反而分散战争的潜能；或主张集中一切力量，争取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它们的可能。这两种观点的提出有着同样的说服力……”

听起来这可能是他所说过的事情中难以置信的审慎的表述。但事实上，他并未宣称阻止过武器的研究工作。他甚至并未宣称，德国团队直到那时还提出过劝阻建议的选择，而只说如果他们做了选择他们可能达到的程度。不管怎样，海森伯说玻尔“对制造原子武器的可能性是如此惊恐以至再也没注意我其余的谈话”。

关于文件公开的某些文章提到，这些文件否定了海森伯宣称曾向玻尔提出过这样一个“默契”，即如果同盟国科学家采取同样行动，德国科学家将劝阻他们政府制造核武器的企图。我

认为海森伯的泛指词组“物理学家”的涵意是指双方的科学家，但我所能找到的海森伯确切有过此项建议的唯一证据来自鲍尔斯引自给容克的备忘录：“接着，我再一次问玻尔，如果出于明显的道德关怀，能否在所有的物理学家们之间取得共识，人们不应该试图研究原子武器……”这也许可以被解释为对某种协议的一种试探性的暗示，尽管1965年他在接受戴维·欧文为《病毒之屋》一书的访谈中，连这一点也不再坚持，而只是说，玻尔“也许觉得我应该希望这样，如果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说：我们不制造原子弹”。在他的书中他没有引用写给容克的话，因而玻尔在1957年没有看到。不管怎样，玻尔在他的信中没有提到这一声称，或者在当时也没有理解任何这种提议。

这次会面中所有其余方面的相关证据都有不相符之处，因而在两位当事人自己的陈述中存在差异更是不足为奇。他们双方都在试图回忆十六年前发生的那事，而他们的感受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情感和对立的忠诚的影响。总之，我觉得使人惊讶的是，这些事情的实质差异是那么细微，而在当时情景中它们大都能够被容易地理解。

两人相互一致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在当时却被所有玻尔公开信件的评论者们所疏忽。我似乎现在对它有了反思，我的结论是：玻尔肯定海森伯的透露违背了所有通常的保密职责。玻尔承认，海森伯的确向他暗示了：德国存在原子研究计划，他自己也加入了这个项目，并且他现在相信制造原子弹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不管海森伯是官方授权或奉有使命而来到哥本哈根行事，我无法相信这项使命中会包括泄露德国研究计划的存在这一最高机密的——至少不会对一位与盟国科学家们有着密切联系的敌国公民（玻尔当时还是美国《物理评论》[*The Physical Re-*

view) 的撰稿人) 泄露。由于玻尔对纳粹的敌视以及他对纳粹受害人的竭力相助, 他当时处于被监视之中。海森伯必然是出于他个人的动机而这样做, 他也必然明白玻尔, 只要可能, 就会把情报转给英国或美国的联系人。因此, 我认为, 这也相当有力地证实了海森伯事后对自己意图的陈述。

在两种陈述间唯一真正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一个环境的细节——会面的地点。玻尔谈到“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交谈”。而另一方的海森伯, 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去卡尔斯贝格 (Carlsberg) 玻尔的家中拜访, 而最后在俩人晚间散步时谈起了那“危险的话题”。这一说法, 在他回忆 1947 年重回哥本哈根试图与玻尔一起重温 1941 年的会面时, 又得到了增强。他说, 他确信谈话发生于在派尔大道 (Pile Allé) 上夜间散步时, 派尔大道就在卡尔斯贝格附近, 离研究所有四公里之遥。(据海森伯说, 玻尔当时认为谈话是在书房里进行的——但那是他卡尔斯贝格家中的书房。)

玻尔自己在信中的话也为卡尔斯贝格的说法增加了可信度, 他说: “我们交谈的每一个词……给玛格丽特和我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而玛格丽特似乎极不可能参加当时研究所的任何集会; 我不认为有任何与会者提到过她。约亨·海森伯回忆起他父亲带他去了 1941 年他与玻尔散步的那条大道, 但他记不起街名了, 只记得街道两旁绿树成荫 (派尔大道正是那样)。

还有一种关于会面的间接陈述是由海森伯的美国编辑鲁思·安申提供给鲍尔斯的。她说这是玻尔告诉她的, 并且得到了玻尔的助手奥格·彼得森 (Aage Petersen) 的证实。根据鲍尔斯《海森伯的战争》所述, 玻尔告诉安申“邀请使他颇为烦恼——他愿意与海森伯一起聚餐, 但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反对, 而玻尔

拿不定主意。最后彼得森建议他把反对海森伯来访的理由写下来，过一两天后细读一遍，再作决定。玻尔这么做了；昔日的友情似乎战胜了那些反对的理由。他还告诉安申，最终他以庄重的许诺换来了玛格丽特的同意，那就是与海森伯只谈物理——不谈政治”。

而另一方面，亚伯拉罕·派斯，玻尔的传记作者，就在他自己于2000年去世之前，在咨询了还在世的玻尔当年的同事们之后得出了海森伯从未去过玻尔家的结论。甚至海森伯自己的证词也不完全一致。海森伯的传记作者戴维·卡西迪指出，在他早先的一次陈述中，他说他“记得同玻尔最重要的一次交谈是在幽静的费莱德公园的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步时，就在玻尔的研究所后面”。魏茨泽克则回忆就在他们会面结束的十分钟后他见到了海森伯（他说，他们“很友好地”告别，但海森伯又立刻告诉他：“我担心事情完全弄错了。”），他同意谈话发生在室外，但又提出了另一个地点——Langelinie，港口的海滨大道，离卡尔斯贝格和研究所都有几里之遥。

在玻尔文件公开的九个月之后，另一封信的出现揭开了这一悬疑的真相。这封海森伯的信是由哥廷根的沃纳·海森伯档案馆主任赫尔穆特·雷亨堡（Helmut Rechenberg）博士公之于众*。决定公开此信的海森伯家族似乎在早先时并未领会信中的含意。

此信本身对争议的谈话并无直接的参考作用，但对这次谈

* 摘自萨克森科学协会（Säch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发行的海森伯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选。该信已收入2003年出版的他的通信集，由他的女儿玛丽亚·希尔施（Maria Hirsch）编辑。

话的环境与背景，它远比我们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材料可靠。因为该信由海森伯写于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而不是在事件发生的十六年后。实际上，信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注明为三个不同的晚上——周二（9月16日，他到达后的那天）、周四和周六——他一回到柏林就把此信寄回莱比锡家中。

此信彻底澄清了争议中的一个问题，海森伯的确去了玻尔的家——而且不止一次。他还在信中记下多次走访了研究所，以及那一周里两人在不同场合见面的确切次数，从而证实了海森伯所宣称的去见玻尔是那次行程的目的。而当事者们在回忆中将不同场合混为一体应该是造成多年后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拜访玻尔家是周一的夜晚，海森伯跳下柏林快车直奔玻尔家中。他写道，天空清澈，星光灿烂，但来到玻尔家时天变得很暗。“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人类的诸多问题与我们时代的种种不幸；关于人类的问题彼此颇为认同；但谈到政治问题，我发现就很难面对现实，即便像玻尔，也无法完全将思想、情感和仇恨完全分开。”

那次宿命的谈话有可能就发生在这第一次会面时，也许就在家中——在那儿，海森伯说，“夜间我和玻尔独自坐了很久”。——或者是更晚些，在午夜之后玻尔送他去乘电车的路上。但去电车站的路上玻尔的一个儿子汉斯（Hans）陪着他们。如果当时谈话发生了的话，汉斯应该会有记忆与评说。而如果魏茨泽克的回忆多少有些准确的话，那么，那次谈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在这首次见面时，因为魏茨泽克本人周三才抵达哥本哈根。

最有可能发生那次谈话的是两天之后，海森伯在周三晚间的第二次拜访时。（这一次，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姑娘在场，在“谈到不可避免的政治话题”时她“知趣地走开了”，“于是，为我

们体制辩护的角色便自动落在我的身上”。) 雷亨堡博士可信地提出,在海森伯返回旅馆的路上玻尔单独送了他一程,而魏茨泽克则等候着他。

信中最令人吃惊的是,海森伯应邀又第三次来到玻尔的家,那是在周六的晚上,在此事发生的三天之后。(谈话不可能发生在这次拜访期间,因为魏茨泽克陪同着他。)"这次各方面而言都特别美好,"海森伯在那天夜里的晚些时候写道,"那天晚上的谈话大部分围绕着人类的问题。玻尔朗读了某篇作品,我弹奏了莫扎特的奏鸣曲(A大调)。"

这两人间的友谊突然决裂几乎是唯一的说法,而这一说法迄今为止也似乎是毫无疑问(我在剧中也自然如此)。但现在连这一点也变得像别的一切那样的云遮雾罩。雷亨堡指出,可能就在这告别聚会上海森伯和魏茨泽克敦促玻尔与德国大使馆保持联系。假如这样,玻尔为此而生的怒气就会使他对早些交谈的回忆蒙上色彩。从当事人的回忆,从他们的反响来看,无论如何,争吵是在谈话之后——也许随着战争的愈加惨烈——随着纳粹统治的残暴罪行的揭露,以及随着核武器实际发展造成了这两位当事人之间的问题。

换言之,历史并不是它发生时的本来面目,而是人们在回顾它时所感受到的往事。

我深深地被玻尔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他的信稿——而始终不曾寄出的画面而感动。他以不断改写自己的文稿而著称,而此处他不但力图满足他个性特有的对精确细微的关注,也力图以同样富于个性的考虑来照顾海森伯的情感。这与在班贝格的海森伯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汉斯-彼得·迪尔(Hans-Peter Dürr)教授的叙述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平行。在迪

尔教授谈到了海森伯也以十分相同的努力来理解那段往事。

迪尔教授在战后曾和海森伯一起在哥廷根工作多年，他说海森伯一直爱着玻尔，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回忆说海森伯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那次宿命的会面，力图追索当时的情景。迪尔教授给我提供了迄今为止对海森伯的意向的似乎最为可信的常理性推测。他认为海森伯只是想和玻尔谈谈。海森伯与玻尔曾经是那般亲密无间以致彼此能理解对方的只言片语，因而他以为他只须暗示一下自己的想法玻尔便能抓住要领。他未能想到的是处境的转变，玻尔对德国占领丹麦是如此激愤使得他们旧日的心领神会会变得绝无可能。

不管会面中谈了什么，也不管海森伯是何意图，从两位老人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关系之艰难特性的某种深沉的东西，他们的痛苦也是深沉的；一个在哥本哈根，一个在哥廷根，他们为那短暂的片刻，那即便未曾结束也深深伤害了他们友谊的片刻，困惑了那么多年。当然，在我剧中徘徊的只是他们的幽灵。但至少，在这部剧中他们又聚在一处来寻求答案。

科学与历史背景简图

从现代原子理论的开端到广岛原子弹爆炸

电子

1895年，汤姆孙发现，电子，即极轻、带负电的粒子，它在原子内运行并形成原子的化学性质。



原子核

1910年，卢瑟福证明，电子绕着一个微小的核运行，原子所有的质量几乎都集中在核内。

量子理论

1900年，普朗克发现，热能并不像传统物理学所假定的那样可以连续变化。在流通中存在一个最小的通用单位，即量子，所有能量都是它的整倍数。



光子

1905年，爱因斯坦发现，光不仅必须被看成波，也必须被看成量子粒子，后来被称为光子。



量子性的原子

1913年，玻尔发现，量子理论也适用于物质本身。电子绕核运动的轨道受限于若干分离的整数个可能性，因此原子只能存在于一些分离的、确定的态中。（不完全的所谓“旧量子理论”。）



量子力学

1925年，海森伯因为电子轨道无法观察而放弃了它，但他发现了一种可用于观察它们对光的吸收和发射所产生的效应的矩阵关系数学公式。



测不准原理

1927年，海森伯证明了所有关于粒子运动的陈述都受到测不准关系的控制：你了解它方位越准确，你了解它速度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



作为波的物质

1924年，巴黎的德布罗意提出，正如辐射可以作为粒子一样来对待，物质粒子也可以作为一种波的形式来对待。



波动方程

1926年，薛定谔发现，适用于波动阐释的数学方程，并证明波动学和矩阵力学是数学等价的。



哥本哈根阐释

1928年，玻尔通过互补原理把海森伯的粒子理论和薛定谔的波动理论相联系。按照该原理，只有既通过波动形式又通过粒子形式的描述，一个电子的行为才能被完备地理解。测不准原理加互补原理被确定为哥本哈根量子力学阐释（正统阐释）的支柱。



中子

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可用于探测原子核的一种粒子，因为它不带电荷，从而可以穿入核中而不偏转。

进入原子核

1932年，海森伯利用中子理论把量子力学应用于核的结构而开辟了核物理学的新时代。

嬗变

1934年，费米在罗马用中子轰击铀而产生一种他无法鉴定的放射性物质。

鉴定

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在柏林鉴定费米轰击所产生的物质为钡，其原子量仅约为铀原子量的一半。

液滴

1937年，玻尔利用液滴类比解释核的性质。

裂变

1939年，莉泽·迈特纳和弗里施在瑞典将玻尔的液滴模式应用于铀核，并且发现铀核在轰击下一裂为二，随着巨大能量的释放变成了钡。

中子增生

1939年，玻尔和惠勒在普林斯顿发现，裂变也产生自由中子。这些中子运动得太快而无法在占天然铀成分99%的同位素U-238中引起核裂变，只能在不到1%的同位素U-235中引起核裂变。



连锁反应

1939年，约里奥在巴黎、费米在纽约证明，随着每一次裂变有两个或更多个自由中子被释放，从而证明在纯 U-235 中出现连锁反应的可能性。



临界质量

1940年，弗里施和佩尔斯在伯明翰错误但令人振奋地计算出保持一种有效的连锁反应所必需的 U-235 的最小量。



战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立即着手研究核裂变军事应用的可能性。



曼哈顿计划

1942年，盟国原子弹计划开始。



德国战败

1945年，盟军进入德国，阻止了德国的原子研究计划。



反应堆

1942年，费米在芝加哥从一个原始型反应堆中获得了第一次自持的连锁反应。



原子弹

1945年，原子弹在7月间试验成功，次日应用于广岛。

附文

《哥本哈根》剧中人物传记

哈里·路斯提格 (Harry Lustig) 编

主要角色

尼耳斯·玻尔

(NIELS BOHR, 1885—1962)

1885年，尼耳斯·玻尔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大学生理学教授，母亲出身于一个在银行业、政治界、语言学和教育学方面都十分杰出的富裕的犹太家族。1962年，玻尔在哥本哈根逝世。

玻尔在物理学方面的早期工作主要体现在金属电子经典理论上。此后，由于没有得到英国剑桥的汤姆孙 (J.J Thomson) 的赏识，玻尔转投卢瑟福 (Ernest Rutherford) 的曼彻斯特实验室，并与卢瑟福结为一生的挚友。他投入到卢瑟福领导的有关原子的核

式模型的研究当中，并洞见到其深远内涵。尤为突出的是，玻尔解释出了许多放射性转换的性质，还确认了后来为人熟知的同位素的存在。玻尔逐渐认识到经典电动力学在解释原子范畴时有着根本的局限性，并且确信这种局限性可在普朗克的“作用量子”（quantum of action）理论下得到解释。他的公式把带电粒子在媒质中的穿越深度与其速度联系起来，从本质上说，该公式孕育了现代量子力学的诞生。

1912年，玻尔返回哥本哈根与玛格丽特·娜隆（Margrethe Nørlund）完婚。尽管二人的结合幸福而和谐，然而玛格丽特肩上的担子却并不轻松，玻尔敏感的天性使他总是需要同情与理解的激励。玻尔夫妇前后生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早年夭折。身为人父后的玻尔认真地承担起了家长的责任，玛格丽特则欣然适应了家庭女主人的角色，玻尔家的每个夜晚都由于热诚的话语和愉快的交谈而显得卓然不凡。

1913年，在成为哥本哈根大学助教不久以后，玻尔发表了他最重要也是最富勇气的论文，后来被称为“旧量子理论”。该文认为，只有当一个原子的辐射以普朗克常量（即“作用量子”）发生时，才能用里德伯公式（Rydberg formula）精确计算出光谱线的频率。也就是说，原子体系的稳态（stationary states）可以通过经典力学来描述，但原子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的变换却是一个非经典理论的过程。

玻尔很快认识到一个体系的量子行为必须能够过渡到对应的涉及大量作用量子运动的（极限情况下的）经典行为，这一见解后来被称为“对应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该理论最近才受到挑战）。量子力学的创立与完善及其在物理学、化学乃至生物学等众多问题上的成功应用使玻尔的原子理论开创了号称科学史上最富冒险精神和最硕果累累的两个十年。

哥本哈根大学的权威学者并没有立刻认识到并奖励玻尔的杰出贡献，然而卢瑟福却独具慧眼，他于1913年在曼彻斯特为玻尔提供了一个讲师职位，玻尔对于能够在曼彻斯特良好的学术气氛下开展工作感到非常愉快。两年后，丹麦当局为玻尔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又过了三年，玻尔的一群朋友参与进来，他们捐赠了地皮，并力谏当局为玻尔建造一个实验室，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理论物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玻尔毕生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当时许多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出色的理论物理学研究者都曾经在玻尔的研究所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克拉末（H.A. Kramers）于1916年率先加入玻尔的研究所，并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十年。早年来到玻尔研究所的还有希维斯（Georg von Hevesy）、克莱因、泡利和海森伯。

玻尔并没有在荣誉面前止步，1924年他在与克拉末、斯雷特尔（J.C. Slater）共同发表的“辐射的量子理论”（The Quantum Theory of Radiation）一文中放弃了因果律的经典形式而代之以统计性的描述。即使是海森伯于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关系”（indeterminacy relations）（在英语中有失准确地称之为“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也是建立在玻尔按照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和“互补性”（complementarity）理论（即量子现象互斥性描述的必然性）为其所构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1930年代，随着量子力学所引发的对原子和固体物理学的充分理解，哥本哈根和其他地方一样，把主要兴趣转向了迅速扩张的核物理学领域。当时迫切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系列“共振能量”（resonance energies）下原子核可以如此容易地俘获中子？玻尔于1936年通过构想完成了这项工作，按照一种经典的形式，原子核被设想成通过短程力结合在一起的

一组核子（质子和中子），这样，实质上它将会像一组分子所形成的一个液滴那样行动，该模型稍早时由伽莫夫提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运用就是对核裂变的解释，玻尔和惠勒于1939年发文介绍了这一问题，该文立刻拓展了有关裂变现象的认识。

以上事件发生于玻尔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会晤期间。1943年，由于纳粹占领丹麦，玻尔被迫逃往瑞典，又从瑞典辗转到了英国。在那里，玻尔意外地接触到了原子弹计划的研究前沿，而此前他曾坚信这是一个技术无法企及的领域。尽管作为理论肇始者之一的玻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对原子弹的发展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是此后他倾其余生专注于促使政治家和公众意识到这一新型武器对于政治和人类的影响，同时敦促人们意识到达成一个永不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性协定的紧迫性。

玻尔将其认识论和哲学思想应用于科学与文化等众多领域。譬如，他援引“互补性”理论来分析生物学的两种描述方式——物理、化学的描述方式和机能的描述方式，同时还将其用于分析传统的影响以及人类文化中遗传性的环境对立问题。在提出自己的认识论思想时，玻尔总是非常谨慎地强调对于剔除个人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广泛从实验数据中寻找指引的必要性，此外，他认为同样迫切需要知晓的是，在任何案例的研究过程中把观念用于现象的描述都存有内在的局限性。

[本文部分节选自《科学家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0)一书中罗森费尔德(Léon Rosenfeld)撰写的“玻尔”一条。]

玛格丽特·玻尔

(MARGRETHE BOHR, 1890—1984)

玛格丽特·玻尔是丹麦艾玛霍姆市 (Emma Holm) 斯莱格艾奥斯镇 (Slagelse) 的一位药剂师诺伦德 (Alfred Nørlund) 的女儿, 她曾就读于镇上的 Frøken Banners Pigeskole 学校, 这是 19 世纪晚期的一所主要教授女性家庭经济学、卫生学、生理学、护理学以及家庭事务操作的学校, 学生们经过培训后还可以进入类似的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玛格丽特于 1909 年经哥罗埃里克 (Niels Erik) 和鲍尔 (Poul) 介绍认识了玻尔, 他们也是玻尔的朋友。两人于 1910 年订婚并在两年之后举行了一个简单文明的婚礼。(对于宗教信仰, 两人有着同样的态度: 玛格丽特曾经这样谈到玻尔: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 他非常认真地坚守着信仰, 他的心被宗教所占据。然而这一切突然就结束了, 信仰对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对于自身的宗教情结, 玛格丽特说道: “你们知道经常是在那样的一个年龄……一个人会非常的虔诚, 会顺从于牧师的坚信礼。然而(后来)这一切完全消失了,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同玻尔)一样的, 彻底不见了。”)

玛格丽特是玻尔不可或缺的伴侣, 在结婚初期, 她一直担任玻尔的秘书兼助手, 负责把玻尔的口述记录成稿。(玻尔曾于 1912 年的一个场合谈起过这件事, “我和妻子回到故乡后, 共同写成了一篇有关这些问题的长文 [可能指完成 α 粒子研究著作的工作]。”) 1916 年 11 月, 玻尔的长子克里斯汀·阿尔弗雷德 (Christian Alfred) 降生了。不幸的是, 后来他在跟随玻尔的一次航行中溺水淹死, 可想而知, 玛格丽特在记录口述方面所能给予玻尔的帮助一下子减少了。在一生当中, 玻尔的身边

始终环绕着玛格丽特的牵念，她多次陪伴玻尔出行，甚至还曾救过玻尔一命。亚伯拉罕·派斯在他出色的传记《尼耳斯·玻尔的时代》一书中收有这条记录：“我们乘车去那里 [从1940年代玻尔在齐斯维勒 (Tisvilde) 的住宅到哥本哈根]，出于信任我坐上了玻尔驾驶的汽车，当时玻尔感到非常热而实际上已经松开方向盘去脱夹克，玻尔夫人立刻介入才使局面得到控制。”

玻尔所有的朋友和同事在写到自己去玻尔家做客的经历时，都一致称赞玛格丽特作为家庭的女主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她还是他们谈话的积极参与者。在1932年搬入位于卡尔斯贝格啤酒厂的豪华的“荣誉府第”后，玛格丽特非常喜欢那里的环境。据派斯介绍，在许多招待会中，“无论是来自玻尔研究所的访客和职员，或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浦王子，抑或是其他高贵的人物…… [她都会处理得] 充满魅力和尊严，她拥有一种能够记忆所有来客姓名以及一些个人情况的独特才能。她开始被人们称为玛格丽特女王，有人饱含敬意，有人充满嫉妒”。

1980年3月，在玻尔逝世二十七年之后，玛格丽特的家人、知名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超过五十人齐聚一堂，为玛格丽特的九十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临近午夜时玛格丽特发表了即兴演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她依然表现得精力充沛。在继续生活了四年以后，她于圣诞前夕去世。玛格丽特被安葬在她深爱的玻尔身边。

在玻尔逝世不久以后，玻尔家庭的多年挚友——数学家柯朗 (Richard Courant) 在解释玻尔的成就时写道：“这不只是运气，从更深层来看，是妻子的行为推动了玻尔在青年时代的孜孜求索，众所周知，在玻尔能够顺利取得科学和个人的全部成就的过程中，他的妻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儿子汉斯这样描述了父母的生活：“……我的母亲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中心。父

亲深知母亲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从不错过任何机会向她表达感激和爱……在日常事务中，她的观点是他的指南。”

沃纳·海森伯

(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

沃纳·海森伯于1901年出生在德国的维茨堡，1976年在慕尼黑去世。同玻尔相似，海森伯的父亲也是一位大学教授，主讲语言学。海森伯于1937年结婚，妻子伊丽莎白(Elisabeth)是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Hermann Schumacher)的女儿，两人前后共有七个孩子。海森伯早年曾上过钢琴课，后来成为了一名出色而热切的钢琴演奏者，并终其所好一生。

海森伯早年的另一项禀赋是数学，他曾经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数学，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数学家。然而，他很快便得到了著名物理学教授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的指导，并于1923年在他门下取得博士学位。随后，海森伯分别与哥廷根的马克斯·玻恩和哥本哈根的玻尔进行了学习与合作(1926年与克拉末一同担任玻尔的助手)。此后，他还结识了包括泡利、费米和狄拉克在内的许多物理学家，并与他们共同工作。1926年，在海森伯年仅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被称为莱比锡大学乃至德国最年轻有为的教授。

1922年，海森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在这篇探讨“塞曼效应”(Zeeman effect)的文章中，他的开拓精神与独创能力已经崭露头角。尽管该模型违反了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早期构想的基本原理，但是它作为后续工作的基础和重大转变的标志却是必需的。1926年，同玻恩和帕斯夸尔·约尔丹一起，海

森伯提出了“矩阵力学”(matrix mechanics)理论——一项杰出的新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化工作。然而,多数物理学家却更倾向于薛定谔于1926年提出的等效设计,薛定谔运用了一个有所不同的方程式——“薛定谔方程式”作为其理论起点。类似的命运在1940年代初期又一次光顾了海森伯,如同1925年的原子相互作用理论一样,他提出高能基本粒子的碰撞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粒子态基础之上的理论,该“S-矩阵”(S-matrix)理论在几年内只获得了零星的重视,而同时期的“重正化场”(renormalized field)理论却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

海森伯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的“测不准原理”,即:同时精确地测出一个电子的正则共轭变量,诸如位置与动量、能量与时间,在理论上(或在实验事实中)是不可能的,其不准确度至少要 and 普朗克常数一样大。1927年,大体建立在这一认识和玻尔的“互补性”理论之上,海森伯、玻尔和玻恩给出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阐释。

海森伯还同魏茨泽克等人一起研究了量子力学的哲学诠释,从而敲响了严格决定论的丧钟,揭示了因果律的缺陷,并探索了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应用。他和玻尔把哥本哈根阐释扩展到化学、生物学甚至是社会现象领域,并和物理学家们如布劳齐(Felix Bloch)、鲁道夫·佩尔斯和爱德华·特勒把量子力学用于解决大量问题,比如氢原子问题和强磁性材料问题。1927年以后,借助狄拉克、约尔丹、克莱因等人的工作,海森伯的主要科学关注点转移到了如何将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统一起来这项工作之上。在1932年中子被发现不久以后,海森伯通过引入“核交换力”(nuclear exchange force)和“同位旋”(isotopic spin)的概念推出了一个中子-质子的原子核模型。1936年,海森伯给出了一个数学上的最小长度值,并认为这将为具有彻底革命性的

新物理学划定界线。

纵观海森伯一生，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德意志人。1919年，他支持反对亲布尔什维克势力接管巴伐利亚州的抵抗运动，保卫当选的社会民主政府。作为童子军的一名首领，他通过直接的自然经验和传奇性的诗歌、音乐与思想所带来的感召力为德国的新生而奋斗。在纳粹统治前期，他和其他理论物理学家都遭到了“白色犹太人”运动的打击，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和纳粹政权彼此达成了足够的和解，原因是纳粹需要他留在德国来负责核反应堆计划。

混乱的战争末期，学术上由荷兰籍逃难物理学家古兹密特领导的阿尔索斯特遣队逮捕了海森伯和其他九名科学家。他们在英国剑桥旁名为“农庄馆”的村庄里的一处庄园中被拘禁了六个月。遣送回国后，海森伯致力于复兴德国科学，并与身居他国的旧友和同事们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他在哥廷根重建并领导了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of Physics，后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他还担任德国研究委员会（the German Research Council）的主席，带领德国代表团参加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在日内瓦的创立。尽管受累于政治事务的牵绊，海森伯在物理学上仍然表现活跃，他致力于统一量子场论的研究直至逝世。

[本文所用素材大多来自《科学家传记词典》一书中戴维·卡西迪撰写的“海森伯”一条。]

其他被提及的著名科学家

(按照在剧中出现的顺序)

马克斯·玻恩

(MAX BORN, 1882—1970)

玻恩是许多物理学家(包括海森伯)的重要导师,他对量子力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玻恩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的一个犹太家庭。1921年,他被聘为哥廷根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并重新阐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1926年,他与海森伯合作研究了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化问题,稍后又对薛定谔方程作出了统计解释,该项研究成果使他与博特(基于其他工作)共同分享了195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27年,他与玻尔和海森伯一起阐述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阐释。玻恩还开创了著名的玻恩近似方法,用于解决散射问题,并同奥本海默一起提出了分子的量子理论。1933年,玻恩为了躲避纳粹迫害逃往英国,先在剑桥大学任教,后于1936年担任爱丁堡大学泰特(Tait)自然哲学教授。

玻恩于1953年退休之后返回哥廷根,此后撰写了许多有关科学家在战争与平时时期对于核能利用所负责任的著作和文章。玻恩于1970年在哥廷根逝世。

路易斯·德布罗意

(LOUIS DE BROGLIE, 1892—1987)

德布罗意出生于法国迪拜，是一个法国贵族的后裔，尽管哥哥莫里斯 (Maurice) 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然而路易斯却打算传承家族传统当一名外交官。德布罗意于 1909 年在巴黎大学取得历史学学位，同时还在那里学习了物理学，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终于选定后者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1924 年，该课题的完成对物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提出了以下思想，即原子中的电子和其他物质组分都具有类似于波动的属性，此研究成果充实了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光的“波粒二象性”说，普朗克常数又同电子的波长联系起来。1927 年，美国的戴维逊 (Davisson)、革末 (Germer) 和苏格兰的汤姆逊 (G.P. Thomson) 分别通过实验证实了电子的波动性。

取得博士学位后，德布罗意留在巴黎大学任教，并于 1928 年成为新成立的亨利·彭加勒 (Henri Poincaré) 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教授，他在那里任教直到 1962 年退休。

德布罗意于 94 岁高龄在巴黎逝世。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我心里作为一个纯理论 (物理) 学家的成分要大大多于一个实验家或是工程师，我对普遍的或哲学的观点情有独钟。”德布罗意一生所关注并为之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爱因斯坦与玻尔的对话中所展示的那个问题——原子物理学的统计性是否反映了对于潜存实在的无知？或统计理论是否表达了所要知道的一切？

亨德里克·卡西米尔

(HENDRIK CASIMIR, 1909—2000)

卡西米尔于1909年出生在荷兰海牙，后分别就读于莱顿、哥本哈根和苏黎世。在莱顿大学当了九年教师之后，他于1942年加入了位于荷兰艾恩德霍芬的飞利浦研究实验室(Philips)，此后曾担任那里的管理者和科学带头人。卡西米尔对应用数学、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中的“卡西米尔算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和低温物理学作出了重要的基础性贡献。所幸的是，《哥本哈根》中海森伯说卡西米尔去世没有一语成谶。

詹姆斯·查德威克

(JAMES CHADWICK, 1891—1974)

查德威克出生于英国小镇博灵顿。他曾在曼彻斯特跟随卢瑟福学习。1911年，他在曼彻斯特获得了第一级名誉学位，并与玻尔相遇。1913年，他来到柏林与盖革(Geiger，以盖革计数器著称)共事，在那里查德威克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遭到拘捕。在囚禁期间他被允许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甚至可以去会见德国同事。1919年他和卢瑟福一起来到剑桥大学，但由于卢瑟福拒绝获取一台回旋加速器，查德威克转到了利物浦大学。在对放射性问题和原子核问题作出许多重要的实验性贡献之后，他于1932年证实了中子的存在，并于次年和戈德哈伯(Maurice Goldhaber)一起精确测出了中子的质量。1935年，查德威克由于发现中子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战期间，查德威克的工作极其繁重，当看到佩尔斯和弗

里施关于少量的铀可以生产出用于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的论文之后，他立刻领导起了英国的原子弹研究任务。1948—1958年间，他担任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院长，此后，因为对学术政治的厌倦，他辞职并重返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领域。

查德威克于1974年在剑桥大学逝世。

保罗·艾德里安·莫里斯·狄拉克

(P. A. M. DIRAC, 1902—1984)

狄拉克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市，父亲是（说法语的）瑞士人，母亲是英国人。由于从布里斯托尔大学取得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后没有在这一领域找到工作，狄拉克转而开始学习理论物理学。1926年，当狄拉克还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一名研究生的时候，他便在量子力学上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项杰出贡献。通过把爱因斯坦的思想运用于量子力学发起者的思想当中，他创立了量子理论的相对论形式，即狄拉克方程。该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可以得出必定存在电子负能态的结论，这一概念似乎与物理事实不相一致。但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狄拉克指出，在这些负能态当中，如果有一个态是由于缺少一个电子，那就等同于存在一个短寿命的带正电粒子。正电子于1932年被安德森（Carl Anderson）发现。除了引入辐射的量子理论之外，他还是“费米-狄拉克统计”的合作发明者之一。尽管狄拉克所做的全部都是数学性的工作，但是他却曾写道：自然界的基本法则“操控着一个实体（substratum），如果不引入一些枝节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对它形成一幅思想的图景”。他还认为，一

个理论对于规律的表达只能建立在近似性这一基础之上。

狄拉克于1932年被剑桥大学任命为卢卡斯(Lucasian)数学教授——这一职位曾由牛顿担任,并于1933年同薛定谔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从剑桥大学退休之后,狄拉克于1971年担任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除了可能受纳粹主义影响的物理学家之外,大概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会把爱因斯坦位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科学家之一(另外两位是牛顿和麦克斯韦),对于一般公众而言,爱因斯坦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爱因斯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的乌尔姆市,1900年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物理学学业。毕业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学术研究工作岗位,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做了一名专利审查员。

1905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报》(*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了五篇论文,著名的狭义相对论就在其中诞生。狭义相对论建立在光速在所有参照系中都是一个常量这一卓识之上,进而颠覆了时间间隔对于任何人都完全相同的传统观念,并修正了运动的规律和对运动的描述。在数学方面,爱因斯坦用著名的公式 $E=mc^2$ 把物质的质量与能量联系起来。在1905年的论文当中,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photoelectric effect)作出了解释,然而整整十六年后他才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发现,在“光电效应”的过程中,光子激发出了金属内部的电子,光是由粒子(后称“光子”)所构成的,其能量由相同的作用量子决定。

“作用量子”这一概念最先由普朗克于1900年引入用来解释黑体辐射的光谱问题，玻尔后来曾用它描述原子的发光问题。

尽管爱因斯坦是量子理论的早期重要推动者，但他却从未接受过量子理论所主张的不确定性，并对玻尔的哥本哈根阐释进行了驳斥。他和他的追随者坚信，在可接受的形式体系背后必然存在着遵循严格因果律的“隐变量理论”(hidden variables)。可想而知，对于量子理论的当代解释，诸如涉及多重宇宙或退相干(decoherence)等问题，爱因斯坦可能会更加难以接受。爱因斯坦于1916年作出了又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即在现代宇宙学中卓有成效、不可或缺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把电磁作用和引力作用统一起来的统一场论研究，但收效甚微。

1905年后，爱因斯坦在欧洲几经辗转，于1914年进入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当了一名院士。1933年，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猖獗，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转投美国新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并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爱因斯坦就成为了自由主义事业的一名口头支持者，该事业具体包括反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核裂变被发现以后，他同意把签署自己名字的信寄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罗斯福能够从美国利益出发尽快展开原子弹研究。信中写道：“保持警惕，如有必要，尽快采取行动。”此举导致了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的启动。

爱因斯坦去世以后人们发现他稍逊于一位理想的丈夫和父亲的事实，几乎无损他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智者和贡献者的声誉。

恩里科·费米

(ENRICO FERMI, 1901—1954)

在 20 世纪的物理学巨人中，费米是一位在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通才。他的杰出贡献已经铭刻在了以其名字命名的事物之上，如“费米子”（包括了如电子、质子或中子等）——一种依随费米-狄拉克统计的、角动量的自旋量子数为半奇数的基本粒子；“费米能级”——在固体里把电子束缚得最松的能量的量度，在绝对零度时形成“费米能”；“费米面”——可以表征金属固体的电性状和热性状；此外还有“普适费米交互作用”和“费米常数”——用来描述费米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

费米于 1901 年出生在意大利罗马，二十一岁时在比萨大学通过 X 射线实验课题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依靠意大利教育部奖学金的资助，他前往哥廷根跟随玻恩学习。1926 年，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了自己的数学教学任务之后，费米关于理想气体行为的论文使他一跃成为了罗马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正教授，不久后便提出了“费米-狄拉克统计”。1930 年代，查德威克率先发现了中子，约里奥-居里夫妇（Joliot-Curies）首次发现了人工放射现象。受到以上工作的启发，费米构思并提出了自己的创想，即把从放射性铍所得的中子通过石蜡减速成为慢中子，并用慢中子轰击各种不同的元素，使其具有放射性。现在我们知道，铀元素被慢中子轰击后发生了裂变。后来，哈恩和他的同事们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但是他们同费米一样，起初并没有意识到真正发生了什么。

1938 年，费米由于“证实了由中子轰击所产生的新放射性元素，并且发现了由慢中子引起的核反应”而荣获诺贝尔物理

学奖。法西斯政府同意他去瑞典领取奖金，费米趁机携犹太妻子劳拉（Laura）永远离开了意大利。

费米于1939年来到纽约，后获悉核裂变已经得到了迈特纳和弗里施的证实。在与玻尔的会晤中，玻尔向他提出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和铀235同位素的重要性。接着，费米在哥伦比亚大学重复了哈恩-斯特拉斯曼-迈特纳实验，他还与匈牙利避难物理学家齐拉特和维格纳（Eugene Wigner）共同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信，并由爱因斯坦署名。在随后的“曼哈顿工程”中，费米所承担的任务是进行受控的、自持的核链式反应。1945年12月2日，他的核反应堆在芝加哥大学的斯塔格运动场（Stagg Field）取得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自持续链式反应——译者按），此后，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费米于1946年成为芝加哥大学原子核研究卓越贡献教授，并领受了国会奖章。之后，他的科学贡献依然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介子物理学这片新领域中。与许多物理学家不同的是，费米在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和科学的社会内涵等问题上表现得興味索然。为了表彰费米的荣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专设了费米奖金。1954年，费米在患癌症逝世前被提名为该奖金的第一位获得者。

奥托·弗里施

（OTTO FRISCH, 1904—1979）

奥托·弗里施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莉泽·迈特纳是他的姑妈。学习了物理学与数学之后，他与年轻的西格雷

(Emilio Segrè) 一起成为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斯特恩 (Otto Stern) 的助手, 从而在德国开始了他早期的研究工作。1933年, 纳粹种族法迫使弗里施、斯特恩以及其他许多的德国犹太科学家移居国外。在英国滞留一年之后, 受玻尔的邀请, 他来到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尽管他主要从事的是实验物理学研究, 但他却因与迈特纳合作的论文首次成功解释了核裂变现象而闻名于世。回到英国之后, 他与佩尔斯在伯明翰从事后来导致原子弹工程的研究。1943年, 他来到洛斯阿拉莫斯从事该项研究。1946年, 弗里施在英国永久定居。在不久后成立的哈维尔原子能科学研究中心的核物理研究所担任了一年的负责人之后, 弗里施受邀到剑桥大学担任自然哲学杰克逊 (Jacksonian) 教授职位, 直至逝世。

乔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 1904—1968)

乔治·伽莫夫出生于乌克兰的敖德萨。1928年, 他来到德国的哥廷根, 利用量子理论解释了放射性元素不同的生命周期。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 他首次提出原子核的液滴模型, 后来玻尔用之解释裂变现象。1934年, 他成为圣路易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与特勒一道, 提出了 β 衰变的伽莫夫-特勒定则。他研究了核反应过程并用之于宇宙学, 提出了太阳能的热核反应起源的假设。他也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创立者之一。1942年, 他与特勒一道描述了红巨星的内部结构。伽莫夫的言行非常具有幽默感: 1948年, 当他与学生阿尔弗 (Ralph Alpher) 提出有关化学元素是由中子的连续俘获而产生的假设

时，他说服汉斯·贝特在研究成果的论文中署名（几乎仅此一次，贝特同意在他没有作出主要贡献的情况下成为论文的共同作者）。由此，产生了阿尔弗-贝特-伽莫夫理论。1954年，伽莫夫的研究兴趣拓展到生物化学，他指出，遗传密码是由核苷酸（DNA的基本成分）三联体的顺序所决定的，而这些思想对于后来快速发展的遗传理论是至关重要的。从1956年直到1968年伽莫夫逝世，他一直任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教授。对于公众来说，伽莫夫的名气更多地体现在他为数众多的科普著作方面，其中包括“物理世界奇遇记”系列（“Mr. Tompkins” series, 1936 - 1967年）和《从一到无穷大》（*One, Two, Three...Infinity*, 1947年）。

塞缪尔·古兹密特

(SAMUEL GOUDSMIT, 1902—1978)

塞缪尔·古兹密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荷兰籍犹太人家庭，曾在莱顿大学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的指导下学习物理学，研究过复杂光谱学和塞曼效应。1925年，他与荷兰同胞乌伦贝克一起，根据泡利理论必定存在第四量子数的主张，证明了电子自旋的存在。1927年，他来到密歇根大学。二战期间，古兹密特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放射性实验室工作，后来加入阿尔索斯特遣队并成为其科学方面的负责人。二战后期，阿尔索斯特遣队捕获了海森伯和其他九名德国科学家。在此期间，古兹密特得知他的父母在大屠杀中遇害了。因此，他多年来一直严厉地抨击海森伯和其他曾为纳粹工作过的科学家。1947年，他接受了新成立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邀请，加入了该实验室。

1952年,古兹密特成为已是世界最为著名的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的编辑,并掌管该杂志长达二十三年。在这个空前变化和扩张的时代,他还打造出了更负盛名的《物理学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杂志。

奥托·哈恩

(OTTO HAHN, 1879—1968)

奥托·哈恩早先曾与拉姆齐(William Ramsay)一道在剑桥大学,与卢瑟福一道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做过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就像他1945年被扣押在农庄馆一样,哈恩几乎整个一生都待在德国。哈恩出生于法兰克福,1901年在马尔堡获得博士学位,最后辞世于哥廷根。作为一名放射化学家,他发现了几种放射性元素,其中第一种便是钷。自1907年起,哈恩与迈特纳在柏林一起共事三十年(1912年起在柏林-达勒姆的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工作),取得了异常丰富的成果。在查德威克发现中子,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了人工放射性,费米利用中子轰击实验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元素之后,放射性化学发展为核化学。哈恩与他的合作者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把中子轰击铀产生的元素错误地(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视为镭的同位素,而不是钡的同位素。后来迈特纳与她的侄子奥托·弗里施才正确地把该现象解释为铀核裂变,当时迈特纳已经流亡到瑞典去了。

哈恩没有参与二战期间德国的核反应堆计划,不过,在被扣留期间获悉了广岛原子弹事件时,他吓了一大跳。另外,人们可以想见,他是怀着多么愉快的心情接受了1944年诺贝尔化

学奖。战后，他投身于德国科学的重建工作。1957年，有十八位著名科学家受到警告，要求不让德国拥有核武器，他便是其中一位。

弗里茨·豪特曼斯

(FRITZ HOUTERMANS, 1903—1966)

在《哥本哈根》中提及的所有科学家中，弗里茨·豪特曼斯有着最为传奇的人生。他生于当时的德国波罗的海港口城市但泽，在维也纳长大。他的母亲有着一半犹太血统，是维也纳第一位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女博士，并教授德国文学、宗教与哲学史。从口音、生活习惯、逗趣方式，以及爱在咖啡店里工作的习性等许多方面来看，弗里茨是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

1921年，他开始在哥廷根学习物理学，但由于经费短缺而被迫中止。他开始靠在罗马做导游度日，却由于胡乱告诉一群美国小姐一条充满时尚气息的街道的名字而被解雇。1927年，弗里茨带着由弗兰克（James Franck）指导的研究水银的共振荧光的博士论文到了柏林，与伽莫夫还有其他一些人一起从事 α 粒子衰变与吸收的重要研究工作，他还提出了核反应是恒星能量的来源的思想。他和妻子里芬施塔尔（Charlotte Riefenstahl，也是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学博士）经常在家里举行晚会，他们称之为“小孩子的物理学之夜”（“Eine Kleine Nachtp Physik”）。1933年纳粹掌权后，豪特曼斯被迫逃亡，但并非因为他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而是因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英国获得一份研究现在称为电磁干扰的工作，但由于不习惯英国饮食，加之受到他那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诱惑，豪特

曼斯到了苏联的哈尔科夫 (Kharkov)。他与兰道 (Landau) 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俄国物理学家一起工作,但是,到了1937年,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豪特曼斯成了斯大林恐怖时期的牺牲品。他在经受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关押和折磨之后,1940年被引渡回当时还是苏联的“友国”的纳粹德国,但很快又被盖世太保监禁起来。幸亏有劳厄的干预,豪特曼斯才得到释放,并在劳厄和魏茨泽克的帮助下,在冯·阿登的私人实验室获得一个研究职位。

在阿登实验室,豪特曼斯转向了原子核链式反应的理论研究。早在1932年,在原子核裂变现象发现很早之前,他就指出了用中子诱导链式反应的可能性。此时,他发表了一份报告,讨论快中子反应、中子减速、铀235、临界质量,以及可由慢中子引起裂变的第94号元素钚的生产等问题。虽然豪特曼斯的研究明显可能对德国制造核武器有用,而且1941年他在曾参观过被占领的哈尔科夫的一个德军代表团里与纳粹合作过,但是他暗地里仍然保留了他那左翼的同情心。1942年,豪特曼斯设法取道瑞士给费米发了一封电报说:“赶快(建立反应堆)!我们已经开始了!”

战后,德国的物理学研究受到协约国的严格限制。于是,1952年,豪特曼斯离开德国来到伯尔尼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并把一个建于20世纪早期的实验室改造成一个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他自己的研究则集中在核地球物理学和陨星两个方面。由于长年过度吸烟,1966年豪特曼斯因肺癌在瑞士逝世。

[根据克里普洛维奇 (Iosif B. Khriplovich) 发表于《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 1992年7月第29—37页的文章“弗里茨·豪特曼斯传奇的一生”(The Eventful Life of Fritz Houtermans) 改写。]

奥斯卡·克莱因

(OSKAR KLEIN, 1894—1977)

奥斯卡·克莱因出生于瑞典，他的父亲戈特利布 (Gottlieb) 是该国首要犹太教教士。当奥斯卡才十五岁时，他就能够与著名的物理化学家阿列纽斯 (Svante Arrhenius) 一起从事研究，并形成学术论文。从 1918 年开始，奥斯卡频繁地访问哥本哈根，1923—1925 年间，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工作。不过，奥斯卡还是在瑞典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并于 1930 年在斯德哥尔摩学院获得了力学与数学物理学教授职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奥斯卡在包括哲学在内的许多领域都作出了贡献，但他最重要的声誉来自他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他是克莱因 - 戈登 (Gordon) 方程和克莱因 - 仁科 (Nishina) 公式的创立者。

莉泽·迈特纳

(LISE MEITNER, 1878—1968)

莉泽·迈特纳出生于维也纳，1906 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07 年，她到柏林听取普朗克的讲座，并加入哈恩在威廉皇家研究所进行的放射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们三十年的合作中，迈特纳与哈恩发现了镤，研究核同质异能性、 β 衰变；在这三十年中，她与斯特拉斯曼一起，研究了中子轰击铀实验的产物。由于迈特纳保留了奥地利公民的身份，因此，尽管有犹太血统，她仍然能够在纳粹德国从事研究工作。直到 1938 年，在德国打算吞并奥地利，并取消奥地利国籍的前夜，

一切都变了。1938年夏，迈特纳逃亡到瑞典。在哈恩和斯特拉斯曼认识到中子轰击铀产生了钡元素之后，正是迈特纳和她的侄子弗里施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裂变过程，并于1939年1月提供了相关的描述和解释。当年晚些时候，玻尔和惠勒把它们整合进了完整的理论之中。1960年，迈特纳退休后到了英国。1968年，她在剑桥逝世。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她应该分享1944年哈恩与斯特拉斯曼因发现裂变现象而获得的诺贝尔奖；也有人认为，犹太女性的身份是她的不利条件。1966年，迈特纳、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共同获得了费米奖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克里斯蒂安·默勒

(CHRISTIAN MØLLER, 1904—1981)

1904年，默勒出生于丹麦。他曾在哥本哈根受过教育，之后去过罗马和剑桥深造，但他几乎整个工作生涯都是以哥本哈根数学物理学教授的身份度过的。1954—1957年，他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领导理论研究团队。尽管默勒也曾对原子与核理论作出过贡献，但他最为著名的却是相对论方面的研究，其成果是1952年出版的得到广泛使用的《相对论》。

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

1904年，奥本海默出生于纽约。作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他擅长拉丁语、希腊语、物理学、化学，并出版过诗集，研究

过东方哲学。1925年大学毕业后，他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待了一段时间。受玻恩之邀，他到了哥廷根，结识了玻尔、狄拉克和其他一些一流的物理学家，并于192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访问了莱顿和苏黎世之后，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邀请他去担任教授。虽然奥本海默对理论物理学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比如玻恩-奥本海默近似和奥本海默-菲利普过程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的老师玻恩，还有他的学生菲利普（Melba Phillips）都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对整整一代美国一流物理学家的陶冶作用。

1942年，奥本海默受命负责曼哈顿工程，他选择了新墨西哥州圣达菲附近的丘陵地带——他的部分童年时光就在此度过——建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制造原子弹。他是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集体的杰出领导者，也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工程的杰出领导者。1945年7月16日，奥本海默与同伴们在阿拉莫戈多取得了第一次核爆炸的成功。8月6日、9日，原子弹被投到广岛、长崎。同年10月，奥本海默辞去工作。1947年，他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负责人。1947—1952年，作为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在国家防卫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到了1953年，随着麦卡锡时期的过去和冷战高潮的消退，艾森豪威尔政府收回了对奥本海默从事机密工作的许可。奥本海默的研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他早期与左翼分子及运动的接触所引发，他对有关情况不太诚实的说明并没有在审讯期间起作用。但是，奥本海默也曾反对发展氢弹。许多人都认为，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试图摆脱他们在核军备竞赛中依旧强势的形象。尽管美国大多数一流的

物理学家，如同他们的组织——美国物理学会一样都来保护奥本海默，但他从事机密工作的许可直到1963年才得到恢复。同年，原子能委员会把费米奖颁给了他。

1967年，奥本海默因咽喉癌在普林斯顿病逝。

沃尔夫冈·泡利

(WOLFGANG PAULI, 1900—1958)

泡利1900年出生于维也纳。1945年因不相容原理获得诺贝尔奖金。1923年，泡利在汉堡大学任讲师；1928年，他成为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40年，他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二十岁时就为一本百科全书撰写了长达二百页的有关相对论的权威论文。1924年，他认识到量子理论中需要第四量子数（后来被视为电子自旋），其数值可取作 $+1/2$ 或 $-1/2$ 。一年后，他引入了泡利不相容原理，说明在确定的量子态中，不可能有两个费米子（如质子、中子和电子）具有同样的量子数值，因为它们都有第四量子数。在其他一些推论中，该原理很快为元素周期表的结构提供了说明。1920年代后期，人们注意到，在 β 衰变（原子核发射电子）中总有一些动量和能量消失了。泡利不愿接受这种严重破坏守恒定律的现象，1931年，他提出，消失的能量和动量被一种中性粒子带走了，这种粒子质量很小甚至没有质量，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微弱，因而很少发生什么相互作用。这种被费米命名为中微子的粒子最终于1956年在一次艰难的实验中被观测到。二战后，泡利返回了苏黎世。1958年，他在那里逝世。

泡利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而且他也因

其超群的智慧而闻名于世(也令人不可思议)。有一个“泡利故事”讲的是,在听了一个乏味的讨论会之后,他评论道:“这竟然没有错。”另一个故事则是,他曾被评论为这样一名物理学家——“如此年轻,却已经如此无所不知”。

鲁道夫·佩尔斯

(RUDOLPH PEIERLS, 1907—1995)

鲁道夫·佩尔斯出生于柏林,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接受了新教的洗礼,因为父亲想给他留下更大的选择空间。在柏林,佩尔斯师从普朗克;在慕尼黑又师从索末菲;之后,他在莱比锡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到苏黎世做博士后,并给泡利当助手。佩尔斯在苏联度过了几年时光,与兰道一起研究电气力学。他早期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声子物理学。1933年的灾难迫使他来到曼彻斯特,与贝特一起研究光致分裂现象和合金的统计力学。接着,他在剑桥进行了著名的超导和液氦研究,并与卡普尔(P.G.L. Kapur)一起得出了核反应的色散公式。1937年,佩尔斯接受了伯明翰大学的教授职位。

核裂变现象发现之后,弗里施请教佩尔斯,纯净的铀235是否能够制造原子弹,佩尔斯计算后认为有可能。一份描述有关作用的备忘录送到英国政府后,马上被视为高级机密。当时,由于佩尔斯和弗里施是敌对国的公民,竟不被允许看他们自己写的材料。英国很快就加入到原子弹的竞赛之中。1944年,佩尔斯(那时他加入了英国国籍)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加入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行列之中。1963年,佩尔斯离开伯明翰去牛津任威克姆(Wykeham)理论物理学教授。

佩尔斯非常关注核武器的情况，他坚定地坚持《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和帕格沃什 (Pugwash) 运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马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 1858—1947)

马克斯·普朗克在《哥本哈根》中并没有被提及，但他应该被视为量子行为的发现者，因此也应该被视为量子力学之父。

1858年，普朗克出生于基尔，1879年在慕尼黑获得博士学位。在赫尔姆霍茨 (von Helmholtz) 和基尔霍夫 (Kirchhoff) 的指导下，普朗克在柏林工作，并且在热力学和气体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在慕尼黑和基尔教过一段时间理论物理学之后，普朗克于1889年回到柏林任教授。

1900年，他解决了令人困扰的黑体辐射问题。根据传统理论，高频辐射的能量应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错误的。普朗克假定，谐振子 (harmonic oscillators) 只以不连续的能量包发出辐射，其中包含一个自然常数。这个常数现在称之为“普朗克常数”。正是这同样的概念引导玻尔在1913年建立了他的有关原子中电子跃迁产生光发射的理论，其能量是与普朗克常数成比例的。

普朗克直到1918年才获得诺贝尔奖。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个人不幸。1909年妻子逝世；一个儿子在一战中丧生；两个女儿难产而死；另一个儿子因被怀疑参与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而于1944年被纳粹杀害。虽然普朗克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都待在德国，但他的行为却值得人们尊敬，他对犹太人和其他的纳粹

受害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二战后，威廉皇家协会及其研究所以普朗克的名字重新命名。1947年，普朗克，一个深受爱戴的人，在哥廷根逝世。

欧文·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

薛定谔出生于维也纳。1910年他在哈孙隆尔 (Friedrich Hasenöhr) 的指导下于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然后，他开始给实验物理学家埃克斯纳 (Franz Exner) 做助手，从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一战期间，在担任炮兵军官时，他获悉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并用业余时间阅读斯宾诺莎、叔本华、马赫 (Mach) 和其他哲学家的著作。

复员以后，他在耶拿、斯图加特、维也纳和苏黎世等地方工作过，在气体和反应动力学、热力学、数理统计学、色觉以及其他领域均作出过贡献。到了1924年，薛定谔对爱因斯坦的量子理论和德布罗意的思想都很熟悉了。由于认识到特征频率的重要性，薛定谔创立了量子力学的相对论——现在称为克莱因-戈登方程，但他很快将之抛弃了，因为它似乎没能对应实在 (原因是它描述的粒子没有自旋)。1926年，薛定谔提出了著名的非相对论的薛定谔方程，很快就发现它与海森伯的矩阵力学方程是等价的。他在柏林被任命为教授，1933年因对纳粹统治不满而离开。在牛津，薛定谔得知，他与狄拉克共同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他回到奥地利格拉茨 (Graz) 接受了一个教授职位，没想到竟会面对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局面。爱尔兰革命家、曾任过数学教授的阿蒙·德瓦勒拉

(Eamon de Valera) 创建的都柏林高级研究院，为薛定谔和其他被纳粹驱逐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薛定谔回到维也纳任教授之后，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讨论生物学的物理学基础，并对印度哲学产生了兴趣。1961年，薛定谔在阿尔卑巴赫的提洛尔人(Tyrolean) 村庄逝世。

爱德华·特勒

(EDWARD TELLER, 1908—2003)

1908年，爱德华·特勒出生于布达佩斯，是为数不多的古怪的犹太裔匈牙利科学家之一，他们在其祖国、美国以及英国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像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特勒在德国接受教育(在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莱比锡)，也在德国开始早期的研究(在哥廷根)。1924年，特勒在哥本哈根做洛克菲勒研究员。1935年，他来到美国，在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工作，直到1943年加入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特勒把主要精力用于制造热核武器。战后，他在加州大学工作，1958—1960年担任利弗莫尔(Lawrence Livermore) (武器) 实验室的负责人。虽然对公众而言他是以“氢弹之父”而闻名于世，但特勒在早期研究中对基础原子能和核物理学也作出过许多贡献。1946年，他与赖斯合著的《物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Matter*) 出版。特勒撰写的科普著作包括《我们的核未来》(*Our Nuclear Future*, 1958)、《广岛的遗物》(*The Legacy of Hiroshima*, 1962) 以及《盾胜于剑》(*Better a Shield than a Sword*, 1988)。尽管特勒的科学成就

令人景仰，但在物理学家朋友当中，他却因为长期投身于核武器研究和告发奥本海默而受到争议。人们把他比喻为“核战争狂博士”其实是一种夸张。

乔治·乌伦贝克

(GEORGE UHLENBECK, 1900—1988)

乔治·乌伦贝克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与古兹密特共同发现并阐明了电子自旋现象。其实，他在物质动力学理论、统计力学、原子结构与核物理学等方面均作出过许多贡献。乌伦贝克出生于爪哇的巴达维亚（现为印尼的雅加达）的一个荷兰家庭。他在莱顿大学受教于埃仑费斯特，后者成为他一生的典范和激励者。1927年，他加入密歇根大学物理系。1935年，他回到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担任克拉末的继任者，直到1939年返回密歇根。除了1942—1945年战争期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放射性实验室工作以外，他一直待在密歇根，直到1960年他成为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维克托·魏斯可夫

(VICTOR WEISSKOPF, 1908—2002)

1908年，维克托·魏斯可夫出生于维也纳一个高级的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他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在核物理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方面颇有建树。魏斯可夫在哥廷根接受完教育之后，曾在柏林、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以及哥本哈根

的玻尔研究所工作过，直到1937年移居美国。他在罗彻斯特大学工作了五年。1943年，他到洛斯阿拉莫斯担任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1945年开始，除了1961—1965年期间担任新成立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的总指挥之外，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他与布莱特(John Blatt)1952年合著的《理论核物理学》(*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多年来都是一本经典教科书。魏斯可夫的科普著作有《知识与疑惑》(*Knowledge and Wonder*, 1962)、《20世纪的物理学》(*Physics in the 20th Century*, 1972)、《物理学家的特权》(*The Privilege of Being a Physicist*, 1989)以及《洞察的喜悦》(*The Joy of Insight*, 1991)。令魏斯可夫的物理学家朋友们感到惋惜甚至懊恼的是，尽管他获得了大量的奖章、荣誉和奖金，但其中没有诺贝尔奖。

卡尔·魏茨泽克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 1912—2007)

1912年，卡尔·魏茨泽克出生于基尔，是德国一个显赫的政治家、神学家和科学家世家中的一员。他曾师从海森伯和玻尔，1942年成为斯特拉斯堡的理论物理学教授，1944年到柏林的威廉皇家研究所工作，1946年起在哥廷根的普朗克研究所供职。1957—1969年，他任汉堡大学哲学教授，后来担任史坦堡普朗克科技研究所的负责人。1938年，魏茨泽克发表了恒星能量产生的理论，1946年发表了行星系统形成的理论。像玻尔、海森伯和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魏茨泽克对认识论、科学的社会意义感兴趣，并且提倡把科学用于和平事业。他的父亲恩斯特(Ernst)曾经是一名外交官，其职业生涯是为纳粹服务而结束

的（尽管他不太愿意，有时也并不忠诚），因此魏茨泽克被协约国判处监禁于纽伦堡。他的弟弟理查德（Richard）于1984—1994年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

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

（JOHN ARCHIBALD WHEELER, 1911— ）

约翰·惠勒出生于1911年7月9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其他许多地方都显得少年老成。1933年，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一生共获得了十五个荣誉学位。惠勒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1976年以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荣誉退休教授的身份退休。然后，他在得克萨斯大学待了十年，并于1986年在那里成为荣誉退休教授。在惠勒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他曾作为国家研究委员会委员于1933—1935年间访问过哥本哈根，1949—1950年作为古根海姆（Guggenheim）研究员再次访问那里。惠勒获得的荣誉包括爱因斯坦奖、费米奖和国家科学奖章。他在原子物理学、散射理论、粒子之间的直接电磁感应、介子理论以及国家防卫等许多方面均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他最为著名的或许是1939年与玻尔合作的有关核裂变的重要论文，以及论述广义相对论中时空几何化的表现出超常想象力的论文。由福特（K.W. Ford）持笔的惠勒的自传于1999年出版。

（史斌、杜严勇 译）

量子力学与哥本哈根阐释

欧根·梅茨巴赫 (Eugen Merzbacher)

玻尔一生中都在努力表达他的思想，并用丹麦语、英语或德语等好几种语言来表述。但是，玻尔说话含糊不清，人们经常听不见他说什么，更谈不上理解了，他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迈克·弗雷恩的剧本《哥本哈根》极好地表达了这种痛苦，即玻尔及其朋友朝着用公式表达量子力学的道路艰苦地摸索着前进，并且最终改变了我们如何研究、教授与学习物理学的方式。

在这次物理学革命中，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虽然量子力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全新的，但它并没有完全取代物理学中的经典概念和目标。在从经典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道路上，广为人知的窍门就是知道什么应该抛弃，什么应该保留。我在教授量子力学时发现这是最大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量子力学像是一种危

险的游戏。我们知道答案，但我们必须学会提出正确的问题。

“因为发现了原子结构及其辐射现象”，玻尔在1922年即他三十七岁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在后来的岁月里，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早期，玻尔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用于获得对量子力学的意义更为完整的理解。人们开始谈论“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阐释”、“哥本哈根精神”，以及“哥本哈根传统”（更为新近，有时还不太友好）。

玻尔决心把那些已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本质特征的许多思想和要求搞清楚：第一，波粒二象性（德布罗意）；第二，不确定原理（海森伯）；第三，理论预言的统计特征（玻尔，讽刺性的是，还有薛定谔）；第四，量子态的整体性或不可分割性（玻尔对爱因斯坦）。

波粒二象性通常用双缝干涉实验来说明。一束粒子打向有两条细缝的屏幕，远离屏幕通过两个小孔从不同方向一颗一颗地观察粒子的运动，发现许多粒子到达了传统轨道之外的地方。在两条细缝后面，通过振荡叠加而生了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而这种现象是波的特征。然而，我们观察的却是单个的粒子。它们可以是电子、中子、整个原子或分子，甚至是更大的物质。当然也可以是光子，即没有质量的光的粒子（爱因斯坦提出的假设，但玻尔并不这样想）。1923年，德布罗意提出，波长（可以通过测量干涉条纹的位置而得到）与质量为 m 的物质粒子的速度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倒数法则来表示：

$$\lambda = \frac{h}{p} = \frac{h}{mv}$$

在这里， v 是粒子的速度， h 是普朗克常数。第一个等式也可以用于光子，因为它们虽然没有质量，但有动量。实验直接表明这是对的。

起初，人们认为这里表现出一个内在的矛盾，但很快就认识到光和物质的波粒二象性并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它们是一个物体在地互补的两个特征，是一回事。人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仅仅因为“波”和“粒子”两个概念有其名，就把长久以来所熟悉的特征赋予它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两个表面上矛盾的性质，波动性和粒子性，就实现了和谐。波并不像水波或声波那样实在，粒子也不是微小的弹性球体。量子力学的命題固有统计特征和或然性，承认这一点是解决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波粒二象性的关键所在。这些在 1926 年就完成了。

空间中完美的协（正弦）波有着确定的波长，因而以某个清晰而又精确的数值表征着某个粒子（光子、电子、中子、原子、分子，凡此种种）的动量和速度。因为这种波的振幅恒定不变，每一个最大值都不能与后一个相区别，所以它不能被确切定位。假如我们要用一种波来使粒子和波峰固定在某一确定的位置，就必须把两种或更多的协波进行叠加。我们获得了空间的精确性，却失去了动量的精确性，也只能获得其速度值的一个范围。一种物理量的精确性的获得以损失另一种物理量的更大的精确性为代价，这种损失把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学区别开来，而后者假定人们可以同时以无限的精度获知所有物理量的数值，至少原则上是这样。在数量上，这种思想被表述为不确定（或测不准）关系，这是海森伯于 1927 年得出的，在剧本里它也经常被提及。抛弃获知物理量完美的精确性的理想，肯定会造成损失，但我们也得到了补偿，因为量子力学赠给我们一笔财富，即，对物理过程的不同状态的描述远远超出了经典物理学的范畴。

双缝干涉实验是波粒二象性的规范解释。它与德布罗意关于粒子速度或动量与对应的波长的倒数关系一起，形成了导向不确定关系的两步。双缝之间的距离 Δx ，有时人们认为单个粒

子可以同时通过，给了我们一个侧向位置的不确定性的量度。在远处的屏幕上观察到的偏转是侧向动量 Δp_x 不确定性的量度。经由双缝的波的叠加实验可证明两个不确定量的互补关系。当我们把双缝移近一些，干涉模式就表现出来，反之亦然。

为了发展出一种能够描述和预言大范围物理学系统（其范围从原子核中的基本粒子、原子、放射物到分子、凝聚态物质，直至中观领域）的行为的统一的框架，我们必须清除几个转移注意力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启发式的信念，认为理论只能通过处理可观察的量而定义自身。因为它引导海森伯利用其难以置信的直觉，得到了量子力学的正确的公式，所以这只根智力拐杖对于量子力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价值。但是，它最终成为全面理解量子力学的一个障碍，对非物理学家来说更是如此。（阿罗阿诺夫-玻姆效应 [Aharonov-Bohm effect] 在 1958—1960 年左右的历史，甚至直至现在，表明把物理量严格地区分为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以及把后者放在第二等或更糟的地位，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另一个可疑的信念是，认为人作为观察者在量子力学中比在经典物理学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甚至于不顾这一明显的事实，即实验检验必须由人类在实验室里准备妥当，以及整个科学事业都是由有意识的人类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直到今天，量子力学中观察者的作用仍然经常引起争议。“上帝不会掷骰子”的谚语必然暗示着只有人类才会掷骰子，爱因斯坦希望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存在着一种没有观察者干涉的，对自然（用大写字母“N”表示）的实在论的非统计学的描述。另一方面，玻尔则强调他所认为的量子现象中观察者和测量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可以比爱因斯坦和玻尔更少教条式地来解释量子力学。我们知道（或者已经习惯了这种思想），处处

存在着或然性，实验与检验都存在另一种结果。最终，检验理所当然地给观察者提供了信息，但这种信息却具有统计的性质，因为爱因斯坦的“上帝”确实在掷骰子而不用人类的干涉。最近《今日物理》上题为“没有观察者的量子理论”、“不需“解释”的量子理论”之类的文章表明，人们仍然有兴趣关心这些问题。

当海森伯在发展他的新力学之时，薛定谔无意识地（狄拉克有意地）形成了解释量子物理学中或然性的理论。我们把该理论的对象简称为态，因为它的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即量子力学允许我们去了解它所描述的系统的环境（或者态）。我们不必深究其原因，可以把态用数学表示为： $|\Psi\rangle$ 。

这里，“态矢量（ket $|\rangle$ ）”的内部特征表示研究中的特定态。这是一个用矢量代数法则表示的对象：系统的两种态可以叠加，一种态可以被许多态所叠加。我们将用光子，即光的粒子来说明这些概念。

因为光线很容易被线性地偏振，我们也很容易测试这种偏振性（用人造偏光板滤光器），因此光子也能如此。水平偏振或垂直偏振的光子可以用两种基态（basis states）来描述： $|H\rangle$ 和 $|V\rangle$ 。一般状态下单光子状态是二者的叠加：

$$|\Psi_1\rangle = a|H\rangle + b|V\rangle$$

这里， a 和 b 是（复）数。其平方， $|a|^2$ 与 $|b|^2$ 是叠加 $|\Psi_1\rangle$ 表示互相排斥的结果的可能性：百分之百，分别在 H 或 V 方向上完全偏振的光子。例如，在

$$|\Psi_1\rangle = \sqrt{0.6}|H\rangle + \sqrt{0.4}|V\rangle = 0.77|H\rangle + 0.63|V\rangle$$

这种态中有60%的可能性发现电子水平偏振，40%的可能性垂直偏振。偶尔（却是误导地）有人认为，电子同时拥有 H

和 V 两种态，就像电子同时通过双缝一样。哥本哈根阐释为这些新概念提供了（现在仍然如此）适当的语言。然而，语言与词汇可能很不忠诚。正如这个剧本提醒我们的那样，海森伯坚持认为这只存在于数学之中。有效的叠加构成了两种态的量子系统，或者说量子位，一种为新的计算方法服务的颇为诱人的工具。

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按照粒子所固有的性质和属性构成的世界。即使我们承认，通常量子力学不会允许我们谈及光子“拥有”某种确定的偏振状态，但我们也不能坚持认为，观察把系统“放置”于一种确定的偏振状态，并“破坏”了波的功能或者状态。抛掉这些无关紧要的累赘，哥本哈根阐释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粒子所“拥有”的确定的性质转向粒子所“表现”的性质本身。从直接的行为语言转向更为费解而被动的表述模式，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没多大意义而又别扭的转变，但是，在量子力学当中这却至关重要，特别在理论延伸至几个同种粒子构成的系统及其量子场时更是如此。因此，整个物理学系统的概念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修正。

利用基态 $|H\rangle$ 和 $|V\rangle$ 的叠加，我们可以引入两种不同的新的基态，例如：

$$\begin{aligned}
 |D\rangle &= \frac{1}{\sqrt{2}}(|H\rangle + |V\rangle) & |H\rangle &= \frac{1}{\sqrt{2}}(|D\rangle - |D'\rangle) \\
 |D'\rangle &= \frac{1}{\sqrt{2}}(-|H\rangle + |V\rangle) & |V\rangle &= \frac{1}{\sqrt{2}}(|D\rangle + |D'\rangle)
 \end{aligned}$$

或

这里， D 和 D' 表示两种 45° 或“对角线”方向。用原始态取代这种表述，我们得到：

$$|\Psi_1\rangle = 0.994|D\rangle - 0.099|D'\rangle$$

其含义是，我们的态有 99% 的可能是 $|D\rangle$ ，有 1% 的可能是 $|D'\rangle$ ，因此其偏振方向非常接近于对角线（或 45° ）方向。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双光子态,用光子 1、光子 2 (或左、右,红、蓝)区别表示。显然,有四种基态:

$$|H_1\rangle|H_2\rangle \quad |H_1\rangle|V_2\rangle \quad |V_1\rangle|H_2\rangle \quad |V_1\rangle|V_2\rangle$$

第一种态表示两个光子都沿着水平方向偏振的物理状态,以此类推。量子力学允许(实际上是要求)我们通过叠加从这些基态建构出更为一般的双光子态,正如我们对一个光子所做的那样:

$$|\Psi_2\rangle = a|H_1\rangle|H_2\rangle + b|H_1\rangle|V_2\rangle + c|V_1\rangle|H_2\rangle + d|V_1\rangle|V_2\rangle$$

进行测量时, a、b、c、d (绝对值)的平方也表示观测到特定的双光子基态的可能性。由于系数具有确定值,双光子态是可分解的:

$$\begin{aligned} |\Psi_2\rangle &= (a_1|H_1\rangle + b_1|V_1\rangle)(a_2|H_2\rangle + b_2|V_2\rangle) \\ &= a_1|H_1\rangle|H_2\rangle + a_1b_2|H_1\rangle|V_2\rangle + b_1a_2|V_1\rangle|H_2\rangle + b_1b_2|V_1\rangle|V_2\rangle \end{aligned}$$

如果这种因数分解是可能的,我们就可以认为两个光子各自独立地携带自己的物理信息,而不会相互影响。然而,双粒子态一般不能分解为两个单粒子态。这种态称之为纠缠(薛定谔称之为“*verschränkt*”)。纠缠态常常用来指不可思议的、诡异的超距作用。

在这个剧本中,我们看到薛定谔隐喻中的猫是表示纠缠态的一种众人皆知的漫画。放射性的核子,最初没有衰变但最终发生了衰变,表示光子 1;薛定谔的猫,要么死亡要么活着,代表光子 2。整个状态是一种叠加,不仅仅是活着的猫与死亡的猫的叠加,而是把猫的状态与放射性核子的始态、终态联系起来两种可区分的“双粒子”态的叠加。这种叠加不可能被观察到,

因为环境与之发生的即使是最为微弱的相互作用都可能导致非常迅速的脱散过程。

薛定谔的放射性核子与猫的相互联系为我们提供了纠缠的双光子偏振态最为简单的例子之一：

$$\text{纠缠的双光子态} = |\Psi_2\rangle = \frac{1}{\sqrt{2}}|H_1\rangle|H_2\rangle + \frac{1}{\sqrt{2}}|V_1\rangle|V_2\rangle$$

发现光子都处于水平或垂直偏振状态各有 50% 的可能性，但绝不可能一个光子水平偏振而另一个垂直偏振。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同样的双光子态也可能用对角基表示如下：

纠缠效应再次显现。

$$\text{纠缠的双光子态} = |\Psi_2\rangle = \frac{1}{\sqrt{2}}|H_1\rangle|H_2\rangle + \frac{1}{\sqrt{2}}|V_1\rangle|V_2\rangle$$

在这一点上，有关 EPR 佯谬（爱因斯坦 - 波多尔斯基 [Podolsky] - 罗森 [Rosen]）的争论（最初由玻姆提出）出现了：在相互纠缠的双光子态中，如果发现光子 1 有水平（垂直）偏振，那么光子 2 肯定以同样的方式偏振，即水平（垂直）偏振。如果光子相距甚远，在测量偏振时不可能发生相互作用，也是如此，就像最近在日内瓦郊区进行相对论褶皱实验一样。爱因斯坦倡导的定域实在性（local realism）的学说要求，不管光子 2 测量与否，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说，它必须“知道”其偏振是水平的（垂直的），其中的（例如，隐变量的数值）信息必须被破译。因为我们可以同样好地选择光子 1 测量在对角线 D 和 D' 的偏振性，区分为水平和垂直的方向，所以定域实在性要求光子 2 带有明白无误的潜在的偏振方向的信息，虽然两个光子可能相隔数公里远。在既定的纠缠态中，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性意味着光子 2 既在水平（垂直）方向又在某一对角线方向具有 100% 的明确的偏振现象。但在量子理论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单光子态！

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只能对粒子的全体进行统计学上有效的预言，但他主张量子力学是（正确的，但）不完备的，必须考虑一种对单个粒子（光子）态进行更为详细的确定性的和实在论的描述。贝尔不等式表明，这种假设与量子力学的一些（虽然不是全部）预言是不可调和的。正如贝尔可能会说的那样，相互纠缠的双光子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它们想象为两个不同的单光子态的合成，而单光子态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并带有其自身的确定无疑的偏振性。后一种观念与量子力学的形式主义不相一致。

量子力学与定域实在论是不可调和的，了解这一点固然是重要而且有趣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实际的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两个或更多粒子的）纠缠态能够在实验室里做出来吗？它们符合量子力学的预言吗？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用实验来说明这些问题最终成为可能。几年前，在美国物理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珀塞尔（Edward Purcell）说，他很高兴能够活着看到阿斯派克特（Alain Aspect）和他的团队表明纠缠的双光子态表现得像量子力学所预言的那样（违反了贝尔不等式）。近年来，如果根据哥本哈根阐释来分析的话，量子力学的预言已被更多的纠缠态的实验所证实。剧本《哥本哈根》为我们再次审视这些基本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本文系在纽约市立大学关于“从科学、历史与戏剧的角度看迈克·弗雷恩的剧本《哥本哈根》”的讨论会上的演讲。时间为2000年3月27日。作者为北卡大学查佩尔希尔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教授。]

（杜严勇 译）

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哥本哈根》

戴维·卡西迪 (David C. Cassidy)

1941年，沃纳·海森伯访问了哥本哈根，这期间他努力想告诉尼耳斯·玻尔什么呢？他又想从玻尔那里得到什么？

由迈克·弗雷恩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发人深省，在伦敦首演时座无虚席。最近，这部戏剧在纽约上演，备受关注。尽管背景简单，只有三个角色，以技术本质作素材，本剧似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让每一个观众产生了“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心灵感受。

此剧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汇合在同一空间；如今，当我们不顾一切冲向未来，憧憬着可能令人无限惊讶的高科技的同时，我们还是时不时地被拖回到20世纪萦绕不去的问题里，正如《哥本哈根》中的人物那样。这些问题是如此深刻，它们本身似乎可以

穿越时空。世界上最文明、科学最发达的民族怎么可能制造出这样一个灭绝人寰的机器——纳粹德国？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海森伯是现代最有天赋的物理学家之一，受过最好的西方文化传统教育，他既不是一个纳粹分子也不是一个纳粹支持者。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选择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一直生活了十二年？而且，在战争的高潮时刻，他还积极地寻求在柏林取得显著的学术职位，其职能范围包括战争期间为德国军队进行核裂变研究的科学管理，这又怎么可能？

二战后，人们研究和辩论不休的难题有很多，这是其中的两个。如今经常性的情感辩论有时甚至比以前争论得更激烈，而且它还将继续下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会永远存在，除非有了新的突破或者可能找到了新的角度，比如历史剧的角度。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戏后的希望。我很高兴地看到，《哥本哈根》非常成功地给公众引出了这些历史问题（甚至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它也从戏剧的角度迈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第一步。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承认我还有些失望。

尽管此剧主题的涵盖面较宽：核裂变、量子力学、家庭背景以及个人悲剧等，但是这部戏剧令我失望的地方是：它缺失了较早前所提出的更大的历史问题的充分完整感，以及比此剧聚焦的历史背景（海森伯在1941年9月和玻尔的会面）宽得多的领悟。在这里，我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观众或剧作家可能会有别的看法。不过，由于此剧缺乏更宽的角度，它似乎很快就过渡到作者要努力回答的那个问题上：海森伯想努力告诉玻尔什么？他又想从玻尔那里得到什么？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本应该非常明显。

当然，没有其他人在场去观察并记录这两个人的户外会面，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确切知道他们在一起散步时究竟说了什么或

暗示了什么。不过，根据测不准原理（不确定原理），对于这个看似神秘的会面，人们可以通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部戏剧，从而缩小这种不确定性。

海森伯说：“……这个世界记住我的只有两点，一个是测不准原理（不确定原理），另外一个就是我1941年在哥本哈根和尼耳斯·玻尔的神秘会晤。”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剧本在这一开始就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有限制的历史聚焦信号。很难知道这个世界究竟记住了海森伯什么。但是，这里我将给出我的建议：这个世界记住的是他对量子力学的很多贡献，其中测不准原理（不确定原理）并非唯一的一个；还有二战期间他在德国核裂变研究中的领导地位，其中1941年哥本哈根访问是唯一的一个表现。

访问

可能出于戏剧本身的原因，此剧一直强调海森伯的这一次行程，而没有提及另外至少十次有相同争议的会面，那是在战争期间海森伯对纳粹占领国以及到也同样说德语的瑞士的几次访问。其中有几次：

1941年和1942年，访问德国占领的布达佩斯。

1942年和1944年，访问瑞士。

1943年10月，访问德国占领的荷兰，就在荷兰的犹太人刚被驱逐到奥斯威辛后。

1943年12月，访问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他是波兰克拉科夫市一位声名狼藉的博士，

仅在几个月前这位总督和他的刽子手刚屠杀掉华沙省英勇的犹太人。

1944年，在玻尔逃到英国和美国后，两次访问哥本哈根。

1944年2月，访问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

历史学家马克·沃克（Mark Walker）在对海森伯战争期间的旅行所做的研究中指出，海森伯担任了去每一个被占领国家的出行任务，包括1941年他作为德国文化宣传驻外代表到哥本哈根的那次行程。据报道，对这几次旅行，海森伯向他的外国同事作了妥协的怀有深深痛苦的声明。他在1943年10月到占领国荷兰旅行，他的一位荷兰同事后来为此次旅行作了如下总结陈述：“民主制度不能发挥足够的能量来管理欧洲，因此只有两种可能：德国和俄国。那么，一个在德国领导之下的欧洲或许更不邪恶一些。”

有人想知道，两年前的哥本哈根海森伯是否真的说过任何不同的话。

战争岁月

事实上，再多看看海森伯对于德国战争目的的态度，尤其是在1941年，似乎就会更肯定地知道他没有。正如我在我的传记中对这个男人的描述一样，海森伯这个时期的观点跟别的德国非犹太爱国者完全一样，比如艺术界、学术界和军事界。出于民族和国家自豪感，这一社会群体为了德意志民族急切地支持德国事业。当战争早期德国军队闪电般地席卷了欧洲时，这

群人希望从各方面得到战争胜利的消息。1941年9月，他们相信最终的胜利指日可待。

不过，这群文化、军事精英想让德国赢得这场战争，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希特勒或者纳粹政府赢。他们不是纳粹分子，而是骄傲、正直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看在民族的份上顺从地支持希特勒政府，同时抱着天真的想法，以为希特勒和他的“流氓”一旦为“真正的德国”（德国文化）赢得这场战争，他们就会被取而代之。当这个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的进程逆转的时候，这些人开始反对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并在1944年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暗杀活动，以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知道，在纳粹德国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德国存在。

海森伯和他的同族人从根本上有着相同的重要观点，这显而易见。他和柏林很多暗杀策划成员关系亲密，而且，尽管他个人厌恶纳粹野心，在1936年后却作为预备军人参加了一个德国山地步兵团（mountain infantry unit）。尽管45岁以下的所有成年男性都被要求参加预备役，但是对海森伯来讲，它并不仅仅是一种义务。比如，1938年苏台德地区经济危机期间，海森伯对于他和他的军团准备攻打邻国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歉意。战争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欧国家在慕尼黑会议上拱手将苏台德地区让给了德国。海森伯之后唯一的反应就是，对希特勒战争目的以及会使他走向自取灭亡的行军计划无奈地妥协。当他的军团暂时将武器放下的时候，他给母亲写信说道：“一想到每个人的性命和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就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就觉得命运是如此可笑。”

1942年，他似乎对战争的进行表现出了更大的妥协，他在一本没有出版的手稿中这样写道：

我们剩下能做的也就是一些简单的事情：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完成生命所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使命，不要惊奇或问什么原因……接下来我们就等待着要发生的事情……现实的转变不会受我们的影响。

海森伯会接受德国战争期间出国访问的任务，并且在1941年出行德国占领的哥本哈根还有什么疑问吗？

裂变工程

当我们用更宽的历史视角，来进一步调查为什么海森伯选择接受德国战争期间的核裂变工程的科学主管这一职务时，就可再次确定该答案了。尽管如海森伯的物理学一样，它永远达不到零不确定（zero uncertainty）。

到1939年9月德国战争爆发，海森伯已经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生活了几乎七到十二年的时间。在那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他必须留在德国妥协的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了。随着反犹太政权的建立，海森伯的很多学生和同事都被驱逐出了德国。接着，1937年，纳粹党卫军把注意力转向了海森伯本人，责怪他在纳粹党卫军的出版物上教授所谓的“犹太物理学”，即现代理论物理学。文章称海森伯为“白犹太人”，并称他为“新德国爱因斯坦精神的代表”。这就是在暗示他是一个叛国者，应该将他送到集中营去“拯救”。最后，经过一年的纳粹秘密警察的调查，克罗地亚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亲自出面证明了他没有背叛纳粹政府。这使他免受进一步的攻击，但是已经对他造成了影响。

海森伯面对专政，现在看到了自己的妥协和留在德国的代价。他留在这种环境下的决心，一方面是来自于他个人对德意志民族的忠诚，另外，还有他错误的信念：如果他个人能够活过这次战争，并且最后推翻纳粹政权，那么，他也就能够使德国的优秀科学持续到更好的时代。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我们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现在接受了赋予他的每一件事情：被指定的每一个高级职位，被分派的每一个到被占领国家的，被邀请的每一个公众演说。这样来作为体现自己真我和德国同时代的理论物理学的证据。

1939年，战争在欧洲的突然爆发给了海森伯还有他的同事们一个理想的机会，通过将他们的科学技术服务于德国战争，来最终向他们的统治者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所谓的“犹太物理学”，核裂变的发现和发展给这些科学家们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来保护德国军队。持久的工程可能会为德国军工厂生产出强大的新武器，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充足的能量来加强德国轮船业和德国经济。就像海森伯后来所说：“我们的政府官员口号是‘我们必须利用物理学为战争服务’。我们把它反过来说：‘我们必须利用战争来为物理学服务。’”

到1941年8月，访问哥本哈根一个月前，海森伯和他的核裂变同事在莱比锡和柏林突然遇到一个新的危机。首先，海森伯在莱比锡的反应堆研究组正在接近中子增值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夏天就可以确认。不仅是核武器的前景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德国人也确信他们在那个时候远远走在同盟国核裂变研究的前面。然而，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这种领先性。

其次，德国柏林另一个研究所的弗里茨·豪特曼斯用反应堆得出了重要的研究结果：铀可以通过吸收中子变成钚而为核武器提供动力。这一发现突然模糊了反应堆研究和核武器研究

的界限。

几年以后，海森伯回忆说：“就是从1941年9月开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前面的一条通往原子弹爆炸的路。”随着到哥本哈根文化宣传学院访问计划的确定，不论海森伯想要或者不想要，这条通往原子弹爆炸的路就径直通向了尼耳斯·玻尔的门前。所有这一切都将我们拖回到这个剧本提出的问题：海森伯在九月份的那次会面期间，究竟努力想告诉尼耳斯·玻尔什么？他又想从玻尔那里得到什么？

道义问题

海森伯自己的答案在战后的几次作品中都曾出现过，被新闻记者罗伯特·容克在1958年发表，自此以后被很多非历史学家、通俗作家和电视制片人所接受。在1948年一个文件上、他别的作品中以及这部戏剧中，像海森伯所说，他想从玻尔那里得到答案：“一个物理学家有没有道德责任来从事原子能爆炸的研究？”

我这样解释的问题是，关于核裂变研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尤其是1941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海森伯以及其他许多物理学家曾为那件事情特别考虑过道义的问题。当然，并不排除这样的考虑。但是，如果在这样一种困难的环境下，海森伯出于这样伟大的一种考虑来到哥本哈根，那么，就应该从那个时期其他资料中找到线索。

在更早的几年里，海森伯确实跟玻尔有过一次随意的伦理方面的谈话。但是，自从希特勒上台后，尤其是纳粹党卫军事件后，海森伯如果需要任何道义或伦理方面的建议，都会求助

于他的两个诚实正直的德国同事——普朗克和劳厄，1941年时候，在柏林仍然是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两个人的。但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他曾经跟他们中任何一个讨论过核裂变研究中的道德问题。

如果道德不是考虑的主要问题，那么，海森伯到被占领的丹麦寻找玻尔一定还有别的动机，他早些时候在国际关系中有更多的频繁的交谈，这种动机很可能反过来代替了这些交谈。确实，早些时候到哥本哈根的几次访问，还有他跟玻尔以及玻尔的许多其他国际客人的会面期间，他首次赢得了国际物理界的真正欣赏。长期访问国际绿洲，即现在的尼耳斯·玻尔学院，结果，他甚至学会了说丹麦话和英语。

到1941年9月，对世界来说，国际形势看起来相当迷茫，但是对德国来讲却相当确定。正像剧中所称，到那时为止，德意志已经扩张到了极致。欧洲大陆多数已经处在纳粹的占领下，德国装甲师已经挺进到了俄国，而美国仍然保持着正式的中立。海森伯已经从他的德国同僚那里得知，原子弹爆炸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可能性，而且也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现实。不论战争是像德国军队预期的那样结束，还是停滞在被拖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往事回忆中，都很容易推测出，美国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赶上德国研究人员，建造出核武器，用来对付德国或者威胁德国。在一部论文集里面，伊丽莎白·海森伯写到，她丈夫整个战争期间都想着同盟国有更好装备，可能会建造出原子弹，而这样的想法“不停地折磨他自己”。同时，海森伯可能知道或非常怀疑玻尔通过地下手段和同盟国的科学家有联系。

因此，海森伯在这次会晤期间，他努力想告诉玻尔什么，又想从玻尔那里得到什么呢？从更广的历史背景更充分地考量评价海森伯的观点，以及他和战争与核裂变的关系都表明，他

想说服玻尔接受他的观点：毕竟，德国看起来不可避免的胜利对欧洲来讲也并不算坏。就像海森伯对他惊恐万分的荷兰同事们讲的那样，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让整个欧洲处于俄国的统治下。因为，他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海森伯就已经目睹过使巴伐利亚地区创伤累累的苏联革命，他总是认为俄国的统治会比纳粹的统治还要糟糕。

很明显，他想让玻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阻止同盟国的科学家，让这些比德国落后得多的科学家不要再努力地制造可能用来对付德国的原子弹。

玻尔让人尊敬的是，他马上感觉到了海森伯的用意，并且中断了那次谈话。海森伯回到家打算继续核裂变研究。他已经对事件的进展听天由命了。在访问玻尔后，不管他是否愿意，事情现在似乎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核战争。海森伯曾写给在莱比锡的一个同事一封信，这个同事是一个中年历史学家，这封信仅仅写在他回到德国的一周后，在这封没有发表的信件里，他暗示了毁灭世界的可能性，明显地表明了世界不可避免地会拥有核武器：

你书里写到和我们这个时代形成对比的中年思维模式的那一段，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种转变在不久的将来会再次发生。因为我们人类可能某一天会意识到我们真的拥有完全毁灭这个世界的力量，即：我们很可能会把自己带到世界末日或者什么类似的地方。

仅在三个月后，在最信任的顾问的建议下，德军决定放弃它的核裂变工程计划，选择致力于火箭和喷气式飞机的研究。这个变化最终扼杀了德国在核裂变方面的彻底成功。

最后，测不准的聚光灯在很大程度上遣散了海森伯旅程的神秘。它向我们解释了：海森伯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十

足的恶魔，而是一个高智商的、文明的、有修养的人，像很多人一样，完全不打算悲惨地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环境中。

我的这篇文章以我在“《哥本哈根》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础，该座谈会于2000年3月27号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举行。

[戴维·卡西迪是纽约亨普斯特德市赫福斯特拉(Hofstra)大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个历史学家，著有《不确定性：沃纳·海森伯的生活与科学》。]

(万国迎 译)

民主

DEMOCRACY

两幕剧

人物

- 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西德联邦政府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京特·纪尧姆 GÜNTER GUILLAUME
勃兰特总理的助理，东德间谍
- 阿诺·克雷施曼 ARNO KRETSCHMANN
东德间谍，纪尧姆在西德的上司
- 霍斯特·埃姆克 HORST EHMKE
勃兰特总理的行政人事主管
- 赖因哈德·维尔克 REINHARD WILKE
勃兰特总理的办公室主任
- 乌尔里希·鲍霍斯 ULRICH BAUHAUS
勃兰特总理的卫士
- 赫伯特·魏赫纳 HERBERT WEHNER
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主席
- 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勃兰特总理的继任者
-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HANS-DIETRICH GENSCHER
联邦政府内政部长，后任外交部长
- 京特·诺劳 GÜNTHER NOLLAU
内政部安全局局长

布景

多层次多空间的组合；各式办公桌与座椅；各种卷宗与文件；当剧中的人物无戏时，也通常不下场，而是留在中心活动场景的外围，或聆听或悄然专注于工作。

本版本（包括剧本和后记）由作者改定于2003年9月。

第一幕

暗场。观众期待时的嗡嗡交谈声被一阵手铃声打断。

旁白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宣布选举结果。赞成者：251票。反对者：235票。

鼓掌声，欢呼声。灯光亮起照着勃兰特。

现在我宣布……现在我宣布，根据基本法第63条第2款，总理候选人已经获得联邦议院的多数票通过。勃兰特先生，你愿意接受联邦议院选举你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吗？

纪尧姆 （对勃兰特和克雷施曼）此刻，时光似乎屏住了它的呼吸。世界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巨变。时隔四十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左派的总理！

克雷施曼 希特勒的十二年。军事政府的四年。保守党与冷战的二十年。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结束欧洲漫长的对峙与僵持的希望。

纪尧姆 1969年，10月21日，上午11时22分……

勃兰特 是的，议长先生。我接受这一选举。

纪尧姆 祝贺，泪水。维利·勃兰特终于成功了！

克雷施曼 而你就在联邦议院目睹了这一切。

纪尧姆 作为法兰克福一个贫民选区党的一位工作人员，那天，我来到波恩以旁观的身份列席了会议。我不得不承认，我流下了泪水。

勃兰特 我十分感激人民寄予我的信赖与厚望。我也不无自豪。在几乎四十年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又担起了这一重任。而整整一个世纪之前，一位穷苦的车工在莱比锡创立了我们伟大的党。而在那些年里，这个代表被压迫者的力量与希望的伟大的党，遭到了纳粹政府的残酷镇压；在那些岁月里我们有多少党员在监狱中在集中营里受尽摧残与折磨，有多少党员惨遭杀害；在恐怖年代结束后的这些年里，我们的党显示了它的力量，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我们奇迹般地从废墟与绝望中重建我们的国家，使其重生为一个稳定而文明的社会。没有任何人能忽视我们的人民与各党派各宗教团体在国家重建中的一切成就。然而，希特勒最终输掉了他发动的这场反对欧洲人民、反对本国人民的战争。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去实现一百年前我们那普通的莱比锡工匠的梦想，去创建我们的祖国——一个充满爱与正义的德国。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但最不寻常的是你所经历的一切。所有返回东德的人们都无法相信。

纪尧姆 就连我自己也无法相信。

克雷施曼 你从未真正想到过会与当选总理维利·勃兰特相见。即便是在梦中，你也绝对想象不到在三个星期之后他们会派你去他的身边。

埃姆克 (对纪尧姆) 埃姆克。霍施特·埃姆克。维利的行政人事主管。主管总理办公室的行政事务。负责整个政府系统的协调运转…… (对维尔克和鲍霍斯) 谢谢你, 乌里。你帮了大忙。放在那儿, 可以, 放在书桌上……

维尔克 别放那儿, 劳驾, 鲍霍斯先生! 别放在书桌上!

埃姆克 (对纪尧姆) 你刚接到通知就赶来, 真是太好了。听着, 我们这儿需要新鲜血液。而不仅仅是我这种大学里学政治出身的学院派。- 放那儿, 乌里! 别听赖因哈德的。- 我们这儿需要增加一些党内的年轻人。能够和人民沟通的人。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同志说你就是我们合适的人选。你在那儿干得极其出色。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还听说你对我们左派的年轻朋友们有一个生动的爱称。所有那些支持拥戴我们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我听说你把他们昵称为……

纪尧姆 噢……

埃姆克 傻屁?

纪尧姆 傻屁。

埃姆克 这工作适合你。- 饮料柜的钥匙, 乌里。这钥匙就由你妥为保管了。- 总理办公室。工会联络助理。一月一日开始。怎么样?

纪尧姆 总理办公室? 在那儿工作? 你是说……和维利一起?

埃姆克 第三部委。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部。联邦薪水二级甲等。接受吗?

纪尧姆 是的, 埃姆克先生。我接受这一任命。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 那么, 你和维利! 在一个楼里! 一起开始你们新的工作!

纪尧姆 我入党的那年维利正好成为西柏林的市长。我俩的星

象是相连的。

克雷施曼 可你还是忍不住笑了。维利·勃兰特谈到了西德的成就。西德花了二十年才第一次出现温和的左派政府。可关于我们东德他只字未提。根本不提我们这二十年的成就。而我们却实实在在地建起了他们曾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社会！

纪尧姆 包括举世公认的最出色的对外情报机构。

克雷施曼 米沙·沃尔夫要我代他本人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联邦总理的办公室内有了我们自己的人！

纪尧姆 只要米沙快乐。我别无他求……现在我就在这里工作，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小房间，在尚波宫的顶楼。我的第一个早晨！

埃姆克 （对纪尧姆）纪尧姆先生，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有一两件事我们需要谈一谈。

纪尧姆 - 上司也要对我表示他个人的欢迎。太妙了。

埃姆克 安全保卫部门有些问题要你回答。你十三年前离开东德来到西德，他们对你在西德的经历已作了详尽的了解。

纪尧姆 - 不是欢迎词。是安全审查。

埃姆克 自由摄影师……影印店……党的工作——好像这一切都核实的了。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回答，是关于你离开东德之前的工作经历。

纪尧姆 - 我想过迟早会有这事。但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真是吓死我了。显然有人在飞短流长。整整两个小时！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谁？最后我终于发火了。- 埃姆克先生，逃离东德意味着你必须放弃你原先拥有的一切。你的房子、你的朋友、你的家庭。永远放弃。然

后你什么都不是，你要从头开始你的生活。恕我直言，你从未有过这样的必要，因而你根本无法理解它的含义。而现在的最令人痛苦的是，在你的新的国土上你发现自己将在一块怀疑与戒备的乌云笼罩下度过你的余生。我来了十三年了！这九年来我为我们党日日夜夜地工作！——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我能听到我的嗓音在哽咽。最后……

埃姆克 对不起。但不得不让你受这个折磨。我实际上一直在同你们法兰克福的上级了解你的情况。他说他愿为你做任何担保。京特，那我们又何必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呢？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你的开场式。

纪尧姆 然而从此刻起他成了我终身的朋友。

克雷施曼 于是，就这样，你进入了尚玻宫！它是什么样子？我是瞎子，我是聋子。你是我的眼睛，你是我的耳朵。我必须为米沙描绘图像！而你得为我描绘它。

纪尧姆 塔楼、窗棂。十九世纪制铁商们梦中的贵族生活。当然还有鬼魂。从德皇时期到纳粹，到占领时期，到阿登诺。在我的办公室中我不时地听到屋顶梁柱间细微的滴答声。

克雷施曼 临刑死囚的报时虫。或许，象征意义的。

纪尧姆 而维利也不时地听到头顶细微的声响。脚步声。椅子擦地声。

克雷施曼 那就是你？

纪尧姆 我的办公室就在他的楼上。

克雷施曼 这是他屋里梁柱间的报时虫。你听到他的声响吗？

纪尧姆 毫无声息。

克雷施曼 耳朵贴着地板呢？

纪尧姆 听不到。他工作时极其安静。而当我下楼时……

维尔克 （对纪尧姆）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京特！别客气！叫我京特！

维尔克 楼上房间好吗，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非常舒适，谢谢你，赖因哈德。- 赖因哈德·维尔克博士。我的顶头上司。替维利守门的龙骑兵。- 要我帮忙吗，赖因哈德？整理档案？复印文件？浇花？

维尔克 谢谢你，纪尧姆先生。我们有秘书的。

纪尧姆 无论事大事小，你需要就叫我。

维尔克 我肯定楼上够你忙的。

纪尧姆 - 他对我的殷勤似有抵触。我不是教授或博士什么的，像其他人那样。就这么一步跳入党的总部。- 有什么东西要我传递吗？档案？文件？

维尔克 我们有信差，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 我最终能搞定他。

克雷施曼 - 慢慢来。不着急。我们已经等了十三年了。还在乎等几个星期吗？

维尔克 （对埃姆克）这就是你的纪尧姆先生。

埃姆克 好人。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

维尔克 办公室所有同人都对他的任命大吃一惊。

埃姆克 赖因哈德，在这儿我们需要拓宽我们的地平线。你是个律师，我是个教授。我们的心灵都蒙上了尘垢。

维尔克 但这可怜的人既无专业训练又无任何种类的工作经验！

埃姆克 他是受过训练的摄影师。

维尔克 如果我们需要一名外出旅游的摄影……

埃姆克 他同时具有管理的实际经验。

- 维尔克 管理？管理什么？
- 埃姆克 管理一家影印店。
- 维尔克 霍斯特，我们能否严肃片刻？
- 埃姆克 时代变了，赖因哈德。我们必须拥抱整个社会。摄影师。影印店的经理。妇女！我们必须得找一些妇女，赖因哈德，而且拥抱她们。
- 维尔克 秘书班子不缺人手。根据我的理解，霍斯特，自从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她们一直为各届政府所拥抱。
- 纪尧姆 - 而今天——重要的日子！
- 克雷施曼 - 你遇到了维利？
- 纪尧姆 - 我正好下楼，走进总理办公室，微笑殷勤地招呼着大家……- 赖因哈德，要我给你捎个三明治吗？哦，你好，霍斯特。你们走廊那边怎么样？你要三明治吗？
- 维尔克 纪尧姆先生，进入这个办公室我们必须约法三章……
- 纪尧姆 - 正当他又要把我推出来时，突然……
- 勃兰特 资本主义已面临万丈深渊！
- 维尔克 总理先生……
- 埃姆克 维利……
- 勃兰特 可这儿在做什么？轻视共产主义者。这是……？
- 埃姆克 纪尧姆先生。我们的工会联络助理。
- 勃兰特 哦，是的，脚步声的主人。
- 纪尧姆 - 他知道我是谁！
- 克雷施曼 - 他知道所有的人。政治家的伎俩。
- 勃兰特 柏林帮的又一个成员，我知道。我们柏林人必须抱作一团。在波恩他们不喜欢我们，纪尧姆先生。
- 纪尧姆 不。当柏林墙在六一年矗起时没有一个波恩人尽举手之劳。唯一为我们而奔走的人是你。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特别是我们当中来自那边的人。我们当中知道那边情形的人。—对不起。与狼共住——与狼同嗥。

勃兰特 东柏林人去国家安全部。“我的鸚鵡不见了。”安全部说：“我们不管财物失窃——我们是政治警察。”“正是如此。我要求我的声明记录在案：我不认同我的鸚鵡的政治观点。”

纪尧姆 - 他喜欢笑话。尤其是东德的笑话。—为什么安全部总是三人一组行动？一个读，一个写……

勃兰特 另一个的眼睛就盯着这两个知识分子。

克雷施曼 - 你需要一些比这新鲜的啦。

纪尧姆 - 我跟不上啊！快给我说些最新的。

勃兰特 我的讲稿。打印了吗？

维尔克 我派个信差送过来。

纪尧姆 我去！—而我来了！来取维利的讲稿！

勃兰特 纪尧姆？

埃姆克 京特·纪尧姆。

纪尧姆 - 我想我引起了他的注意！

勃兰特 他看上去像个色情书店的经理。

维尔克 事实上他曾经就是影印店的经理。

纪尧姆 总理先生……

勃兰特 谢谢你。赖因哈德，复印几份，好吗？

纪尧姆 我来吧，总理先生。

勃兰特 哦，好啊。你的专业。

纪尧姆 复印机专家。绝对可靠。

克雷施曼 - 我们的脚就这样踏入了这扇门。干得漂亮。米沙非常满意。

勃兰特 我觉得我受不了纪尧姆先生这个人。

埃姆克 维利，你让教授和政治家们围绕着不是一件好事。你需要同草根阶层保持着某种联系。你需要一些普通人在你身旁，他们能告诉你人民的想法。

勃兰特 但是，这纪尧姆先生，就是做一般的事情也殷勤得过分。霍斯特，给我换个人，好吗？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波恩这个鱼缸里，如果其中一条金鱼消失了，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们的会面将是这样，完全公开，在大家都去的饭店和酒吧里。两个老朋友一起喝一杯，让大家都看到。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传递。所有的照片或复印的文件都由你交给你的妻子。她是你的情报员。

纪尧姆 可怜的克里斯特尔。她是演出晚会的明星，不是我！

克雷施曼 她干得非常漂亮。

纪尧姆 一份在威斯巴登的黑森州总理官署的工作！还能指望比这更好吗？

克雷施曼 另一个在波恩的联邦总理办公室。

纪尧姆 天作之合，阿诺！上帝的礼物！

克雷施曼 甚至上帝也为米沙效力。

纪尧姆 你知道，这对她可是生命攸关的。

克雷施曼 只能如此，所有书面文件都交给克里斯特尔。但米沙真正要的是，所有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不诉诸文字的东西。流言蜚语。内幕新闻。政治气氛。他们的思维方式。谁入局了，谁出局了。谁在背后捅谁的刀子。复印机和照相机，那是当然的。但，首要的是，眼睛和耳朵。

纪尧姆 维利一直在说他要求政府运作程序公开化。

克雷施曼 这就是我们如何帮他之处。当然我们要了解的最重要的是……

纪尧姆 东方政策。

克雷施曼 东方政策。不放过任何点点滴滴有助于我们判断他对社会主义阵营意图的情报。他说，和解，和平。但我们能信赖他吗？在这样一场赌局中他真能不惜一切代价吗？他说“小踏步”。如何小？小到他在讲话中所指的空间，以不影响国家安危的前提和一大堆“谋求更大民主”的诚恳的老调吗？

勃兰特 - 在德国同它在西方的宿敌间建立起互信是我的前任的历史功绩。这一互信依然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石和我们国家安全的保证。但是当前世界上两大强权阵营的对立分裂了我们欧洲。它分裂了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首都，损害了我们同东德人民的关系。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和解，正如大家所知，极其困难。然而如同我们与西方的和解一样它是和平重要的前提。

克雷施曼 但当他涉及到这一点时，他是否真的愿意付出代价？他是否真的准备劝说西德人民最终正视现实而承认我们的存在？你和我？其他德国人？他愿意偿还战争的最终代价吗：四分之一的德国国土划给波兰和俄国；另外四分之一，划给我们，脱离并自由。国土的一半，将永远失去！

勃兰特 - 那些家庭被分隔的人们，那些故土被剥夺的人们，将永远忘不了他们所失去的一切，我们只能尽力去理解去尊重他们的苦难。

克雷施曼 这儿的一千二百万难民将永远不会宽恕他。任何民主政治家能一笔勾销这五分之一的人口吗？他如此小心

翼翼选择他的话语。它们的意义何在？

勃兰特 - 即便这是客观事实，德国存在着两个分离的国家。但它们相互之间也绝不是异国异邦。我们因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苦难而血肉相连。如今我们甚至有着我们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责任：我们之间的和平与欧洲的和平。我们过去曾是一个整体，这已成为历史，时光也无法倒转。我们必须争取一步步地缓和分离的痛苦。我们必须与过去的罪恶划清界限。本届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同莫斯科、同华沙、同东柏林展开直接的谈判……

克雷施曼 但我们真的能信赖他吗？

纪尧姆 你无法不信赖他。当你置身在听众之中。你仰望着他，而他站在那儿迎着你的目光回望着你。望着你个人。同你单独交谈。一个人同另一个人。

勃兰特 -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必须一心一意地与我们的邻居友好相处。与我们所有的邻居，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德国境内还是境外。我们必须最终和解。

克雷施曼 但此刻你想起了在柏林任职时期的那个他。当你想到他竭尽全力阻止西柏林与东柏林的重聚。当他喋喋不休地述说他那古老的东柏林的笑话时……他真的变了吗？或者他只是注意到西柏林的青年一代突然间反对起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世界潮流在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他私下在说什么？在办公室里。在同他自己人的谈话中。

勃兰特 （对埃姆克、维尔克和纪尧姆）但是，霍斯特，我们能信赖他们吗？当你回顾他们的记录。当你想到他们的冷战心态。如果这儿的百姓知道东德政府是如何来设

法平衡与我们的贸易赤字的，他们会怎么说？

维尔克

我看我们的话题或许是步入了非常敏感的区域。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说吧，说吧！

埃姆克

不要紧，让我们试试他嘛。试试我们的普通选民。我们街头的人。京特，由于某些奇怪的理由，这种事情是我们在东方的新朋友不想让你知道的。他们必须要有出口给我们的产品。哪一样是他们成功的产业呢？制造政治犯的产业。于是这就成了他们卖给我们的商品。他们需要抓多少政治犯就抓多少，而我们把他们赎买出来。一年一千多人，每个人头的价位是四万西德马克。哦，他们同时还让我们付钱他们放人让这些家庭团聚。所以京特，你怎么想？我们是否能信赖我们这些新朋友？

纪尧姆

- 是？不？我说什么？哪一个我应当回答？

克雷施曼

- 由你选择，京特。

纪尧姆

- 由哪一个我选择？

勃兰特

显然，一个艰难的决定。

纪尧姆

- 我的一半要这么说。我的另一半要那么说。

勃兰特

这是选民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几乎所有事物的立场。

埃姆克

我说过，维利！我们街头的人！

纪尧姆

（对克雷施曼）然而我们是否向他们出售政治犯？我们是否收费让这些家庭团聚？

克雷施曼

别在乎那些叛国者及政治异见分子。我们担心的是维利对我们人民的影响。

维尔克

（对埃姆克）他对东德的访问。

勃兰特

- 一生中令我感动的日子。

- 维尔克 从他的专列一越过边境就开始了。
- 克雷施曼 突然间他来到了我们中间。第一位踏上东德国土的西德首脑。
- 维尔克 突然间我们置身于它的围绕之中。另一个德国。我们从未承认过的德国。那不存在的德国。
- 克雷施曼 我们的人民从未见过这一情景。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西德领袖！
- 维尔克 前所未有啊！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城市与村庄——人们双手向他伸展着，人们挥舞着台布与床单。各地的武装警察们都奉命制止任何集会，但他们无能为力。
- 克雷施曼 这就是我们为何需要对维利下如此紧迫的决心。因为我们对这一切已控制不了多久。
- 维尔克 他来到爱尔福特出席高峰会议，人们冲破了围绕他下榻旅馆的警戒线。
- 克雷施曼 太可怕了，京特。
- 维尔克 “维利！维利！”他们呼喊着重。“到窗口来！”
- 克雷施曼 只有一个人能够控制他们。
- 维尔克 “维利！维利！”他们齐声叫着。“到窗口来！”他来到了窗前。
- 克雷施曼 他俯视着所有仰望的脸。
- 维尔克 他该说什么而不至于火上浇油燃起烈焰？
- 勃兰特用手做一动作。
- 维尔克 沉默。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伟大的讲话之一。一言不发。只是那小小的动作。那充满个性的小动作。
- 埃姆克 我在内阁会议上见过他这一动作。
- 维尔克 “镇静，镇静。”
- 埃姆克 维利是个调停者。

维尔克 对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的一次无声的谈话——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像普通人般在同他交谈。私下的交谈。一个小小的动作。

埃姆克 “请放心！不着急！”

维尔克 但所有人都理解到另一层含义。

埃姆克 “耐心，耐心。这一天会到来。”

克雷施曼 此处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维利的每一个词和动作都举足轻重。我们的每一个词和动作同样如此。他将同莫斯科签订条约，同华沙，同我们。但他能在联邦议院获得通过吗？

纪尧姆 超出十二票的多数。

克雷施曼 十二票，是的。但只有在联盟团结一致的前提下。对维利而言，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从而拼凑起一个政府应该没有问题，但如何挽留住他们？

魏赫纳 （对勃兰特、埃姆克和纪尧姆）议会中他们仅有三十人可争取——而这其中有一半人不惜任何代价反对东方条约。

克雷施曼 - 他就是应当发挥联盟作用的人？

纪尧姆 - 赫伯特·魏赫纳。联邦议会中维利的党的领袖。

魏赫纳 他们中有三个人肯定投向对方。根据我私下掌握的情况，他们三人即使同基督教民主党一起投弃权票也不会赞成东方条约。

克雷施曼 - 三个人被拉过去了？只要再有三个，这项条约就死在水中了。整个东方政策就会像拂晓的晨雾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魏赫纳 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还有三个犹豫不决的议员在那审视自己的良心。或者在斟酌条约的要价。

- 克雷施曼 - 你在现场？同他们在一处？
- 纪尧姆 - 他们已不再注意我。
- 克雷施曼 - 那维利怎么说？
- 纪尧姆 - 什么也没说。他没看赫伯特大叔。赫伯特大叔也没看他。久久的沉默，而大叔吸着他的烟斗颤动着他湿湿的厚下唇。
- 克雷施曼 - “赫伯特大叔。”他们当面这么叫他？
- 纪尧姆 - 他们不敢。你一旦看到那张脸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像吃了柿子。你嘴巴发干。当他在电视荧幕上出现时，德国的所有老鼠都钻到了沙发下面。
- 魏赫纳 任何傻瓜都看得清这种形势。我们曾经同基督教民主党有过极稳定的联盟。
- 埃姆克 那是勉强的合作！同一个完全拒绝与东方合作的党结成联盟！
- 魏赫纳 我们仍在学习如何治理国家。我们还在学习中。党还未能进入这个角色。而当我们稍稍增加了几席选票，就发生了什么呢？不经任何咨询讨论，我们伟大的船长砍断了纤绳，转换盟友，把我们同自由民主党绑做一处。那个党是一只漏水的旧船，正在我们眼前沉没。我们都知道这届政府还有六个月的任期。然后怎么样？新的大选？只要自由民主党在民意测验中再掉一个百分点，他们在联邦议院将全部出局。那么我们就彻底失去联盟。
- 纪尧姆 - 你看清这一切了吗？这个负责推动联盟合作的人——却反对这一联盟。
- 埃姆克 赫伯特对待我们的党就像他的一只瓷器茶杯，太珍贵了以致舍不得用它喝茶。

魏赫纳 联盟来了又去。党是长存的。联盟没有根基也没有忠诚约束。而一个党有党员和经费，职务和干部，捐献与惩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信赖纪尧姆先生的忠诚因为我们知道他献身于这个党——而且我们知道他将继续献身于党，因为他的职责建立在他的忠诚之上。如果我们议会中的任何党员小伙子们开始审视自己的良心，我将开始审查他们的档案。

纪尧姆 - 他捏着他们所有人的档案。

魏赫纳 我会让卡尔盯着他们。他们通常会知趣的。

克雷施曼 - 卡尔·特罗姆斯道夫？

纪尧姆 - 他的私人安全特工。

克雷施曼 - 绝对忠诚可靠。受过我们的训练。老牌双重特工。

魏赫纳 我们已宣告世界我们将“谋求更大民主”。不管它是何意。让我来告诫你们对于民主我的痛苦教训。你越谋求它就越得加强对它的控制。这不是我们的一号想知晓的东西。他想看到一天辛劳之后在他面前两只干净的手握合一处。但如果水管工要修理的话就得把他们的手伸到马桶里。我一刻也忘不了三十年代这个国家的民选代表政府是如何完蛋的。不稳定的联盟像肥皂泡般地一个接一个破灭了。这种局面会再一次发生。德国的议会民主仍然在襁褓阶段。没有两只强壮的腿支撑着它，它会倒向它的敌人。两条腿中的一条，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就是基督教民主党。另一条腿就是我们党。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我们渐渐地、一步一步地赢得了选民对我们的信任。而现在我们将自己的未来放在这帮日益减少的半吊子读书人的手中，对他们我们完全无法控制。自由民主党。仅仅这名字就让

我的血发冷。

克雷施曼 - 当然，魏赫纳，他自己就是一个老牌布尔什维克。没有维利，我们党怎么办？

勃兰特 (对埃姆克) 他对我成为总理一直耿耿于怀。由于政治面目的丑陋，他不便露脸，不然德国所有的老鼠会逃到窗帘箱里。因而他痛恨与他不同的人。木偶的主人嫉妒他自己的木偶。他还想要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坐在尚玻宫里，只要能把我拒之门外。一个老牌纳粹！但他知道如何在幕后操纵。真是一对。老牌布尔什维克幕后操纵。老牌纳粹在那一头起舞。

埃姆克 纪律威权，维利。那是大叔所渴望的。有人要挑战他。这就是他恨你之处，维利。你不要向他挑战。况且不管你对他有何想法，他毕竟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献给了党。

勃兰特 他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献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他还把他的同志们都奉献给了俄国秘密警察。

埃姆克 他至今还为此痛苦不堪。

勃兰特 他至今同他的东柏林的老友们亲密无间。

埃姆克 他们从未宽恕他。他们恨他。

勃兰特 但他们相互理解。

纪尧姆 - 是吗？

克雷施曼 - 当然。

埃姆克 不管怎样，他是个感情用事的老家伙，骨子里是。你当选的那个晚上他张开双臂拥抱你。

勃兰特 就像谁家未婚的姨妈欣欣然地把送信的邮差灌得酩酊大醉。

埃姆克 他走遍了全德国看望那些病卧在床和奄奄一息的党员们。

勃兰特 坐在他们床边为他们祈祷。当初他是个布尔什维克，

如今成了个宗教狂。

埃姆克 就像有时候你的一言一行也没人能听到看到罢了。

勃兰特 除了纪尧姆先生

埃姆克 噢——京特，你还在吗？

勃兰特 纪尧姆先生，大叔怎么能如此清楚人们几时死去？因为即使他到达时你还没死，他陪了你半个时辰你就死了。

埃姆克 算了，维利。这种事情他会遭报应的。

勃兰特 不过是种安乐死的合法方式。

克雷施曼 - 我认为你开始这份差使时，对维利太乐观了一点。而我是怎么说的？魏赫纳并不是他的唯一对手。

纪尧姆 - 是的。还有赫尔穆特。

施密特 (对魏赫纳)我崇拜维利。你知道我崇拜他。我一直这样。他是我的政治偶像。我愿为他赴汤蹈火。

克雷施曼 - 赫尔穆特·施密特。维利总理职务的继承人。

施密特 但他对你的态度的确荒唐。我们的多数席位的优势很快将失去。他知道没有你他无法凝聚这个党。

魏赫纳 他也知道没有他我们就无法再次当选。

施密特 我们谁也缺不了！正是我们三个人才使这个党成为执政党！你和维利，还有我。我们抛弃了党的教条僵化的理论原则。我们坚持不懈地奋斗。我们三个人团结一致。现代社会主义的三个火枪手！作为其中一员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克雷施曼 - 王储赫尔穆特。在幕后等待。

纪尧姆 - 永远在等待。他只比维利年轻五岁。除非维利被电车撞了，不然他年龄太大而无法接班。那是他的悲剧。这就是他为何这般剑拔弩张。还有他的甲状腺失调。他不能进食。他就靠冰激凌和可口可乐过日子。

- 克雷施曼 - 冰激凌、可口可乐，还指望一辆失控的电车。
- 施密特 这些日子维利好像总是在和霍斯特·埃姆克密谈。
- 魏赫纳 埃姆克先生具有一种我们其余人所缺乏的天分：他欣赏伟大人物的笑话。
- 施密特 当然，大多数笑话是关于你。你听过那个关于你和贞女玛丽的笑话吗？
- 魏赫纳 听过。谢谢你。
- 施密特 同时我还得每星期坐在内阁会议上，眼睁睁地看着维利让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从他指缝里溜走。他不予任何控制！不控制或控制不了。他声称关注国防，但对我保留国防部的预算不表示任何支持！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让卡尔·席勒给我们讲上一小时的经济学。简直就像回到了大学。维利那所有没完没了的沉默！那所有的妥协忍让！那所有的优柔寡断！避免一切对抗和冲突。（对勃兰特）那么，维利，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草案还是那个草案？我的提议还是席勒的提议？
- 勃兰特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看看我们是否能找到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
- 施密特 你没法让所有人满意，维利！因为你在管理一个政府！我们必须得作出决定。
- 勃兰特 谢谢你，赫尔穆特。我们其他同志感觉如何……？
- 魏赫纳 （对施密特）伟大的和事老。
- 施密特 对此我尊敬他，就像世上所有的人那样。只是他私下别这样。我承认我不是那种最有耐心的人。但坐在内阁会议上我明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只能看着维利在那儿浪费时间——真让血肉之躯难以忍受！
- 魏赫纳 接着突然间，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一个伟大的动作。

不吭一声能把大家促成一个新的和解。无可非议，他这绝妙的无意识动作。但是无意识动作就像民主——是需要严格控制的……要帮忙吗，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对不起。找样东西。打搅了。

施密特 不要紧，给他递个火，不用说的。递个火来。

克雷施曼 - 老牌布尔什维克和老牌魏玛军官。两人都朝思暮盼着遗忘已久的纪律威权。

纪尧姆 - 尽管他们所要的是那种可笑的纪律威权。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维利背后吹毛求疵，找岔子。

魏赫纳 (对埃姆克和纪尧姆) 根据我的消息，伟大的人昨天夜里又招待了他所有的时髦朋友。据说，在莱茵河上的乐园。

埃姆克 你应该去的。

魏赫纳 奇怪，不是嘛。我们几乎刚刚脱去这党的首脑的油膩不堪的旧布帽并夺掉它手中油污的扳手，我们的大厨就让我们全换上雪白的领带和燕尾服，从女明星的舞鞋里豪饮香槟。无怪乎他们都喜欢他。至少，所有酿香槟的酒农。所有出租晚礼服的商家。

施密特 (对维尔克和纪尧姆) 柏林人！他们没人知道钱的价值！我们每年给他们三亿马克的市政经费，他们乱花一通，好像这钱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现在更别说了，维利让他们过来接管整个政府。那就像是一群群飞过来！

维尔克 甚至飞到这儿来。工会事务，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党政事务。

维尔克 哦，没错，你已被提升了。

施密特 而维利甚至还不是个真正的柏林人。他出身于吕贝克！因此，他当然是比其他柏林人还要柏林。

- 埃姆克 (对勃兰特和纪尧姆) 关于大叔的问题非常简单。他不喜欢你而你也不喜欢他。赫尔穆特的问题则比较复杂。他爱你——而你爱不爱他。就像一个六年级学生爱上了他的老师。于是他不停地向她证明他要比她聪敏得多。
- 魏赫纳 (对施密特和纪尧姆) 霍斯特·埃姆克又和一号密谈去了。
- 施密特 他转眼成了维利的掌礼大臣。我们不久就要听他的命令了。
- 魏赫纳 他显然是占了你的位置。
- 埃姆克 (对勃兰特和纪尧姆) 维利, 对他们俩你需令他们感到安全并受到赏识。其方法是, 维利, 恕我直言, 就是暗中不露声色地塞给他们俩大笔的钱。
- 纪尧姆 - 而在地基的最阴暗处, 像老鼠般啃噬着我们整个事业的基础的是——新左派。
- 根舍 (对勃兰特、埃姆克、诺劳和纪尧姆) 这就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人们看着我们政府可他们看到了什么? 一大群来自大学的长头发的激进分子。六八年人们不喜欢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聚众闹事, 而今天人们依然不喜欢他们。
- 纪尧姆 - 根舍。内务部长。他对控制示威游行负有全权职责。
- 根舍 人们每次打开电视——日益增多的左派暴力活动。今天占领了银行, 明天谋杀法官。
- 埃姆克 那是巴德-梅霍夫! 红军组织! 跟我们的人毫无关系! 我们的人是不会用他们的拇指去按一只臭虫的。
- 根舍 左派就是左派。这是多数人所关注的。
- 勃兰特 就是这些年轻的激进派把我们推到了执政位置上。
- 埃姆克 我们将老左派推下木筏, 因为木筏不堪他们的重量而即将沉没, 而新左派一看到木筏浮出水面便一拥而上

把它又弄沉了。

根舍 然后下一条新闻是总理在东德同共产主义者搞什么爱情幽会。

埃姆克 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左派有什么关系？

根舍 左派就是左派！不管怎样，诺劳先生告诉我东柏林在积极支持恐怖分子。

诺劳 我们确信东德国家安全部为他们提供庇护及训练设施装备。我们有证据表明他们有通道向叙利亚和南也门的法塔赫基地提供援助。

纪尧姆 - 京特·诺劳。西德安全局局长……我们是否支持恐怖分子？

克雷施曼 - 诺劳先生，我们的又一个叛逃者。西德官方钦定的安全局长。出逃时涉嫌谋杀。

诺劳 我深信我们眼下同东德的谈判并未减少东德国家安全部对我们实施的特工情报活动。根据我们的情报，东柏林眼下大约有一千多名特工在我们这边活跃着。

克雷施曼 - 一动也别动，京特！

纪尧姆 - 他们已经忘了我。我是立在角落里的衣帽架。

诺劳 可以肯定，就在此刻，近几百名东德特工正在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内活动……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机密会晤。

埃姆克 纪尧姆先生。在楼上工作。我们中的一员。痛恨左派。

勃兰特 不管怎样，毫无疑问我们在那边也有同样的安排。为什么不呢？我们都说着同一种语言。我看整个德国，东德和西德，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宫殿。

根舍 总理先生，我们必须更严肃地落实安全保卫措施。再出一桩间谍丑闻会使这个政府完蛋。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会的，京特，会的。切记，躲在那些衣帽后面，

一动也别动。

纪尧姆 实际上，使这个政府完蛋的可能就是根舍。

克雷施曼 根舍？

纪尧姆 自由民主党。

克雷施曼 特别温和的一个。

纪尧姆 自由民主党中某些较为激烈的成员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要推他为党的领袖。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弃维利而与基督教民主党结成联盟。

魏赫纳 (对诺劳和纪尧姆) 外交部。这是他预期的报偿。这是他看中的目标，然而他知道维利是决不会让他沾边的。出访巴黎与纽约。每次走下飞机后的新闻采访。如果他在电视上频频出现的话，他相信一些细心观察的选民会开始注意到他的存在。

纪尧姆 - 魏赫纳和诺劳。

克雷施曼 - 他们总是亲密无间。当然，两人都来自德累斯顿。

魏赫纳 那么，自由民主党党内怎么说。根舍先生将取而代之呢还是维持现状？

诺劳 我不知道。我不是自由民主党党员。

魏赫纳 他是你的部长。

诺劳 你要我监视我的部长？

魏赫纳 那又怎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不让维利知道。手脚干得利索！不要忘了，你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官员——你还是一个党员。你有责任捍卫党的利益。你发现任何情况，关于根舍或其他任何人——让我知道。我们必须密切合作，你和我。两个淳朴的撒克逊人要在这一满世界的刚愎自用的巴伐利亚人和狡猾阴险的莱茵兰人中活下来。树林里两个来自德累斯顿的婴儿，

被潜藏在荆棘丛中的来自柏林的群狼包围着。

诺劳 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魏赫纳 那你随时向我汇报。

诺劳 我一直这样做。

魏赫纳 第一次。是吗？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 京特, 西德! 联邦共和国! 并非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政体——十一个独立的民主实体合并为一个联邦, 就像一窝雪貂装人一个口袋里! 十一个独立的议会同时在发言, 而在波恩的联邦议会试图让它的声音压到它们! 三个政党, 彼此上床下床就像喝醉了的读书人, 光是波恩就有十五个冲突不断的内阁部长, 就别说还有六千万个独立的自我。都在相互达成协议又背弃协议。都每时每刻四处张望着窥探别人的脸色。都试图猜想别人下一步怎么走。都在为自己谋求, 都得靠着别人。不是一个德国。六千万个独立的德国。巴别通天塔! 不是椽木间的一只报时虫, 是屋内所有木梁里的报时虫。我们东德有我们的缺陷, 上帝知道我们有。但至少我们说话的口径一致。我们唱着同一支歌。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最终当这整个房屋结构行将坍塌时, 我们将依然持续着。

诺劳 (对魏赫纳) 有一件事你或许感兴趣……

纪尧姆 - 这会儿诺劳又去见魏赫纳了。还是关于根舍?

克雷施曼 - 别管他了, 京特! 不能跑两趟!

纪尧姆 - 衣帽架。没人会注意的。

克雷施曼 - 衣帽架总是进房间会使他们注意的。

诺劳 安全局在寻找一个潜伏者。有人潜入到我们党内。我想你或许希望亲自作些暗中的调查。

- 魏赫纳 潜伏者？我们掌握了他什么情况？
- 诺劳 不多。他的潜入至少在十二年前。那时我们曾窃听到一个发给他的无线电信号。结尾是对他个人的问候。祝贺他的生日以及他的次子的出生。
- 魏赫纳 两个儿子？这就是我们掌握的一切？
- 诺劳 他的姓名以字母 G 开头。
- 纪尧姆 - 不必担忧，阿诺！天空是晴朗的！
- 克雷施曼 - 晴朗的天空——这正是晴天霹雳突然发作之时。
- 埃姆克 （对纪尧姆）对不起，京特，我能和你私下说个事吗？
- 克雷施曼 - 我早知道！
- 纪尧姆 - 别急。镇静。
- 埃姆克 下周在萨尔布吕肯举行党的会议。我为总理成立了一个临时办公室。由你负责。有没有问题？
- 纪尧姆 当然没有。任何工作。我都乐意。
- 埃姆克 我担心，人手会短缺——你必须注意与安全保卫机构的协调联络。我很抱歉。
- 纪尧姆 不要紧——我一直暗中留意安全保卫。- 你看到吗？只要往那可怜的旧衣帽架上再扔顶帽子。
- 克雷施曼 - 难以置信。只是这让我更紧张了。
- 埃姆克 可也有安慰奖，京特。埃贡·巴尔将去莫斯科谈判。你可以用他的公务车和司机。
-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看来在某处总要出什么事。
- 纪尧姆 别担心！维利已签订了第一个条约。
- 克雷施曼 可来我们这儿之前他还得去波兰。
- 纪尧姆 苏联是最难对付的。它是打开其余一切大门的关键。
- 克雷施曼 还未获正式批准呢。他的多数已降到四票了。而一旦由于任何原因我们失去维利，一辆电车……公共汽

车……一场雷击……一桩什么丑闻……比如，他的私人生活。所有他那些女人……

纪尧姆 秘书们，记者们。如今这没什么了不起，我给你名单。

克雷施曼 但，这如果传出去……

纪尧姆 大家都知道！

克雷施曼 但都不说。

纪尧姆 我们不会提这事。对吗？

克雷施曼 我们不会。我们要帮他站稳了。而一旦维利失去光彩，魏赫纳会像拔掉一颗坏牙般除掉他。哪怕是半点机会，都是他和赫尔穆特梦寐以求的……

勃兰特 （对施密特、维尔克、埃姆克、纪尧姆和鲍霍斯）乌里！

鲍霍斯 总理？

勃兰特 酒瓶，杯子！

克雷施曼 - 喝酒。他没再开始喝酒？

纪尧姆 - 这会儿不是酒。只是葡萄酒。他们都喝。成桶地喝。但只是葡萄酒，总是葡萄酒。而且由于什么原因，总是红葡萄酒。

克雷施曼 - 他们社会主义的最后的痕迹。

纪尧姆 - 工作一天结束时，他们人人举着酒杯聚在一起。松弛自己。忘记了他们的分歧。甚至赫尔穆特。甚至魏赫纳。而一二个小时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所有问题都抛到了脑后。一张张昂起的脸围成一圈，而一直倾听着的维利最后开口了。

勃兰特 1945年。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在断墙瓦砾中。那我们从何开始重建呢？瓦砾。我们只有瓦砾。一队队妇女们耐心地把能用的砖头一块一块拣出来。手接手地传递、搬运，洗净，存放好这些砖头……如今谁又知道

哪些高楼大厦的墙基用这些砖头砌成？各地秘密警察的地下室……奴工们受尽折磨而死亡的工厂……人们把砖头洗得那么干净，用它们，我们建起了我们平实质朴的城市，今天我们居住着。人民也是一样。靠那些人我们重建起这破碎的社会？他们有的是集中营和监狱的幸存者。有的是流放者。但绝大多数是帝国的普通公民。他们是我们的建筑材料。除了他们，我们一无所有。靠他们我们建立起平实质朴的社会机构，今天我们共享着。现在我们面对着什么？两个德国，犹如古老破碎的石墙断裂了。而就是这材料，我们必须用它建立起一个我们明天赖以生存的世界。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材料——两个德国，这恰是它们的实际存在。怀疑与戒备困扰着双方。如果我们要想让我们建起的大厦矗立下去，我们就得确信这一脆弱的建筑经得起我们施加的重量。我们就得想方设法让怀疑与恐惧的双方来接受我们今天的行动。

施密特 维利的梦。没有冲突的生活。

勃兰特 冲突解决了。

施密特 势不两立者和解了。

勃兰特 即使在我们自己党内也有势不两立者。

埃姆克 这真是一个沉重的思考。

勃兰特 今夜留给大家的还有一个更沉重的思考，绅士们，当你们回到你们亲爱的妻子与孩子的身旁，如果你们仍然还能记得他们生活在何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压迫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是另一种方式……请你清理一下书桌，乌里。你的工作。

纪尧姆 （对鲍霍斯）我来帮你。

施密特 是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生活在哪儿呢……？

勃兰特 东柏林人派了一位政府官员去考察死亡的资本主义。他去了伦敦，他去了巴黎，他去了纽约。回到东柏林后，他说：“那是一个美丽的死亡。”

维尔克 他没有去波恩，我发觉……

维尔克和施密特下。

魏赫纳 我在想当一号把鲍霍斯先生被当作男仆和杂工时，他是否问过他的感受。

勃兰特 乌里？

埃姆克 他是你的卫士，维利。

勃兰特 晚上这个时候没人会向我开枪。

鲍霍斯 如果没有别的事，总理……

勃兰特 妻子和孩子，乌里。

鲍霍斯 我在车里等你。（下）

埃姆克 维利，他有妻子和孩子吗？

魏赫纳 他多半记不起来了。

埃姆克 或者京特。他呢？你不知道，是吗，维利。你从来没有和他谈过。

勃兰特 我要求过你把纪尧姆先生调走。

埃姆克 和他谈谈，维利。他热爱你。大厅中那所有崇拜的仰望着你的脸——他是其中一个。和他谈谈。了解他们在那儿想什么。

勃兰特 他总让我想起柏林特产：肥油煎肉丸。非常难吃非常油腻。

魏赫纳 （对纪尧姆）妻子和孩子，没错……格拉伯特。G。格拉伯特倒是符合的。霍斯特·格拉伯特。他是个有家的人？纪尧姆先生，你知道大家的情况。霍斯特·格

拉伯特有孩子吗？

纪尧姆 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怎么啦？

魏赫纳 随便问问。只是想了解一下同事们的生活情况。那高斯先生呢？

纪尧姆 京特·高斯？一个女儿。

魏赫纳 一个女儿？那或许省事些，不像有两个儿子……（下）

埃姆克 （对勃兰特）和他谈谈！

克雷施曼 - 现在你和他单独一起了。

勃兰特 不回家看妻子，纪尧姆先生？没有孩子？

纪尧姆 多谢，总理先生，我等你结束工作。晚上要锁好东西。

勃兰特 但我以为你还想找时间讨好一下那两个秘书呢。

纪尧姆 哦……只是想表示友好……

勃兰特 从法兰克福党组织来？

纪尧姆 我？是的，我来自那儿。

勃兰特 知道这个人吗？他竞选你们那儿的党代表。

纪尧姆 共产党人。

勃兰特 谢谢。我想知道……

纪尧姆 妻子，没错。我有妻子。你刚才问过。

勃兰特 跟你做着一样的工作，是吗？

纪尧姆 她从威斯巴登调来。我们总算在波恩找到一套公寓……
总理先生，你知道吗？你和我在这点上有着共同之处。你有一个儿子叫皮特——我有一个儿子叫皮埃尔。都是十四岁。但政治观点却有所不同。我知道你的皮特是个热情的左派。你每次打开报纸——又是他，又和他的一帮哥们儿上了大街，抗议他老爸的政府。你一定感到非常……非常地为他自豪……而我的皮埃尔则是你狂热的崇拜者。满屋子贴满了“请选维利”的广告。

勃兰特 现在睡了吧。你见不到他。

纪尧姆 星期天吧。星期天我设法陪着他。我们星期天早晨的常规是一跳上汽车开到机场去取报纸。绕着机场一起兜风。聊天。我不知道谈些什么。看飞机起飞。想像我们就在其中一架飞机上。凌空而起穿过云层，飞进灿烂的阳光。我们去哪儿？不知道。那温暖的地方。那天空碧蓝生活淳朴的地方。

勃兰特 午夜，一个十分不同的纪尧姆先生开始出现了。这一个，带着浪漫的情调。

纪尧姆 总理先生，我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点。

勃兰特 那，每个星期天早晨。你和皮埃尔。

纪尧姆 那是我的生活。星期天的早晨。和皮埃尔一块儿去拿报纸。

克雷施曼 - 你喜欢上他了，像别人一样？

纪尧姆 - 他倾听！那是他的手段。他倾听别人说话。不管怎样，如果你不爱上他们又怎么能了解他们的心？而突然间，不知为何，我听到我自己的说话声。- 总理先生，你曾经问过我你能否信任他们。东德人……

勃兰特 我记得，你陷在两种思想之中。

纪尧姆 - 午夜，没有别人只有他和我，静静地交谈着……- 我们必须相互信赖，总理先生。我们的生活中别无他法。

勃兰特 谢谢你。

纪尧姆 - 可以吗？

克雷施曼 - 只要你能搞定。

纪尧姆 - 我信任他。而他也信任我。然而两天之后……事情完了。

克雷施曼 - 完了？什么完了？

纪尧姆 - 所有一切！整个方案！整个行动！

- 埃姆克 (对维尔克和纪尧姆) 我们出局了! 我们完了! 我们没有任何获胜的手段! 没有任何有把握的行动, 我们自己的五个人将要变节!
- 维尔克 我相信其中一个又被魏赫纳先生拉了回来。
- 埃姆克 那我们还是会输掉。维利出局了。我们都出局了。巴泽尔将上台。基督教民主党将上台。
- 纪尧姆 东方政策出局了。
- 埃姆克 这是一场肮脏的政治程序上的小把戏。在整个德国土地上, 人们都走上了大街。
- 施密特 (对魏赫纳和纪尧姆) 这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事件。你建立了一个联盟, 而它像一个鸡蛋立在一根台球杆的顶端, 于是这个鸡蛋迟早会在地毯上摔得粉碎。现在你我之间谁也不希望提醒维利这件事, 但私下我不得不对你说这正是你我确切无误的预见。我在想你袖子里是否还揣着一两张牌?
- 魏赫纳 所有人都等着善良的赫伯特大叔拿出他的党内手腕来。即便是一号。既然由我来变戏法。既然他无须看到暗中的弹簧和杠杆。
- 纪尧姆 - 我自然不必告诉我的头儿们该做什么。但你说过, 米沙要我行使我的政治判断, 对吗? 我对人类心理学的理解? 对吗? 我就给你一个词。
- 施密特 钱?
- 纪尧姆 - 钱。
- 魏赫纳 他们是那样称呼它吗?
- 纪尧姆 - 脆生生的西德马克。
- 施密特 你只要买通那弃权票中的两到三票。
- 纪尧姆 - 从他们将近二百五十人中挑选。

克雷施曼 - 京特，你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

纪尧姆 - 但为什么不呢？米沙先前就干过。错在哪里？我们买，我们卖。卖政治犯——买政治家。有啥区别？

克雷施曼 - 在此处十六年的生涯。

纪尧姆 - 我们卖不卖政治犯？

魏赫纳 干得利索。一个声称代表这个国家产业工人的人。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情结。

埃姆克 （对施密特、魏赫纳、维尔克、诺劳、根舍、纪尧姆和鲍霍斯）我开始销毁文件了。我要求在巴泽尔搬进尚玻宫之前将我们所有的档案文件都撤出办公室。

维尔克 那人已经把时间表发给我们了。14:00 选举揭晓……

施密特 那太晚了，太晚了。怎么回事？什么给耽误了？

维尔克 15:00 他被任命总理。16:00 宣誓就职。17:00 搬入尚玻宫。

埃姆克 （对纪尧姆）给，京特——拿住。炸药。搬动时闭上眼睛。

根舍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诺劳 我们输了。

魏赫纳 等等。

诺劳 我碰巧知道。

魏赫纳 等等，等等。

诺劳 我的消息来源……

施密特 看着维利。

根舍 在断头台上。

施密特 镇静得像个国王。

埃姆克 好了，好了。

纪尧姆 他们把人从医院里拖了出来！

根舍 可怜的老古腾堡看上去只剩一口气了。

诺劳 他是……

埃姆克 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

施密特 看，看！塞浦·沃尔克！他在打手势！

维尔克 二！二！他在说二！

埃姆克 他们到底赢了！

诺劳 我告诉过你。

施密特 两票之差！

魏赫纳 等等，等等。

施密特 两票之差他们扳倒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

维尔克 看着维利。

埃姆克 他在微笑……

纪尧姆 （对克雷施曼）而整个党疯狂了！不是输了两票——而是赢了两票！这帮杂种这么得意，以为稳操胜券了！他们把时间表都排好了！四点钟宣誓就职！五点钟搬进尚玻宫！我们以为他们赢了！销毁了一半文件档案！接着塞普·沃尔克跑了出来。二，二，他做着手势。哦不……！

克雷施曼 好了……祝贺你。

纪尧姆 别在乎足球了！试试议会民主吧！对不起。与狼同嚎。

克雷施曼 与他们同嚎？还是与他们同猎？

纪尧姆 与他们同猎，与他们同吃。与他们同笑，与他们同哭。别无他法，如果你是半人半狼。

克雷施曼 你不会忘记你的半个人吧？

纪尧姆 不用担心。我将继续是那个侍奉两个主子的完美的仆人。米沙和维利。维利和米沙。我的两个伟大的主人。但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这事花了多少钱？

克雷施曼 你又噤了，京特。

纪尧姆 抱歉。只要米沙快乐。我别无他求。

克雷施曼 还有维利。

纪尧姆 还有维利。

克雷施曼 那，回去工作吧。

维尔克 （对施密特、魏赫纳和纪尧姆）总理呢？身体欠安吧，纪尧姆先生。

施密特 他又发烧感冒了。

魏赫纳 应该是技术意义上的。

施密特 医生怀疑这一次是应届大选的前景所致。

魏赫纳 现在医生正陪着他。

维尔克 埃姆克博士。

施密特 开了常规药物。

魏赫纳 正用瓶塞钻开药瓶呢。

施密特 那你只能坐下来等。我们都在这着急地等着他好转，依照过去的经验，我们或许还得等相当的时间。

纪尧姆 应届大选？

施密特 谁知道？

魏赫纳 问一号。

施密特 排队吧。

维尔克 必须赢得新的大选。我们在议会中失去了我们的多数席位。我们连预算都通不过。

纪尧姆 我们的选票会增长的。

施密特 但是自由民主党的选票会下降。会降到五个百分点线下。会整个消失。

魏赫纳 而这拙劣的联盟也会随之而去。

纪尧姆 所以总理感到……

- 施密特 病了，只要想想，显而易见的。
- 魏赫纳 得有什么人给他一瓶别的药。
- 维尔克 我想那该是我。
- 施密特 我想我们的小朋友已经上路了。
- 埃姆克 (对勃兰特和纪尧姆)好了，维利。你是总理。记得吗？你得登高望远。
- 纪尧姆 大选候选人：“如果我们获胜了你们将有一所新的医院，一所新的学校，大河上将横跨一座新的大桥！”人群中的声音：“我们还没有一条大河。”候选人：“你们将有一条大河……！”
- 勃兰特 我无法面对他们，霍斯特。他们看着我，我看到了他们眼中永恒的疑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你？”
- 埃姆克 他们知道这答案。因为你就是你这样一个人。
- 勃兰特 谁都是那样。
- 埃姆克 那个人做了你所做的一切。
- 勃兰特 做了就是做了。
- 埃姆克 那个人将要做你要做的一切。
- 勃兰特 尽管所有的一切，他们希望我是他们希望的人。他们希望我成为他们希望造就的人。他们知道迟早他们会发现我不是那样的人。
- 埃姆克 站得高些，维利。
- 勃兰特 所有那些期待的脸庞凝视着我。当我俯视着他们我总是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希望，同样显露出的失望。
- 克雷施曼 - 震惊吗？
- 纪尧姆 - 惊奇。过去从未见到他会如此沮丧。
- 克雷施曼 - 幻想破灭了？

纪尧姆 - 疑虑消除了。

勃兰特 而我总想到每次选举后出现的逆转，对于我的不合法性的轻蔑，对我是个叛国者的讥讽。战争期间我在做什么，当他们其余人都被困禁在葬尸所内时我在斯堪的纳维亚吃着精美的自助餐？我双手干干净净地回到祖国！这才是他们无法容忍的。

埃姆克 维利，他们贬损的是他们自己，不是你。

勃兰特 我想现在已经到了我该下台的时候。

施密特 （对维尔克、魏赫纳和纪尧姆）辞职？

纪尧姆 正在说呢。

魏赫纳 当然。

施密特 尽管，只是说起。说起就是一个好的迹象。

魏赫纳 我得承认，我有些同情他。为了我的流亡他们曾整得我死去活来。

施密特 你是个布尔什维克。你的手是脏的。你和我们其余人一样是伟大的德国历史列车残骸的一部分。甚至我们从柏林来到这儿的快乐的朋友们，毫无疑问。什么，纪尧姆先生，战争结束时十七岁？

纪尧姆 十八岁。

施密特 希特勒青年党？童子军？

纪尧姆 当然。反空袭。跟你一样。

魏赫纳 我们所有人都在列车上，除了那伟大的人自己。

施密特 而他在挪威的船上：

魏赫纳 他每夜离开这儿又回归为一个挪威人。德国总理——可他同妻子和孩子说挪威语。

施密特 他在 1945 年回国时穿着挪威军服。

魏赫纳 当他的那些可爱的柏林人像猪一般在灰土中搜寻废铜

烂铁时，这伟大的人在哪儿？和占领军同坐一桌，用抢掠来的银器和瓷器餐具享用着美食。他的双手一如既往，干净得很。

施密特 这就是维利惊人的力量所在。他几乎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不太理解我们所有人所理解的。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你自己看上去似乎要服用一到两匙的红色药物了。

纪尧姆 他们把卡尔·希勒挤出经济部和金融部。逼得他辞职。赫尔穆特接管了这两个部。

克雷施曼 向王座接近了一步。

纪尧姆 家里的事情也有点麻烦。

克雷施曼 克里斯特尔？

纪尧姆 沉默。流泪。

克雷施曼 非常遗憾。

纪尧姆 她似乎一直独立地在做些情报工作。

克雷施曼 是文件往来吗？

纪尧姆 诸如此类。

克雷施曼 你是否告诉她这纯粹是职业？

纪尧姆 等等，等等。就是这个职业使我们俩之间终结了。她想家了，阿诺。你从来没体验过一种突如其来的想返回到家乡的渴望？

克雷施曼 当然有过。

纪尧姆 它总出现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

克雷施曼 那些颇为昏暗的街道。那宁静的沉闷。

纪尧姆 那朴素简单。

克雷施曼 我们曾秘密地把你召回过几次。

纪尧姆 恍如一个回归的幽灵。宣誓保持沉默和隐匿。窃听着

我自身的缺席。

克雷施曼 这证明了西德也并非是我们那么多东德同胞梦中的天堂。

纪尧姆 她要离婚，阿诺。

克雷施曼 她离不了。米沙不会答应她。我们需要你们作为一对夫妇。而且为皮埃尔着想吧。

纪尧姆 我一直想着他。

克雷施曼 你们一起在机场的星期天的早晨。

纪尧姆 甚至那也只是去投信的掩护。

克雷施曼 每个钱币都有它的两面。

纪尧姆 如果我被捕……

克雷施曼 你怎么会呢？

纪尧姆 阿诺，这已无法继续！不可能永远！而当他们逮捕我时他们也会逮捕克里斯特尔。

克雷施曼 皮埃尔会受到照料的。我向你保证。

纪尧姆 他才十五岁。他不会理解的。

克雷施曼 一切都会向他解释的。

纪尧姆 夜间我有时会醒来，一阵致命的恐惧在我全身游走。

克雷施曼 你和维利。你们就像那结合了四十年的老夫妻。他落难你也落难。他重新崛起而……

埃姆克 （对纪尧姆）京特！临睡前读一下！

纪尧姆 火车时刻表？

埃姆克 十一月份大选。维利将乘坐他的专列在各地竞选。

纪尧姆 火车？火车的安排事务是他的私人助理的职责。皮特·罗伊申巴赫。

埃姆克 竞选期间，你将担任这一职务。

纪尧姆 作为维利的……私人助理？

埃姆克 恐怕会很辛苦。火车、档案、他的公文包，所有来往

信件——所有事务。很抱歉，但必须有人做，于是——由你来干。

克雷施曼 - 掐我一下，好吗？

纪尧姆 (对勃兰特) - 现在一切都变了。在这段日子里这豪华而轻轻晃动的数节车厢就成了我们的家。车厢由紫檀木、柚木、胡桃木、红木和樱桃木装饰而成，当年它们载着帝国元帅戈林游遍了纳粹帝国。今天它们又带着维利去走访德国的选民去争取他们的选票。

勃兰特 亲爱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还要告诉我们全体人民：鼓起勇气展示我们的同情心。

纪尧姆 - 同情。这是这次大选党的口号。但他所到之处在演讲台上留下了一个更简单的口信：维利！

勃兰特 同情那些在你身旁的人！也同情那些不在你身旁的人！

纪尧姆 - “维利必须连任总理！维利！维利！”而永远站在维利身边在他的背影中的是——京特。时间表的主人——主诵圣经的祭司。巡游小朝廷的总管。总理的私人贴身男仆。为总理拎着公文包的随从。

勃兰特 这是何处？

纪尧姆 总理，这是贝恩堡。- “总理”，你注意，不是“总理先生”。不是在车上。这称呼是跟乌里学的。

勃兰特 我们到达希尔德斯海姆是……？

纪尧姆 12:07 市政厅握手七分钟——会见市长十分钟——市登记处会见新郎新娘三分钟……

勃兰特 纪尧姆先生，这儿我感觉是在家里。在奔波中。我流亡了十四年。十四年颠沛流离为了事业为了躲避纳粹。挪威、瑞典。西班牙、法国。然后将近二十年在柏林和波恩之间来回。在全世界来来去去，告诉每一个人“柏

林，柏林”。我生命中的三四十年，是从车窗和机舱里
注视着异乡的土地和生命。

纪尧姆 市政厅演讲……失业率数字……联邦的投资……地方
趣闻……

勃兰特 车上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没有大叔对我吸着烟斗。
没有赫尔穆特对我喋喋不休。

纪尧姆 - 没有维尔克把我同维利分开。没有埃姆克让人聆听他的
故事。

勃兰特 没有妻子。没有家庭。

纪尧姆 - 只有我。熨好他的西装。搭配好衬衫和领带。往返于
电报车厢传递电文。

勃兰特 这两份是急件。这一份是密件。

纪尧姆 我要将信件译成密码。在传递中不知道谁会看到这些
东西。他所有对外部世界的联系都经过我的手。游侠
骑士和他的忠实侍从。行旅魔术师和熟知他一切诀窍
的助手。他看到的一切——我也看到了。

勃兰特 这另外世界的一切！工业区里那小工厂，我也可以在那
儿劳作……而它已经不在在了……那村里街道上驼背
的老人，转身抬眼望着疾驶而去的列车……那也可以
是我而不是他……我可以坐在高速公路上那银色的
奔驰车中，一同消失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们停
车了。

纪尧姆 北施泰门。三分钟。在窗口讲几句话。——看他们来了，
北施泰门的好人们。

勃兰特 那房子不坏。

纪尧姆 - 在诺特海姆和弗雷登以及阿尔费尔德，我们看到同样
恭敬本分的支持者们向我们挥手微笑着。

- 勃兰特 亲爱的朋友们！鼓起勇气展示我们的同情……
- 纪尧姆 - 这一次他把他的眼光投在哪个女人身上？是站在前面双唇微微张开凝视着他的那个？还是站在那儿正奇怪、神秘地似笑非笑着的那个？或者同时看着她们？或看着她们所有人？她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看着她，唯独看着她一个……
- 勃兰特 我看到你了，纪尧姆先生。眼睛盯着姑娘们。
- 纪尧姆 那个女人怎么样，总理？
- 勃兰特 她们看你的那种样子……她们直直地看着你的眼睛，而你也直直地看着她们。那样子你无法理解她们。那样子你能够理解她们。
- 纪尧姆 她们微笑的样子。
- 勃兰特 她们严肃地看着你的样子。她们寻你开心的样子。
- 纪尧姆 她们与男人不同的样子。
- 勃兰特 她们就是那样子。她们摸你的手的样子。她们摸你的脸的样子。她们触摸你皮肤的那种柔软。你触摸她们的那种柔软……你能和各种不同的人交往。你生活中可能有的各种不同方式……
- 纪尧姆 - 但她们已经与我们失之交臂。所有那甜蜜的可能——永远消失了……而当夜晚来临……
- 勃兰特 乌里！你在哪里？
- 鲍霍斯 总理。（递过葡萄酒）红酒还是红葡萄酒？
- 纪尧姆 - 他放松地谈起话来，就像在波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那样。但现在这儿没有赫伯特大叔，没有王位继承人赫尔穆特，没有忠心耿耿的埃姆克。只有旅行团的记者。只有乌里。而有时候——只有我。没有任何人。一张仰望的脸，向所有其他人那样。

勃兰特 我一直想回忆起我在吕贝克长大时我知道的一个男孩。奇怪的小伙子。总是十分认真严肃。生活中没多少快乐。总是吃不饱。没钱、没朋友、没父亲，几乎没母亲，因而，是祖父母把他养大……

纪尧姆 而这男孩就叫赫伯特·弗拉姆？

勃兰特 赫伯特·弗拉姆。这名字和他的人一样怪怪的……然后有一天，在他十九岁那年，他突然在地球上消失了。他离开吕贝克去德累斯顿，但却永远不见了。哦，那是1933年，我那蓄着一撮小胡子的前任还刚刚就职。当时人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踪是家常便饭。作为一个左派党的成员，那日子不好过，就像赫伯特·弗拉姆。特别是去参加每年一度的党的会议那就难了。只有赫伯特·弗拉姆身上的一件东西到了德累斯顿。他以前的学生帽。但这帽子现在戴在一个年轻人的头上，一个过去谁也没见过或听说过的年轻人。

纪尧姆 维利·勃兰特。

勃兰特 这是所有关于赫伯特·弗拉姆最奇怪的事情。事实上我就是他，而他就是我。作为他，是什么样子？我回首望去，所有那岁月消隐在一片沉甸甸的灰色纱幔中，就像在吕贝克水岸边冬日清晨的大雾中。当维利·勃兰特接过他的学生帽顶替他时，他有了什么变化？有时，我瞥到他一眼。从车窗望出去。在等候的人群中。一个严肃的男孩，仰望着我，用他那沉思的目光。他怎么看待我？但他转过身去，走向了另一种我永远无法寻觅的生活……你有父亲吗，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咖啡馆的钢琴师。

勃兰特 一个体面的职业。

- 纪尧姆 他也是个纳粹。当他战后回家发现我母亲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时，他就从窗户里跳了出去。那是扇很高的窗户。
- 勃兰特 两个没有父亲的男孩，浪游在世上在寻找……我们在寻找什么？
- 纪尧姆 我不知道，总理。女人？
- 勃兰特 京特！我震撼了！
- 纪尧姆 - 然而，“京特”！“京特”！
- 鲍霍斯 对不起，总理……
- 勃兰特 怎么啦，乌里？
- 鲍霍斯 记者中有一位有点不耐烦了。说你答应过在我们到达卡塞尔之前做一个访谈。
- 勃兰特 我和京特在谈话。告诉他我明天做。
- 鲍霍斯 是她。
- 勃兰特 她？哦，是的。她。那好……我想我们还是不能得罪新闻界。
- 纪尧姆 我可以坐在车厢的那一边，总理，如果你需要我。
- 勃兰特 我想我自己能对付报社对我的采访，谢谢你，京特。那她……
- 鲍霍斯 在你的车厢里。我把文件从床上搬开了。
- 勃兰特 我们到达卡塞尔是……？
- 纪尧姆 还有四十五分钟。但，先到维岑豪森。
- 勃兰特 要在窗口讲话？
- 纪尧姆 还有……上衣和领带，总理！
- 勃兰特 裤子呢？
- 纪尧姆 当然。（对鲍霍斯）这条，好看吗？
- 鲍霍斯 我不知道。

纪尧姆 你搜她时眼睛闭了吗？

鲍霍斯 你觉得这一切很有趣。

纪尧姆 你肯定对她作了仔细的全身搜查？

鲍霍斯 我觉得这太恶心了。

纪尧姆 我理解。恶心的差事。

鲍霍斯 我有妻子和孩子。

纪尧姆 他也有妻子和孩子。

鲍霍斯 哦，真的？

纪尧姆 总之我们要知道她是否被窃听？甚至是否是他们派来的？

鲍霍斯 他们那儿是过不来的。

纪尧姆 - 她不是我们的人，是吗？

克雷施曼 - 女人，不归我这个部门。我要高兴地说。

纪尧姆 或者巴德-梅因霍夫。枪藏在内裤里。耳朵贴墙上听着，
乌里！

鲍霍斯 注意进去的时间，注意出来的时间。这是我的全部职责。

纪尧姆 那，把公文包拿到我包厢里去。还有，乌里……把任何要采访的年轻女人们带到我那儿——不管白天夜里任何时候——我的包厢就在总理隔壁。于是我们继续前行。一程又一程，一周又一周。基尔、卡尔斯鲁厄……不来梅、布伦瑞克……

勃兰特 亲爱的朋友们。鼓起勇气……

纪尧姆 - 所有地方，随着竞选活动的继续，那些仰望的脸更喜气洋洋，那些伸出的手更渴望着触摸他。维利在他们中间走过像一个救世主。微笑，微笑……交谈，交谈……

勃兰特 展示同情心的勇气……

纪尧姆 - 而不变的是，在他身后的不显眼处，跟随着他忠实的仆人，他忠诚的朋友。

- 勃兰特 关爱你们邻居的勇气……
- 纪尧姆 - 他要求霍斯特·埃姆克把我调离。我发现了那备忘录。他说，我的个性是造成他焦虑的原因之一。我很伤心。那是自然的。但我把它置之脑后。那是他焦虑时的说法。我把它全忘了。霍斯特也一样，从目光中——因为现在的我们，总理和我，依然在一起，比以往更亲密。
- 勃兰特 发现你真正自我的勇气……
- 纪尧姆 - 维利和京特。这高贵的英雄和他滑稽的仆人。堂·吉诃德和他的桑丘·潘查。一次又一次他凝视着那些仰望的脸。一次又一次他讲演着，直到他的喉咙嘶哑。
- 勃兰特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
- 纪尧姆 - 有的老年妇女流泪了，把护身符和念珠塞到他手中祈求他得到保佑。而对年轻的女人们……
- 鲍霍斯 (对纪尧姆) 看她们在那儿！比摇滚音乐会还糟糕！你要我怎么对付这帮乌合之众？只要他一露脸她们就会向他冲过来的。
- 纪尧姆 我会帮你，乌里。她们过不了我们！要不，只放一两个长得特别漂亮的。
- 鲍霍斯 假若她们是你的女儿呢？
- 纪尧姆 我们是公仆，乌里。我们只能尊重选民的希望。
- 克雷施曼 -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查？还是唐·璜和莱泼雷罗？
- 纪尧姆 - 你听上去几乎和乌里一样的酸溜溜。
- 克雷施曼 - 自由社会，京特。及时行乐吧。
- 纪尧姆 (对勃兰特) - 她们皮肤的柔滑，她们眼中的火花，或她们心底的温暖，所有那些年的沧桑岁月在吕贝克的迷雾中该忘却了……不？不，好吧。只是个念头。忘了它。他还是个小伙子，仅此而已。我们俩都是小伙子。

两个逍遥自在的家伙。两个离开妻子在行旅途中的推销员。但我们必须卖的是什么产品啊！维利·勃兰特，欧洲的拯救者，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有诺贝尔和平奖为证。莫斯科条约——签订并通过了。华沙条约——签订并通过了。是的，在华沙，他赢得了不朽的声望。他给整个世界的记忆留下了一幕难以磨灭的印象，人们将永远无法忘怀……

- 埃姆克 - 他另一次无言的演讲，最伟大的一次。
- 纪尧姆 - 他将代表政府的花圈放在华沙犹太区的犹太死亡纪念碑前。他退了一步。然后……
- 施密特 - 还有什么。他还有什么要做……
- 纪尧姆 - 此刻时间又一次屏住了它的呼吸。世界又一次将在我们的眼前转变。而无法料想的……

勃兰特跪了下去。

- 纪尧姆 - 此刻我想着：“不，不，不！这一次他做得过头了！”但我错了，而他是对的，因为世界记住了这一刻。这长长的一刻追溯了德国历史的低点而他为我们全体跪下。那一个无言的词述说了所有他渴望的倾诉。那一个简单的动作体现了所有他为何被爱 and 所有他为何被恨。
- 魏赫纳 - 他心中的话向他诉说，而他听到了。
- 施密特 - 那诉说的声音那么轻，我们其余的人无法听到。
- 纪尧姆 - 我哭了，阿诺。

勃兰特站立起来。

- 克雷施曼 - 也许伤口终于开始愈合了。也许势不两立的双方终于开始和解了。
- 纪尧姆 - 在大选到来的前十天，他们签订了两个德国之间的条约。东方政策的奠基石终于落定了。

- 克雷施曼 - 由于你的帮助，我们信赖他。
- 纪尧姆 - 在大选之夜，是谁把好消息带给了维利？ - （对勃兰特、魏赫纳、施密特、埃姆克、维尔克、诺劳和鲍霍斯）我可以第一个向你致贺吗，总理？他们说是有 271 席！他们说是有超出整整 46 席的多数！
- 魏赫纳 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结果！
- 根舍 甚至自由党也增加了 11 席！
- 魏赫纳 横扫一切！独立选举人居中。天主教工人们。老太太们。青年人。
- 根舍 维利，我们有过分歧，今后我们会有更多分歧。但让我们毫无疑问地宣布：这是你的胜利。
- 施密特 十年前当我们重组这个党时，我们撒下了种子。你、赫伯特和我。今天我们收获了金色的成果。
- 魏赫纳 来——接受你缺德大叔的一个拥抱吧。
- 维尔克 祝贺你，总理先生。我代表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
- 诺劳 我代表联邦安全局全体工作人员。
- 鲍霍斯 还有你的调酒人和保镖。
- 纪尧姆 总理，我是否可以说同你一起工作是我过去生活经历中最辉煌的，或许永远是？
- 埃姆克 维利，你漫长的流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 众人 讲话！讲话！
- 维尔克 他讲不出来了！
- 埃姆克 他嗓子已经讲哑了。
- 施密特 讲两句吧，维利！
- 埃姆克 捡最重要的说，维利！从现在起我们走上了坦途。
- 勃兰特 亲爱的朋友们……
- 埃姆克 他还能这么说！

众人

听他说！听他说！

勃兰特

对我们所有在场的如此携手努力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胜利。但它不仅仅是一场胜利，这是德国人民对我们所开始的伟大的和解行动的赞同和支持。此前从未有过，从未有过，一个德国的具有自由精神的公民们和它的邻居，生活在如此和谐的状态中。

纪尧姆

(对克雷施曼)庆祝一直持续到深夜。阿诺,议会民主！一个没完没了的疯狂的晚会！你站着——你躺下了！他们把你扔了起来——你又落了下来！现在大家在歌唱，现在他们在争吵。现在他们在哭泣流泪，现在他们在畅怀大笑。现在有人在沙发背后醉倒，而他可能是你。

克雷施曼

现在有人，毫无疑问，需要一杯浓浓的黑咖啡。

纪尧姆

你永远无须担心，到早晨我会十分清醒。我们都会清醒。

魏赫纳

(对施密特)此刻，在这寒冷阴郁的日子，世界该是什么样子？我来告诉你我所看到的。又是四年的迟疑不决。又是四年的妥协和摇摆。又是四年的维利。

施密特

又是四年突如其来的意外动作。而现在更无顾忌了。他以往沉醉于红葡萄酒和烈酒之中，而今他更沉醉于功成名就之中。

魏赫纳

过去他需要他的老朋友们一起来控制党和维持联盟。如今，他不再需要我们了。

埃姆克

(对施密特和魏赫纳)听着，新政府的工作安排。职务任命。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你们两位绅士必须代替维利主持谈判。

魏赫纳

他不是又发烧感冒了吧？

埃姆克

他的喉咙。医生不让他说话。他正在去医院检查的路上。

给——他的一封信。是关于请你们如何施政的方案。

魏赫纳 (对施密特) 这么说, 游戏又开始了。

施密特 这个时辰大臣们才接到掌礼大臣转来的手谕。

魏赫纳 我会把手谕小心放在我公文包的秘密夹层里。

施密特 最好先看一下。谁入局了, 谁出局了。

克雷施曼 - 你入局了, 是吗?

纪尧姆 - 我在等埃姆克告诉我。

克雷施曼 - 他曾要埃姆克放弃你。

施密特 那, 维利说什么?

魏赫纳 我想, 不会多说, 如果他不能说话。

施密特 在信里。在他让埃姆克交给你的信里。

魏赫纳 埃姆克, 没错……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或许他换一个位置对他自己有利。

施密特 扩展他的阅历。给他以新的视野。

魏赫纳 哪一个部你觉得最适合他的天赋?

施密特 邮电部需要重组。他或许会感到那是个有趣的挑战。

魏赫纳 他对传送信件知之甚多。

施密特 维利在信中如何安排他的?

魏赫纳 什么信?

施密特 你放在公文包里的。

魏赫纳 嗨, 亲爱的上帝, 我把它搞丢了。这辈子找不到了。

施密特 那……埃姆克就去邮电部?

克雷施曼 - 那埃姆克怎么说?

纪尧姆 - 没说什么。没见到埃姆克。- 你见到他了吗? 霍斯特·埃姆克?

魏赫纳 或许去休一小段早就该休的假了。哦, 纪尧姆先生。你的家庭, 他们都好吗?

纪尧姆 非常健康，谢谢你。

魏赫纳 你有两个儿子，是吗？

纪尧姆 我只有一个。

魏赫纳 当然啦。那好极了。

克雷施曼 - 没有埃姆克了？这是什么意思？

纪尧姆 - 那就是维利今后将只能自己注视着我的眼睛而直接对我说话了。（对勃兰特）那，总理，怎么决定的？我还跟着你吗？- 他一言不发！只是……把公文包递给我。又是一个无言的动作！而这次的意思是：“是的！我们走！走到底！手拉着手！”

暗场

第二幕

纪尧姆 （对勃兰特和克雷施曼）没一件事能尽如人意。没有！有时看着维利我只感到心碎。他希望的一切他都得到了。大选，条约，甚至我们统一祖国的条约。然而顷刻间一切都出错了。所有一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无法满足的工资需求，工业混乱……

克雷施曼 民主，京特！六千万个独立的自我，在船上滚动着犹如暴风雨中散落的货物。

纪尧姆 他们同心协力树起了纪念碑。而如今他们扔掉了唯一连接他们的绳索。他们像假期结束时厌倦了的孩子，所剩的就是无谓的争吵。

施密特 （对维尔克和魏赫纳）劳驾你们谁能告诉我内阁如何讨论外交部关于削减军备的提案？这一提案外交部至今尚未出台。

维尔克 在日程安排上似乎是存在着些许混乱。

施密特 毫无疑问的是，就是这位无名人士还在我们决定税收政策的前一天就安排了总理关于税收改革的新闻发

布会。

魏赫纳 另一方面，我们还发布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政策方案。这也是我在报上读到的。

维尔克 这是泄露出去的，我想。

魏赫纳 寻找新中间派的一次朝圣。

施密特 新中间派？那老的怎么啦？那近十年来我和赫伯特为之而奋斗的这个党又置于何处？

维尔克 我相信这一思想来自新闻局。根据我的理解，其意图是提供那么一种对左派的平衡。

魏赫纳 我们本来不需要一种平衡，如果一号没有在他的所有讲话中提出谋求更大民主而把这些人鼓动起来的话。

施密特 这个政府到底怎么了？我们不经任何审慎的咨询便随意提出轻率的计划。我们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承诺而不知道经费从何而来。当霍斯特·埃姆克主管总理办公室时，他总是会统筹协调这种事情。

魏赫纳 伟大的人作出他的明智决定豁免了霍斯特·埃姆克对他的服务。

施密特 但格莱伯特在这儿主持工作！他为什么做不到？

维尔克 格莱伯特博士这星期不在。

纪尧姆 在西伯利亚。

施密特 西伯利亚？

维尔克 去东京的途中。

施密特 与日本的条约？

维尔克 考察空中航线的合作发展。

纪尧姆 一次免费旅行。

施密特 当然，又是个柏林人。

魏赫纳 这个政府就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

施密特 因为维利没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任何事情！

纪尧姆 （对勃兰特和克雷施曼）没做任何事情。的确如此。在外省的铁路车站上我等在他身后的背影中，盼着他开口，好像他是皮埃尔，仍然才五岁，在学校的圣诞演出中站在那儿惊呆了。他注视着一张张期待的脸，然而，一言不发。没有任何动作。没有微笑或怒气。他的脸是一张面具。面具后面没有人。人们凝望着他们的总理的肖像。肖像回望着他们。他那闻名于世的沉默。但此时它被说成是没做——任何事情。

施密特 （对魏赫纳、维尔克和纪尧姆）他现在在哪儿？不是又发烧感冒了吧？

魏赫纳 或者还在思考他的行动？

施密特 别人也有健康问题。他们尽力不让它影响他们的行为……什么？

纪尧姆 我没说话。

施密特 我毫无保留地赞成人们对他的信奉，维利是上帝。而我依然感到的一点困惑之处是不明白随着时间的变换，他将担任三位一体中的哪个人物，圣灵、圣父还是圣子？恕我冒昧，赫伯特。

魏赫纳 我们伟大领袖的突变令我的信念受辱感情受伤。

埃姆克 （对勃兰特）我们胜利了。那是我们最大的错误，维利。唯有失败才是这个党所能理解的。失败是崇高理想的试金石。失败消除了要求。胜利意味着你必须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总是牵涉到异见和妥协，还有犯错误。

勃兰特 甚至你似乎也抛弃了我。

埃姆克 我在重组邮电部。你给我的任务。如果你没忘记，是

你解雇了我，维利。

勃兰特 那天我看到一个男孩注视着我。在某处车站的人群中。十五六岁。非常庄重和严肃。头上戴着一种帽子，像是老式的学生帽。我没法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而他也直直地回看着我。看着，看着，没有一丝笑容。他不喜欢他所看到的。

埃姆克 不必担忧那些激进者。

勃兰特 我注视着他。他注视着我。直到我们又消失在彼此的视野中。

纪尧姆 总理，要我让乌里去替你买包烟吗？——他试图戒烟，把它看作高于一切的事情。

勃兰特 那次行动，霍斯特……

埃姆克 行动和其他事情一样，维利。它们也会出错。

勃兰特 我当时以为我要死了。在生死关头我清醒了。我无法呼吸……解决一切事情，办不到。赫尔穆特会接任总理。大叔将回到党的领袖位置上。根舍将担任外交部长，为电视聚光灯所青睐并成为一位王子。

纪尧姆 - 他几乎又一次死在以色列，在迈萨代上空的直升飞机上。突然一阵旋风，飞机猛地往下坠滑，像一片落叶。眼看就要坠毁。“全部跳伞！”乌里大叫着。而总理还坐在那儿，纹丝不动，双眼盯视着四百公尺下的死海山谷。

勃兰特 大地在等待，那么平静，那么宽容。微笑着，双臂展开着，像一个母亲等待她的孩子拥入她的怀抱……我不怕死亡。只是死亡到来之前无法呼吸的痛苦挣扎，只是无尽的坠落……只是睁开双眼看到惨白的医院病房以及赫伯特·魏赫纳在身旁为我祈祷。

纪尧姆 （对克雷施曼）让我走吧，阿诺。让我回家吧。你不再需要我了。你还想知道什么？

克雷施曼 条约是否能付诸实施。维利是否能在位长久而确保条约的实施。你与他比先前更亲密无间，京特！你实际上生活在他的公文包里！

纪尧姆 我可以还给克里斯特尔她的生活。我可以向皮埃尔解释明白。

克雷施曼 再没有公用车，京特！再没有专列。没有一张张仰望敬慕的脸。没有我们午饭小酌时我对你的尊重与关注。没有米沙对你感激不尽的赏识。没有你和皮埃尔在机场兜风的那些快乐宁静的星期天。或者你是在担忧维利？

纪尧姆 如果我现在辞职他将永远不会发现我的真实身份。让我走吧，阿诺！

克雷施曼 我们需要你，京特！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你。你不只要告知我们他是否能继续在位而且要帮助他。现在埃姆克去了，他还能靠谁？谁能像你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因他的错失而责怪他？从不因他的冷漠而激怒，或是因他的轻慢而怨恨？这就是我们为何需要你——因为他需要你。与他同噪，京特。帮助他。

魏赫纳 （对诺劳）纪尧姆？

诺劳 他的名字屡屡从我们的卷宗里跳出。三件不同的间谍案中的嫌疑人似乎都认识他。于是我们就查他的生日。二月一日。正是向 G 致以生日祝贺的日期。我很抱歉给你添麻烦，在你麻烦已经够多的时候。

魏赫纳 这就是所有的线索？

诺劳 迄今为止。

魏赫纳 一个字母和一个日期？还有一个多余的儿子？

诺劳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但获取更多证据就意味着监视他。不碰他但监视他。

魏赫纳 如果这事当真，这会使大人物的形象缩水。他完全信赖他。让他看一切。

诺劳 让他看什么？他不就是个工会联络助理吗？他不会处理任何太敏感的东西吧？

魏赫纳 如果他们发现你在监控一号办公室的人而你搞错了……

诺劳 他们会严惩我。对不起，赫伯特。

魏赫纳 你处于困难的境地，我的朋友。

诺劳 那我们怎么搞定？我们对维利说什么？

魏赫纳 什么也不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让他坐卧不宁。不管如何，他通常喜欢被告知消息时问题已经解决。

诺劳 我们不能让他两眼一摸黑！我们必须告诉他点什么！

魏赫纳 如果我们不能审慎处理，我们将面临各种各样可怕的人物从隐藏处露面的境地。包括那些我们希望人们忘却的事件。

诺劳 哦，别再提那谣传啦！你莫非真的相信我杀了人？

魏赫纳 当然不会。

诺劳 那纯属捏造！你知道的！

魏赫纳 我知道的。

诺劳 我是完全清白的。

魏赫纳 让我们保持你的清白。

诺劳 我必须告诉根舍，无论如何。我的主管部长！

魏赫纳 他会立刻跑去告诉维利。

诺劳 我很遗憾，但我如果没有根舍的授权我将遭到……

魏赫纳 严惩。

- 诺劳 严惩。
- 魏赫纳 问题是你怎么表达。不必扯着喉咙大吼大叫“起火了”。只须不经心地对天气热得烫人传个话。那样你就撇清了——而没人会恐慌。
- 诺劳 他们都会被烧死。
- 魏赫纳 不然影响政治局面。
- 诺劳 他只是个工会联络助理……
- 维尔克 （对勃兰特和纪尧姆）魏赫纳先生呢？去东柏林了？
- 勃兰特 首脑私下会晤。同昂纳克本人交谈。
- 维尔克 是关于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庭。
- 勃兰特 争取恢复交易。
- 纪尧姆 胜利之后另一无法预料的后果。我们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而结果是，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并未解决人口买卖的问题。
- 勃兰特 我获悉东柏林挤满了坐在他们行囊背包上的人。他们走不了——他们回不去。
- 纪尧姆 - 我不清楚对于这个国家我究竟了解了多少，但毫无疑问我对我自己是有所了解了。
- 维尔克 这个行程是几时安排的，总理先生？
- 勃兰特 今天下午，显然是的。提前一小时发了通知。无须什么怀疑，赖茵哈德！这种事情他很认真的。他的牧师精神又一次呈现罢了。
- 维尔克 居然这么匆忙。
- 勃兰特 他几乎来不及带上他的圣油。
- 纪尧姆 - 是关于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庭，是吗，阿诺？
- 克雷施曼 - 我不清楚。
- 勃兰特 不管怎样，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休假了。离开这些

是是非非。在挪威湿润的绿林深处，几乎一切未曾发生。
离开这儿去别的什么地方，没有比这更让总理高兴的事了。

纪尧姆

没有大叔。没有赫尔穆特。没有任何人除了乌里保护着我以及赖茵哈德侦听我的通话。

勃兰特

维尔克

我有个小小的私人问题，总理先生。很不巧，我同我家人的度假日期有冲突。

纪尧姆

那么又有谁站出来填补这个空缺呢？

维尔克

噢，我明白……但是你的假期怎么办，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放在下一次吧。

维尔克

但是，你们家……

纪尧姆

很高兴看到我又回来！总理和我是旅行的老搭档了。

勃兰特

就我而言，我与纪尧姆先生曾一起长途跋涉过。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你看到吗？我们都需要你！我们都离不了你！

纪尧姆

整整一个月。在大自然的旷野中同噪。

克雷施曼

没有你我该去哪儿？回到东柏林在公家食堂吃小香肠？米沙又在哪儿呢？你是他皇冠上的宝石，京特！即便你什么也不告诉我们，只要托上帝之手有你在哪儿，仍然是米沙整个事业的证明！

勃兰特

（对根舍）纪尧姆？我的小肉丸？

根舍

谣传而已。诺劳甚至觉得没必要向你提起。我说：“听着，除非总理授权，我们不能让你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搞监控。”

勃兰特

那我该做什么呢？

根舍

什么也不做。一切照旧。诺劳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勃兰特

一样地接触文件？

根舍

完全一样。

勃兰特 他将跟我一起去挪威。他将全权负责所有我同外界的联络。

根舍 这是诺劳的人监控他如何工作的最佳机会。

勃兰特 我不知道他们把自己藏在哪儿？没有藏身之处。要么扮作母牛。

根舍 或许，你自己也留意他。

勃兰特 很少有娱乐。除了观看草地生长和挪威电视外，几乎一无所有。

根舍 自然，他的妻子也在监控之下。

勃兰特 间谍之家！

根舍 我不清楚他的两个儿子。

勃兰特 一个儿子。

根舍 两个，根据我的情报。

勃兰特 一个，根据纪尧姆先生所说。

根舍 诺劳显然盯错了人。无论如何，东德也不至于去刺探一个刚刚把他们这个可怜的小国家刻在欧洲的版图上的这个人啊。

勃兰特 唯一的可能就是纪尧姆以其外表来掩盖自己，而那样让人好受得多。（对纪尧姆）你有空吗，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总理。——他看我的眼光有些怪。好象我是另外什么人似的。

勃兰特 纪尧姆先生，我在重新考虑你同我们一起去挪威的慷慨好意。

纪尧姆 ——根舍刚刚来过！根舍一定给他说了什么！

勃兰特 经过考虑我觉得让你同你的家庭分开是不可原谅的。

纪尧姆 ——我感到警觉的波涛涌过我的全身。随后是空洞的感觉。失望。纯粹幼稚的失望。聚会泡汤了！他将再也不会

带我去任何地方！

勃兰特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们一起去呢？

纪尧姆 我为什么……？对不起……？

勃兰特 带上你的妻子！克里斯汀，是吗？

纪尧姆 克里斯特尔。

勃兰特 还有你的儿子。皮埃尔。就像我们家的皮特。我的热情支持者，我似乎还记得。鲁特和我会带我们一个儿子去那儿。不是皮特——是马休斯。完美的假期对称组合：我们俩和我们的儿子，你们俩和你们的儿子。

纪尧姆 总理，这是种令人惊叹的……

勃兰特 带上你们的雨衣，纪尧姆先生。还有大量的新鲜笑话。

克雷施曼 - 现在你又快乐了。

纪尧姆 - 他突然看着你好像你第一次见到你。犹如一束阳光从云层中射出，照着你，照着茫茫世界中你一人。而寒冷暗淡的日子立刻消融了。你能感到透骨的温暖。

勃兰特 你只有一个儿子？

纪尧姆 就一个，总理。

勃兰特 你应该再生一个，纪尧姆先生。两个会比一个更有趣。

纪尧姆 - 结果证明这是我们有过的最美好的家庭假期。他们把我们安顿在一间小巧玲珑的绿色木屋中，就在总理住处的山脚下，我们六个人，都尽情享受我们的生活。- 这是他们真正的假日，克里斯特尔、总理同鲁特轻松地闲聊着。但不知道两个男孩去了哪儿。他俩总是一起消失在树林中。

勃兰特 警察与强盗。秘密特工。

纪尧姆 不管怎样，两人立马成了好友。

勃兰特 好儿子，你的皮埃尔。你一定为他骄傲。

- 纪尧姆 我的生命之光。
- 勃兰特 他们觉得是多么的不寻常。宁静，自由。
- 纪尧姆 父亲们。
- 勃兰特 假如世事沧桑，环境不同的话我们该会是什么样的人？
你或许可能成为我。我也完全可能成为你。
- 纪尧姆 但是，自由。那就是为何这个地方如此令人放松，总理。
你可敞开所有门扉，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追逐玩耍。
- 勃兰特 你知道为何会如此，京特？
- 纪尧姆 因为这整个地区被当地的警察封锁了。
- 勃兰特 我们自己小小的警察国使你感到像在家一样的安宁自由。
- 纪尧姆 - 思考的时光，交谈的时光。当然，也有少量公务，我们各自的工作。对外的信件……
- 勃兰特 埃贡·巴尔的谈判要点。手稿比较乱。在你发出之前最好先打印下来。
- 纪尧姆 - 收到的电报。每件两份。一份是总理的……- 理查德·尼克松的私人信件。- 另一份是我的。但我们也在树林里度过时光，像男孩们那样，同鲍霍斯一起，转悠着采集蘑菇。（对鲍霍斯和勃兰特）换个环境，乌里，看你工作得多愉快。
- 鲍霍斯 换个环境就有这实实在在的收获。
- 勃兰特 这就是我喜欢蘑菇的地方，乌里。你采它们，你腌它们，你吃它们；它们等着被采，它们等着被腌，它们决不会倒过来吃你。把它们在桌上摊开，然后，让我们看看我们采到了什么。你想溜掉，是不是，京特？不想了解一下真菌生态的秘密？
- 纪尧姆 我太害怕我们采到毒蘑菇。
- 勃兰特 我们总会采到个把毒蘑菇的，是吧，乌里？

纪尧姆 - 于是当总理和乌里在挑选他们的蘑菇时，我挑选我的。

鲍霍斯 有的真是美极了。

纪尧姆 - 有一两个极漂亮的品种。

勃兰特 裂缘莲。很罕见的。

纪尧姆 - 英国政府私下敦促我们对美国人要强硬。

勃兰特 美妙的香味。

纪尧姆 - 可爱而轻率的口气。

鲍霍斯 看这个大家伙！

纪尧姆 - 哇，这是一个真正的绝色美人！

勃兰特 小阳伞。 *Lepiota procera*。

纪尧姆 - 而法国外交部长本人对美国人甚至更为强硬。

勃兰特 这蘑菇让鲁特用奶油煎炒加点切碎的洋葱和芹菜。

纪尧姆 - 米沙烧起来应该味道更好……我甚至同乌里也处得不错。事实上，我同整个安全保卫班子的人都能和睦相处。克里斯特尔和我开了个小酒会招待他们，皮埃尔给他们所有人摄影留念。到了晚上，我们散步过去同维利和鲁特在阳台上喝一杯。

勃兰特 再拿几瓶来，乌里。省得我们再麻烦你。

纪尧姆 - 就像是过去在办公室里相聚的日子。只是没有大叔也没有赫尔穆特。只有鲁特、克里斯特尔和孩子们。乌里，站在一旁，挎着手枪，手中拿着瓶钻。总理和我。

勃兰特 三十年代我在挪威的时候我并不仅仅是维利·勃兰特一个人。我还是维利·弗莱姆。我是卡尔·马丁。我是费里克斯·弗兰克。他们中每一个人都为不同的报纸撰稿，每一个人都有稍稍不同的观点。你一定学过英语，京特，也读过沃特·惠特曼。“我会自相矛盾吗？”完全没错，我当时自相矛盾。我宽容，我容纳众人。

- 纪尧姆 总理，你第一次主持内阁会议时的经验。
- 勃兰特 我当时一定主持得比现在好。我不记得那时有大的分歧和背叛。你以为如何？作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京特·纪尧姆你不会消磨了你所有的潜能吧？
- 纪尧姆 这么称呼我是第一次。
- 勃兰特 人们一直指称我为间谍。从来没有人这样指控你吗？
- 纪尧姆 间谍？没有。
- 勃兰特 挪威人以为我是芬兰间谍。而瑞典人则指控我为俄国人收集情报而逮捕我。
- 纪尧姆 看不出你是个间谍。
- 勃兰特 看不出？
- 纪尧姆 太引人注目。总理，太——如果允许我说的话——隐秘了。
- 勃兰特 我知道这个行当的所有技巧。在盖世太保追踪我的时候学会的。公文包底装夹层。显影墨水。
- 纪尧姆 显影墨水？你原来一直在用显影墨水写信？
- 勃兰特 很有用的训练。政治家们都这么做。不，我可以是个间谍，京特。或许就是，像你所了解的。或许正从事谍报工作。
- 纪尧姆 - 而此刻我想……
- 克雷施曼 - 想什么？
- 纪尧姆 - 没什么。荒唐。总理搞不了谍报只会逃跑。
- 勃兰特 好，这是 1936 年。对吗？我回到了纳粹德国，待了六个月。在柏林，担任党的地下工作者。我是谁？维利·勃兰特？显然不是。维利·弗莱姆、卡尔·马丁、费里克斯·弗兰克？不，我甚至不是一个德国人……我能自我介绍吗？我叫根纳·加斯兰德。我在奥斯陆出生并长大，我恐怕我的口音太明显了！在柏林的日子里，

看到那激动人心的崭新的政治局面真让人兴奋不已！

纪尧姆

我相信你，总理。根纳·加斯兰德，从奥斯陆来！

勃兰特

而在你的心底，你一直，一直恐惧着你会突然被捕。猛然间——另一个挪威人。你们挪威人的口音对一个挪威人是什么感觉？—Vi må sørge for å møtes en gang. Det ville være en lettelse å snakke norsk igjen noen timer...! —你通得过还是通不过？如果他是根纳·加斯兰的一个老朋友呢？或是你发现你正面对面地遇见了维利·勃兰特一个老朋友？或你正和某人坐着交谈。这人你应该非常了解。觉得那么轻松。觉得万事顺利。但那时你察觉他以一种稍稍古怪的眼神看着你。你立刻想到……

纪尧姆

“他知道了。”

勃兰特

“他知道了……他知道了……”那样生活需要勇气。

纪尧姆

我能想像。

勃兰特

勇气与坚忍。

纪尧姆

是的。

勃兰特

当更大的勇气与坚忍把我压倒时，我逃脱了，京特。我逃脱了。所以也许你是对的——我不是一个间谍。只是一个有着一层层隐秘夹层的手提箱。维利·弗莱姆、卡尔·马丁……费力克斯·弗兰克、根纳·加斯兰德……以及藏在他们当中最最隐秘的一个夹层罢了。你能想起见到过它一次，但你永远无法再发现它了。

纪尧姆

那个叫赫伯特·弗拉姆的。

勃兰特

或者它总是另外什么人？另一个小男孩。一个快乐、寻常的男孩。既不忧郁也不严肃。就像你的皮埃尔。假如这是个由父亲养育并跟他玩给他讲故事的叫赫伯

特·弗拉姆的男孩。或甚至承认他的存在而给他提了名字。赫伯特·莫勒。我或许本该是他，但我从来都不是。

纪尧姆 - 我们坐在那儿度过了那一个个长长的挪威之夜，而在那陌生的北方星光中，世间一切都变得生疏而不定。在他眼中，我变得透明了，他在戏弄我，就像我也在戏弄他。或者他只是在戏弄那可能性？或者我也是如此？在暗光中我看到的是他，或只是我自己的倒影？

克雷施曼 - 你仍然在处理电报？

纪尧姆 - 是的。

克雷施曼 - 没有被监视？

纪尧姆 - 没有。

克雷施曼 - 肯定吗？

纪尧姆 - 肯定。然后一天夜里他又问起我那个他曾问过的同样的问题。

勃兰特 你仍然认为我可以信赖他们？

纪尧姆 - 天几乎是黑的。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总理，我希望他们不曾收听到你一直在对我说的某些事情，不然，他们可能会开始对你产生几分怀疑……

克雷施曼 - 他看不到你的脸。

纪尧姆 - 看不到。但到假期结束离去的时候，我必须给你看我辛辛苦苦摘来的水果。于是我径直拿起我们的两只公文包……

鲍霍斯 这两只？

纪尧姆 谢谢你，乌里。- 我把所有来往的信函电报的复印件放在那只包里，把它放在我车后的行李箱里，这一只装的是总理旅途上分发的纪念品。然后……- 乌里！

鲍霍斯 如果你想要我替你把什么东西搬回波恩……

纪尧姆 秘密文件，乌里。

鲍霍斯 我已经带了总理所有的箱包。我还带了五罐腌蘑菇。

纪尧姆 乌里，你是专业的保卫警官。

鲍霍斯 是的。但不是搬运工。

纪尧姆 你坐飞机。我开车。

鲍霍斯 当然不是你的搬运工。

纪尧姆 乌里，如果这些文件放在我的车后而出了什么问题……

鲍霍斯 那也不是我的责任。

纪尧姆 我把它塞在你的臂弯里，好了。乌里，从现在起，这个公文包不能离开你的视线。一刻也不行。谢谢你，乌里。你小子够朋友。

鲍霍斯 我甚至无法拔枪！

纪尧姆 如果你需要拔枪，乌里，扔掉蘑菇。- 我的恐惧决不是多余的。在瑞典，我们在一家旅馆过夜，我将装着纪念品的公文包锁在房间里然后同克里斯特尔一起去跳舞。当我们返回房间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人偷偷潜入过房间将包内的物件全数拍摄了。

克雷施曼 - 干得确实漂亮。谢谢你。

纪尧姆 - 现在我们回到了尚玻宫。甚至在挪威时总理脑中不时出现的怀疑也顷刻消失在波恩的秋雾中，因为整个形势是每况愈下。金属加工业的自发罢工此起彼伏。清洁工则停止清除垃圾。

克雷施曼 - 六千万德国人民！

纪尧姆 - 赫尔穆特更是怒不可遏。

施密特 必须有人为人民挺身而出！必须有人采取措施！必须做出决断！使我们的政府恢复目标和方向！

- 纪尧姆 - 大叔哪儿去了？
- 埃姆克 (对维尔克和纪尧姆) 你们能相信他居然说过这话吗？甚至是赫伯特·魏赫纳？
- 维尔克 “现届德国政府缺少的是一个领袖。”
- 埃姆克 在新闻发布会上，在莫斯科，在所有的地方！我们刚刚建立了与这些国家的正常关系！整个世界都等待着倾听他将说什么！
- 维尔克 “总理进入了睡眠状态。他迷失在他自己的世界中……直率地说我从未真正把这届政府看作为一个政府……”
- 埃姆克 然而是在支持他、推崇他？你不知道俄国人一直私下告诉我们他同他的东柏林的朋友们在频繁地秘密会晤？
- 维尔克 而东柏林人则私下告诉我们俄国人在撒谎。
- 埃姆克 两个老朋友变成一个新朋友——而他们立刻相互嫉妒起来。我们的胜利所招致的又一个不曾预料的后果。赖因哈德，生活就是这样一团乱麻！每一个人都盯着另外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同。每一个人都试图推测另一个人的观点。这真是一个变幻不尽的靠不住的难解的无法分析的困境。
- 维尔克 我觉得魏赫纳的话比较起来，更简单。“开除我。要不开除你自己。”
- 埃姆克 而这次维利不得不动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举起枪扣动扳机。要么维利要么大叔。他们无法共存。
- 魏赫纳 (对埃姆克、维尔克和纪尧姆) 驱逐了！流放了！沐浴不到我们伟大领袖微笑的阳光了！
- 埃姆克 开除了？
- 魏赫纳 开除了？没有，亲爱的上帝。只能坐在午餐桌的角落里。像以往一样，恩威并施，手下留情。伟大的调停者又

开始工作了。双手还是那么干净。

埃姆克 (对维尔克和纪尧姆) 当然, 现在又轮到赫尔穆特开始进攻了。

施密特 (对勃兰特) “不。” 就是这个词, 维利。你必须学会说这个词! “不……不……不……” 他们要求增加工资 15%? 不。“不” 就意味着不行。

勃兰特 当然, “不” 就意味着没有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没有邮政。没有医院。

施密特 它也将意味着没有你的财政部长——我的支持。

纪尧姆 - 这就是他说的话。不。而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

埃姆克 没有公共汽车或火车。没有邮政。没有医院。没有赫尔穆特的支持, 因为——没有赫尔穆特!

维尔克 (对勃兰特) 他在华盛顿, 总理先生。

勃兰特 有什么话吗?

维尔克 他说——按你觉得最好的方式办。

勃兰特 替我谢谢他, 好吗, 赖因哈德?

埃姆克 (对纪尧姆) 当雇主们崩溃而“不”就成为“是”, 该归罪于谁呢?

纪尧姆 维利。

埃姆克 当世界产油国提高了油价, 突然间加油站没有了汽油, 连续四个周日德国高速公路上没有行驶的轿车, 这是谁的错?

纪尧姆 维利。

埃姆克 谁让他们昨天享受阳光?

纪尧姆 维利。

埃姆克 谁让他们今天遭受阴雨?

纪尧姆 维利。

- 埃姆克 谁让他们屋顶漏雨胶鞋漏洞呢？
- 纪尧姆 维利，维利，维利，维利。
- 埃姆克 他在民意测验中下降了十个百分点。甚至左翼新闻媒体也开始反对他。
- 克雷施曼 - 让他离开那儿，京特！让他再登上专列。再看到仰望的脸。再看到微笑的唇和闪亮的眼。再让他快乐，京特！
- 纪尧姆 （对勃兰特和鲍霍斯）弗里莫斯多夫……科布伦茨……达姆施达特……熨好的西服，干净的衬衫……弗里莫斯多夫的什么人，达姆施达特的什么情况……乌里，再来一瓶！……联邦议院衣帽间挂着的告示：议员专用。底部横着一行草体：包括帽子和外套……诺伊马科特……雷根斯堡……施特劳宾……一位听众写信给耶瑞凡广播天台：“火星上有生命吗？”耶瑞凡广播电台回答说：“没有，火星上没有生命，不管是……”看他们在外面，总理！所有那些在黑暗中仰望的脸！你只要说两个词——这是他们唯一需要的！“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不？那就，看着她！她那盯着你的眼神！她微笑时那柔软的脸颊。还有后面的两个女的。再后面，你看不大清的地方还有更多的女子。下一站会更多。总理，她们那么多！你有那么多不同的道路可以走。
- 勃兰特 我对待生活怎么啦，京特？总是走啊，走啊。变啊，变啊。背叛了所有曾经热爱过我的人。忘记了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一层一层地蜕皮，像一条蛇……车站一个接着一个。普拉特灵、菲尔斯霍芬、帕索……维利·弗莱姆、卡尔·马丁、费里克斯·弗兰克……脸一张接着一张。失败一个接着一个。而哪儿是我的结局？在一

节列车上，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到何处去，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对着不存在的牧师忏悔。

纪尧姆 （对克雷施曼）没有用了，阿诺。火车也没用了。于是我们回到了波恩……而另一个问题出现了。他们盯上了克里斯特尔。

克雷施曼 她能肯定？

纪尧姆 肯定。

克雷施曼 你要我们撤退你们？

纪尧姆 太晚了，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所有人都会知道它的真相。一个间谍潜伏在维利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真的会让他垮台。而且不管怎样……

克雷施曼 他会知道。

纪尧姆 愚蠢，不是吗？他迟早会知道。我的另一半渴望着告诉他！

克雷施曼 但你想面对面地说。

纪尧姆 不想仅仅逃走，像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克雷施曼 你想看到他被刀插入时的眼神。

纪尧姆 我要他明白我和他一样的艰难。不管怎样，这或许是一场虚惊。克里斯特尔被提升到国防部任职。可能是一种例行审查。

克雷施曼 低调一点。休个假。去晒点阳光。去天空整日晴朗的地方，静候事态发展。

根舍 （对勃兰特和诺劳）我知道纪尧姆先生今天不在办公室。

勃兰特 度假去了，他早该享受的。

根舍 自从你授权诺劳先生对他实行监控以来，一年中最佳的时段过去了。我一直在催促诺劳先生回答我，我们现在是否能够立案起诉了。

勃兰特 亲爱的上帝，我把这一切早忘了。我从未见他有过任何反常的行动。你们是非常专业的，诺劳先生。

诺劳 谢谢你，总理先生。

勃兰特 你们确实发现了证据。

诺劳 我们认为的是的。我们相信是的。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发现了证据。在另一方面……

根舍 肯定还是否定？

诺劳 还有些难点和矛盾之处。比如，你可以想像辨方会在第二个男人这点上大做文章。

根舍 第二个男人？什么第二个男人？

诺劳 最初那神秘的电文是本案的主要依据。它提到，如果你们还记得，关于第二个儿子。

勃兰特 第二个儿子？还是第二个男人？

诺劳 让我想想……

根舍 噢，不！噢，我的老天！

诺劳 “向第二位男人祝贺。”

根舍 家庭里的第二位男人就是儿子！

诺劳 我明白了。当然如此。那这第一个男人就是……？

勃兰特 劳作之后正在休假。

纪尧姆 （对克雷施曼）拂晓之前我驾车开始了去南方的长途旅程。当我拐出加油站时我瞥了一眼车镜，那儿，在第一线曙光下，在我身后三百米处有一辆车停在路旁。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我上高速公路，他也上高速公路。我开到时速一百二。他还在我的车镜中。越过国界进入比利时他仍然尾随着。进入法国后，他保持时速一百六一路跟着我直到巴黎。我自己的私人助理！对我就像我对维利那样忠心耿耿。然后在枫丹白

露由法国警察接手了……

克雷施曼 他们让你度假？

纪尧姆 我最后的假期。在南方。在阳光下。

克雷施曼 你想过留在那儿吗？或者永远不回来？

纪尧姆 每个阳光灿烂日子里的每个阳光明媚的时分。简单的生活。阳台遮荫下的一杯葡萄酒。迷迭香和百里香的芬芳。所有思绪被蝉声打断……

克雷施曼 你完成了你一生的工作。

纪尧姆 周围的世界如此宁静。最后只有我自己。甚至连我自己也不存在。没有一个人。

克雷施曼 你本来应该回家的。现在你知道你完了。你本该越过边界返回东方。

纪尧姆 他们给了我机会。他们从北方跟起一直跟到枫丹白露。然后今天下午——没事了。一直到边界——没有一个人。我车子的油箱里有油，我口袋里有钱。

克雷施曼 那你为什么不走？因为皮埃尔？

纪尧姆 还因为克里斯特尔。

克雷施曼 以及你现在的女友。

纪尧姆 你。米沙。

克雷施曼 当然，还有维利。

纪尧姆 那样一个耻辱的离去。我不愿意在他的记忆中我是那样的人。

克雷施曼 那么，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

纪尧姆 好像是的。

克雷施曼 可是，整整四年了！

纪尧姆 挺不错的。

克雷施曼 京特，在未来的史书中，关于维利·勃兰特的这一章节

中你将永远有你的一段。

敲门声。暗场。门铃声。一线光缝。

幕后声 京特·纪尧姆先生？

纪尧姆 什么事？

幕后声 我们奉命逮捕你。

光缝开了，光照进整个门口。

诺劳 (对勃兰特和纪尧姆) 今天早晨六点三十分，总理先生，在他的公寓里，他和他的妻子同时被逮捕了。

勃兰特 还有皮埃尔，他们的儿子。他在场吗？他目睹了吗？

诺劳 我相信在实施逮捕的过程中，他儿子走出了他的卧室。我很乐意告诉你，纪尧姆当场就供认了。

纪尧姆 我是一个东德公民，一位东德军官。我必须要求你尊重这一点。

勃兰特 一个东德公民。一位东德军官……他向你提供了证据。不然，你得不到的。他判决了他自己。

诺劳 总理先生，我承认我们在侦查过程中犯了若干错误。我希望你看到此案终于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勃兰特 他为了皮埃尔而这样做。他背叛了我——也背叛了他的上司。就是为了能向皮埃尔解释。

诺劳 或许也是为了能向你解释，总理先生。

纪尧姆 (独自一人，坐下) 对不起，阿诺。在这儿度过了十八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放弃了自己的戒备。我犯的唯一错误……我不知道现在你在何处？我希望，你消失在迷雾中……奇怪——你能看到我。从西德的每一份报纸和每一个电视画面上我凝视着你。你也能猜出我在做什么。在我的头脑中。还在向你汇报！告诉你所有一切！告诉你我的遗憾。告诉你我明白我让米沙丢了脸。

勃兰特 (对埃姆克)别信赖任何人。这是我这四年来之惨痛教训。

埃姆克 甚至别信赖我。我雇用他。我审查他。甚至也别信赖你。整整一年,你明知道他在监控中,却不愿告诫我一个词。

勃兰特 然而,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派遣者又是什么样的人?你被你的乞丐朋友抢了,你为他感到羞愧。你也为你自己,为信赖他而羞愧。

纪尧姆 -而维利。我背弃了维利。我看到他被舆论攻击。他精神垮了。他第一次没有我伴随及照料的旅行。穿着不配套之西服!不再有仰望之脸!谁安排他之时刻表?当大家都在家里看足球赛时,谁又陪他去散步?

维尔克 (对埃姆克)所有之记者都在埋怨。其中一位说:“以前京特安排组织时,从来不会像这样。”而此刻,维利,正站在俯向北海之峭壁上,凝视着脚下深处之大海。

勃兰特 -如果你将坠落,落在何处更好些?落在可耻之泥泞沼泽里继续那无望之挣扎,还是坠落在坚硬之土地上?结束你所有之抗争。一个是长久之恐怖,而另一个则是那么……那么简单。

埃姆克 (对维尔克和勃兰特)没什么,维利。我们能立刻解决这一问题。只要我在电视上说明在对纪尧姆之整个任用过程中,应有之审查和安全措施都做到了。

维尔克 没有做到。

埃姆克 你不应该是说这话之人。

勃兰特 要是我当时没戒烟该多好。

埃姆克 那么,维利,讨论你重要之内阁改组计划,你怎么安排赫尔穆特?他要外交部,而根舍也要。

勃兰特 这等卑劣之方式。这等耻辱之退场。

埃姆克 我来处理,维利。我会解决它。我们很快就能让你完

成内阁改组。

诺劳 (对鲍霍斯) 女人? 什么女人?

鲍霍斯 在火车上。在他旅行中。

诺劳 哦, 我明白了。我觉得这同我们的询问没有任何关系, 鲍霍斯先生。

鲍霍斯 对不起。我以为我应当提到它。

诺劳 关于勃兰特先生这方面的弱点, 那是公开的秘密。

鲍霍斯 无论怎样, 我把名单给了你们, 如果你们需要它……

诺劳 你立了名单?

鲍霍斯 我的部分职责——检查他的来访者。我没法记下她们所有人的姓名, 但记下了进去和出来的时间, 大致上的职业特征。记者、党的工作人员, 等等。当地的支持者、妓女……

诺劳 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无需再谈了, 鲍霍斯先生。

鲍霍斯 不是, 我只是想, 假如纪尧姆先生也保存了这样一份名单……

诺劳 纪尧姆? 纪尧姆也知道勃兰特先生的癖好?

鲍霍斯 当我们在车上时。纪尧姆先生不得不帮助我……比如……

诺劳 帮助你什么?

鲍霍斯 帮助排队。而我只是在想, 他是否把这名单交给他东柏林的人……

诺劳 那……你说, 记者? 党的工作者? 我们说大约有多少人?

纪尧姆 - 女人! 突然这成了询问者唯一感兴趣的事! 但所有人都知道! 一直都知道! 为什么人们突然开始谈起这个事?

根舍 (对勃兰特) 不用我说, 这是一个极为无聊的任务。诺劳一交到我手中我就明白, 但是我别无选择, 只能给

你看。

纪尧姆 不是我，阿诺！我一个字也没说！不是我，总理！不是我！

根舍 每次我们坐下和他们谈判时，不管谈什么——贸易、避难者、边界控制——我们知道在他们身后他们捏着这个。

勃兰特 当然，纯属胡说。绝大部分，令人悲哀。但，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男人。太恭维了。

魏赫纳 （对施密特）我们把一把刀放在了他们手中。

施密特 当然，也放了一把在你手中。

魏赫纳 我选择的应该不是武器。

施密特 这名单是你的笔迹。

魏赫纳 诺劳读给我听的。

施密特 而你记了下来？听写下来？整整十页？

魏赫纳 老记者了——我速记记下的。我很遗憾事情会搞成这样，赫尔穆特。我知道你十分厌恶这种做法。

施密特 每一次会面。铁路沿线的每一个车站的每一种职业的女人。速记法记录。

魏赫纳 赫尔穆特，我们俩都知道他最终得走人。问题仅仅在于他何时成为党的负担而不是党的财富。

鲍霍斯 （对勃兰特）对不起，总理。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背叛了你。

勃兰特 我很遗憾。看起来我当时给了你一份超量辛劳的工作。

鲍霍斯 他们日夜不停地询问我！我被搞糊涂了！我是个普通顾家的男人。我对付不了。总理，我忠心耿耿跟了你四年！日复一日！为你跑腿搬运！而且分分秒秒警惕着，哪怕我眼角里瞥见一丝意外迹象，我都会冲上去为你挡住子弹。

- 勃兰特 而这些年来，另一个乌里，始终等在暗影里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 施密特 （对魏赫纳）当然，我们将给予他全力的支持。
- 魏赫纳 当然。全力以赴的支持。
- 施密特 你会给他讲清楚吗？
- 魏赫纳 不必担心，赫尔穆特，你的双手是干净的。就像一号历来那样。
- 纪尧姆 - 总理知道他可以信赖我们！他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暗中算计他！那绝对不是我们的意思！
- 魏赫纳 （对勃兰特）毫无疑问选择权在你手中。你可以辞去总理职务，但继续担任党的主席；或者你同时放弃党的职务。
- 勃兰特 你看了诺劳的名单？
- 魏赫纳 我没注意细节。
- 勃兰特 可惜。不然它们会带给你乐趣。
- 魏赫纳 或者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不管你如何决定，你知道我将是你的后盾。
- 勃兰特 像你以往那样。
- 魏赫纳 毫不含糊的一直那样。
- 勃兰特 同赫尔穆特并肩一起。
- 魏赫纳 而你如果决定再坚持下去你要坚信我们俩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 勃兰特 令人欣慰的是你想到你还有能够依赖的忠贞不渝的朋友。
- 魏赫纳 要我把赫尔穆特叫来吗？
- 勃兰特 这么多人，有着这么多不同的观点和这么多不同的声音。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更多更多的人希望他的心声被聆听。在一个时期，当一个声音扬起压倒了

其余的声音时，所有人都会模仿它的音调。但不和谐的声音继续着，直到迟早另一个声音的扬起……

魏赫纳 赫尔穆特！（对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我想一号已经做出了决定。

施密特 我觉得我应该等你自己拿定主意。我不应该让别人以为我试图影响你。我不想多说，不管你的决定是……

勃兰特 你都支持我。

施密特 毫不动摇的支持。

勃兰特 谢谢你。我想我能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请你主管外交部。

施密特 请我主管……？

勃兰特 外交部。这不是你的要求？在我改组内阁时？至少，不让根舍得到这一位置。我将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免去格莱伯特。另调人员来主持总理办公室。

施密特 我明白了。你不是……？

勃兰特 不是什么？

施密特 我以为……赫伯特以为……

魏赫纳 我以为甚至一号也想过。

勃兰特 想过，是的。想了又想。甚至决定了。但当你开口时，你永远无法确信在你说出来之前你会说什么。

施密特 那么……好吧……当然……

勃兰特 甚至你也不知道。

施密特 不……只是……好吧……

勃兰特 你是战斗呢还是逃脱？事情到来之前谁又知道呢？既然我有你的支持。有你的毫不动摇的支持……

鲍霍斯 （对诺劳）我还要提到另一个可能。纪尧姆也可能有……

嗯……照片。

诺劳 照片？

鲍霍斯 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诺劳 怎么样？

鲍霍斯 在火车上，他的包厢紧挨着总理的……

维尔克 （对魏赫纳和施密特）当然，也就是这么一篇在下流报纸上。但是，我想你还是看一下。

魏赫纳 “勃兰特的间谍是否拍了性爱照片？”

施密特 这篇文章出自何处？

魏赫纳 不知道。

维尔克 你们今天见他了吗？他看上去像是到了他的末日。

魏赫纳 我猜想是一夜没睡。喝酒，转悠，嘴里嘟哝着手枪和悬崖峭壁。

勃兰特走了过来。维尔克递给他报纸。

维尔克 我很遗憾担任这信使……

勃兰特 那么多人渴望着伸出帮助的手。

施密特 但他们是怎么得到这消息的？

纪尧姆 - 不是我，总理！没有消息——没有照片！你是知道的！

勃兰特 （对魏赫纳）我一直没问过你会谈进展。周五同你东柏林朋友的会谈。

魏赫纳 我认为，卓有成效。

勃兰特 关于犯人和他们家庭？

魏赫纳 这次没谈。

勃兰特 没有？

魏赫纳 谈了经济合作。这计划已久了，你知道的。

勃兰特 这么多的支持……你开口要宣布辞去，可你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我决不辞去！”你又开口，而这次是另一个声音。它说：“完了。结束了。无法挽救了。”好了……

当然了，这些人我必须首先通知。我的家人。我们党。我们的盟友。今晚格莱伯特会将我正式的辞职信送交总统。（对施密特）我知道赫伯特会像我那样，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施密特 维利，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让我们就此停住再思考一下。让我们不要匆忙做出一个我们可能会后悔的决定。维利！

魏赫纳 （对施密特和维尔克）我可不该这么激动。他还会改变几次主意呢。

施密特 我们必须有个人跟着他，制止他，同他说理！

魏赫纳 别担忧。他们手指头戳的将会是我，不会是你。

施密特 我们不能没有维利！我将无法领导这个党！他们热爱他！

魏赫纳 他们也会热爱你。会的，只要你让他们吃饱穿暖。只要有我被他们痛恨着。只要你需要他们的热爱。

施密特 我没法干，赫伯特！不能像这样！

魏赫纳 这一点他是对的。战斗还是逃脱？扣动扳机还是扔掉枪？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没人知道结果。

埃姆克 （对施密特、魏赫纳和维尔克）维利在哪儿？我觉得我可能已经扭转了形势！我上了电视做了反复的声明。我向人们声明我们的确做了全世界最严格的安全审查。做了不下十次。这是个假话，可我说呀说呀连我自己都相信了……他在哪儿？

魏赫纳 在辞职。

埃姆克 我早知道。

魏赫纳 或不辞职。

维尔克递给埃姆克报纸。

魏赫纳 同时两个想法。同时两个决定。

埃姆克 我们得去个人确信他没事。

施密特 那应该不是你。

埃姆克 奇怪，不是嘛。所有人都爱他，但他无人可以求助。
这茫茫世界上他无人可以求助。

施密特 他有你。

埃姆克 甚至也没有我。

纪尧姆 (独自一人) 他可求助的人曾经是我。那一张仰望的脸和所有的人一样，被他发自心底的话所激励。那仰望的脸永远站在他的一边。那微笑的脸的后面什么也没隐藏。没有包藏的野心，没有掩盖的歧见，没有暗中的怨恨。他不太喜欢我。他要求霍斯特·埃姆克把我调离。

观众期待时的嗡嗡交谈声。

告诉他，但决不要强迫他。

手铃声。沉默。

女声旁白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宣布选举结果。赞成者：267票。反对者：225票。

鼓掌声。灯光亮起照着施密特。

现在我宣布，根据基本法第63条第2款，总理候选人已经获得联邦议院的多数票通过。施密特先生，你必须回答你是否愿意接受联邦议院选举你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

纪尧姆 - 他那忠诚的小人物。正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了。

施密特 议长阁下，我接受这一选举。

纪尧姆 在我漫长的刑期中，我在狱中回顾了这些年的一切，这盘根错节的谜在我眼前变得清晰。猜疑、妒嫉。国家经济、个人病患。施密特和魏赫纳。诺劳、根舍和

鲍霍斯。赫伯特·弗拉姆和赫伯特·莫勒。最后是我。我听任别人利用我！不仅仅是米沙。不仅仅是你，阿诺。还有赫伯特·魏赫纳。这是我最痛心的。我像一根手边的木棍，被魏赫纳选中，用来击倒了维利。我没让任何人看到我的每时每刻的羞辱。但我耻辱啊，阿诺！耻辱在最后……

克雷施曼 — 现在我对你已无能为力，只能一天一天地数着你的刑期，等待米沙把你交换回来。我们等了整整六年，终于设法把你带回了家。

纪尧姆 家，是的。只是，此刻我已患了癌症。我同皮埃尔已完全失去了联系。

克雷施曼 （对纪尧姆）京特，换回你我们用了三十个犯人！而你一直想知道囚犯交易是否属实。现在价格上涨了。现在一个人头几乎值十万马克。我们为你付的身价是三百万马克！

纪尧姆 家，这是吗？现在我看它的眼光已经完全不同了。一旦你的耳朵听惯了复调音乐的错综繁杂，那单一的音响听上去是多么的微弱！不管怎样你是对的。如今维利已经同俄国人和解，他们已不再需要他们脚下那可怜的小盟友。

一把丁字镐微弱的凿振声。

（对众人）随着月月年年那木梁间的敲击声愈来愈响——这响声一直从那儿发出。不是那间房子，是隔壁的房子，我们的房子。

勃兰特 午夜时分，记者们来电询问我的反响。我们等待了如此之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所承认的这个国家终于在我们的眼前走到了它的末日。所有那些为之而苦难、

挣扎和欺骗的目标霎时间灰飞烟灭。

一把丁字镐引来了更多的丁字镐。响声越来越大。所有人都站起凝望着整个屋子。丁字镐的响声积聚到顶点时传来柏林墙顷刻间崩塌的隆隆声。

而最终属于一起的又走到了一起。我们分割的自身又回归一个自身。

纪尧姆 年迈的调停者又一次踏上了他的旅途。那么多尚未漫步的新的土地！那么多仰望着的脸！

勃兰特 爱森纳赫和德累斯顿……莱比锡和罗斯托克……

纪尧姆 所有的人都渴望着看到这位开创德国统一大业的伟人。他是否还想念着我为他每天安排日程，准备服装？他是否曾思考过我个人在其中所起的小小的作用？小人物仰望着这伟大的人，深知他是值得信赖的。

勃兰特 当然，我有时想到他。他的儿子离开了他，他的祖国消失了。我们俩都病得很重很重。

纪尧姆 他经过时，我注视着。他变了。我也变了。变了，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赫伯特·魏赫纳……

魏赫纳 死了，陪伴着天使。

纪尧姆 赫尔穆特·施密特。

施密特 多年前就去职在野了。

埃姆克 我们伟大的党也随他去了。

纪尧姆 一直当不了外交部长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根舍 担任了整整十五年的外交部长。

纪尧姆 而你在哪儿啊，阿诺？在他们逮捕你之前，你消失了。融入了人群，就像许许多多其他的人。

克雷施曼 - 我站在他们当中，当维利经过时，我们一起欢呼。欢呼发自我心底。一个伟大的人！

勃兰特 我们愈合了完整了。不管怎样，在这短短的时刻。就在这短短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是快乐的。

纪尧姆 而不管他去向何处，我的身影伴随着他。依然同在。

暗场。

后记

1972年标志着维利·勃兰特短暂而辉煌的德国总理生涯的鼎盛时期。那年恰恰是我首次正式访问德国，也是我第一次为它所吸引——尤其是它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或许这就是为何两年后勃兰特复杂而又痛苦的下台引起了我的关注，并且一直挥之不去地萦绕在我的心底。

勃兰特是20世纪最具人格魅力的政治领袖，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各国深得民心。早在1950年担任西柏林市长时期，他便为国内与国际政坛所瞩目，他领导西柏林人民在东德的围困及渗透中顽强地抵抗苏联的颠覆与威胁。1974年，他辞去联邦德国总理的职务后，又以一个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新的政治生涯。在联邦德国总理任期内，他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第一，在他的主持下他改组了社

会民主党，从而赢得了持重传统的德国选民的拥护；第二，他首次力排众议抓住时机，趁1969年社会民主党席位增多之时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派联盟——自1930年代希特勒镇压议会民主以来，德国的第一个左派联盟。而他最伟大的胜利，便是在他总理任期内完成了一项政治上极为艰难的任务——实现了同德国的宿敌东欧的和解。

这项任务的艰难之处在于，他不得不接受战争失败的痛苦的现实局面。首先是联邦德国将失去位于德国东部的约占四分之一的领土。此外就是承认在苏占区的德国领土所建立的第二个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该国紧紧依附于苏联，有着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它的隔离封闭的国界线，切断了东西德的社会联系，造成了德国人民痛苦的家庭分离。因而，接受这一现实面临着激烈的刻骨铭心的反对，尤其来自最直接的受害人——前德国领土奥德河与尼斯河以东地区被驱逐出境的八百万德国人民，他们家园所在的这一地区已被苏联与波兰分割。再加上四百万从东德逃出的人民和依然陷在东德的几百万亲属。但是，勃兰特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完全成功。这一和解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德国，它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消融了两个阵营的冷战格局——而最终使整个世界出现了勃兰特本人也未能料想的结果：他所承认的这个国家终于走到了它的末日，接踵而来的是整个苏联帝国阵营的崩溃。

当我1972年夏天来到德国之时，勃兰特政府正从事着这项伟大的事业。尽管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中正一步步失去它的多数席位而处在困难危机中，西德政府同苏联和波兰经过谈判而签订的和约已获得联邦议会的通过。当时的我并未十分关注这些胜利。联邦政治发生在波恩，而那年夏天我的德国是在柏林。我曾为了报道这昔日伟大的城市而来到德国，如今这只剩象征

意义的首都被辉煌而徒然地遗留在东德境内，如同一艘豪华的邮轮被遗弃在马克勃兰登堡沙滩的废墟中。

这座城市会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想像。然而它最令人注目之处，毫无疑问，是它那畸形的巨物——柏林墙。那丑陋的混凝土高墙由全副武装的卫兵看守，墙下还设置了复杂致命的陷阱。柏林墙由东德政府在1961年强制修筑以阻止东德公民大量逃往西德。另一堵更长的隔离墙从波罗地克到图林根亚将东德与西德分割。而柏林墙更令人触目惊心，因为它在城市的西半部合围就像用篱栅圈住了一座城郊花园。不管你去往何处，这高墙会在大街上劈面拦住你，这地理分界线的鲜明要超过纽约市西边的哈德逊河。

那年夏天在人们视线之外的某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双方的代表埃贡·巴尔（Egon Bahr）和迈克尔·科尔（Michael Kohl）正在就基本条约进行谈判。在该条约中，西德最终承认东德，同时根据这一条约两国之间也基本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在此之前，有四国签订的关于柏林的条约首次使西柏林人访问东柏林区成为可能。我那些出访后回到西柏林摩登繁华街区的朋友们为大墙对面的东柏林街区的截然不同的景象而惊愕：石子路的街道、无灯火的村落、破旧不堪的公寓、笨重老式的蒸汽火车——久已忘却的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的遗迹，她那所有旧时的呆滞和破旧如同某种灰色的遗址公园被极权的保守统治和他们落后的经济体制神奇地保留着。

这另一个德国的存在，以及它同联邦德国纠缠不清的关系是现代德国政治成为欧洲政治最有趣现象的部分原因。然而如何称呼它而避免使其有独立国家之嫌呢？在它自己的政府成立很久之后，右翼新闻媒体仍坚称其为“苏占区”，甚至简称“占领区”。通常官方的委婉称呼为“德国的另一部”。勃兰特总理

的前任，季奥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总理从不称其为国家而称其为“现象”。勃兰特作出让步，承认了它的国家地位，但拒绝视其为异国。正如他在1969年新政府施政纲要中著名的那段话“即便在德国存在着两个国家，它们之间也不是异国异邦，他们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

不管西德人如何看待，对付一个充满敌意的隔壁邻居，麻烦是没完没了的。刺探情报是全方位的，不仅在内部而且在外部——特别是它所有一千五百万公民都有可能是潜在特工，因为他们说着完全相同的语言——而已经有四百万人在大门这边。如此亲密的同胞手足，生活道路是如此不同，又怎样相处呢？如果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化又如何行事呢？

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形成了维利·勃兰特和京特·纪尧姆故事中他们的个人的悲剧。纪尧姆十三年前从东柏林潜入西德，在1969年勃兰特当选为总理的几星期后进入总理府担任工会联络助理。在随后的四年中，他在为勃兰特的工作中表现得忠诚勤勉，很快被升迁为勃兰特的私人助理。他负责勃兰特的旅行出访，并形影不离地伴随着他。同时他又秉承东德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局的指令，以同等的忠诚勤勉监视着勃兰特，直到1974年他被捕而导致了勃兰特的辞职。

虽然，事件并未明说，但在勃兰特的辞职信中，他声称为此事的疏忽失职而承担政治责任。安全部门在纪尧姆的任用之前，确实犯了一连串错误而忽略了对他进行应有的政治审查，发现他有重大嫌疑之后又未对他采取应有措施而放任他继续行动。在私下，勃兰特的某些同事则告诉他东德政府可能会敲诈他，因为纪尧姆把一份勃兰特婚外情的名单提供给了他们。但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纪尧姆的暴露更应该是总理下台的结果而非原因。它的发生是联邦共和国内部，社会民主党和它的领导层内部的政治矛

盾所致。另外，勃兰特的个性和身体状况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甚至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形成这一事件的原因。

勃兰特最新传记的作者皮特·默斯伯格（Peter Merseburger）嘲笑勃兰特的支持者们将他的下台视为因背叛的弑君者的阴谋所致。“就好像体面的波恩共和政权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政治对手们被妖魔化为长袍下揣着匕首的布鲁特斯人物，甚至成了一心一意只想暗杀总理的尼伯伦斗士式的人物。”政治，在默斯伯格说来，是最为“陈腐恶俗”的。发生于1974年的事件也未能例外。而其陈腐恶俗之处在于各种强烈的个人情感：忠诚与妒嫉，勇敢与绝望。恰恰是这混合体的复杂性使我最终决定写这部剧作。这部戏的主题就是复杂性：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形成与解读的困境。

对于德国历史，英国人最感兴趣的是纳粹时期。西欧社会通常自律于道德约束，然而这个残忍野蛮置道德于不顾的假期即便对那些谨小慎微、奉公守法者来说也有一种腐蚀灵魂的魅力。德国从噩梦中醒来后的这半个世纪被人们认为是体面而不张扬的时期，联邦共和国除了在物质经济上的繁荣之外并无其他作为，而长期作为政府所在地的莱茵兰以其宁静的省城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

我依然认为，物质的富足，社会的祥和，尽管不无乏味，总是一种成就。对德国的这种成就我始终怀有惊叹与感动之情。像西德这样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的全面的重建复兴是很难找到与之匹敌的国家，即便是日本，能像德国那样从1945年时的国家毁灭、道德堕落、政治瘫痪这样彻底崩溃的基础上如此迅速地崛起吗？联邦德国的生命几乎是从荒凉的坟场开始复

苏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已成了废墟瓦砾，所有的机构和政治组织都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帮凶与罪犯。然而，就在这绝对的废墟上，未经专制统治或军事镇压，这个国家的公民们在欧洲建起了一个繁荣、稳定、高度文明的国家，成为西欧六十多年来和平的基石，直到今天。

无疑，由于作为战败国的特定局面，它在重建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援助。首先，占领军的存在使它免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动荡与灾难，而它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受尽这种磨难的。其次，东部难民大量拥入。到1950年为止，失去领土的东普鲁士省和苏台德地区的一千二百万中的八百万难民拥入了西方占领区。一个破碎的国家如何承受这些难民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随后的数年中又拥入了三百万人，外加从东德逃亡入境的四百万人。但这样的移民潮也为联邦德国的重建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当俄国在掠夺他们的占领区的同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给德国的西方占领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援助（虽然在去除了占领和维修费用后，其净援助额一直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质疑；不管如何，德国所获得的紧急援助额还是低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1948年，闻名于世的货币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这项改革产生了坚挺的货币西德马克。但甚至这项在德国强行实施的改革，也并非是人们公认的那样，由他们的财政大臣路德维格·埃哈德（Ludwig Erhard）所为，而是由美国人提出的（只是被埃哈德公开地双向蒙骗而劫为己有，此事件的资料可写另一部剧）。货币改革也加深了东西德的的分裂，因为苏联拒绝在它的占领区接受西德马克。然而这对西德是有利的，因为它标志着整个世界进一步划分成两大竞争的阵营，冷战的敌对迅速把被美国击败的敌人转换成前线的前线同盟军。

德国政治家们极不情愿接受他们国家分裂的局面，而西德

对这一政治分治实体的理念又一次起源于美国人（据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 称，这一理念最早由美国驻军最高指挥卢西斯·克莱 [Lucius Clay] 将军提出）。甚至新国家的宪法也是在占领军要求下所制定的，尽管这一宪法（仅仅被称为基本法，以避免在宪法上接受国家分治局面之嫌）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大法。

然而最终，依靠自己公民的努力——完全靠工人夜以继日的辛勤劳作，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各类专家和企业家的知识才干，靠广大百姓把公众利益视作自己的事业而不遗余力，靠创建它的领袖们的政治智慧，一个崭新的国家得以成功崛起。基本法通过并实施，联邦大选在 1949 年举行。然而一幅复杂的政治画面已经产生：版图，德国的各省行政图（当时为十一个省），以及它们各自的政府，它们迥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所折射的异质性上溯到日耳曼各邦国在 1871 年合并为日耳曼帝国的时期，而它们这种政治个体性的混合以及对波恩联邦政治的参与形成了现代德国政治极为复杂的特性。

自 1949 年首次大选，老谋深算的康拉德·阿登诺（Konrad Adenauer）大权独揽以来，联邦政府已历经多次危机与丑闻。其间经历了政府议员与官员被揭露或涉历史罪行或为东德间谍的多次丑闻，也度过了国家主义右派的复兴和选民们对昔日光荣的缅怀等若干危机。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东德版图回归祖国的渴望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长期而严峻的困难。但是联邦共和国成功了，显示了它的稳定平和。依靠政治联盟作为生存途径，这在英国和美国未能成功，在法国和意大利屡遭挫折——当年魏玛共和国正是因为这种联盟而垮台，并招致了希特勒的独裁和德国民族的灾难。然而联邦德国却得以幸存，毅然挺了过来。在联邦德国成立以来，历届执政的德国政府均为联盟，通常是

CDU（基督教民主党）/CSU（基督教社会党——由北部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保守联盟）为一方，而少数党和自由民主党（自由派人士）为另一方。

然而，到了1966年，联盟政治发展到异乎寻常的顶峰，被称之为“大联盟”，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的外围盟友不再是自由民主党，而是多年来一直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对手的社会民主党。当年缘于一场大雾，他乘坐的来自柏林的飞机而晚点，造成了维利·勃兰特违心而不得已地被他的党内同人赫伯特·魏赫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拖进了这一联盟。但是，又一次，协议奏效了。凭着他的魅力、他几门流利的外语、他无可指摘的政治履历，勃兰特众望所归地担任了外交部长。虽然他憎恶来自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理——曾经是纳粹党员的季奥格·基辛格，声称见到他便有生理上的厌恶，大联盟持续了三年，而且被某些政论家们认为是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府。

1969年秋天的大选又一次改变了联盟政治的格局。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席位仍落后于基督教民主党，但社会民主党的席位已增加到同自由民主党结盟便拥有足够的席位成为联邦议院的微弱多数。魏赫纳和施密特反对这一结盟，他们仍坚持原有的联盟。但这次勃兰特一反常态，果断地抓住了机会。原先魏赫纳和施密特把他拖入“大联盟”，现在他把他们拉了出来。他未跟他们打一声招呼，便在大选之夜在电视上宣布他将同自由民主党结盟而组成一个新的政府。他成功了，三个星期之后新一届的联邦议院选举他为新任总理。

这就是本剧的开场。

两股相互对立的发展力量鬼使神差地把社会民主党和选民们的距离拉近了。首先是十年前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后党的

性质的变化，在勃兰特、魏赫纳和施密特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其二，大选前几年德国的街头事件改变了选民们的民意基础。

1968年，学生运动席卷欧洲和北美。但是柏林的学生运动早在一年前就发生了。导火索是一场反对波斯（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活动，在警方铁腕的镇压中，一个名叫班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的学生被枪杀了。于是示威、罢工和静坐的浪潮此起彼伏席卷全球，犹如压抑已久的能量在地震中释放。这是因为汹涌澎湃的理想主义思潮被保守妥协的议会政治所禁锢。除此之外，德国人民因另外两个原因则更加沮丧。其一是青年一代意识到德国社会的基石建立在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碎石上，而国家社会主义由于潜在的势力从未被清算。其二是战后德国大联盟政治在舆论上空前的一致性，对立空间只剩下极少数毫无力量、立场软弱的自由民主党人。

于是，激进的左翼力量就成立了非正式“准议会反对派”。这个混乱的组织，不用说，其混杂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正式的联盟组织。我1972年来到柏林时，特别令我关注的是它的纷杂组合的成员。其中一部分是社联党（“社会联合党”曾经是东德的执政党），一部分是毛泽东主义者，一部分是怀旧的返祖者，魏玛时期老共产党人，还有一部分是从事残杀活动的恐怖主义者。各种不同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实业公司在柏林市涌现，形成了一个“左翼性”社区，那里的酒馆和咖啡店以“同志价格”销售饮料蛋糕。

这一运动使许多从未投身的选民们转而同情左派。一部分活跃而有政治能量的成员便在现实政治体制内拓展自身。他们宣称进行“一次体制内的长征”，其行动包括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内以宪政手段来扩大控制力。而这一切使得社会民主党在

1969年大选中的选票得以增长(3.4%)而赢得了大选。但党内因此也产生了压力,新的成员对于社会民主党成功的高度期盼,给了勃兰特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巴德-梅因霍夫组织这样的极左分子,组成红军小分队,屡屡抢劫银行,刺杀法官等,造成了选民们的反弹。而勃兰特所显示的向苏共做出让步和承认其东德的附庸政权的趋左姿态甚至比过去更令人担忧。于是他必须设法采取措施安抚人民,其中一项就是1972年1月颁布的所谓“激进分子法案”,对外称为Berufsverbot(职业禁止法),制定该法是为了在教育和其他公共职位上排斥激进分子。如果说勃兰特的最大成就是东方政策(又称德国国内政策,因为该政策的一部分涉及德-德关系),那么他的最大失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这反动内政法来平衡东方政策。

所有政治都应该是复杂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现实地解决无法调和的利益和理念的分歧。而所有的人,也是复杂的——但勃兰特(就像德国政治)或许是更加复杂。他无疑要比他看起来复杂得多。在公众场合,他那令人心仪的亲热、坦荡,甚至在他最为迷茫的时期,也体现出他的正直与人性,这种品格深受世界不同地区人民的回应与喜爱。喜爱他的人甚至包括新左派人士,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身为东德间谍的私人助理。然而勃兰特的同僚们也不时地私下埋怨他的弱点:他的迟疑不决、回避矛盾、不善沟通、忧郁症,还有他的自负。他总能赢得人心民意,却少有真心挚友。他能在大庭广众与人们坦诚心扉,但无法同许多个体的人沟通交流。

然而,他成功了;他实现了他伟大的目标。对人们来说这也是最难理解他的地方。他所演绎的那独特的一幕,给世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给一个生命以定义与证实,也几乎陷世人于困惑之中。

就像我的前一部剧作《哥本哈根》，人们依然关注着这部剧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虚构。不管如何，剧中的人物都已撒手人寰，因而他们讨论的真实事件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是可以争议的，但其分界，在我看来，是颇为明晰的。然而，一些刨根究底的访谈者仍然郑重其事地问我，观众是否会被我误导而以为他们在观看历史“真实”。

本剧仍期待着合理的意见与反馈。剧中的人物都以生前状态出现，他们所投入的事件以现在时态展开。这些人物的台词很少是历史人物的原话。如果我的剧中人所表达的情感与理念同历史人物的情感与理念巧合的话，那应该是阐释与推测。事件本身及历史背景已被尽可能地简化。任何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会毫不犹豫地本剧置于虚构作品类的架上。

但是，任何感兴趣的人会发现，这部虚构作品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所有政治事件都是真实的：爱尔福特之行与华沙之行，议会多数票的流失和不信任案的投票，1972年大选的胜利及随后的危机困境。剧中主人公的性格依据来自历史学家及观察者们所提供的历史人物的原型。勃兰特的嗜酒和好色是无可争议的，还有他的“发烧性感冒”和爱说笑话也是无疑的。（剧中勃兰特所说的笑话几乎都来自一本他搜集的笑话集。^{*}）所有勃兰特回忆的童年时代和1930年代为社会工人党从事地下活动的经历均来自他的回忆录和可靠的传记。联邦总理府的尚玻宫（Palais Schaumburg）的生活原型照片来自各种档案记录。特别专列上的生活也是如此（该列车当年为帝国元帅戈林所建，而今存列在波恩的历史博物馆）。

^{*} 此书和本后记中提及的所有其他的书，见最后部分的参考书目。

剧中所涉及的两项暧昧可疑的事件均取自历史事实。其一就是据说拯救了勃兰特的联邦议会不信任案投票的贿赂事件。事件的真相在一年之后逐渐暴露，那是在1973年的夏天，一位名叫尤利乌斯·施泰纳（Julius Steiner）的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终于承认自己收受了五万马克而未投勃兰克的反对票。他声称这笔钱来自联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的主管卡尔·维南德（Karl Wienand）之手，此人曾臭名昭著地帮助赫伯特·魏赫纳为基督教民主党做了为数不少的暗中交易。这些交易令魏赫纳颇为自得。这笔经费来自Stasi，东德国家安全部^{*}。这点在东德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局[†]的传奇首领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的回忆录中也得到证实（此人在同事中昵称“米沙”[Mischa]，据说堪称为约翰·勒·卡里的卡勒[John le Carré's Karla]的典范）。尽管维南德本人否认此项指控，沃尔夫的证词仍被1994年审判他的法庭接受。这样，东德国安部档案中第二个基督教民主党议员的名字得以曝光。

另一事件就是联邦德国以重金秘密赎买东德政治犯，并赎买政治犯家属，使他们获准离开东德与家人团聚。DDR（东德政府）[‡]是暗中干这桩敲诈买卖的，交易人是一个叫沃尔夫甘·沃吉尔（Wolfgang Vogel）的东德律师。当我在1972年偶然得知这桩交易时，国际大赦组织的官员请求我不要在我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披露此事，以免危及他们的营救计划。此项交易的金额是如此巨大，它解决了当时东德对西德每年贸易额的20%的赤字。仅根

* 更应称MFS（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其职能为对内负责监视民众对外负责情报工作。

† HVA（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国外情报局，纪尧姆所属组织。

‡ 英语名为GDR，但似乎就像USA在德语中是VSA一样令人不解。

据沃吉尔自己的记录，自1964年此项交易的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联邦德国政府共赎买了33,755名政治犯以及政治犯家属215,019人，赎金总额为34亿3千6百万马克。

京特·纪尧姆这个角色是这部剧中最传奇的人物。然而，我也是紧靠历史人物的原型的。他几乎是和勃兰特同时进入总理府工作的。对他的政治背景的怀疑就像剧中所述被人们忽略了。勃兰特的确几次要求他的人事主管霍斯特·埃姆克（以及后来的继任者京特·格莱伯特）换掉纪尧姆；但他还是不断地得到提升。在1972年大选的竞选初期，他成为勃兰特的首席私人助理，担任特别专列的主管并处理勃兰特的文件档案。在旅途上他像侍者一样陪伴着勃兰特，负责处理一切事务，包括同波恩及世界各处的联络。

在历史记录中他有许多照片，因为许多勃兰特的照片中都有他。他总在现场的一角，在背景中或在总理的身后几步，两手优雅地合在身后，低调、随和，敦实的体态，温和的笑脸上架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他用之不竭的工作精力和同样源源不断的幽默感为人们所称道。他总被人们觉得 kumlhaft（平易近人），一种典型柏林人的性格。根据《名人》（*Die Zeit*）杂志，他身上一直有着柏林人后院烧烤的气味。聚在总理府的许多记者似乎都喜欢他的随和友善。勃兰特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过于殷勤顺从。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勃兰特自身的一种暗影，同样地讲究生活品位，喜欢同样的女人。《名人》杂志的明星记者布琳思（Wibke Bruhns），据称是同勃兰特有染的女人中的一位，在她的忆文中，称纪尧姆似乎是“不存在的……一个仆人——不是人而是室内的一件家具。你会觉得他在那儿像是一把椅子”。库琳（Marianne Wichert-Quoirin），一位熟识纪尧姆的地方记

者曾告诉我，纪尧姆身上明显有东德派遣人员的特点——稍稍守旧而拘礼，总是西装革履，为女子买鲜花并帮助她们穿大衣等。

他担任勃兰特助理的工作是极为辛苦的。一天工作的结束是当他深夜在勃兰特桌上摊开最后一叠文件，而清晨收起这叠文件用绿笔标出勃兰特的批复是又一天工作的开始。在他深夜休息的几个小时里，为他的另一方上司复印、拍摄文件又占去了许多时间。他的家庭生活是暗淡的。维布克·布琳思去过他和她妻子居住的那间无名公寓，据她的观察，房内摆设着人们送的那种盆栽植物；“没人喜欢它们，也没人扔掉它们。”克里斯特尔（布琳思说她是那种大嗓门、说话尖刻、没有魅力的女人）也是个间谍，原先她是上司眼中的红人，直到京特意外地潜入了总理府。他们的婚姻已经触礁。他所有的安慰就是同他的联络主管共享精美的午餐和晚餐、几个暗中的婚外情人、他的十几岁的儿子皮埃尔，还有深藏在他心中的巨大的秘密。

除了1972年他的一次酒后违法驾驶外，记录在案的似乎只有一件事，由此可见他生活在何等紧张的压力之中。此事发生在酒后驾车的一年之后，在他陪勃兰特去法国南部的途中。根据勃兰特的回忆录，当时勃兰特接到报告，说纪尧姆在酒后睡着时，一本笔记从他口袋中滑出。在陪同总理的卫士轻轻把它塞回去的那一刻，纪尧姆醒了过来嘟哝着：“你这头猪！你休想抓住我！”

毫无疑问，京特·纪尧姆并非仅仅是尚玻宫里同时运作着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被捕后的那年夏天，当他最后出现在法庭上时，一些记者们发现了他形态、举止的巨大变化。《明镜》杂志的文章认为，人们低估了他，新的纪尧姆显然是极具“判断力、活力和意志力”。他神采奕奕，那种出众的直率和真切的热情令某些女性为之倾倒是可以理解的。又过了很久，在他释放出狱回到东德之后，在一次长时段的电视访谈中，他又一次

发生了变化。让人无法联想波恩时代矮胖的低调人物会是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这个清瘦的留须的人，他言谈警惕、不动声色而又谈吐锐利，不像是唯唯诺诺的小军官，而像个退休的高级官员。

史料中关于对纪尧姆的全面监控是最难令人置信的。勃兰特确实被告知其助理涉嫌为潜伏间谍而被要求保持沉默。他的确被允许让纪尧姆作为唯一的助理陪同他去挪威度假，因为维尔克和他的副手席林（Schilling）已有了他们自己的度假安排，纪尧姆确实受权处理所有来往波恩与挪威之间的电文而不受任何监控。纪尧姆和他的妻子确实举行了一个晚会招待所有保卫人员。来自史料的还有关于“第二个儿子”和“第二个男人”的滑稽的混淆，以及事件的延误。

其他的细节我持谨慎的态度。尚玻宫屋梁间的报时虫*和另外一些有趣的细节均来自出版物。但其出处是纪尧姆自己的一些回忆录——因而需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这些回忆录是代笔的，先是1988年在东德出版——不做公开发行只作“内部使用”（东德安全部门）——然后，两年后在联邦德国重新出版，马库斯·沃尔夫，在其回忆录中（当然，也只能作参考），说纪尧姆“写此书的用意之一是为了利用此事件取笑波恩政府（我们情报局对原稿做了仔细的润色。一是散布假情报以保护其他的情报来源，二是宣传我们工作的业绩和意义）……”。

尽管（或许正因为）它暧昧的出处，纪尧姆的书出奇地吸引人。但在1989年东德崩溃到1995年他去世期间，记者古伊

* 纪尧姆称其为木蛀虫，但虫害专家告诉我它如果发出叩击声，就一定是报时虫。

多·诺普 (Guido Knopp) 在为他制作一个电视节目时曾对他进行了一次长时段的访谈。在访谈中诺普对此书的背景出处更加怀疑。代笔的人, 据纪尧姆说, 是东德国安部提供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 此人怂恿他把往事写得精彩些。其中一直令我困惑的一段是, 纪尧姆声称在瓦劳里斯的毕加索博物馆与情报局的“一位大人物”会面——应该是沃尔夫本人——而现在他完全否认了。他还承认编造了挪威假期结束时求鲍霍斯带假的公文箱回波恩的事。他承认当时有好多箱子, 并非只有两只, 他也并未特意骗鲍霍斯带那个装满了纪念品的箱子。而我承认我在剧中用了他的第一个版本的故事也出于他开头说的原因。

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纪尧姆及他的自负颇有讥贬之意, 他直率地承认他的间谍潜入计划“是当时最大的挫折……等于将球踢进了我们自己的球门”。这也使得纪尧姆在他的书中和他随后的访谈中的说法又产生了差异。纪尧姆在他的书中对沃尔夫极为尊崇信赖。但在他的访谈中, 他的口气则满带讥讽: “沃尔夫先生今天是不应该编造历史的。也只是为了逃避当年的历史责任而已。在上帝与世人面前也未免太急于宽恕自己。”

纪尧姆对于他的其他上司的态度, 也变得更挑剔了。在他的书中他对勃兰特唯有赞美之辞 (布琳思和其他人曾评论过他的态度)。而现在他说勃兰特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共事。他宁愿担任施密特的私人助理, 他觉得施密特是联邦德国最伟大的总理。

剧中另有几处我作了相当自由的处理, 当然大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剧中的纪尧姆同他联络主管之间不断的接触只是他们每月会面的戏剧呈现。纪尧姆同勃兰特在专列上的谈话我也利用了一定的发挥空间。在他的回忆录中, 纪尧姆说勃兰特在旅途中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另外的城市, 另外的面孔, 另外的想法, 另

外的难处——他发现一股新的力量推动着他们。突然间他感到自由和松弛……他变得健谈，欣赏每一个精彩的笑话……在路上，他尽情享受，而我也尽心尽责给他尽可能多的机会。”当没有竞选旅行的安排时，纪尧姆借机想出了“访察旅行”。他声称勃兰特在旅途上有时称他“老兄”，而他也欣然回敬。虽然他从未谈到勃兰特曾同他亲密无间地诉说自己的孩提时代和个人感情。

对于挪威假期我也做了一定的自由处理。两个家庭聚在一起，他们也确实彼此来往。同鲍霍斯悠闲地采蘑菇、马休斯和皮埃尔一起在林间游戏，均来自纪尧姆的回忆录。他说他深知勃兰特把对他的敌意与警觉压在心底——可能仅仅是想糟蹋了那个假期。但是，在同诺普的访谈中，却又出现了大不相同的画面。纪尧姆说在挪威勃兰特对他是不寻常的沉默，部分原因是两人都由于家庭成员在场而克制自己（两个家庭聚在一起时，主要的谈话者似乎是克里斯特尔）。不管怎样，勃兰特不像是忘了他的允诺。勃兰特的演讲撰稿人克劳斯·哈普雷希特（Klaus Harpprecht）告诉过诺普，勃兰特在离开波恩之前曾自己设法收集纪尧姆的罪证。他夜里留了些相关文件在桌上，小心地摆好铅笔与案卷；“在少年时代他应该在小说里读到过这种事。”在剧中，在挪威假期里他借着在纪尧姆面前回忆自己战前从事地下活动的情景来试探他的情节纯粹是我的虚构，就算代替那桌上的文件与铅笔（但剧中勃兰特对当年的回忆完全来自他回忆录中的叙述）。

我只能说，历史事实的结果却是难以置信地超越了我的构思。当年在挪威树林里同纪尧姆的儿子皮埃尔快乐地玩耍的那个勃兰特的儿子马休斯，如今是个演员。最近，一家德国电视台就此历史事件制作了一部电视剧，马休斯又一次进入这个故事。他在剧中扮演纪尧姆。

在叙事上我也做了灵活的处理：在剧中东方政策的产生似乎是非常清晰的，而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勃兰特早在“大联盟”时期外交部长任期内便开始了与东方接触的政策。改善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是当时政界的共识，而难以逾越的障碍前提就是——接受奥德河—尼斯河边界以及承认东德民主共和国。第一幕中勃兰特上任初期所谈的主题均来自历史上他的各次讲话，但我不认为会像剧中那么集中，那么强调。在后来几年中，东方政策成了他的毕生事业，历史学家们公认，这是勃兰特政府的核心政纲，也是他们的伟大成就。他实在太了解这一政策对于相当数量的选民来说是何等的敏感，因而1969年大选后他在新政府施政纲领的宣言中更强调了国家的安全、发展的持续和内政的改革（“追求更大民主”——京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所提出的著名的口号）。今天，人们会想到，英国政府用同样的手段来解决如何加入欧洲的货币体系。

无人知晓在勃兰特总理决定辞职的前夜他与魏赫纳及施密特究竟说了什么。这一众所周知的谈话并未发生在波恩，而是在明斯特艾弗尔休假胜地的一个党务会上；此次会议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又一个谜，就像爱尔福特会议（1891年，社会民主党在该处会议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为该党的主导思想）和巴特戈德斯贝格会议（1959年，社会民主党在该处会议上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我还把一些台后人物的行动移到了台前。根据纪尧姆的回忆录，将纪尧姆提升并取代皮特·罗伊申巴赫德（Peter Reuschenbach）并非是埃姆克，而是罗伊申巴赫本人。同时鲍霍斯也并未自发地把勃兰特搞女人的情况报告诺劳，而是告知了他的讯问者。剧中略去了警察和安全人员是出于戏剧制作中简约舞台人员的需要（实践与隐喻的双层意义）。现实政治是一

项人力密集的事业，联邦议会应当坐满了议员及代表，而尚玻宫里也应到处是部长、助理和工作人员——更不必说一个代表整个日耳曼人的德国。

鉴于同样的理由，我甚至略去了故事中一连串重要人物。其中我最感遗憾的是埃贡·巴尔。巴尔是勃兰特最信任的挚友，曾经是一家电台的记者，在柏林时期担任勃兰特的新闻发言人。在整个东方条约艰难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仅德苏会谈就谈了五十次），他是勃兰特最信赖的代表。勃兰特曾开玩笑说巴尔甚至连法国位于何处都不清楚，但他深谙权力政治法则，天生擅长秘密谈判。纪尧姆称他为“狡猾的狐狸”，别人称他“狡猾的埃贡”。（在英语中，相当于狡猾的迪克，他[尼克松]在勃兰特离开尚玻宫的三个月也被赶出了白宫。）

他是个很有魅力且有些古怪的人，他原先是位钢琴家，但在纳粹时期由于他祖母是犹太人，便无法再从事这个职业。从联邦政府退休后，他开始了一种奇怪至极的嗜好，也是我平生从未曾听说的事——他与妻子专门搭乘集装箱货船旅行，船上的乘客只有他夫妇俩，从一个货运港口到另一个货运港口进行着他的环球之游。当魏赫纳在勃兰特辞职后以党的领导者身份谈到勃兰特的为人与政绩时，巴尔双手蒙脸流起泪来。（据说这場面出现在摄像中，而卡尔·维南德不以为然地声称他先前也见过巴尔哭泣。）就戏剧事件来说，在他从事谈判期间，他在波恩的角色多多少少由勃兰特的另一位挚友霍斯特·埃姆克顶替了。埃姆克帮助勃兰特摆脱忧郁症（安抚他，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作为勃兰特的行政人事主管，他更多地涉入了纪尧姆所经历的事件。

我所略去的另一位勃兰特的挚友是出版家克劳斯·哈普莱希特，他在勃兰特第二届政府中担任总理的演讲撰稿人，而哈

普莱希特的日记为勃兰特离职前的十八个月间的尚玻宫的氛围提供了详尽的背景资料。我还希望在此介绍一位极其非凡的人物，就是曾经在《哥本哈根》一剧中出现过的格奥尔格·杜克维茨（Georg Duckwitz）。1940年，在他担任哥本哈根德国大使馆的海运专员时，他把秘密警察将对犹太民众实施大搜捕的行动时间确切无误地通知了丹麦方面，使得所有犹太居民得以安全转移。战后，他又回到哥本哈根，担任驻丹麦的德国大使，为丹麦人所敬重，后来他成为外交部东方局的主任。勃兰特与他私交颇深，在勃兰特担任大联盟政府的外交部长时，即请达克维茨从退休中复出；在勃兰特任总理期间，他又被任命为处理东方政策的助理。

人们会觉得剧中人物简约的最奇怪之处是看不到一位女性——特别是那些同勃兰特关系最亲密同时又毁了他前程的女性。但当时的德国议会政治是男人的世界；如果当时的社会对合理的男女比例的现实状况不持那么守旧态度的话，勃兰特政府的故事或许就完全不同了。当时联邦议会只有少数女性（在赫尔穆特·施密特宣誓就职时，其中的一位女性就是联邦议会的议长），内阁中只有一位女性成员。通常来说，在波恩政界，政治家们所能看到的女士，仅仅是妻子、秘书和记者，根据剧中历史背景的史料，没有一位女性在当时的矛盾漩涡中充当重要角色。

而位于这个政治漩涡边缘的两位不寻常的女人，则需另外的剧作来描绘她们了。其中一位就是勃兰特的妻子鲁特。勃兰特在流亡挪威之前结过婚，在他六十八九岁时他又第三次结婚。不过，鲁特伴随他度过了政治生涯的大半岁月。1943年他俩在斯德哥尔摩相遇，当时鲁特在德国占领的挪威从事抗德宣传运动。她像她丈夫一样可爱并具有人格魅力，是所有传统的男性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终身伴侣。1974年，在他们那段痛苦的考

验及随后的婚姻离异中，她始终表现得极其体面、宽容与幽默。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关于自己在少女时代从德占区的挪威出逃，翻山越岭，来到瑞典的那段经历十分感人；战争结束时她同维利一起来到柏林，在她的笔下，战火蹂躏后柏林的苦难惨景令人怵目惊心。不过到1974年时，他们的婚姻多少只剩一种社会形式了。她回忆说，在那年辞职危机中，勃兰特回到家中在屋里转来转去“像一个家里的陌生人”。他后来在辞职事件上一直怪罪她（和魏赫纳）因为她当时赞成他负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没有劝阻他的决定。

另一位优秀的女人是纪尧姆的妻子克里斯特尔。她似乎生来就是鲁特的反衬——冷淡、无趣、难以接近。见过她的记者都认为她比她丈夫要聪明得多，在很长一段时期是她担任着重要的间谍角色，因为她在威斯巴登的黑森州总理府成功地谋到一份职业。在纪尧姆超过她而进入联邦总理府后她一定有过一段心态调整的痛苦时期，因为她受命担任他的信使——虽然在两人身份暴露之前她因进入国防部任职而似乎找回了些许失落的自我。

然而，她几乎鲜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机会。东德国家安全部从未征求她的意见便将她同她丈夫派入西德——几乎不予告知而只要求保持沉默与合作——而利用她持有荷兰国籍的母亲的身份获得他们三人在联邦德国居住的许可。在法庭上她竭力维护她与丈夫婚姻圆满的形象，而多年之后她承认她当时只是不想表现出软弱。实际上他们的婚姻早已破碎，之所以维持是因为国家安全部要求他们保持夫妇关系。又过了许多年，在东德不复存在后，她接受了一次长时间而伤感的电视访谈。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连串背井离乡。她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开始在西德的虚幻生活。然后她被扔进监狱，判刑八年后服刑五

年。在此期间同她儿子失去联系（他们的儿子也成了一个牺牲品，他的故事足以写另一部剧作）。随后她又被弄回东德。六个月后当她丈夫被交换回东德后，她又被他抛弃。接着东德崩溃，她又被自己的祖国抛弃，陷入了另一个陌生而格格不入的社会。访谈结束时，她默默无语地坐了半晌，陷在往日的岁月之中。

最后她说：“惨淡的一生。”

剧中还有第三个未出现的女子的身影：诺拉·克雷施曼（Nora Kretschmann），纪尧姆的联络上司的妻子。但我的阿诺·克雷施曼自身也只是个简略的出现。在纪尧姆进入总理府的初期，他的联络上司是另一人，此人姓名他未曾提起。在他同诺普的访谈中，纪尧姆说克雷施曼是在1972年总统竞选时接任的。虽然纪尧姆在回忆录中把克雷施曼的上任时间提早了一年，还提供了许多背景细节，但我相信访谈版本的说法更可能是正确的。虽然克雷施曼比他年轻，两人似乎相见恨晚。首次见面一起用午餐两人便开始毫无拘束地谈上帝、谈世界，就像两个男人举着满杯啤酒泡沫在消磨快乐的下午时光。从那以后他一直担任纪尧姆的联络上司直到纪尧姆被捕。

他们原定的会面计划应该在一间船舱里，而那样，纪尧姆就得学会驾船，对一个大家都知晓讨厌运动的人来说就显得怪了。所以最后，他们说定就在波恩公开见面。而当时他们的会面是如此公开以至克雷施曼有时会来到总理府用内线电话找他。但通常他们在饭店和酒吧见面，经常是交际场合的夜晚，妻子都在场。纪尧姆说克里斯特尔和诺拉处得很好，如果这是实情，那一定是他妻子暗淡生活中的亮点。

克雷施曼夫妇在我弄清楚他们之前一直是我虚构的人物。他们是一对夫妇，姓名不详，以“弗朗兹·唐德拉”（Franz

Tondera)和“西格琳德·费科特”(Sieglinde Fichte)的化名先后单独地被派往西德,他们都有各自完全不同的掩盖身份的说辞。根据纪尧姆的回忆录,弗朗兹为一家著名的汽车公司而来到西德(他未说哪一家),而西格琳德放弃了在东德担任兽医的专业训练,在工厂里同土耳其和希腊女工们一起在生产线上劳作。他们被指令上演了偶然在滑雪场上相遇,相恋,求爱等整个过程,然后再重新结婚一次。于是现在成了乌尔姆的西格琳德·费科特,不然就是斯图加特的厄休拉·贝尔(Ursula Behr),或是先前科隆的西格琳德·唐德拉。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唐德拉夫妇成了阿诺和诺拉·克雷施曼夫妇(据《镜报》,他们的原名根据“唐德拉”字母的重组而提取)。当纪尧姆被捕时,克雷施曼夫妇连同他们所有的化身,消失得无影无踪。东德崩溃后,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曾让那么多人曝光,但经过万般搜寻仍找不到他们两人在国安部档案中的一丝痕迹。

关于此案的另外几个问题尚未回答。纪尧姆开头传递的究竟是何情报?他更喜欢向他的联络上司口头汇报——主要是他在总理府内获得的小道新闻——当然是在1972年竞选之前,在竞选活动中他才开始接触到重要文件。勃兰特在给审判纪尧姆作证*时说,档案与信件远不如他从非正式渠道获得的思想与理念那么重要。各家记者都有此类报道。“与总理大臣共进午餐,与市长同饮咖啡——在那种场合的谈话并非字字斟酌。政治领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比如,在一个党的会议休会期间,施密特、魏赫纳和勃兰特去一家酒吧继续交谈——纪尧姆会坐在

* 此案主要内容的来源为新闻报道(通常是众说纷纭),因为在德国法律中没有正式的法庭审理报告,只有法庭显示的作为判案依据的罪证记录。

旁边的桌上……在一系列党领导会议之后，坐在车中，勃兰特‘不愉快心情’的宣泄，或说起某人‘脾性’……当社民党的首脑们在喝咖啡时的谈论——一天工作之余时——什么事更重要，谁的重新任命或不予任命以及何处……他能够从这些私下的交谈和对记者们宣布而后成为新闻标题的官方报道中捕捉到蛛丝马迹。他所了解到的远远不止国家机密——他所了解到的是形成最后决定的那些心态、关系和发展过程。”

就像巴尔的证词：“他总是在场，但人们意识不到他。”维尔克也回忆起纪尧姆对总理府的事务无论巨细总要求在场，不管是否涉及到他。在他同诺普的访谈中，纪尧姆说自己记不起传递了哪些情报，但他承认肯定包括所有一切他能插手的涉及到同莫斯科和东柏林谈判事务的情报。正在研究东德国安局档案的专家斯蒂芬·考诺帕兹基（Stephan Konopatzky），在这些存放于柏林的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编号为 XV/19142/60 和 XV/11694/60，即汉森和海恩兹，以及京特和克里斯特尔·纪尧姆的档案内容极少——有价值的就更少了。他认为纪尧姆的情报或许是由于它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而有它特殊的转达渠道，所以在档案中并无显示，也更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独特的身份而对他的使用是非常审慎的原因。然而，人们会想到阿诺（即弗朗兹）对他的每月的问询……口头汇报的那一切究竟去了哪儿？还是对他支持有加的阿诺认为那一切都不值得汇报？

如果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说谎，他应该收到了比档案中多得多的材料。他说，在勃兰特 1970 年 3 月出访爱尔福特之前——譬如，甚至就在纪尧姆刚进总理府，仅仅负责处理工会联络事务时期——他“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加上通过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我们对勃兰特的意图和忧虑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他还说：“纪尧姆对我们东柏林真正的重要之处在于

他的政治嗅觉。根据纪尧姆的判断，我们能够并较早地认定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尽管还有矛盾之处，却标志着西德外交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转变。正是这样，他的工作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勃兰特和他的盟友的意图的信赖。”

在档案与沃尔夫的叙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入，在档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勃兰特婚外情的材料，而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知晓“纪尧姆很快就发现勃兰特婚外性多而频繁”。后来在纪尧姆暴露后，联邦安全局局长在报告中提到了勃兰特的私生活，也确实了沃尔夫所说的勃兰特“同女记者们，偶然相识者和妓女们发生性关系”。沃尔夫声称“纪尧姆自然是一直告知我们勃兰特的这种行为”。所以，幸存的档案或许并未对此有全面的记录。

法庭在审定此案中所能依据的材料范围是狭窄的。对纪尧姆的罪行指控是当时的最高罪名“schwerer Landesverrat”——叛国罪。而仅仅凭传递小道传言和道听途说这类情报——即便是传递文件，如无人知晓那些文件——是无法判定此项罪名的。因而此案主要依据便是纪尧姆在被捕现场承认自己为东德军官，以及窃取挪威假期中来往的电传文件——那是唯一能确定他经手的文件。

不管怎样，至今尚未搞清这些材料最终是否送抵东柏林。在他的回忆录中，纪尧姆说他在假期中并未试图接触他的联络上司，而只是通知了他携带及存放这批文件的方式，以及返回波恩途中在瑞典一家旅馆过夜的安排，为信使拍摄窃取这批文件的实施做了详尽的计划与安排。在诺普的访谈中，如前所述，他收回了先前所说的故意迷惑鲍霍斯，让鲍以为是自己带着文件的这一说法，但坚持事件的其余部分是如实的。可是在沃尔夫的回忆录中，这一切都蒙上了疑影。沃尔夫说复制的文件是

由克里斯特尔在波恩的卡斯尔思卢何饭店交给一个叫阿妮塔的信使，当阿妮塔发现自己被跟踪便将文件扔入了莱茵河。因此他从未收到这些文件，但此事他瞒着纪尧姆以免伤他的自尊心。考诺帕兹基也证实在档案中没有挪威信件的任何痕迹。

然而奇怪的是，沃尔夫从未提及纪尧姆关于瑞典旅馆由信使获取文件的安排。更奇怪的是，他叙述了纪尧姆复印的三封最重要的信件的某些细节却不解释情报的来源；当然不可能来自纪尧姆的庭审，因为相关证据是摄像提供的。更奇怪的还有，在古伊多·诺普所作的纪尧姆专题的电视访谈中，他说公文箱中的文件确实交给了东柏林，但他拒不说出了发生了什么。

克里斯特尔在卡斯尔思卢何饭店会面的故事巧合地在纪尧姆的书中出现。按照沃尔夫的说法，共进午餐的同伴发现她被监视着，而她离开饭店后发现自己被跟踪。在纪尧姆书中这位女子不是阿妮塔而是托敏，而纪尧姆的审讯者在问及其令人怀疑的信使身份的时候不禁哑然失笑，因为纪尧姆说这位女子认为监视她的人是她丈夫雇用的私人侦探，原因是她当时正红杏出墙。

对于若干有争议的史料记录，我不得不做了取舍。根据勃兰特对事件的记录（见本章后叙），他的卫士乌尔里希·鲍霍斯“含着眼泪”来向他说明，他是被逼供才向他的讯问者交待了关于勃兰特的女人们的情况；而勃兰特对自己已经被收集的材料如此之多大为吃惊。此后很久，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卡尔·维南德说是鲍霍斯主动来提供证据的，因为他和其他保卫人员同所有日常戴礼帽持雨伞的普通公民一样对总理的行为感到震惊。维南德的记录和他自己的现身说法均缺乏可信性，但总有人首先提出了女人的问题，根据纪尧姆对他们的了解，我还是采用

了维南德的说法。

对于因党内阴谋而造成勃兰特辞职一说，我也在剧中做了表述。主要集中在社会民主党主席赫伯特·魏赫纳所担任的幕后角色。魏赫纳是个人们公认的不择手段的政客，他同勃兰特的关系一直不睦，甚至就在大联盟时期，俩人之间的沟通也得通过中间人进行。勃兰特只手单枪赢得了1969年的总理大选，或许，也是向公众宣示他对魏赫纳的脱离。而这并没有改变魏赫纳对勃兰特的轻视。他认为勃兰特是个轻量级。出版家鲁道夫·奥古斯坦曾听到魏赫纳说勃兰特和瓦尔特·希尔（Walter Scheel，自由民主党主席，时任外交部长，勃兰特的盟友——剧中缺席的另一中心人物）两人都是花花公子——“他们的强项与其说是管理还不如说是勃起”。在勃兰特的第二任期内，魏赫纳不遗余力地反对他，为施密特的接班鸣锣开道。但在勃兰特辞职的几周前，当施密特终于宣布竞选总理后，魏赫纳又似乎突然醒悟到勃兰特在选民与党员们心目中的威望对他是何等的重要。于是两人又稀奇古怪地重归于好——（剧中略去了这一情节以减少过多的复杂性）在勃兰特家中的一次长谈，许多无言的沉默，许多杯红葡萄酒，密谈的主题自然是反对施密特。

这一奇怪的转折，并未消除勃兰特及新闻界后来对魏赫纳是总理辞职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怀疑。根据新闻界的观点，辞职事件是魏赫纳同他的心腹——内政部安全局局长京特·诺劳的合谋。据称，1973年，诺劳在向他的顶头上司——内政部长根舍报告之前先向魏赫纳汇报了纪尧姆的重大嫌疑。而诺劳坚决否认此事，他坚称说他在5月29日向根舍汇报了此案，到6月4日才告知魏赫纳。后一个日期他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他的生日。但是根舍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似有怀疑。“我担心的是”，他说，“诺劳向魏赫纳报告调查详情。大家都清楚，魏赫纳对勃兰特担任总

理之职日益反对，他若得知这一切会怎么做？”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阿诺尔夫·巴林（Arnulf Baring），是比较同意这一说法的，诺劳给魏赫纳透露情况的日子可能是5月23日，就是案卷出现在诺劳桌子上的当天，根据他的研究“这极为可能”。

根舍不喜欢诺劳，事后怪罪他在汇报此案相关材料时说假话。他的行为“证明过去人们对他的许多偏见是正确的”。勃兰特也不喜欢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讥讽地称他“据称是能干的”。无疑，诺劳此案办得极其愚蠢无能，几乎不能再糟了。在随后的电视访谈中他的形象令人们不得不认同所有对他的偏见与怀疑；你会感到，就像维南德所说，如果他干的不是二手车交易，或许还做不到这个份上，纪尧姆也逐渐相信这一阴谋的存在——但他认为魏赫纳、诺劳和根舍都参与其中。据报道，他在1993年他的原上司马库斯·沃尔夫被控叛国罪^{*}而出庭作证时说诺劳不仅是魏赫纳也是根舍的心腹，这两人都企图迫使勃兰特下台。“诺劳拔出了刀，根舍把勃兰特推向刀口。”他对自己用了稍稍不同的隐喻，他说他是一根棍子被用来击倒了勃兰特。

而勃兰特自始至终怀疑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对他的阴谋——它来自赫伯特·魏赫纳与东德首脑之间的交易。勃兰特将此事记在密写本中，在他退休后，他写了下来但一直没有出版（直到1994年），将它始终埋藏在他余生的岁月中。其中心就是人们所了解的魏赫纳与东柏林的两次交往。魏赫纳向勃兰特通报

^{*} 他被审判定罪，但两年后此案的判决被联邦宪法最高法院推翻，其裁决为，对前东德民主共和国情报机构的军官所判之叛国罪和间谍罪不能成立。对于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沃尔夫究竟是感激涕零或甚至因它的某种冷嘲而暗自发笑——这个如今他成为其公民的联邦德国正是当年他奋斗不懈竭力推翻的国家，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未曾提及此事。无独有偶，勃兰特是最早宣布反对指控他叛国罪行的重要人物之一。

过他与东柏林的两次会面。第一次会面者是东德党的领袖埃里克·昂纳克。据魏赫纳说，会面的目的是恢复政治犯和家属团聚的秘密交易。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项交易由于两国最新签订的涉及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条约而只能停止。第二次会面者是沃尔夫甘·沃基尔（Wolfgang Vogel）——秘密交易的中间人，这次会面的话题是双方的经济合作。两次会面的时间存在争议——第一次是1973年的5月29日的晚上，就是在那天诺劳告诉根舍，而根舍则告诉勃兰特关于纪尧姆的涉嫌；第二次是在1974年的5月3日，那天诺劳将勃兰特的女人名单告知魏赫纳。不管怎样，勃兰特坚信魏赫纳同东德还有其他暗中的接触。他怀疑魏赫纳就在与东德的接触中被告知纪尧姆的间谍身份，并且秉承莫斯科的旨意，在1973年的秋天开始对他进行大肆的攻击诋毁。

勃兰特的情报是由埃贡·巴尔提供的。情报来自俄国人，其秘密通道是由巴尔同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模仿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与苏联谈判时所用的“秘密通道”建立的。历史学家奥古斯特·卢戈斯-舒斯堡最近揭开了这条暗道的秘密以及对魏赫纳的指控。舒斯堡说，巴尔和勃兰特所不明白的是，这条通讯链由后来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人安德洛波夫所建立，此人当时是克格勃的总头目。安德洛波夫所以要让魏赫纳在勃兰特眼中信誉扫地，是因为魏赫纳不信任这条通讯暗道并且要重建一道更直接的线路。而安德洛波夫个人当然希望保留它以维护自己的影响。同时，魏赫纳也不赞成勃兰特的关于同苏联的谅解是开启东德关系正常化的钥匙这一理念，他要联邦德国尽力谋求与东欧在更大范围内的和解。

无论魏赫纳在幕后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在明斯特埃弗尔的紧急关头他对勃兰特的支持似乎并非全心全意，勃兰特始终

怪罪他（和鲁特）未曾在他决定辞职的关头劝阻他，而令他后悔终身。

我在本剧的写作中得到了大量的帮助。最早（又一次）给我帮助的是萨拉·哈夫纳（Sarah Haffner），当我刚把自己的创作意念告诉她，她就推荐我读阿诺尔夫·巴林的《权力的转换》（*Machtwechsel*），从而使我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随后她又给我带来了一包包的书并帮我翻译了若干特别艰涩的短语。在勃兰特担任联邦总理期间曾在波恩任职的皮特·默斯伯格是一位政治记者，不久前撰写并出版了勃兰特传记，他不厌其烦地给了我大量的帮助。他还把我介绍给勃兰特的演讲撰稿人克劳斯·哈普雷希特，还请求他的老同事弗瑞茨·普雷特根（Fritz Pleitgen）为我开放位于科隆市的西德广播电台的电影档案室。

伊芙·吉赛尔（Eva Giesel），我的剧作的德国代理人厄休拉·佩格勒（Ursula Pegler）的同事，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才智代我联络咨询。我原计划把更多的重点放在纪尧姆的庭审上，吉赛尔女士竭尽全力为我联系了当年在杜塞尔多夫国家高级法院主持庭审的官员。我还要感谢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兰普（Lampe）先生为我解释了部分德国基本法。感谢勃兰特的长子皮特·勃兰特教授，他主动提出见我，虽然最终我因考虑保持创作的自由度而未能与他见面。感谢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弗雷德里克-埃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的兰茨（Gertrud Lenz）女士，是他们保存着勃兰特的手稿；感谢西德广播电台的普特雷根（Fritz Pleitgen）；感谢德国电视二台为我提供古伊多·诺普对纪尧姆的访谈记录；感谢库琳女士为《科隆向导》（*Kölner Stadt-Anzeiger*）撰写的关于波恩时期的联邦政治和纪尧姆在杜塞尔多夫的庭审的采访文章，

还有芬·阿斯鲁德 (Finn Aaserud) 的挪威语译文。

相关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我平生从未有过这种将被淹溺的感觉，多亏我的研究助理的帮助。斯蒂芬·克罗纳 (Stefan Kroner) ——我选中的助手，这位曾协助《哥本哈根》德文版制作的剧作家显示了他惊人的才情。他不仅难以置信地快速努力，而且具有猜测我所需资料的特异能力。他一头钻入弗雷德里克—埃伯特基金会和科隆广播电台的档案之中，在成吨的剪报及数周的新闻短片中筛选出我所能处理的材料。他觅得一些绝版已久的书，从柏林的东德国安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搜集资料 (这些档案至今未能完全查阅，这是一个蕴藏极丰的资料化石沉淀)。我们还一起快乐地漫游了莱茵兰，凭顾当年旧地，查阅各种档案。

读者若对此案或有关人物及历史背景感兴趣，以下是相关的一些书目资料。

一般

阿诺尔夫·巴林：《权力的转换：勃兰特—希尔时代》(1983, 1998)。该书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通史。其篇幅长(将近一千页)，行文大胆犀利。关于纪尧姆事件和勃兰特辞职的章节写得相对简明扼要，但立论十分深刻。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在总理府：与维利·勃兰特共处的日记》(2000)。哈普雷希特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他在1973年年初担任勃兰特的演讲撰稿人和顾问。他也是勃兰特的私人朋友，在那年政治风暴的艰难中，他为勃兰特提供了一处在法国南部的度假屋，使得勃兰特得以度过精神上的危机。他在尚波宫的生活日记，写得辛辣、世故，而且客观——为我的过简的戏剧

结构图纸提供了有益的纠正与补充。

路德维格·雷林格：《赎买自由》（1991）关于东德政府每个政治犯的索要赎金的价位。

克雷格·惠特尼：《魔鬼律师沃尔夫甘·沃吉尔——东德与西德间的赎金》（1993）。关于政治犯与家庭团聚赎金交易中的总数与金额，来自沃吉尔个人档案。

勃兰特自己的著作

维利·勃兰特：《往事的回忆》（1989）。1994年版的书中还包括《纪尧姆一案的记述》，是他在辞职期间所写的关于纪尧姆一案的记述。此书有英文版，《我的政治生涯》（1992），但其中不包括《记述》。

勃兰特著作全集正在出版中（柏林人版）。其政府的内政与社会政策部分在第七卷《谋求更大民主：内政与社会政策，1966—1974》（2001）；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与东德关系）部分在第六卷《国家外交与东德关系政策，1966—1974》。这一卷尚未出版，但我所用的他对外政策的话和其余的声明摘自：

维利·勃兰特：《讲演与访谈，1968—1969》（德国政府出版，无日期），《联邦总理勃兰特：讲演与访谈》（1971）。

维利·勃兰特：《大笑有益——政治笑话》（2001）。笑话集，大都为勃兰特多年收集的政治笑话。该书在他去世后由她的遗孀布丽奇特·西巴赫-勃兰特完成并出版。剧中大部分笑话出自此集。

勃兰特传记

皮特·默斯伯格：《维利·勃兰特：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领袖，1913—1992》（2002）。最新版本。精心撰写、综合全面，坦然的党派意识，该书前言对勃兰特的政绩做了高度的评价与概述。

皮特科赫：《维利·勃兰特》（1998）精彩、纪实、可读性高。

巴巴拉·马歇尔：《维利·勃兰特》英文版。简短扼要。

格雷戈·舍尔根：《维利·勃兰特》（2001）。简明实用。

纪尧姆

京特·纪尧姆：《证词——历史的真相》。它的原版题为《京特·纪尧姆的证词》，由东德军事出版社于1988年为安全部门及国

家人民军出版，书上标有“内部使用”。1990年该书的修订本由西德重新出版题为《证词》，表明此书是纪尧姆当年在法庭上拒绝呈述的证词。如前所述，对此书应持保留态度。对于其可靠性需参考：

古伊·多诺普：《最高间谍》（1997），以及已出版的相关的电视专题节目（ZDF，1994）；斯蒂芬·克罗纳帮我从ZDF（德国电视二台）搞到了诺普和斯坦恩豪色对纪尧姆访谈节目的文本，该文本似乎尚未出版。虽然它既无日期也未标明出处，它应该是整个谈话的记录，而电视节目只摘用了它部分内容。出现在东德国安部档案中的纪尧姆报告的评估，是由斯蒂芬·考诺帕茨基提供给在西德召开的一次关于东德国安部的功能的研讨会，该会由现在保管档案的联邦前东德国国家安全部文档管理局于2001年11月赞助召开。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

马库斯·沃尔夫：《无脸的人》（1997）。其回忆录用英文撰写。颇为生动感人，在许多历史事件上十分坦率，虽然也保持着对某些事件的沉默。

汉斯-迪特里克·根舍：《回忆往事》（1995）。回忆录。英文版《重建分裂的家园》（1995）。

鲁特·勃兰特：《好友之国》（1992）。该回忆录就像勃兰特夫人自身一样的迷人。

赫尔姆特·施密特：《离别而去》（1996）。回忆录。

奥古斯特·洛伊格斯-舍茨伯格：《赫伯特·魏赫纳的转变之路，从国家阵线到大联盟时期》（2002）。此书是魏赫纳的正传，但只写他到大联盟时期。直到下一卷的出现：

奥古斯特·洛伊格斯-舍茨伯格：《魏赫纳与勃兰特一九七四年五月七日上午的辞职》（刊于《历史岁月季刊》第二期，2002年4月）

京特·诺劳：《我的职责》（1982）。回忆录。相关章节摘自《明星》（1975年9月11日）

霍斯特·埃姆克：《就在那个年代》（1994）。回忆录。

埃贡·巴尔：《我的岁月》（1996）。回忆录。

附文

我和我的影子

约翰·兰赫尔 (John Lehr)

人啊，就是没法了解自己。我们总是非常自信地向外界播撒着“我”的真情实况，但“我”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就像偷工减料做成的盒子，里面盛着多种变化无常的无意识成分，分裂我们，并给我们的思想造成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史与公共史都具有相似的动态性原则。两者都是大家认可的虚拟故事。迈克·弗雷恩的最新戏剧作品《民主》（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就围绕着这个理还乱的难题进行循环论说。“人人都有很大的可能性，人物性格就体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弗雷恩最近说，“一条普普通通的政策的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有点像内阁进行的重大决定……；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民主在涌动。”《民主》由导演迈克·布莱克莫尔配以灵巧的管弦乐，以迅捷而又印象主义的叙事风格，与观众玩着一种墨西哥式的

三张纸牌游戏。变化不居的事件及其观点的喧哗是弗雷恩的惯用手法。这可使他将纷乱不安的心理身份问题隐匿在昙花一现的历史盛况之下。

从表面上看,《民主》叙述的是社会民主党员维利·勃兰特的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他逃过了纳粹的迫害,二战后又从斯堪的纳维亚的流放地回到德国,不久就一路荣升为德国总理——他是四十多年前自希特勒结束民主之后,第一位从德国中左派中荣升的国家领导人。勃兰特的调和政策——他的“东方政策”——有助于调和德国与苏联、东欧(其中包括东德)这些前敌对国家的关系。他的调和政策所带来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德国的范围。“弗雷恩在已出版的《〈民主〉后记》中写到:“这一和解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德国,它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消融了两个阵营的冷战格局——而最终使整个世界出现了勃兰特本人也未能料想的结果:他所承认的这个国家终于走到了它的末日,接踵而来的是整个苏联帝国阵营的崩溃。”

当勃兰特(由罗杰·阿兰姆[Roger Allam]扮演)站在我们面前接受总理就职仪式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位自信帅气的勃兰特。就职讲台为一个两层的白色台子,它既是公共平台,又是尚玻宫。勃兰特的故事由京特·纪尧姆(由康勒斯·希尔[Conleth Hill]扮演)富于热情地讲叙着。他是总理的内勤总管,又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当希尔惟妙惟肖地扮演京特·纪尧姆的时候,相对于勃兰特这个大人物来说,京特·纪尧姆完全是个不知名的小卒——一个矮胖的类似狄更斯小说中的伪君子的小人物,可用对权力的效忠来解释他难以名状的心灵迷失。在勃兰特执政联合政府的四年时间里,京特·纪尧姆与勃兰特保持接触,并参阅了勃兰特的许多私人书信文件。十三年前,京特·纪尧姆和也曾是间谍的克里斯特尔,京特·纪尧姆的妻子,被秘密

地派遣到德国。那时候，克里斯特尔是个更为得力的特工人员。可笑的官僚因缘与十足的运气一起把京特·纪尧姆从法兰克福一个伪装的忠实的社会民主党公务员变为勃兰特波恩办公厅的一个下级官员。就像剧情所演绎的——“要我帮忙吗，赖因哈德？整理档案？复印文件？浇花？……无论事大事小，你需要就叫我。”活泼快乐的京特·纪尧姆很快就让他的主人们感到这个人很好使，他马上就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低级官员以及间谍史上最有力量的鼯鼠之一。

弗雷恩在大学读的是伦理学，与其说他对京特·纪尧姆复杂的背叛行为感兴趣，不如说他对京特·纪尧姆监视行为的讽刺性更来劲。无论京特·纪尧姆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告密者，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副官，他都不得把自己与他的关注目标结合起来。他以一种富有想像的共生性自我膨胀的行为手段，扮演着“那个侍奉两个主子的完美的仆人”。他有种习惯，即行为的转换——他的内心深处就是如此，而且很固执很痴迷。听完勃兰特的一场演讲之后，京特·纪尧姆滔滔不绝地说：“你无法不信赖他。当你置身在听众之中。你仰望着他——而他站在那儿迎着你的眼光回望着你。望着你个人。同你单独交谈。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京特·纪尧姆对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头子来说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对他自己来说，勃兰特和他是“维利和京特，是多变的英雄和他的喜剧奴仆，是堂·吉珂德和他的桑丘·潘查”。

勃兰特曾经说过：“我不想强迫任何人臣服于我，我也不想任何人强迫我服从他。”然而，最后他被京特·纪尧姆背叛行为的暴露（间谍身份的暴露）给拉下了马。1974年，随着一长串勃兰特的婚外情人，再加上涉及国家的一些其他情况的相继揭露，勃兰特被迫辞职。京特·纪尧姆在狱中待了七年半的时间之

后，以交换一帮政治犯的名义被遣返回国。然而，作品《民主》的新奇之处不是对德国政治进行综合性分析，而是解读人性特征中隐晦的神秘性在叙述中设下的陷阱。该戏剧作品解读得很清楚，勃兰特开始时就不喜欢京特·纪尧姆。事实上，他请求把他调离。他说：“这纪尧姆先生，就是做一般的事情也殷勤得过分。霍斯特，给我换个人，好吗？”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逐渐开始信赖他了。即使有人告诫勃兰特，京特·纪尧姆有背叛行径，在他政治上的最佳年月中他仍继续雇佣他。弗雷恩剧中谈及的不是谁在做什么，而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的问题。

有一条线索似乎可以解释京特·纪尧姆内心的空虚程度达到了何种令人惊愕的程度，他献媚讨好的地位使他没有倾向性，他的婚姻一团糟，他与他钟爱的十几岁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只是每周开车去机场观看飞机的起飞。除了工作与偶尔和女人勾搭之外，他没有什么明显的兴趣爱好。他常身着深色西服，说话匆匆忙忙，在房子周围闲荡徘徊，对无意之间听到了什么事情也是不理不睬。京特·纪尧姆简直就是一个游离式的人物。“他们几乎把我给忘了，”他对他的前东德国家安全部上司说，“（我不过是个）衣帽架。没人会注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说得很对。“不存在的牧师”，勃兰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窃听着我自身的缺席”，京特·纪尧姆是这样描述他被偷偷召回东德的经历的。在京特·纪尧姆的关系上，勃兰特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勃兰特从京特·纪尧姆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他的成功是由于他向外界隐瞒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某种程度上说；他尽量不表现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弗雷恩非常聪明地设计了相似的境遇：两个男人都没有父亲，两个男人都是伪装大师，又是赢得别人信任的工程师，两个人物都陷入了他们充当的角色陷阱，两个人物都处于深深的分裂状态。“在暗

光中我看到的是他，或只是我自己的倒影？”京特·纪尧姆在与勃兰特进行一项火车游行时候问道，勃兰特经历了阵阵令人沮丧的后悔事情之后，为了卸去精神负担，向京特·纪尧姆吐露了他的真情实感。这个戏剧作品用了勃兰特的许多直觉感受——“那诉说的声音那么轻，我们其余的人无法听到。”有一位部长是这样评价的。弗雷恩言下之意就是想让心理雷达收取京特·纪尧姆的信号。“我可以是个间谍，京特，”勃兰特一边说，一边玩弄着他的助手，玩弄着我们，“或许就是，像你所了解的。或许正从事谍报工作。”当然，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心理意义上讲，京特·纪尧姆都在从事间谍活动。京特·纪尧姆直呼1930年代躲在挪威时勃兰特使用的名字：卡尔·马丁（Karl Martin），维利·弗莱姆（Willy Flamme），费里克斯·弗兰克（Felix Franke），丘亨·沃特·惠特曼（Quoting Walt Whitman）。勃兰特对京特·纪尧姆说：“‘我会自相矛盾吗？’完全没错，我当时自相矛盾。我宽容，我容纳众人。”当他把自己叫做“有着一层层隐秘夹层的手提箱”的时候，勃兰特常常无法摆脱自身的不断变化，无法摆脱模糊的真实性记忆，无法摆脱真实自我的模糊记忆。“你能想起见到过它一次，但你永远无法再发现它了。……假如这是个由父亲养育并跟他玩给他讲故事的叫赫伯特·弗拉姆的男孩。或甚至承认他的存在而给他提了名字。……我或许本该是他，但我从来都不是。”

在弗雷恩的戏剧呈现中，人物之间相互交替地交流，也向我们叙说。其观点采用叙述的形式，而不用论证的方式。我认为，这是它的不足之处。《民主》确实是一篇有棱有角的散论。不过，剧作家错综复杂的间谍情报活动及其大胆的叙事设计本身还是很壮美的。弗雷恩很有策略，善用技巧。比方说，《民主》之剧的结尾，分裂的德国成了勃兰特自身渴求和谐的象征符号，两个德

国就是勃兰特成功地统一起来的。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之声传遍剧场，勃兰特说：“最终属于一起的又走到了一起。我们分割的自身又回归一个自身。”此刻不但演绎了一项公共事实，也演绎了个体的一段苦痛经历。京特·纪尧姆凝视着他曾颠覆的英雄，宣告了一段丑事的腐臭余味。他说：“不管他去向何处，我的身影伴随着他。依然同在。”这种心理悖论的最后刺激性因素重复着一个政治悖论，且反响非常强烈，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也许就此做了最好的评述。“《民主》，”他说，“意味着政府由讨论产生，但是要想在讨论之下真正产生政府，惟有你能让人们都闭上他们的嘴巴，不再开口说话。”

[本文副题为：迈克·弗雷恩谈维利·勃兰特的背叛行为。刊于《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2003年9月29日。]

（俞建村 译）

弗雷恩谈《民主》

马特·沃尔夫 (Matt Wolf) 采访

沃尔夫 1998年，也是在这个剧场，您的另一部描写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剧作《哥本哈根》举行了首演。而现在这部《民主》讲述的则是在那之后的真实人物和事件。您是否认为该剧是《哥本哈根》一剧的姊妹篇呢？

弗雷恩 当然不是，但是相似之处还是有的。两部话剧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哥本哈根》一剧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以亡魂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遇，试图重新演绎一场已成过去，但是却久久萦绕心间的历史事件。但是《民主》一剧却是把真实的历史事件展现在观众面前。从这种意义上讲，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戏剧结构。但是我采用了在《施主》一剧中使用的相当自由的手法，改

编了场景，感觉上很自由，让演员直接对着观众说：“这件事发生了，接着就会发生那件事。”如果这样做效果会更好的话。

沃尔夫 1984年上演的《施主》一剧中，您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其中，虽然该剧的人物事实上是虚构的两对夫妇。但是近来，您一直在从事有关于真实事件的剧本创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弗雷恩 我自己也不清楚，也不是有意识地做这样的转变。之前我对于《哥本哈根》一剧中的海森伯和玻尔两个角色之间的故事非常着迷。至于勃兰特，他后来的辞职，以及他怎样因他的助手纪尧姆间谍案而下台，我都思考了好一阵子。

沃尔夫 《哥本哈根》一剧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从探索如何使现实人物具有舞台价值方面来讲，是不是使写类似的剧本变得更加容易些？

弗雷恩 我认为《哥本哈根》一剧的成功或许是给我增添了一点自信。当时创作《哥本哈根》的时候我很犹豫，因为我清楚在创作有关现实人物的剧本时，无论你对人物做了多少研究，都无法再回到过去，同他们见面，听听他们说话的方式，捕捉他们说话时的语气。剧本的开头，你会感到有点不自然。但是当所有人物都出来的时候，到后来你会觉得他们控制了整个舞台，角色被他们演活了。我认为我笔下的海森伯和玻尔与他们的原型没有太大的联系，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特征。事实上，在我写完了《哥本哈根》，话剧在纽约首演的时候，我到了后台，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个又高又帅的男人。他对我说：“我叫约亨·海森伯，是沃纳·海森伯的儿子。”我当时简直是胆战心

惊，因为我诚惶诚恐地想在舞台上再现他的父亲，而他在过去的两个半小时里一直注视着发生的这一切。他要表达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说：“您笔下的海森伯一点都不像我的父亲。我从没见我的父亲为了什么事激动过，除了音乐以外。”这一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刻画现实人物是多么不容易。然后他又接着说：“但是我能够理解，在戏剧中，您不得不把人物刻画得情感丰富。”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历史剧创作来说是非常有见地的评论。历史剧的创作确实给了你一个机会，把你生活中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想要抓住但是没有抓住的东西都表现出来。因为人生太匆忙了，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很难抓住它，去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有当你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才渐渐开始醒悟。在戏剧创作中，你可以暗示那些隐藏于真实事件背后的原委，决定了人物行为却丝毫未被察觉的情感。所以当我在写《民主》这部戏的时候，我觉得在将现实人物融入舞台表演方面确实比以前有信心了点，但是真正创作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当你知道一两个剧中人物至今仍然健在，但是你对将来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却无从知晓。

沃尔夫 您曾经提到您对维利·勃兰特非常感兴趣。那么在欧洲这么多领导人当中，您为什么选择了他；在这么多国家中，您又是为什么选择了德国呢？

弗雷恩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德国这个国家非常着迷。我很喜欢德国，对它的历史更是如痴如醉。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德国现代史确实是残酷了点。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欧洲历史都是围绕着德国展开的。正如我在已经出版的《〈民主〉后记》中提到过的，在整个德国历史中唯一能引起

英国读者兴趣的也就只有纳粹统治的时期。但是真正能激发我对于德国的丰富想像的却是战后那段时期：在遭受了1945年那场物质和精神的摧残之后，德国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每次我去德国的时候，当我想到德国人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了不仅是欧洲大陆最繁荣的社会之一，更是最稳定、最福利的社会之一时，就会觉得这一切很令人感动。所以现代德国深深吸引着我，特别是维利·勃兰特，他是个极富魅力的公众人物，不仅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他是矛盾的统一体：极富个人魅力的公众人物，同时也是极具说服力的国家领导。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是他的酗酒贪杯，也不是他的风流韵事，而是连他的同僚都曾抱怨过的优柔寡断。同时他也郁郁寡欢。虽然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大的亲和力，但是有好几次他都因为抑郁症而一言不发，当他不得不卧床休养的时候，便对外宣称是因为得了感冒。性格分裂的角色总是那么引人入胜，维利·勃兰特故事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另外一个性格分裂的角色京特·纪尧姆将他拉下了马。纪尧姆是勃兰特的忠实下属，对他忠心耿耿，辅佐有佳。他也是社会民主党事业的忠实拥护者。但是与此同时，纪尧姆又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名间谍。他同时追求着两个截然相反的目标。他一方面为勃兰特服务，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破坏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似乎对他的良知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因为人人都在想方设法同时实现多个梦想，由此说来我们都是矛盾冲突的人物，只是比起大多数人来他身上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更加戏剧化。不管怎样，将这样的历史搬上舞台，肯定会是一部好戏。

沃尔夫 迈克·布莱克莫尔执导的这部戏引起了关于双重和分裂的争议。戏剧的故事背景本身就发生在一个分裂的国家，而正如剧本所写的那样，维利·勃兰特要帮助这个国家实现统一。这里是否存在着某种争议？

弗雷恩 是的。令人吃惊的是，左翼的约翰·格罗斯（John Gross）和右翼的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都对此提出了异议。两人都表示，勃兰特促进了德国统一和冷战结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功劳应当归给罗纳德·里根总统，是他致使苏联方面无力承担冷战的巨大开销而结束冷战，我对此也不置可否。冷战的结束的原因远比想像的复杂。勃兰特成功说服德国人采纳他所谓的“东方政策”与东方进行和解，尤其是对苏联、波兰和东德和约的签订，以及对东德国家主权的承认，如果说这是缓和冷战的第一步的话倒是恰如其分的。我同皮特·默斯伯格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是最近一段时期给勃兰特立传的作家，也是一位笔锋犀利的政论记者。他是德国电视台常驻伦敦的通讯员。在波恩，他也报道了很多在剧中提到过的事件。他说，勃兰特承认东德的存在，但是这种承认却最终使东德解体，乍看之下，这是互相矛盾的。这就意味着，苏联方面开始相信西德，他们开始觉得，“那好吧，既然他们不再试图收复失地，那我们可以相信他们。”所以当东德开始瓦解的时候，苏联方面也就任由东德，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生自灭了。此前，要是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就是像1954年在东柏林发生民众暴乱的时候，苏联的坦克早就已经开到进行镇压了。当到了19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开始瓦解的时候，苏联方面已经完全不派兵支援了。

这就是东德消失的原因。有人说是勃兰特引起了这场政治巨变，东德人毫无疑问要将此功劳归给他，我觉得这个观点倒是正确的。当1989年推倒柏林墙之后，在原东德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因为人们把他视为这次事件的总设计师。

沃尔夫 您之前就写过间谍题材，事实上，最近您还写了部小说就叫《间谍》。我有好几次在想，您可能当过间谍。或许，您能向我们谈谈为什么会写间谍题材的小说和戏剧。

弗雷恩 就像维利·勃兰特在剧中对纪尧姆讲的那样，或许我就是个间谍。我觉得对于每个人一直在做的事而言，间谍是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我们总是注意观察对方，试图对其他人的感觉和意图做出判断。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这是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方法。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给出决定，“他是不是真诚的？他有野心吗？”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无意之间做出这些判断。甚至，在你下楼梯的时候，如果迎面走来一个人，你就会下意识地判断说，对方对你是否构成威胁，你该走右边还是走左边，或者说尽量避开对方。有些时候，我们是有意做出这些判断的。嗯，间谍当然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必须得处心积虑，还要为他们观察到的结果撰写报告。纪尧姆的间谍身份非常有意思，因为总部告诉他说，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西德造新飞机的计划，虽然他们从不放过他手头的任何情报；他们真正想要他做的是让他留心监视西德人的动静以及政府办公室里的传闻。由于他是在勃兰特的总理部门做事，所以总部让他凡事多加注意，这样他们才能判断勃兰特提出的新政策是否值得信赖。勃兰特是冷战英雄，曾是西柏林市长，力挽狂澜，使西柏

林免于被民主德国吞并的厄运，因此，东德对他的新政态度十分谨慎。有趣的是，东德要求纪尧姆利用他人类天生的判断力来监视西德政府的一举一动。这对我来说，是人类行为学的一个戏剧版本。

沃尔夫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勃兰特的被迫下台？

弗雷恩 嗯，当然是纪尧姆的间谍身份的暴露。纪尧姆因间谍案被捕，在这之后几周时间内，勃兰特递交了辞呈，宣称他为此负有政治责任。但是为什么呢？这是导致他下台的真正原因吗？我想所有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专家都会赞同这样一个观点，纪尧姆并不是勃兰特下台的简单原因，其背后还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因素。这就是我对现代德国政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相当的复杂。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有它自己的政治体制，自己的议会，自己的一套领导班子。他们都要同联邦政府的步调保持一致。德国的政治也完全取决于对外联盟。自从世界大战以来，每届政府都是采取联盟。维系这种联盟关系又是政治复杂性的另一层面。同样的，正如我之前谈到过的，勃兰特本人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所以他辞职的原因就更加难以捉摸了——尤其是在他自己领导的党内，社会民主党——一部分也是因为他自己性格中的矛盾冲突。纪尧姆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他揭露了党内的状况，使局面难以维持下去。勃兰特自己经常说，他要是没打算戒烟的话，也就不会被逼辞职了。他严厉谴责了赫伯特·魏赫纳，一位掌握德国社会民主党实权但又心术不正的人物，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因为当他向她征询是否应该辞职的时候，她没有进行劝阻。

沃尔夫 在该剧进行首演的时候，我相信是每次演出的时候，都

有那么些时刻，就是观众看到剧中所表现的东西真实地反映出了当今英国社会的现状，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前“东方政策”所要反映的东西时，剧场里总会爆发出阵阵笑声。这些都是你信手拈来的，还是创作时刻意安排的？

弗雷恩 一些评论家评论该剧说它影射了当今英国工党的困难处境。但是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我就已经创作完成了该剧，所以它谈不上是针砭时弊，但是里面确实含有一些类似之处。勃兰特和布莱尔都是极富亲和力的公众人物，极富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在他们政治生涯的某一阶段，他们都大获人心；但是当选民们开始不再信任他们时，他们又大失人心。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当时勃兰特连任期间政府内幕的复杂情况与当今布莱尔政府后台颇为相似。但是我不想陈述得过于详细，毕竟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沃尔夫 您是怎么来决定您的作品的名称的呢？《哥本哈根》一剧是以故事发生的地点来命名的，而《民主》一剧则是以该剧探讨的政治体制来命名的。

弗雷恩 没错。要是德国政府所在地设在柏林的话，我想我会用《柏林》做名字。但是波恩听起来太平淡了，而且民主是该剧真正要探讨的东西。这部戏要探讨的其实是每个人在做每一项抉择时的艰难，并不仅仅只局限于政治生活，甚至可以具体到客厅的家具怎么摆设，到哪里去度假。凡是涉及到两人及以上的事情，总是会包含政治性的思辨，妥协，试图试探他人的真实情感，试图做到左右逢源。抉择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妥协和错误是难免的。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讲，这部戏探讨的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但是我又认为民主精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每个人

的心里都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单单把所有这些可能性都集中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出最终要采取的行为方式，就已经困难得有如在公众中推行民主了。

沃尔夫 我有时会听到“男人戏”这个说法，但是种轻蔑的表达。我觉得这部戏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虽然是“十个男人一台戏”，但是观众在观看演出时不会感到不耐烦。当您在创作该剧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弗雷恩 我的确担心过。我不希望写一部全是男人的戏。这太可怕了。但是问题是当时在德国政坛上女性政治家可谓是寥寥无几，正如我在《〈民主〉后记》中提到的，要不是德国政坛上男女比例如此的失调，勃兰特政府的命运就不至于如此了。纵使最终导致勃兰特下台的是他的风流韵事，是他的儿女情长，但是这部戏仍然不涉及一个女性角色。但是在这部戏的幕后站着许多女性角色，正如在这个故事的背后站着好几位举足轻重的女性：一位是勃兰特的妻子，另一位是纪尧姆的妻子，虽然后者与前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但是我并没有将她们写进剧本，搬上舞台。最后，在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就照既定的想法来写这个剧本，正如你所说的，真是“十个男人一台戏”。

沃尔夫 去年的时候，当汤姆·斯托帕（Tom Stoppard）的三部曲名剧《乌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一部关于19世纪欧洲大陆思想史的剧作，在奥利弗剧院（Olivier Theatre）公演的时候，他探讨了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戏剧表演的困难。当然，在9小时20分钟的时间内他做到了。我只是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样将理论研究中的成果运用到实际戏剧中去的呢？

弗雷恩 这是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要一步步来。这部戏动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要想成功完成这次研究，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该请位研究助手。我以前从没请过助手，但是这次关于那个时期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大量的全德语文献、剪报和影像资料。虽然我能够用德语进行流利的阅读，但是要快速浏览一本德语书籍，看是否有我感兴趣的内容，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后来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助手，斯蒂芬·科洛纳（Stefan Kroner），他曾经是一个德国版本《哥本哈根》的导演。他真是太棒了：非常勤快，勤奋，很主动，总能够猜透哪些内容是我感兴趣的。他将所有材料进行了归类，浓缩，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的材料。我的书房里全是他寄给我的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了——正因为有了他，我才能写出这部戏。

沃尔夫 您有没有打算排一部德语版的《民主》，如果有的话，您会不会加进一些现在这部戏里没能用上的内容？

弗雷恩 我想，这部戏会在2004年5月6日在德国开演，那天正好是勃兰特辞职三十周年纪念日。《民主》里的勃兰特是一个完整的平凡人的形象；我希望大家会喜欢上这个人物。剧中他的弱点和缺点也都暴露无疑，我希望这对于那些认识勃兰特的人来说不是件太痛苦的事。在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版本的剧本之前，迈克·布莱克莫尔建议我把剧中的专有名词都简化，把所有的简称，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都换掉，因为这些词对于英国观众来说，理解起来有点费劲，所以都换成像东德、社民党之类的称呼，但是在德国这些名词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所以我们会用一回以前的叫法。

沃尔夫 谈谈您和导演布莱克莫尔之间的合作吧……合作了八部

作品，是吗？

弗雷恩 是的。布莱克莫尔和我在戏剧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就是要看看我们俩在一起究竟能合作几部戏。我看了节目单，发现我们两边记载的数据有点出入，最后我们商榷为八部。

沃尔夫 迈克会参与您的创作过程吗？您会把稿子寄给他看吗？这会不会对他的导演工作有所帮助？

弗雷恩 我尽量在完成剧本后再给别人看，先是我的太太克莱尔·托玛琳（Claire Tomalin），然后再是迈克·布莱克莫尔。迈克是第二个看到剧本的人。我会和他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他会让我把剧本读给他听，这对我来说真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我完全没有当演员的天赋，老实说，甚至还有消极的一面，我甚至连自己写的台词的重音都不准。虽然这是个很可怕的过程，但是这也说明了我们是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的。迈克会问些很傻的问题，比如说：“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就会说：“很明显，她就该这么说。”之后，我意识到她其实可以不用这么说时，于是我又说：“好吧，我把它删掉。”他常常会说服我改动剧本，但是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使台词更简洁。

观众 您是有意要等到勃兰特逝世之后才开始写这部戏的呢？还是写作本身就花了您很长时间？

弗雷恩 不是的。勃兰特是在1992年逝世的，我是直到三年前才开始打算写这部戏的。

观众 您的下部作品会是戏剧还是小说？

弗雷恩 我目前在将我的上部小说《间谍》改编成电影剧本。至于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我还没有打算。

观众 是不是有关近代历史的文献在德国的公开程度比在英国

要高？

弗雷恩 就政府文件而言，恐怕是的。我使用的大多数资料并不是政府内部文件而是新闻报纸或是电视资料。如今在德国，有关东德政府，特别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文献是一座巨大的信息库。现在这些信息都由一个西德机构管理，对研究者开放。但是保存下来的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文件（许多文件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覆灭而被销毁）简直是浩如烟海，尽管从事这些文献研究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但至今仍有大量卷帙有待查阅。东德当时谍影重重。我当然不可能亲自查阅那么多的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文件，但是斯蒂芬·科洛纳做到了，而且他还请教了二手资料来源的专家们和德国学术界的学者们，发掘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材料。

观众 就您先前提到的海森伯这一角色，您是否认为，比起海森伯来，维利·勃兰特的形象更加贴近于原型？

弗雷恩 我不这么认为。当然了，勃兰特更加接近于原型是因为关于他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所以你可以接连好几个小时观察他的演讲，绝大多数是公共演说，偶尔也有和家人或私人的谈话，比起玻尔和海森伯来，观众更容易在脑中形成一个勃兰特平凡人的形象。

观众 对于您这一代的人来说，劳伦斯·奥利弗就是理查三世（Richard III）的化身，那么，对于将来那些去看您的戏却不知道勃兰特为何许人也的观众，您认为您要担负起什么责任？

弗雷恩 我认为作者的责任就是清楚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正如我在《〈民主〉后记》中提到过的，如果你首先就声明这只是文学创作，那么，将真实事件加以文学的修饰

也就无可厚非了。但是这部戏是基于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的。剧中的全部台词都是经过加工润色的，就连勃兰特的公共演说也是如此。我本来打算用他的真实演讲内容，但是后来还是进行了浓缩、剪接，从而形成一次有重点的演讲。但是剧中大多数的对话在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也不可能发生。我认为勃兰特和纪尧姆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像剧本里写的那样讲话。老实说，只要是正常人都会这么觉得。但是如果有人被误导的话，我想我在剧本里的声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沃尔夫 德国大使有来看过演出吗？

弗雷恩 在演出的两周内，我相信德国驻英国大使会带着一大队人马来看演出。

观众 德国大使曾经这样说过，在德国，在对学生进行有关二战和纳粹时期的历史教育时，如果不涉及战后时期，那就无异于种族主义教育。同样，在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时候，我发现在德国报纸上找到的有关英国议会的报道甚至比英国国内的还多，对此我感到很惊讶。请问，您对英国议会制度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之间的不同点（个人认为是种优越性）有什么看法？

弗雷恩 说来也奇怪，虽然我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政府一贯推行的联盟政策的诸多弊端，但还是不得不承认也就是这种政策给德国社会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稳定性。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战后德国政治获得成功的一个基础就是他们的宪法。德国人不称之为宪法，而是叫基本法，因为德国人不愿接受在宪法上承认德国分裂的事实。基本法的制定也是事出无奈，因为执政当局声称他们不得不制定一部宪法。于是他们制定了一部很好的宪法，很符合德国

的国情。德国人也向来以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而感到自豪。所以，我不禁要想，英国要是也实行基本法，我们的社会状况是不是也会得到改善。设于卡尔斯鲁厄的宪法法庭是个非常权威的机构。比如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执政当局准备将那些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效力的人员绳之以法。他们将臭名昭著的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头目马尔库斯·沃尔夫告上了法庭，最后他被判有罪。但之后卡尔斯鲁厄的宪法法庭又驳回了此案，并声明：“对于那些曾经是东德公民而今天不是西德公民的人，我们无权审判。”面对德国大众的激昂情绪，这真可谓是个大胆的决定。此外，对于你刚刚提到的德国报纸的报道，我也表示赞同。

观众

您的剧中所引发的矛盾冲突真的很引人入胜，在看完了《幕后的喧闹》和《哥本哈根》以后，我太太和我就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在激励和愉悦着我们的作者。我太太认为，这几部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模棱两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一个相同的主题。如果您能就此发表一下您自己的看法，我将不胜感激。

弗雷恩

要弄明白自己的想法还真有点难。作者只是负责把自己心中所想写出来，但是写完之后，读者、观众还得琢磨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令我很吃惊的是有一次，在演完《哥本哈根》接受采访时，他们跟我说，他们突然意识到《哥本哈根》的结构和《幕后的喧闹》如出一辙。之前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写的时候，故事情节充满了整个脑子，牢牢抓住你的想像力，没等创作完成，你是不会意识到为什么要这么写的。现在我明白《幕后的喧闹》一剧背后蕴含的哲理了，但是我还是不确定在动笔前脑

子里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

沃尔夫 您总是从多个视角来叙述一个故事，是不是这样？

弗雷恩 因为戏剧是由多个互动的角色组成的，所以从各个角色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戏剧表演，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小说里，通常会通过某个特定的角色的视角，特别是在我的小说里，通常只有一个中心角色，然后通过他或她的视角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但是，在舞台上，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部戏里有十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会很自然地透过他们各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观众 您认为勃兰特政府的垮台仅仅是德国政坛的一个政治事件而已，还是会把它放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来考虑？因为我看到当时世界范围内还是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左翼政府，还有一些西方人拒绝与东方阵营对话，拒绝采取缓和政策。

弗雷恩 下台的只是勃兰特本人，而非他的政府。在赫尔穆特·施密特的领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掌握着政权，他们继续奉行“东方政策”，“东方和约”，坚定不移，孜孜以求。所以勃兰特下台并未对此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也未改变德国政府的策略，但是这却是个绝大的损失，因为很多国家的人民都给予了这位领导人很大的信任。他的政治生涯十分清白，他本人也极富魅力，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挪威，都是个身体力行的双语者。很难相信，时至今日，一些人对德国还是持怀疑态度，但是当我们谈到1970年代时，谈到那些帮助德国树立了国际新形象的人时，勃兰特无疑是其中一位。

观众 勃兰特和他的时代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受到法

西斯主义的玷污，他曾经放弃了德国国籍；在战争中与挪威人民共同抗战；当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说时，他与阿登纳并排站着。我们觉得这是他的优点，但是一些德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右派仇恨他是因为他的战时记录，左派仇恨他是因为他曾是反共先锋，曾协助铲除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我在想，是不是这种内在的矛盾也是勃兰特之谜的一部分呢？

弗雷恩

我要澄清的一点是：勃兰特从来没有帮助挪威人抵抗过德国，这只是右翼报纸的诽谤而已。他去挪威，是以社会工人党代表的身份去的，当德国入侵挪威的时候，他成功逃亡到中立的瑞典，在那里继续从事党内工作，直至战争结束。他从未反对过他的德国同胞。但是德国右派决不会原谅他的出逃，也不会原谅他和挪威的结盟，这倒是真的。他加入过挪威国籍，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穿着挪威军人的制服回到了德国，因为这是战后能够重返德国的唯一途径。左派一直对他心存怀疑，这也是真的，因为他确实曾和赫伯特·魏特纳、赫尔穆特·施密特一起说服社会民主党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采取一种和布莱尔颇为相似的折中主义。尽管如此，他的魅力和魄力是如此之大，吸引了大量的支持左派的选民，在1969年大选中大获成功，这点也跟布莱尔极为相似。到了1972年第二次选举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人们把他视为英雄，甚至在有些地方把他奉为神明。在这之后便是大失民心，我觉得右派的真正支持者，尤其是那些德国东部流离失所的居民，因为后来这些领土变成了波兰和苏联的领土，他们是决不会原谅他的，也决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千百万被驱逐的居民或者他

们的亲戚，对于受到这样的遭遇真是苦不堪言，所以他们是可能原谅任何默许这样的遭遇发生的人的。还有那些居民的亲友们，那些认为西德政府是用强制手段统一德国的人（虽然没有人知道这“统一”的背后究竟是用什么手段），他们也同样不会原谅他。所以说，他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但是他的确成功了，仅仅凭借着他的人格魅力，统一了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的思想。

[采访地点：科特斯洛剧院；采访时间：2003年9月19日。
马特·沃尔夫为伦敦剧院《综艺》（Variety）栏目的评论家。《民主》一剧于2003年9月9日在科特斯洛剧院首演，
2004年2月12日移师利特尔顿（Lyttelton）剧院演出。]

（留妍 译）

附录

弗雷恩访谈录

马希·卡恩 (Marcy Kahan) 采访

我以前未曾采访过别人，很高兴第一次就是为 BOMB 杂志采访。该杂志强调的是活泼生动的语言，不加怀疑的蔑视或无耻的奉承。同时我也很高兴采访的对象是著作甚丰的迈克·弗雷恩。他写了九部精彩的小说（包括获得布克奖的《勇往直前》，十三部出色的戏剧（其中有令人捧腹的《幕后的喧闹》，也有引人入胜的《哥本哈根》），还翻译了一些契诃夫的作品。但我和迈克·弗雷恩的初次接触却并不怎么振奋人心。

卡恩 弗雷恩先生，我打电话过来再次确定一下，今天下午五点我将代表 BOMB 杂志对您进行采访。

弗雷恩 好的。你有没有意识到 BOMB

对于我们这些戏剧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多么不祥的词？*

卡恩 我知道你的意思。无论他们什么时候给我发邮件，我都会觉得胃里一阵抽搐。

弗雷恩 你现在是在采访我吗？

卡恩 呃，不——我想我得先绕完线路，五点开始采访。

弗雷恩 好的。现在是伦敦时间四点二十五，你三十五分钟内打来吧。

卡恩 （越来越惶恐了。采访还没开始，我们的交流就失败了。）
如果我在三十五分钟内给你打电话，我就不能在五点的时候赶到你的办公室了。

弗雷恩 你不在纽约？

卡恩 我在伦敦。

弗雷恩 啊，当你说“绕完线路”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一个表示把你的录音机接到电话上的最新科学技术呢。

我绕完了线路，迈克·弗雷恩在他那间处于摄政公园旁的堆满书的办公室里为我泡了杯茶，然后他提醒我打开麦克风，采访开始了。

卡恩 美国观众将知道你的剧本《哥本哈根》获得了2000年的托尼奖最佳戏剧奖，你的书《勇往直前》也在那里出版了，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你最初的成功是在做通讯记者方面。你在1960年代为《曼切斯特卫报》和《观察家》写专栏文章，并获得了“现代德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美誉——创造了代表不同道德模式的角色。我想把名字列出来——克里斯托福·斯慕斯（Christopher Smoothe），投机倒把部长；若罗·斯

* 在英语中，bomb表示戏剧或电影的失败或不卖座。——译注

卫弗里 (Rollo Swavely), 公共关系人士; H·斯宾塞 (H.Spencer Upcreep), 皇家通讯员; 拉维尼亚·克朗布 (Lavinia Crumble) ——拉维尼亚·克朗布究竟是谁?

弗雷恩 我在专栏里写了两对夫妇: 克里斯托福和拉维尼亚·克朗布, 霍瑞斯 (Horace) 和多里斯·莫里斯 (Doris Morris)。克里斯托福和拉维尼亚·克朗布知道的比我多得多, 也比我聪明得多, 也曾对我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霍瑞斯和多里斯·莫里斯比我笨, 我对他们采取屈尊俯就的态度。所以, 我可以从克里斯托福和拉维尼亚·克朗布那里发现当时的正确价值观, 然后我又吃惊地发现霍瑞斯和多里斯·莫里斯并不知道。

卡恩 这就是让争论者一直争下去的好方法。

弗雷恩 完全正确。

卡恩 在一篇 1963 年发表的论文里, 你卓然地将英国人分为食草动物——空想社会改良家, 吃着牛奶什锦早餐, 热衷于请愿的中产阶级, 和食肉动物——精英钻营者, 尽可能为自己和家庭谋取尽量多的利益。过去的二十年可以被称为“肉食动物的复仇”。

弗雷恩 当然。

卡恩 是怎么回事呢?

弗雷恩 不仅是在英国, 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样, 权利在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间转移。在一段自我放纵和利己主义之后, 人们厌烦了这些, 他们想要更高目标的生活, 他们又想试试利他主义。在一段利他主义和无私的生活之后, 他们又厌倦了, 想要重新过上以前的舒适生活。这很容易理解。人们在不同的氛围中摇摆不定。

卡恩 这个看法很乐观, 因为它表示人们还可以从一个端点摆

回到另一个端点。

弗雷恩 是的，我想事实就是这样。虽然相当困惑，可是我想目前的政府基本上是草食动物。它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在心底里是一只羊，但却尽量装扮成一只狼。

卡恩 是的，人们对改选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的小心。播音员简·贝克威尔（Joan Bakewell）最近在 BBC 电视中做了一个包括三部分的系列节目，叫做“我的那一代”——即关于 1950 年代在剑桥就读的你们那一代。

弗雷恩 没错。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我的妻子克莱尔·托玛琳的。

卡恩 看完这个节目我的感受就是，生活在你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赶上了好年景。

弗雷恩 这是看法之一。我们都在战争年代中长大，但是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当时都是些小孩子。战争结束后，普遍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人们确实认为你能为解决问题做一些事情。我想我们当时深受其影响，或者说，深受其鼓舞。我的一个在纽约和伦敦都上演过的叫《施主》的剧本，就是关于从这种无处不在的态度中解脱出来的故事。我在 1960 年代末曾到过美国，在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乐观感觉，即社会能够被改良。教育可以大范围普及，并能够完全改变社会。我想人们不再相信这点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事情也变得更棘手了。问题比我们想像的要持久和困难得多。

卡恩 BBC 播音员马克·罗生（Mark Lawson）曾谈论到英国戏剧。他说在 1979 年，如果你把一个火星星人带到英国，让他看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大卫·马瑟（David Mercer）和特雷弗·格里菲斯（Trevor Griffiths）的戏剧，然后你对这个非常聪明的火星人说：“看完这些戏剧

后，你认为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火星人会说：“将会发生马克思主义革命。”

弗雷恩 对，许多人都这么想。

卡恩 看电视、去皇家宫廷剧院和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看最新的戏剧，那就是当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记者生涯。你的戏剧比起那些愤怒的作品来有更多的喜剧平衡——

弗雷恩 它们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戏剧。我得说，我已经度过迷恋马克思主义的时期了。在学校那会儿，我对它感兴趣——哦，我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对俄国很感兴趣。我在学校里自学俄语，然后除了对俄语感兴趣，对共产主义的兴趣已经消亡无几了。

卡恩 你的义务兵役——你用服兵役的两年时间里学习了俄语，但你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军训。

弗雷恩 是的。我们得做一些基本的训练，然后我争取上了俄语课，被培训成一名俄语翻译。我们被派往剑桥。我们并不像学生那样上课——我们仍然是军队里的一员——但是剑桥拒绝让我们穿着制服上课。于是我们穿着平民的衣服，每天在大学里学习。我们学得很努力，周围是些意气相投的人们，他们精通语言，学术也做得很好。我非常享受在那里的日子。我喜欢我的学业，也喜欢我的同伴们。

卡恩 剧作家阿兰·本内特（Alan Bennett）曾经——

弗雷恩 阿兰·本内特是一个不错的朋友。我们上同样的课程，并在一起合作过演出。我们曾演过时俗讽刺剧，那是他创作讽刺伪善牧师的短剧的开始。

卡恩 1960年代你在莫斯科待了很久吗？我读过你1966年写

的小说《俄文翻译》，它描述的是莫斯科当时滑稽但骇人听闻的封闭状况。

弗雷恩 服完了兵役后，我在剑桥读了三年研究生，当时人们是这么称呼的。其他四个和我一起学俄语的同学和我一起说服了莫斯科大学让我们以第一批交换生的身份入校。他们只允许我们学一个月，并且在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不怎么喜欢我们，也没有把他们的学生交换到剑桥。当时是1956年，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开完第二十届党代会之后，匈牙利起义之前。莫斯科大学曾经是并且现在可能仍然是莫斯科杰出的大学，那里有像戈尔巴乔夫之类的人物，他那时肯定也在那里。我当时没见过他。但那时将要治理俄国的人物都在那里学习。那时俄国的学生中间也悄然开始动乱前的迹象，但仅仅是开始。他们得非常非常地小心。

卡恩 我曾经跟一些后来到过那里的演员谈过，他们在1960年代随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去那里，他们说当他们见到那里的戏剧同行时，发觉这些聪明有教养的人们都很抑郁，他们生活在如此受束缚的环境里。

弗雷恩 哦，我同意。我想“抑郁”是那个时期苏联人生活的关键词之一。我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去过苏联很多次。我待在那里的时间从来不会太长，但是作为一名记者，并且在那里出版了一本小说，我得不时地去那儿。不管怎样，朋友们曾经常跟我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完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每次我回到那里，事情还是没有变化，人们还是在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然后突然间它不再那样了，非常难以置信。整个事情完全崩溃了，如同人们常常预见而我从不相信的那样。

卡恩 从那以后你回去过吗？

弗雷恩 没，没有。我觉得很担心。我连一个路标都不认得了。我不该回去。

卡恩 在过去的几年里，你有没有因为《哥本哈根》而花更多时间待在丹麦？

弗雷恩 我在那里没待多久，但是我去那里做过短期旅行。

卡恩 当你在写作《哥本哈根》的时候，我获悉你觉得如果能在广播中播放这部作品，你将觉得很幸运。因为这是对两个物理学家一次著名会面的重构——有丹麦和犹太血统的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和纳粹占领时期的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之间的会晤。在战争爆发前，玻尔曾是海森伯的良师益友。该剧的大部分情节重现了他们关于不确定原理和量子物理的争论。

弗雷恩 是的，我想没有别的人想排这个剧。怎么会有人想要排这么一部无聊抽象的戏剧呢？

卡恩 现在，从结果来看，你已经风靡全球了。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这么受欢迎吗？

弗雷恩 不，这可把我难倒了。

卡恩 我想知道是否有人看了《哥本哈根》后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我的感受非常独特。我看的是科斯特洛剧场的星期六日场演出，观众大多是特罗洛普协会（Trollope Society）的会员，看起来都超过了六十岁，但是兴致很高。

弗雷恩 是的。

卡恩 我观看该剧的时候完全被迷住了，因为我之前只对海森伯和玻尔的那次有名的会晤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灯光暗淡下来，我想，这是一部多么发人深省的令人满意的戏剧啊。当我披上外套走向出口的时候，才意识到四分之

三的观众都在排队买冰激凌。

弗雷恩 啊，是的。你把幕间休息当成了这部剧的结束。

卡恩 所以我当时把自己扮成了迈克·弗雷恩笔下的一个戏剧人物，走出去，装作我要去抽根烟，但是我并不抽烟，所以我对其他抽烟者做了一个煞费苦心的手势，表示我忘了带烟了，然后走进来，脱下外套——

弗雷恩 你以为戏已经结束了。

卡恩 嗯，当然我很高兴我留了下来，因为第二幕出现了让我从骨子里震颤的高潮。我不知道有没有别人走出了出口，就像我这样，不是说“我不懂里面的科学”或“我认为这部剧只有些狂妄的傻话”，而是说“这相当让人满意”。

弗雷恩 我想人们也许会在幕间休息的时候离开，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部剧的话。以前曾有一个男子——美国人，在演戏中间跳起来说道：“我抗议！”但是他到底抗议什么我们并不很清楚，他也没有解释。

卡恩 这部剧上演后，你有没有收到过认识海森伯和玻尔的人，或者物理学家写来的信呢？

弗雷恩 收到过。当我写这部剧的时候，首先我觉得非常的胆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关于真人真事的作品，同时也觉得受束缚，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曾生活在我们中，或像这样或像那样，并且他们的言谈举止我没法再次体验。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与他们见面，他们已经去世了，虽然我能够用手触摸到他们写下来的东西，但是我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所以，一开始我感到很尴尬，但是你不能总是尴尬下去；最终人物的问题克服了，就在你写作的时候，他们似乎有了生命，之前的障碍和困难烟消云散了。但是我仍不能确信这些曾经是真实存在的人，虽然

他们不在了，但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认识的人可能还活着，他们可能来看这部戏剧，并对此有自己的感受。之后我却万分惊喜。我必须说认识海森伯和玻尔的大多数人对此都非常慷慨宽容。我想，从某一点上看，这是对人类想像力持宽容态度的明证，是人们对戏剧反应的明证。所以，当他们接受某种事物时，如果他们把这个故事看下去，他们作好了相当的准备，他们准备好了走一段长路来实现它，理解它和接受它。许多认识这三个人的人说他们就是这个样子，这些演员与海森伯和玻尔像极了——虽然事实并不是这样。要找到与原型人物长得相像的三个人可不容易，但是如果人们喜欢这个故事，他们就做好了接受它的准备。最让人胆怯的事情发生在纽约第一次公演的时候，我在剧终后走到后台去，在那里面对面地碰上了一个非常英俊迷人的男子，他说道：“我是约亨·海森伯，沃纳·海森伯的儿子。”他住在美国，是个物理学教授。事实上，我知道他来看演出了，但是我没想到在与我的剧组演员见面之前就和他面对面地碰到了。他对这部剧相当地宽容与温和，但是他说道：“当然，你的沃纳·海森伯不像我的父亲。除了在音乐方面，我从来没见过他表露过任何情绪。当然在这部剧里，角色得或多或少地坦率一点，否则你就排不好戏了。”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卡恩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篇学术论文，说你——不知你是否同意——对海森伯过分地同情。

弗雷恩 哦，我的天哪，一篇论文。美国总是存在一种异常的强烈反应，特别是来自研究海森伯的学者们。海森伯在他们中口碑不佳。在美国有一个学术组织，人们受他们的

文章影响，非常地坦率，他们在他身上没发现一点优点。你刚提到的文章是在《美国科学家》上发表的；它是由一个物理学家写的，他说我把历史背景和科学都弄错了。我觉得作者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他对这部戏也抱着消极的态度。

卡恩 但是我在美国的大学里读到过它，这部戏被列入了大一新生的阅读书目里，向他们介绍一点量子理论和科学中的道德伦理。因此，赞成和反对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弗雷恩 完全正确。嗯，它在美国激起了一场比这里更激烈的讨论。我并不是想挑起一场支持或反对海森伯的辩论。我要说的是要知道他的动机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探究所有人类动机的一个例子——要知道人们为什么做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困难的。我也非常理解一些人从另一些角度和事件来看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从哥本哈根的那场会晤，并由此总结出他非常抵制纳粹政权。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确实需要做判断下结论。但是有些人似乎认为，我在尽量证明他对纳粹隐瞒对原子弹的了解是为了表现他的英雄主义。但那并不是我想在剧里表达的。我觉得他没有做数学的核心问题，他也没法对付挑剔的大众。两方面都有明证，但是明证的结果是他没有做，而且问题的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对一般问题不畏困难，对科学问题过分自信的他，这次没有做？他发现问题时从没有袖手旁观。他迎难而上，并且常常得到意料之外的解决方法。那么，这次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干了？也许没有原因。也许他没有考虑。人们大多不考虑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英国的弗里施和佩尔斯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并解决了呢？我认为你不得不得觉得弗里

施和佩尔斯非常渴望去解决它，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正义的事业，他们觉得德国人有可能在研究原子弹，他们想要在德国人之前完成，人们不会想到海森伯会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其他的德国人也没有想到。如果你读过“农庄园”的抄本——海森伯和其他一些德国科学家曾被扣留在那里，他们的谈话被英国窃听并记录了下来。他们的谈话明显围绕着是否建设核反应堆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在认真思索研制核武器的困难。他们并没有直面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他们之所以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直面这个问题。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这个循环不断延续。如果他们对研制核武器真正上心的话，他们就能打破这个循环，像弗里施和佩尔斯那样做出来了。但是，这让他们陷入了道德陷阱——如果你没有能力实实在在造出核武器，他们就不必考虑是否应该制造。这个结果让人慰藉。虽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有想在戏剧里证明什么。我只是想把这些可能性公之于众。

卡恩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戏剧家能够做的。

弗雷恩 是的。

卡恩 你的最新一本小说《勇往直前》——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你经常去参观维也纳艺术博物馆，也经常去布鲁格的展区。有一天你注意到有一条小标签上说，有几幅四季组画只是一个系列中的一部分，其中有一幅丢失了。

弗雷恩 是的。

卡恩 你从有这个构思到开始动笔写这本小说花了多少年？

弗雷恩 不是多少年，而是多少天。克莱尔和我去维也纳，我们看到了这个标签，我立刻就想写一部小说。于是一回到

伦敦，我就开始了研究工作，并且完全入了迷。

卡恩 你的研究工作反映了主人公马丁·克莱（Martin Clay）的研究工作吗？

弗雷恩 是的。我们做的几乎是相同的事。我尽力去发现是否有这么一幅画，如果有这么一幅画，画的主题应该是什么。马丁·克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找到的那幅就是遗失的那幅画。

卡恩 你清不清楚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对英美战后文学的分析？

弗雷恩 不清楚，你告诉我。

卡恩 他觉得在充满感性的写得很好的小说和机场商店卖的畅销小说之间存在着分裂。前者描写汉普斯蒂德的通奸和没有拥有权的痛苦，后者通过一些研究和难懂的信息来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但后者远没有前者写得好。你可以通过写小说来满足维达尔先生的愿望，既可以剖析一下幸福和不幸的家庭，又可以分析一下16世纪的艺术史或政治。

弗雷恩 是的，有些人会认为我得抛开一个方面。一些人对喜剧情有独钟，但却认为艺术史无聊寡趣。有些人喜欢艺术史，但容易被现实生活激怒。我很喜欢在这两种间舞蹈。毕竟，每个人一生中一半时间在做严肃的事情，另一半时间在做荒唐的事情。

卡恩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你说让小说家和剧作家接触一些通讯记者的工作，这是个办法，可以提醒他们世界永远比我们记忆中的要糟糕。这是你的感觉吗？——你曾为BBC做过许多城市纪录片。

弗雷恩 是的。这个工作相当不容易。写小说是辛苦，但是当你

动笔的时候，一个虚拟的世界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从笔端流出来，因为这毕竟是本小说。我想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困难，不是这样的困难就是那样的困难。但是，当你描述一件真实的事情时，它就会变得相当复杂。事情都联系不到一块儿。不是故事，没有情节，没有紧凑的结构。这就是一个作家所看到的世界的困难。它像树，像云，像房子，就是不像词语。

卡恩 我们刚谈到你在维也纳艺术博物馆得到了关于布鲁格的灵感，你有没有马上意识到这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戏剧？

弗雷恩 嗯，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小说里你可以随意进出一个角色的思想，或所有角色的思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但在戏剧里，你得保持在角色思想的外部。当然，你可以让角色说出他们的想法、独白或直接与观众说话。但是戏剧的基本模式是对话。在《勇往直前》中，我想描述主人公马丁·克莱每一步都在想什么。他认为自己在做什么，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高尚还是卑劣，是想选一个还是将两者中和，如此你就能像明白别的事一样明白他的自欺欺人了。

卡恩 从某一点来说，他突然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商人后，他开始拥有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他的婚姻。

弗雷恩 与之相反的是，在《哥本哈根》里，因为关注的是海森伯脑子里所想的東西，似乎我们在判断别人的动机和行为时，应该处在生活中的位置上，从人物的外部来观察他们。他们在剧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坦白过自己，但是我们一般处在他们的大脑外，于是我们就像其他角色那样，在努力地发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卡恩 你说在终极意义上，你学不会如何写小说或戏剧，你学

会的是如何写某本小说或某本戏剧。这像不像是旅行——你是个有经验的旅行者——即使你知道会碰上困难和意想不到的事件——你会不会因为行李被误送到津巴布韦、最喜欢的旅馆没有房间、在圣日尔曼大街吃鸡蛋饼又食物中毒而歇斯底里呢？

弗雷恩 嗯，我不清楚——不管是写作还是旅行，不管以前有没有经历过，每次有这种事发生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似的。当你文思枯竭时，当你情绪低落时，你确实觉得末日来临，你再也不会写出东西来了。

卡恩 你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说法：戏剧可以被分为失败与成功。

弗雷恩 是的。

卡恩 你在《瞧看戏》这部戏剧失败的时候曾对一位记者说，你看了诺尔·考伍德（Noel Coward）的自传，他的一部叫《侯爵夫人》（*The Marquise*）的剧也遭受惨败，让你觉得很受鼓舞。那部剧不叫《侯爵夫人》，而叫《西罗科》（*Sirocco*）。

弗雷恩 真的吗？哦，我的天哪，我告诉过很多人它叫《侯爵夫人》。

卡恩 它们几乎是同期上演的。现在《西罗科》有许多捧场者，但就像你早年遇到的那样，考伍德在《西罗科》初演的时候也被折腾得够呛。他写到，当他从舞台的门里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围着他吐口水，他不得不把衣服拿到洗衣店里去洗。

弗雷恩 那《侯爵夫人》怎么样呢？

卡恩 这部戏曾在维也纳演出，诺尔·考伍德去看时几乎要笑得掉下包厢，因为他看到他们对该戏进行了大场面的滑稽模仿。这些经常光顾伦敦西区的幸灾乐祸的捧场者，有可能为我们所需的戏剧提供一种阿仙奴（Arsenal）足

球队对热刺（Tottenham）足球队般的刺激——你认为现在有让他们再次出现的必要吗？

弗雷恩 他们不一定是幸灾乐祸者。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在戏剧上演的头天来看戏，在第一幕静静地坐着，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去酒吧，讨论并决定他们是否喜欢该剧。我知道他们喜欢一部剧会怎么做，但是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部戏，他们就会在第二幕时回来起哄，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喝彩。我希望他们不要回来。我认为他们基本上是痴迷的狂热分子，同时他们因为人多并且坐在黑暗中，知道别人不能找他们麻烦。

卡恩 彼特·尼克斯（Peter Nichols）带着他的受难剧回来了，他说有同情心的导演都会排演受难剧。你有没有同感呢？你有没有某段时间写小说是因为你写不出戏剧呢？

弗雷恩 这并不是我不写戏剧的原因。我在戏剧方面的事业曾经陷入低谷，特别是《瞧看戏》失败后。后面的两部戏剧比《瞧看戏》要稍好点，但也没怎么轰动。那时我特别希望能直面这种衰退，直到忘记为止。但是《哥本哈根》和《勇往直前》给我带来了惊喜。事实上彼特没能上演这种剧，难度大些。

卡恩 现在我想请你谈谈对进化心理学的看法。

弗雷恩 哦，天哪。好的。

卡恩 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到影响 20 世纪的三大思想家是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达尔文。1971 年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明白马克思的重要性——那时每分钟都有可能发生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弗洛伊德——我们长大后赚的薪水里有一部分肯定会花在坐在沙发上向人谈论我们的私生活的这件事情上。但是达尔文——是的，他完

成了一个关键的发现，但是人们对优生学的厌烦使得他失去了应有的地位。现在是 2000 年了，一切都改变了，进化心理学家们正在从各个方面解释人生。你对这类争论熟悉吗？

弗雷恩 我得说我不太清楚细节方面的事情，但是我对最经典的理论中的进化论的回归非常感兴趣。它有着强大的诠释力量。如果你与一位心理学家交谈，他很可能会说量子技术是科学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这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对于理论的解释也多种多样，没有一种解释是人人满意的。但是，它的预示能力非常强大，并且没有受过批判。我想如果你以生物学为例，进化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并且以后也是这样。我想，如同许多一般原理一样，它能解释很多事情，能解释一切事情，而在这种情况下，它解释不了任何事情。如果人们了解了，他们就会知道进化论是如此不错而又简单的理念。

卡恩 当你考虑这些问题——量子理论、进化论、地球引力——的时候，有没有关于创作一部“假如……”的喜剧的灵感呢？或者你有没有想到一个特别的角色，比如一个性挫折的进化心理学家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一篇剽窃而来的论文？

弗雷恩 我想我的大多数灵感来自情境，并且通常是不按常规的——某种事情误入了歧途，一旦你想到一种普遍情景，你就仿佛看到人们正在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每次都是情境先行。我经常觉得，就像进化论一样，最好的道理总是最简单的，并且确实反映了一些这个世界的真实可能。戏剧因素在文学中很重要，但人们通常以为文学应有一些严肃的目的而将其忽略了。但戏剧和小说重要的

一点共通之处就是，你能把它演出来。你能创造并不存在的情境，你也能不受现实生活的束缚。

[发表于《博名》(BOMB)杂志，第73期，2000年秋。采访者马希·卡恩也是一位剧作家，同时为舞台、电视和电台写作。她为BBC写过许多剧作，影响很大。]

(周婕 译)